

第一章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 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它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特点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母体中，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工商业城镇和市场的大批涌现，自然经济的日趋解体，冲击着封建经济的根基。特别是从明代中叶起到鸦片战争，在中国手工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还无力摧毁封建主义，但“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当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正处在迅速发展阶段。清王朝为了确保自己的封建统治，便实行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这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相矛盾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越出国界，寻求广大市场。因此，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把封建落后的中国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倾销廉价商品的主要基地。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中国社会失去了正常发展的机会，一步步地向着半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页。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

首先，“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場。”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把棉纱、棉布、煤油及其它各种廉价工业品大量推销于中国，同时又从中国廉价掠取茶丝、棉花、牛皮、大豆等各种原料和特产。通过搜刮原料和推销商品，外国资本的势力逐步遍及于各口岸，城市以及内地广大乡村。使得原来不需要依赖市场的个体农民，转而必须依靠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同时生产部分为了交换的农产品，变成了小商品生产者。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狭小的地方市场扩大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并逐渐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及附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个市场，虽然为外国侵略者所占有，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占领市场的缝隙中，也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劳动力的市场。”外国廉价商品在中国的倾销，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竞争不过机器工业。“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洋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②“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③这些破产的、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为了生活，便不得不出卖自己仅有的劳动力，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日益扩大的劳动力市场。

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财富的积累也随之增长。除了封建政府利用国家权利，征收田赋、盐税、厘金、茶税及其它苛捐杂税，对人民进行超经济掠夺外，封建地主、大官僚地主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9页。

②③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65页、233页。

通过对农民提高正租率和增收附加租的剥削，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一些官商、行商和银号、钱庄的经营者，通过贱买贵卖、侵占、欺诈等手段，攫取了一定的货币财富；直接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的买办，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利益中分得相当数量的财富；在美国、日本、南洋等地经商的华侨，早已有致富者。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的人，在外资的刺激下，对资本主义生财之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将手中的货币财富部分地投资兴办近代工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就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受到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打击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严重威胁之后，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官僚，积极兴办军事工业。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以强化和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以1861年曾国藩开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至90年代，共设立大小军事工业19个，雇佣工人约1—1.3万人，花费国库经费4.5千万两左右。其中较大的企业有：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和通商大臣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189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创办了湖北枪炮厂等。这些军事工业，是由清政府封建官僚所控制的官营工业，资金来源于国库。经营的目的是为了交换和利润，而是为了直接武装封建军队。企业管理也是沿袭封建衙门的一套规章制度，所以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但是，这些企业普遍使用机器生产；采用雇佣劳动；生产也受价值规律的作用。从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近代军事工业。它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对西学的传播和科技人才的培养都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从19世纪70年代起，以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为了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供应、减轻财政困难和牟取高

利，打起“求富”的旗号，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以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为起点，到90年代中期，这类企业有20多个，资本达1.7千万两。主要是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采煤、炼铁业，和为解决财政经费的贵金属开采以及利润丰富的棉纺织业。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有：1875年开办的台湾基隆煤矿，1878年兴办的开平煤矿，1888年开办的漠河金矿，1890年兴办的汉阳铁厂，189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兰州机器织呢局、湖北织布局、华新纺织新局、湖北缫丝局等。这些民用企业和军事工业又不尽相同，资本的所有者多数是以私人投资为主；企业生产的产品全属商品生产，计划出售，并有明确的利润目的；工人自由招雇等等。因此，这些企业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虽然仍带有明显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阻碍着当时正在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他们毕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工业，它们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训练了一批掌握近代生产技术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办了一批洋务学堂，首次派遣了出国留学学生等等。这在客观上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开始出现，当时仅有20家左右。80年代逐渐增加，约有50多家，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到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企业共创办136家，资本达500万两，雇工近3万人。民族资本企业主要是缫丝、轧花、棉纺织、面粉、火柴、造纸、印刷、采煤、金属开采、船舶修造、公用事业等。

缫丝业：1872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到90年代广州及其附近机器缫丝厂发展到50多家，成为发展民族资本缫丝机器工业的一大中心。1882年上海出现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到90年代出现7家，成为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另一个中心。

轧花业：1875年在江苏设立程恒昌轧花厂，1887年在宁波设立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此后在上海建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和礼和永轧花厂，每厂有轧花机数10至100余台。

棉纺织业：90年代在上海建立了华新纺织新局、上海裕源纱厂，在宁波建立通久源纱厂。此外，在天津、镇江、广州、重庆、扬州、广州都曾有本地绅商酝酿兴办纺纱厂。

面粉业：1878年在天津创办了贻来机器磨坊，1887年设立福州面粉厂，在上海开办了源昌机器碾米厂等。

火柴制造业：从1879年至1900年，先后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浙江、太原等地都设立了火柴厂。其中上海的燮昌火柴公司、天津自来火公司、重庆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等，规模较大，雇佣工人各约数百人。

造纸、印刷业：1889年广州设立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1891年上海设立伦章造纸厂。甲午战前，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设立新式印刷厂10余家。其中，1882年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局规模较大。

采煤业：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后在安徽池州、湖北荆门、山东峄县枣庄、广西富川贺县、直隶临城等地筹办煤矿。其规模，资本少则2~3万两，多则20~30万两。此后又建9个煤矿企业。这些煤矿由于资金不足，技术落后，有的仅能勉强维持，有的开办不久即行停闭。

金属开采业：1881年至1894年，中国民族资本开办金矿、银矿、铜矿、铝矿等14个企业。规模最大的是1883年开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投资总额达80万两。

船舶修造和机器制造业：甲午战前，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在上海一地设立了10多家企业。其中，船舶修造业达9家。这些企业规模都不大，资本最多达500元左右，少至100元。大部分企业只能从事修理业务，只有少数几家能够进行某些机器的制造。

此外，在制茶、制糖、制药、轧铜、制玻璃、制煤饼、制汽

水、碾米等方面，也产生一些民族资本企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不是在手工工场的基础上产生。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一般要经过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大机器工业几个阶段。手工工场的充分发展是大机器工业产生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没有发展到手工工场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出现的机器工业，不是从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发展过来的，而是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的，由于手工工场发展不成熟，所以近代民族工业一出现，就缺乏自身发展的基础。

第二，民族资本经营近代工业主要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开始的。这一时期，民族资本经营的缫丝、棉纺织业、火柴制造业、新式印刷业等，大部分获得成功。因为这种工业不仅有市场，而且投资少、设备简单，企业建设时间短，资本周转快，容易获得较高的利润。而采矿业，则大都失败，因它需要较多的资本，较复杂的先进技术和较高的组织能力与经营能力。当时民族资本缺乏这些条件，特别是原始积累不充分，资金短绌。他们大都只能凑集较少的资本，购置少量的机器，进行小规模的开发；加以运输困难，经营不善，以及地方封建官僚不予支持甚至阻拦，其结果只有失败。

第三，大部分企业投资少，规模小。企业资本多者10万两以上，少的只有几万两甚至几千两。大的缫丝厂资本达20万两，个别煤矿资本达20~30万两，只有山东平度招远金矿投资高达80万两。100多个企业总资本共计500多万元，平均资本不过4万元。这种状况，不仅不能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相比，而且比洋务官僚资本企业也小得多。由于民族资本资金不足，再加上受外资排挤打击，受官僚资本束缚，十分惧怕亏损失败，因而企业经营方式，绝大部分采取集股经营，独资经营则很少。这样，企业资本少，规模小，企业内设备简陋，生产效率低，资金周转困

难，生产成本低，产品无法与进口洋货相竞争。

第四，近代民资工业产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地的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地区。它便利原料出口和加工，也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土产原料的需要。它反映了民族资本，一产生就带有半殖民地性质。

上述特点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它代表一种新的先进生产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和特征

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逐渐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而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比商品输出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使城乡手工业和小农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商品经济得到较多发展，从而为民族工业提供比战前较广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以上海市人口为例，甲午战前 1890 年有 168,129 人，而甲午战后的 1910 年激增到 1,185,859 人，20 年增加 6 倍。^①除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是江浙一带破产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这就出现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然，这种扩大了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首先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但是在这种扩大了的商品市场中，在帝国主义占领的空隙里，也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甲午战后，清政府财政枯竭，洋务企业连年亏损，已无力继续垄断新式企业。这就迫使清政府减轻和放松了对民族资本工业的限制，曾采取一些“补救之道”，如对创办新式工业提倡奖励政策；设立商部，颁布商律等，其目的虽是维护自身的统治，但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第 40 页。

在客观上给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环境。

1895年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社会各界强烈要求“设厂自救”、“抵制洋商纱厂”，“不买外国货”等。使帝国主义商品输华锐减，而民族工业产品“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

甲午战后，在上述有利时机和条件下，从1896~1898年，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中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缫丝业发展比较突出。纺织业：1895年~1898年中，共新建纱厂9家，布染厂9家，纺织厂16家，平均资本为50万元。在上海、无锡、南通等地集中纺织业达56.8%。如在苏、沪、杭地区除原有的华盛、裕源、大纯等厂外，新建和投产的纺织厂又有：宁波的通久源（1896年）、无锡的业勤（1897年）、苏州的苏纶（1897年）、杭州的通益公（1897年）、上海的裕通（1898年）、南通的大生（1899年）和肖山的通惠公，其产品十分畅销。缫丝业也颇为景气，1896~1898年，全国共建29家机器缫丝厂，计有资本324万余元。其中在广东顺德地区设有21家，共有资本52万元，平均每家资本2.5万元；在上海设有2家，共有资本104万余元，平均每家为52万元；在杭州设有2家，共有资本50万元，平均每家75万元；在苏州设有4家，共有资本117万元，平均每家29万元。上述统计中，广东地区丝厂数量虽多，但各厂资本力量单薄。新设各厂中资本最多的不过3~4万元。而苏、沪、杭地区，新设丝厂虽仅8家，但拥有资本较为雄厚。如上海祥兴、永泰二厂，各拥资本42万和62万元；杭州的世经缫丝厂，拥有资本42万元，其设备都达到英商怡和丝厂的水平，是长江以南新设厂的一个规模宏大的丝厂。因此，甲午战后，江南缫丝业逐渐取代广州地区，而跃居全国缫丝业的中心地区。正如当时人们指出那样：“上海等地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厂接踵添

没，络绎不绝。”此外，轻工业中的面粉业、火柴业、烟草业、酿酒、印刷、造纸、榨油、肥皂、碾米、制革、制麻等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如经营比较好的有：1895年山东烟台成立的张裕酿酒公司，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等。重工业的机器制造业、矿冶业、水电业、建筑材料业也在缓慢地发展。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力量仍然非常薄弱，成长十分缓慢。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依靠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对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这就给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从投资数量上看，帝国主义通过《马关条约》，取得在中国开办工厂特权后，投资数由甲午战前2~3亿美元，增加到22亿美元，增加9倍。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规模较大，资力雄厚，而华人厂矿则一般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外厂平均每家资本额为81.8万元，而华人企业平均每家资本额为19.4万元。^②在资本分配上，外厂资本额大的占多数，资本额小的占少数；华厂资本额小的厂矿占多数，资本额大的占少数。如资本额在1至10万元之间的厂矿，华厂与外厂各占其总厂矿数的比例为：华厂占55.2%，外厂只占5.1%；资本额在10~50万元之间，华厂占其总厂矿数的34.5%，外厂占其总厂矿数61.8%；资本额在50万元以上者，华厂只占10.3%，而外厂则占33.1%。^③民族资本企业与外资企业资本力量相差悬殊。无法与其竞争，必然受其排挤。在商品市场上，外国资本除了向中国输出本国产品外，又加上倾销在华生产的产品，使民族工业承受双重压力。仅以棉纱市场为例，1891-1893年间，洋纱输入量为70万公担，大量进口洋纱再加上外国在华纱

① 《关册》，1897年（中文本），总论第1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89页，表2。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399~401页，表2。

厂所生产的棉纱，在中国市场已占居绝对优势。此外，民族工业的市场价格也处于劣势地位，华纱产品成本高，无力与洋纱竞争。再加上中国民族工业还要受外国银行的控制，外国银行一旦压缩金融，便直接影响民族工业。民族工业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强大经济压迫，许多企业因竞争不过而倒闭，或被外资企业吞并。至于一些小手工工场，更无力与外资厂商相抗衡。

同时，中国民族工业还遭受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清政府对工商业征收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在苛捐杂税中对民族工业危害最大的是厘金。甲午战后，清政府由于赔款，财政支出大增，除对人民大肆搜刮外，厘金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1894~1902年的厘金收入都在1400余万两到1600余万两之间。这样，民族工业产品价格就不纳厘金的外商产品价格高，实际削弱了与洋货竞争力。对此，民族资本家张謇曾致书张之洞说：外“不受厘之害，转可以厘害我之商，我国商货无一足与外商竞争。”“外商货物成本皆轻，足以制内商之死命而有余矣。”^①可见厘金危害之深。同时，民族工业还受封建经济关系的阻碍。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下，虽然封建自然经济继续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关系仍十分严重。其中，高额借贷利率长期存在，最低利率为6%，最高达36%，如果投资工业的利润不能超过或者达到商业高利贷的利息收入，很难使商业高利贷投到工业上去。这样，高利贷统治着资本市场，工业资本筹措困难，资本短缺，势必影响民族工业的顺利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民族工业一般规模比较小，资力薄弱，资金缺乏，因而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依靠外国资本借贷。还有许多民族资本企业吸收了外国资本股份，或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或向外国当局注册，挂外国招牌；或者拉进外人当股东，聘请外国

张謇：《拟请提议照约速定裁厘加税清秘密会议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册2，卷3，第33-34页。

人当荣誉董事长。民族资本还需外国资本提供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许多企业往往是一面购买“洋机”，一面雇佣随机“洋匠”。中国民族企业与封建势力也存在较多的联系。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投资办厂的人，绝大部分是封建官僚、士绅、地主和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商人。这些人，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成为资本家后，不可能割断与封建势力的联系。他们一面投资经营新式企业，一面又在农村拥有土地，进行封建剥削，或高利贷剥削。还有许多民族资本家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往往主动依靠封建势力，它需要政府的批准和有势力官僚的支持，需要地方政府保护企业、管束和镇压工人，需要获取减免厘税的特权，需要政府保证一定的销售市场和资本的支援。至于得不到封建势力支持的企业，往往归于失败。

由上可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受外资排挤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具有一定程度反帝反封建和发展经济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具有它的软弱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性又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所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另一方面，它在不同程度上又与外资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与坚定性。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

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诞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新兴的社会阶级。

19世纪70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一些买办、商人、官僚、地主投资兴办近代工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来源。据1872年至1913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国资本开办的25家纱厂，在41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26

人,商人 5 人,买办 10 人;面粉工业, 1895~1913 年,中国资本家开办的 28 家面粉厂,在 43 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 11 人,商人 15 人,买办 15 人,另有华侨 2 人;轮船航运业, 1872~1913 年,中国资本开办的 12 家轮船公司,在 15 个创办人中,有地主和官僚 9 人,商人 2 人,买办 4 人。另外,毛纺、缫丝、榨油、卷烟、水电、水泥、煤矿等 7 个行业, 1872~1913 年开办的 80 家近代企业,在 103 个创办人中,有地主官僚 67 人,占 65.1%;商人 15 人,占 14.5%;买办 21 人,占 20.4%。^①又据, 1904~1914 年 10 年间在上海设立的 37 家规模较大的华商工厂的主要创办人的出身调查,其中官僚 8 家,买办和洋行高级职员 7 家,地主、商人 8 家,银行家和钱庄老板 4 家,华侨 3 家,其他一般职员和手工业者 7 家。由官僚、买办、地主、商人等创办的企业即占 90% 以上。^②从上述材料,可看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即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从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转化而来的。

洋务派官僚在创办近代工业过程中,不断发生分化,是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又一重要来源。一部分洋务派官僚目睹“官督商办”企业负债、亏损、倒闭而告终的事实,从而产生独立投资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愿望。这部分人大致有几种情形:一是洋务派官僚通过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积累了对新式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在洋务运动破产后,独立投资创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如杨宗濂、杨宗瀚二兄弟于 1890 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因工厂被烧,由 1895 年他们又把积累财富的一部分投资开办无锡业勤纱厂。二是,洋务派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官督商办”企业的股份投资逐渐增多,从而把“官督商办”企业变成独资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洋务派官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 23—24 页。

② 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第 13 页。

僚也随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如曾国藩女婿聂缉槩，1890年筹办“官督商办”的华新纺织新局，此后他用贪污所得陆续投资，终于掌握了该企业的1/10股权，1908年他将企业收买，并改组为恒丰纺织新局，开始独立经营。三是，一些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官僚，在洋务派头目的扶持和优厚待遇下，投资兴办民族资本企业，并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上述洋务派官僚、买办和商人通过“官督商办”企业作杠杆，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19世纪80~9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侵略者在华兴办企业的增多，国内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新式机器不断地输入，城市传统手工业的一些部门，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中一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一些中小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也随之发展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一些长期停留在工场手工业的行业，由手工业者和学徒工转化为手工工场主，再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较多。如在木器工业中，资本家大都是工匠出身；在皮革工业中，有2/3的资本家是工匠出身；在机械工业中，1913年上海91家机器厂的创办人中，手工业者或学徒出身的占80.2%。但是，他们一般资本很小，如1913年上海机械工业中，这些人开设的73家机器厂的资本加起来，还比一家买办开设的机器厂的资本小1/3。

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由上述几种人组成。但是，在它兴起阶段，早期官僚资本占压倒优势。据1872~1894年间72家本国企业资本额统计，官督商办企业占77.6%，而商办企业仅占22.4%。商办企业数量虽较多，但其全部资本额的总和，还不如轮船招商局一家最多年份的资本（1882~1883年资本计530余万两）多，平均每家只有8.8万多元。官督商办企业数量较少，但平均每家资本为85.3万余元。相比较，民族资本如此薄弱，就无法为其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民族资本产生时期，向商办近代企业投资的人们大多数正处

于陆续从母体里分化出来，还未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的状态，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未成熟的资产阶级。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的。

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与兴起阶段相比，民族资本经济有了显著的增长，并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中占据优势地位。据1895~1913年间商办和官督商办两种企业的资本额比较，官僚资本的官督商办、官办企业的资本额，由初期的77.6%下降到23.7%；民族资本的商办企业的资本额，由初期的22.4%上升到76.3%，其资本额增长数量约相当于前一阶段的20倍。^①民族资本由劣势转到优势，远远胜于兴起阶段，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应有的物质基础。同时，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除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继续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外，有许多人通过雇佣剥削的积累，获取经营企业利润，跻入资本家的行列，独资创办一个或几个企业。一些新式商人和其他剥削者，如经营鸦片、洋纱布、煤油、卷烟等商号的老板；从事房地产买卖和金融业的投机商等；因走私漏税，屯积居奇、买空卖空、投机取巧而暴富的人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因投资于新式工矿业而成为工业资本家。此外，一些小业主和小生产者，通过逐步扩大雇佣剥削的积累而上升为资本家；许多华侨富商纷纷向国内投资办企业。上述形形色色的人们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使得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初具规模。在这支队伍中，已形成拥资百万元至数百万元的大资本家。他们一般是从官僚、买办转化而来，主要凭仗自身兼有的封建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联系，或从外国殖民主义者获得某些特权，而得到一定期间一定程度上的积累资本的便利条件，通过扩大经营和兼并的方式，逐渐占有若干行业不同的企业。以张謇、祝大春等14个大资本家创办或参加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各表累计。

投资企业为例，他们共有企业136家，多者27家，少者3家。在所办的企业中，1895年以前设立4家，1895~1900年设立23家，而1900年以后109家。他们是占有企业较多较大、社会地位较高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一批批地涌现，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代表着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跃上政治舞台的。

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亲疏关系和转化程度的差异，又可以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较为密切，一般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资本也较雄厚，大都是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和某些华侨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他们本身即是官、绅、商三位一体，受到政府的庇护，有专利权、垄断权。因此他们从事的政治、经济活动，对社会影响也较大。为了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希望清政府实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他们是清末维新派和立宪派企图跻身政权的社会基础。而华侨中的上层则是保皇会的社会支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妥协性十分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是由手工业工场主或中小商人转化为资本家的。他们兴办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少，资金不足，力量薄弱。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较为疏远，而且往往受外资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打击和压制，时常有破产的危险。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到20世纪初，才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他们蕴藏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基础；华侨中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是革命派的主要支柱，革命派则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者。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存在明显的二重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又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第二节 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初步传播

一、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提出

19世纪70~9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他们以最先觉悟者的姿态，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体来源三个方面：一是直接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如容闳、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到过外国，或生活在香港，与外国人有较多的联系，长期接受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思想；二是从封建士大夫队伍中分化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如汤震、陈虬、宋衡、宋育仁、陈炽等。这些人从小接受封建教育，虽然没有去过外国，但他们通过书刊或别的方式，间接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现状表示不满，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要求。三是，从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官僚、买办，如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及郑观应等人。他们原是洋务派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是洋务派头子的门下幕僚，参加了洋务派的商务、政务、外交等活动。后来对洋务运动产生怀疑，提出了不同见解，并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上述知识分子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容闳的《西学东游记》，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尺牍》、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和《曾论书后》，汤震的《危言》，陈虬的《治平通议》，宋衡的《卑议》，宋育仁的《时务论》，陈炽的《庸书》，郭嵩焘的《养知书屋遗集》，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等。他通过著书立说，程

度不同地吸取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营养，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念。

首先，他们冲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要求学习“西学”，“西法”。为了排除学习“西学”的障碍，他们对封建复古思想做了一定的批判。认为只有打破旧的传统成见的束缚，才能学习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他们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撇开了西学的精髓，“西学为用”是“遗其体”，是丢掉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这个根本。批评洋务派“全盘西化”的主张，是跟着洋人的屁股后面踟蹰而行。按照这种做法，即使达到了“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一切仰仗外洋，自己没有自主力。他们认为正确的作法是全面学习，变通为用。

其次，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最初他们认为西方的富强在于船坚炮利优于中国，但与西方有了较多的接触之后，又逐步认识到西方国家富强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且在于振兴商务，认为商务足以富民，中国应当振兴商务以达富强。陈炽说：“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也。”薛福成说：“握四民之纲者，商也。”“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哉？”^①他们认为“富民”、“富国”的方策根本在于兴商。中国如果象西方那样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富强起来。郑观应则进一步提出了“商战固本”的救国方案。认为，国强是以民富为基础的，而民富又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条件的。后来又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采取“兵战”与“商战”两种形式，即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交相为用。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他们“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国”。因此，提出对付帝国主义要兵战与商战并举，以商战为主，以商战固国本，国本强了，帝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录》第2卷，第1页。

国主义就不敢再来侵略。为了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和主张：要求改革税制和废除厘金制度；要求摆脱洋务派官僚对民族工商业的控制和束缚；提出设立工艺学堂，培养工商业技术人才；要求在中央和各省、县分别设立商务部、商务局、商务所等保护商人利益的组织，等等。这些认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再次，表现了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面对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侵略加深的形势，表示极大地忧虑和愤慨。主张中国应把抵御外侮，反对外国侵略放在首要位置。王韬提出：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戎祸是中国政治上混乱的根源。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形势深感忧虑，指出：如不警惕，将来会落到“国几不国”的地步。认为外国侵略者一直想蚕食吞并中国领土，所以中国应把主要力量放在反对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之上。郑观应也认为，当被瓜分、亡国大祸临头的时候，防外患重于防内乱。因此，中法战争中，他主张抗法；中日战争中反对屈辱求和；庚子赔款后，他强调抵抗沙俄的侵略，抵御外侮，拯救祖国，是他们“梦寐不安，行愁坐叹”，耿耿于怀的终生大事。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表现在反对清廷签定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自主独立维护国家主权。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大大扼杀了这个刚刚在发生与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所以他们反对关税协定、子口税规定、海关管理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烧、杀、掠夺，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而由外国领事处理，结果使罪犯逍遥法外，无法无天，继续作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中国人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

上述这些思想虽然不系统、不成熟，但是它代表了初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民族要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繁荣、强盛的要求。

甲午战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从封建士大夫阶层分化出来一部分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他们在民族危机严重刺激下，从旧的科举及第士的道路醒悟过来，开始追求西方资产阶级各科知识，并逐渐与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发生背离，寻求救亡图存的办法，形成了维新派，他们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绅士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发出有力的呼声和号召，并形成维新思潮。

维新派以社会历史进化论为依据，提出变法维新思想。康有为、梁启超的社会历史进化论思想，就是经过改造和发展的“公羊三世”说和孔子托古改制说。“公羊三世”说是指东汉的何林在《公羊传注》中提出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康有为把这三世与古代典籍《礼运》篇中的小康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并用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加以解释，认为社会按照这三个阶段的顺序而发展，由乱到治，愈变愈好，即由文教未明的野蛮时代到文教渐明的小康时代，再到文教完备的大同时代，人类社会这一发展过程就是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制。这里把“三世”说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证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是合乎历史规律和发展的。梁启超把“公羊三世”说进一步具体化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和“民为政之也。”而“多君为政之世”又有“酋长之世”和“封建世卿之世”区别；“一君为政之世”有“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区别；“民为政之世”存在着“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区别。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发展，都是按“三世六制”轨道前进的。所谓“托古改制”说，康有为认为，儒家经典“六经”全是孔子所作，“六经”中所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世”，都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孔子并不是“述而不作”的守旧者，而是“托古改制”的素王。所以 they 要恢复孔子的“微言大义”，而孔子思想

的核心是改制。康有为试图用“托古改制”的类比说教，论证维新变法不但不违背圣人之教，相反是将孔子道统发扬光大。康、梁以“公羊学说”的社会历史进化论为理论依据，用孔子托古改制说为招牌，强调现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程度。

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则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宣传变法维新。1897年，严复通过翻译发表赫胥黎的《天演论》，把西方的达尔文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特别是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等理论，指出中国的前途命运在于变法图强，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变化，才能由弱转强，否则将被“优胜劣败之公例”所淘汰，亡国灭种。并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严复用进化论，大力宣传维新变法主张，批判封建政治与传统文化，曾经风靡一时，它大大开阔了人们眼界，启发了青年的觉醒，号召人民起来挽救民族危亡。许多爱国人士，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革社会，寻求救国出路。

康、梁和严复宣传的两种进化论，其共同点：他们宣传变法维新，只主张循序渐进的变革，而否定突变；在政治上主张改良，而否定革命。

维新派以西学为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展开了全面批判。他们用资产阶级观点批判“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指出：君主既不是神授的，也不是圣人所立，而是由民产生的。只有人心拥戴，天下归往，人群公共推举出来的人才是君主。认为原始社会的君是由民共举的，是为民众利益的。自秦以后君主，是凭借暴力争夺君位的，是窃国于民众的“大盗”和“民贼”。君权之下的各级统治机构，都是专制压迫的工具。历代法律制度也都是“尊君卑臣而奴民”的专制之法。君与民的关系，维新派认为，君末民本，君贱民贵，君仆民主。君既可由民“共举之”，也可由民“共废之”。君位“人人可以君之。”

在维新派反君权斗争中，谭嗣同进一步发展为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直接触动了清王朝政权。维新派对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纲常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其中以谭嗣同批判最为激烈。指出，纲常礼教决非什么不可违背的“天命”，不能议论的“国宪”，而是封建帝王有意编造的，便于他们进行统治的反动工具。他们用纲常礼教以制人身，以制人心，使群臣、百姓听从皇帝而无法反抗。而且他们所制定的刑律也都以三纲五常为标准，以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新派还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指出，科举制度有三大祸害：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所以，只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当然，维新派对封建主义批判很不彻底，还认识不到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阶级本质。

维新派的“民权”论、“大同”论中，已含有初步的民主思想。以宣传民权著称的梁启超，曾给民权下定义，所谓民权就是“人人有自主之权。”认为此权“全”则国强，“缺”则国殃，“无”则国亡。作为“积权而立”的国家，要具有“全权”，就应该由“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而不能允许“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的现象。认为中国“历古无民主”，是中国社会进化缓慢，国家长期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而西方各国民族兴旺，国家发达，赖有民权政治，中国若再不开放民权，就要亡国灭种了。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将“平等”、“自由”之义，总括为“不失自主之权”，并以此作为“有教”、“有学”、“有国”、“有人”的根本。维新派认为，只要兴民权，在数十年中，中国将变得象西方国家一样强大。维新派代表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者谋求部分权力，这是第一次以资产阶级权利观念对封建君权提出了严重挑战，表现了刚出现于历史舞台上新兴资产阶级的觉醒。然而，维新派民权论，在具体实施上，着眼开绅智、兴绅权、开官智，不能把民权与君权

真正对立起来。相反，“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这种民权论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君主立宪”或“君民共主”，不可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从1885年起，撰写《人类公理》，（以后屡经增补，直到1902年改写成《大同书》），他除了拼凑儒家、佛家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外，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谓大同之世，就是根本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按着美、法模式实行君主立宪制，进而实现大同理想，建立一个“无私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维新派把实现君主立宪与未来的大同理想连接起来，为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一个民主主义的远景。他们的民主政治的理想带有浓厚的空想，它极端憎恶君主专制，却不敢与其勇猛斗争；对民主共和有所向往，却将大同理想推到遥遥无期的地步，表现了十分的软弱性。

二、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介绍和宣传

议会，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意大利的马西利·巴东斯基曾提出等级代议君主制，即君主、贵族和平民三者之间分权，实行这种制度，一方面反对宗教教会干涉政治，另一方面对君权有所限制。后来，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即立法权、国家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交给代表代议机关、国王和法院。这一制度与中世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比较，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

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使正在转化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得更多的权利，希望清王朝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并通过奏折、日记、书信、译著、撰述和回忆录等方式，介绍和宣传西方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最早介绍西方议会制度的是王韬。他介绍西方有三类国家，一是君主之国，二是民主之国，三是君民共主之国。这三种类型相比较，他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

不无流弊。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①这样，就“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苞磐石焉。”^②所以，他主张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制，认为君民上下互相联络，政治完美。薛福成对英国的上下议院很感兴趣，他说：“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一出—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剂于平云。”^③在他看来，英国保守党和进步党的互相牵制，上上下下，正好使政事不偏不倚。而有了上议院，就不会民主太重，有了下议院，也不会出现君权太重，君主独裁，因此是“君民共主”的理想政体。马建忠非常赞同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说，他认为：“各国吏治异国，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议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他敢于公开介绍西方三权分立说，在近代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郑观应更是积极提倡西方议会制度，认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④还说：“两人立国具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⑤他批评洋务派舍其本而求其末，遗其体而求其用。而积极鼓吹君民共主的代议制，说：“议会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德诚良，意诚美矣。”^⑥他特别强调议院的作用，认为“兴议院，而民志和，民气强，”就可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

①② 王韬：《原土》，《弢园文录外编》第23、24页。

③ 薛福成：《出使日记》卷4。

④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第31页。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盛世危言》卷首。

⑥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盛世危言》卷首。

⑦ 郑观应：《议院》，《盛世危言》卷一。

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之民无所积其怨。”总之，他们认为，欧美各国由于设立议院，所以国家强盛，中国如仿效也设议院，就能做到“君民共主，上下同心，”则“天下有志之士，莫不奋起直追，众志成城，安见不足以御外侮哉”！^②

关于议会制度职能，最初他们认为只是皇帝的谘询机关。汤震在《危言·议院》篇中，提出议院议员由上诏所定，上、下议员全部是现任官吏；国家大政方针，由两院议员讨论其利害得失，“由宰相（军机大臣）核其同异之多寡，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在外省府州县事有应议者，自巨绅以至举贡生监，皆令与议而区其等。”^③陈虬提出创设议院的办法是：地方议院“遇有大事，则克期集议，轻舆减从，亲临议院，与地方父老周谘详问，互相驳辨，议定而后行。”这里地方议院的职权，仍是“周谘详问”的谘询机关。至于中央议院，“京师另设都察院衙门，主以三公，中设议员36人，每部各6人，不拘品级，任官公举练达公正者，国有大事，议定始行。”所谓议员，仍是行政机构中的官吏。甲午战后，何启、胡礼垣、陈炽及郑观应等人进一步提出议院是权力机构的主张。他们认为，议会有否决国君决定的权力，如果没有议员的同意，上自国君，“下至府县，都不能推行政令的，议院具有否决之权。这样，“有上议院，国家爵命之官也；有下议院，绅民公举之员也。院之或开或散，有定期。事之或行或止，有定论。人之或贤或否，有定评。”^④“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这里提出的议会不仅仅是谘询性质的机构，而且是可以否决皇帝意志的权力机构。

郑观应：《议院》，《盛世危言》卷一。

王韬：《弢园尺牍》第170页。

③ 汤震：《危言·议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177页。

④ 陈炽：《庸书·议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246页。

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斟酌变通”，提出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的几种方案。第一种，把议会制度和官僚机构融为一体。汤震在《危言》中提出设议的办法是：“自王公至各衙门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均隶上议院，而以军机处主之；堂官四品以下议员，无问正途任子誊郎及翰林院四品以下者，均隶下议院，而以都察院主之。”“届期，分集内阁及都察院，互陈所见，由宰相核其同异之多寡，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在外省府州县事有应议者，自巨绅以至举贡生监，皆令与议而区其等。”实际上全部的现任官吏都为议员，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僚组成上议院；四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吏组成下议院。上、下两议院分别由军机处、都察院管理。这一方案，使议会成为官僚机构的下级机关，丧失了它的权力和独立性。

第二种，主张把议会制度和乡官制度相结合。陈炽在《庸书·乡官》中提出了下议院议员产生办法：各府、州、县，则仿西洋议院之制，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 2 人，一正一副，其年龄必足 30 岁，其产必及 1 千金，然后出示晓谕，置匭通衢，期以 3 日，择保人多者用之。优给俸薪，宽置公所，置贤者 1 人为之首。开会散会，具有定期。每任 2 年，期满再举。邑中有大政疑狱，则聚而咨之。兴养立教，兴利除弊，有益国计民生之事，则分而任之。毋厉民，毋抗官，毋乱政。贪婪专横者，官得随时撤之，檄令再举。其或县官贪虐，大失民心，合邑乡官，亦可会同赴省，白之大府，查有实迹，照例撤参。”^②这样，按照“百姓公举”办法，先产生县议员，再产生府议员、省议员，最后产生中央的国会议员。不但议员的资格、权力有所限制，而且议员随时有被官吏撤掉的可能。

第三种，主张把议会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何启、胡启垣合著的《新政论议》中，提出县、府、省议员分别从秀才、举

汤震：《危言·议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 1 册。

② 陈炽：《庸书·乡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 1 册。

人、进士选出。主张：“县设 60 议员，是谓县议员；府设 60 议员，是谓府议员；省设 60 议员，是谓省议员。”“县议员于秀才中选择其人，公举者平民主之。”“府议员于举人中选择其人，公举者秀才主之”，“省议员于进士中选择其人，公举者举人主之。”参加选举的人，规定：凡男子 20 岁以上，除暗、哑、盲、聋，以及残疾者外，其人能读书明理者，皆有选举权。

上述主张虽然采取的议会方式不同，但是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要维护皇权的尊严，君权不动，使士绅阶级有点发言权，参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专制皇帝权力的作用。

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议会政治的介绍与宣传，在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这些观念对于政治思想较为闭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风气、益民智的作用。使中国人了解到，除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议会制度，并希望把这种制度引进中国来。

三、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张与方案

19 世纪，世界上资产阶级国家有两种政体，即民主共和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把封建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另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考查了世界历史，分析了英、美、法、俄、日、德、波兰等国变法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张和方案。

康有为指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都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的。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家安得不强！”而“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

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梁启超认为：“君主立宪制度是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国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严复虽然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原则，主张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但他又认为当前中国的条件不成熟，不能立即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只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维新派认为，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必须仿效俄、日两国。康有为说：“职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③又指出，日本也是以君权变法的，“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维新派还特别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原则。认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④如行“三权分立”制，“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⑤

为了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最初曾主张开国会、设议院、立宪法。1888年就曾说“折取”“邻人”的专门之学西方民选的议院制度。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实行议郎制，规定各州、府、县每十万户选出一议郎。议郎通中外明政体，不受官阶限制。其

①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36页。

② 梁启超：《立宪法主义》，《饮冰室合集》文集5，第1页。

③ 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

④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38页。

⑤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99～201页。

职权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均由民选“议郎”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议郎制具有一定的立法权，议郎会议讨论的大政方针，经过 $\frac{2}{3}$ 的多数通过，就交给各部施行。这里的议郎制实际上是带有国会性质的机构。1896年，在《上清帝第四书》中，除了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外，再次提到民选“议郎”的问题，要求“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接着《上清帝第五书》中，又恳请皇上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从1898年1月《上清帝第六书》起，康有为又进一步提出“开制度局于宫中。”他劝清政府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2月，在《为胁割旅大，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折》中也要求“请专以开制度局，变新法，修战具为事”。5月，上《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法而大局折》中，反复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也。”6、7月间又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指出开制度局“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同时在上《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请速筹全局折》中，再次恳请“开制度局于宫中，以筹全局”。

制度局具有立法性质，是国家的最高机构，相当于西方的国会。他的组成和职能是：妙选天下通才20人入制度局，指派王大臣担任总裁，“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其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它基本上是一个最高立法决策机构，不受资历出身限制，选择“天下通才”为其成员；总揽规划指导变法新政的大权，每日和皇帝见面，共同议政，起草宪法和法律。通过的法律可以公布实行。从其内容来看，已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议院的性质。但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还有一定的差别，尤其是成员由皇帝任命，不能选举产生，大事仍由皇帝裁决。

中央机构成立责任政府。责任政府设12局，即法律、税计

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规定¹²局的职能是：一、法律局。考万国法律公法，以为交涉平等之计，或酌一新律，施行于通商口岸，以入万国公法之会；二、税计局。掌参用万国之税则，定全地之税，户口之事，关税之法，米禄之制，统计之法，兴业之事，公债之例，讼纸之制。三、学校局。掌于京师，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分格致、教术、政治、医律、农矿、制造、掌故、各国语言、文学诸科，别以大小，公私并立，师范女学而广励之。其有新书、新艺、新器者，奖劝焉。四、农商局。掌凡种植之法，土地之宜，垦殖之事，赛珍之会，比较之厂，考土产，计物价，定币权、立商律，劝商学。五、工务局。掌凡制造之厂，机器之业，土木之事。六、矿务局。掌凡天下一切矿产，开矿学，定矿则，凡开矿者隶焉。七、铁路局。掌天下开铁路之事。八、邮政局。掌修天下道路及递信电报之事。九、造币局。掌铸金、银、铜三品，立银行、造纸币，时其轻重。十、游历局。掌派人游学外国，一法一艺，宜得其洋，其有愿游学者报焉。十一、社会局。泰西政艺精新，不在于官，而在于会，以官人寡而会人多，官事多而会事暇也。故皆有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字会、法律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宜劝令人民立会讲求，将会例、人名报局考察。十二、武备局。掌编民兵，购铁舰，讲洋操、学驾驶，讲海战。这些局相当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设的中央政府各部。皇帝不再负责任，“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可见，制度局是立法性质的机构，十二局是行政性质的机构。康有为还主张立法与行政、司法相分离，他在《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38页。

折》中就指出：中国“今有办事之官，而无议论之官，譬有手足而无心思，又以鼻口而兼耳目。”所以要确立“三权分立的政权，还必须定三权之官，即立法官、行法官、司法官。“立法官，议论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权，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绳愆纠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至于地方政府，则采取地方自治，每道设一新政局，和督、抚并行，管理地方上的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宗教、正俗等新政。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

实行君主立宪制对皇帝来说，维新派认为皇帝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己必须有权力；二是要有贤相执政，听任执行，君主可以端拱无为，有任人不疑的气魄；三是君主要允许结党，用以巩固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势力。康有为维新派寄希望于光绪皇帝成为开明君主，既让贤相执政，又允许结党。

由上可见，康有为维新派从设立议院、制定宪法，到设立制度局和十二局、新政局、民政局的主张，就是他们变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的方案，也就成了改造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官制的具体措施。它使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特别是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权，以便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维新派竭力鼓吹尊崇君权，让皇帝“乾纲独断”，保存了君主、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这都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所以君主立宪政体是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它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和两面性。

第二章 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政团的出现及其活动

第一节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团活动

一、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

19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与瓜分世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两大特征。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更成为掠夺的主要对象。

首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强租海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俄国是瓜分中国的急先锋。1896年，它以“干涉还辽”有功，诱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以“共同防日”的名义，夺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并将其势力伸入我国东北地区。接着，沙俄又强迫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设立了由沙俄独揽大权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取得了在铁路沿线地区的行政权、警察权、采矿权和贸易减免税厘等特权。1897年底，沙俄出兵占领旅顺和大连湾。1898年3月和5月，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租借旅顺和大连25年，并取得从中东铁路修筑一条通到旅大的铁路支线的权利（即哈尔滨至旅大的南满铁路）。这样，整个东北就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德国早就垂涎我国胶州湾，作为它侵略远东的海军基地。1897年11月，它借口两个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兵占领了胶州湾。1898年3月，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了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开采铁路沿线两旁30里内的矿产，以及兴办各项工程的特权。从此，山东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在1895年就占领了云南边境的一些地区，并取得云南和两广的开矿优先权。1898年，法国强占了广州湾。1899年中法订立了《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为99年，又迫使清政府答允不将云南、两广割让与他国。从此，云南及两广大部分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是在华势力最大的国家，当然不甘落后。1898年2月，英国强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它的势力范围。同年6、7月，英国为对付俄、德、法，又强租威海卫、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向中国南北两翼伸展了触角。

日本不以割让台湾为满足，急忙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声明福建省不得割让与别国，从而使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时，美国正忙于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顾及对中国的合伙打劫。战争结束后，美国不甘心受占有中国土地列强国的排挤，于1899年9月至11月向英、俄、德、日、意、法6国政府提出所谓“门户开放”的通牒。即美国承认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已经夺得的特权；美国在各国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使帝国主义国家都享有投资权利。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一方面企图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另一方面想凭借已经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逐步挤垮对手，以便独占中国。由于列强争夺中国的斗争难解难分，为了缓解矛盾，各国只好同意这一政策，从而帝国主义各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同盟。使中国由被瓜分

的局面，变成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管理的局面。

其次，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的同时，又通过资本输出而对中国各项权利展开激烈争夺。

（一）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在 3 年内偿付对日赔款 2 万万两，后来又加上赎辽费 3000 万两，总计 2.3 万万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收入只有 8000 余万两，根本无力偿付巨额赔款，只好筹借外债。帝国主义列强乘此机会向清政府进行外债投资。仅在甲午战后的 3 年里，清政府向列强进行 3 次大借款。1895 年 7 月，俄法以干涉还辽“有功”，争得第一次借款权。俄法借款总额为 4 亿法郎，折银 9800 余万两，由 4 家俄国银行和 6 家法国银行分摊贷给。1896 年 3 月，签订第二次借款——英德借款。借款总额为 1600 万英镑，折银 9700 余万两，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分摊贷给。1898 年 3 月，又签订第三次借款——英德续借款。借款总额为 1600 万英镑，折银 11200 余万两，仍由汇丰、德华两银行贷给。这 3 笔大借款，总计 3 亿两。从 1895 年到 1900 年，3 次大借款再加上其他名目的借款，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 45100 余万两白银，约为当时年财政收入的 5.5 倍。这些借款，不仅数量大，利息高，而且都带有苛刻的政治条件。结果，西方列强在财政上和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了清政府，清政府不依赖外债就难以生存。

（二）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企业投资。甲午战前，外国资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的企业仅有 80 余家，资本总额为 2800 万元。

《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此后，外国资本在华开办工厂剧增，据统计，1895~1900 年，外资在华设厂共计 933 家，其中资本雄厚的有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增裕面粉厂、鸿源纱厂、三井制面厂、美国机器碾米厂和美国纸烟公司等。同时，列强在中国纷纷投资开矿。到 1899 年，美国先后夺取了山西平定、盂县煤矿的开采权和四川麻哈金矿的开采权；英国先后夺取了四川全省和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以及河南怀

庆附近地区的矿产开采权，以及热河朝阳煤矿的开采权；俄国夺取中东铁路沿线采矿权和新疆全省金矿的开采权；法国在四川灌县等煤矿和四川金矿获得开采权；德国先后取得了山东胶济铁路两旁和沂水、诸城、潍县、烟台等地矿产的开采权。这些外资企业，可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又可以节省运费，并享有免纳各种税的特权，严重地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三）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仅1895~1898年间，列强掠夺中国铁路达6400多英里，包括铁路的建筑权、经营权、借款权，由此而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如英国掠夺铁路2800英里，得到京沪、苏杭甬等路的借款权、管理经营权，浦信路的借款权，道清路的建筑权。沙俄掠夺铁路1530英里，得到中东路及南满支路的合办权，正太、京汉铁路借款权、管理经营权。德国掠夺铁路720英里，得到胶济路的建筑权。法国掠夺铁路420英里，得到芦汉路借款权，滇越路之建筑权。美国掠夺铁路300英里，得到粤汉路的借款权和承筑权，以及粤汉、广九两路的投资利权。列强通过掠夺中国铁路，可以利用铁路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获取高额利润，控制铁路沿线的大片领土，垄断铁路沿线资源，享有铁路沿线的警察权和行政权。这种资本输出，不仅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取得政治和军事的特权。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侵略中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中华民族处于危殆之境。在这种形势下，救亡图存成为摆在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面前的紧迫任务。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清朝政府对外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对内采取苟且求存的态度。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一时期清王朝通过联俄制约其他列强，避免列强瓜分中国的“要策”。甲午战后，清王朝统治更加腐败和虚弱，面对列强不断提出的贪得无厌的瓜分要求，已无力采取任何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政策，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

制，从中求得清王朝暂时的生存。由于这一政策完全不是立足于自立自强的基础上，其结果只能是以断送中国的领土主权来调节列强之间的矛盾。对内，清王朝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在军事、财政和经济上，采取了编练新军，开源筹款和允许民间设厂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有的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丝毫没有触及封建主义制度，它只能使清王朝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清廷上层帝党和后党之间的争斗日益尖锐起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代表着清政府的顽固守旧势力，掌握着清廷的实权，顽固地反对一切改革。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没有实权，对慈禧太后及后党的内外政策日益表示不满，他们企图通过变法维新，排挤后党，掌握实权，挽救民族危机。帝党成为清廷上层中具有革新倾向的一派力量。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纷纷起来展开自发斗争，他们把反对教会侵略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和挽救祖国危亡的总目标联系在一起，并酝酿了农民阶级的反帝大风暴。一部分从封建士大夫阶层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代表着爱国、进步的士绅、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发出了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强烈呼声，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潮流。

二、资产阶级政团思想的产生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开展变法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十分重视组织学会，即资产阶级政治团体。他们认为“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只要普遍组织学会，则“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以雪仇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欲

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①“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②“今之急务 端在学会。”^③这些认识都把组织学会团体看成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为此，维新派在报刊发表文章积极提倡组织学会团体。康有为还专门编写了《日本会党考》，附在《日本变政纪》之后，进呈给光绪，企图争取清廷的支持。在《应诏统筹全局》中，建议清政府专门设立“社会局”，作为组织学会团体的机构。维新派认为学会团体能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并能起到开风气、联人才、伸民权的作用。

所谓“开风气”，就是通过学会制造舆论，扩大影响，增强变法维新运动的声势。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推行变法，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皇帝的支持上，先后向光绪帝7次上书，以求变法；另一方面比较注重广泛制造社会舆论，动员一定的社会力量，形成相当的政治声势。这样，上下呼应，达到双管齐下的目的，维新运动才能得以开展起来。康有为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④梁启超说：“先是胶警初报，事变暴急，南海先生以为振厉士气，乃保国之基础，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以相讲求，则声气易通，讲求易熟。”^⑤维新派多次上书不达后，更注重组织学会团体，不断扩大变法维新影响，争取皇帝和清廷的支持。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叙当时情形道：“此书既不克上达，康有为以为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

梁启超：《论学会》及会报叙》，《戊戌变法》第376，377页。

② 谭嗣同：《论全体学》，《谭嗣同全集》第405页。

③ 谭嗣同：《报涂儒謁书》，《谭嗣同全集》，第274页。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同上书第133页。

《林旭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56页。

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 康有为也说：“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②这样，“吾未见我朝廷之不曲谅苦衷，俯如人愿也。”^③康有为最初强调变法首先要争取皇帝的支持，要“变于上”；上书碰壁之后，又提出“变于下”，即创立学会，动员社会的力量。当康有为被光绪皇帝破格接见之后，又转而强调变法“非尊君权不可。”康有为维新派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君权”支持变法，又以组织学会推动变法维新的实现。

所谓“联人才”，就是通过学会培养一批通晓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为变法维新事业组织一支骨干队伍。维新派认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就是组织学会。而维新运动的发展迫切地需要“广求同志”。他们声称：“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他们还认为学会比学堂有较大的号召力，比报刊有较强的组织力。为此大力提倡在全国普遍设立学会。“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虽数十人之寡，数百金之微，亦无害其为会也。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④这样，就可以把各地的“人才”集中起来，使涣散的个人变成凝聚的社会力量。维新事业有了雄厚的社会基础，改造落后的封建政治和学术就越迅速，祖国的富强就有希望了。

所谓“伸民权”，就是通过学会争取和扩大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权利。维新派揭露封建专制统治如“浮屠十级，级级难道，广厦千间，重重并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滞，血脉不通，病危立至。”造成这种尊卑悬殊、上下隔绝状况的原因：“皆由体制

《戊戌变法》，第1册，第297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

③ 唐才常：《论热力（下）》，见《唐才常集》，第143页。

④ 梁启超：《论学会》，见《戊戌变法》第4册，第376页。

尊隔之故，”即由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等级制度。因此，维新派提出了“兴民权”的主张，要求“通上下之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给以适当的限制，同时给人民群众以某些政治权利。而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学会，学会普遍建立起来之后，就会改变“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绅与士隔，士与民隔，”以及“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相隔离的状况，而出现“凡会悉以其地之绅士领之，分学会各举其绅士入总学会，总学会校其贤智才辨之品第以为之差。官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与学会议之，议定而后行。议不合，择其说多者从之。民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上于分学会，分学会上总学会，总学会可则行之。官询察疾苦，虽远弗闕也；民陈诉利病，虽微遏也，一以关捩于学会焉。”当然，维新派所指的“民”，并非人民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他们强烈呼吁“伸民权”，就是伸“绅权”。

维新派组织政团的思想，首先，在观念上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君子不党”的教条。封建专制统治，为了维护皇权的独断地位，历来把集会、结社视为大逆不道，“悬为厉禁”之事而严厉镇压。维新派则把冲决封建专制政治的网罗作为组织学会的目的，向传统观念进行挑战，在社会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在政治实践上，维新派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不准结社的禁令，在全国各地组织各式各样的学会团体。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团聚社会力量的重要途径。

三、资产阶级政团组织的涌现

甲午战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江西、湖北、贵州、陕西、天津等地组织学会达78个，^②在这些学会中，以政治性为主的，主要有强学

《壮飞楼治事十篇》，见《谭嗣同全集》第438页。

② 《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99—206页。

会、南学会、保国会以及保川会、保滇会、保浙会。它们主要研讨、宣传某种政治学说和政治思想。其组织成员，主要是一部分官僚和士大夫。以学术性为主的，主要有质学会、算学会、测量会、郴州学会、法律学会、校经学会等。它们主要学习和讲求一门或几门具体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但也并非脱离现实的政治，他们学习社会、自然科学的目的，就是求得中国之富强。这类学会在强调学好各门具体学科的同时，“尤宜讨论中外古今盛衰之源，联合士气，互相师法，庶几合天下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①其学会组织的成员，主要是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以改革社会习俗为宗旨的学会，主要有不缠足会、戒鸦片烟会、延年会等。它们以改革封建陋俗，提倡社会新风气为目的。实际上包含着鲜明的政治色彩。这类学会成员，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上述形形色色的学会组织中，人数较多，规模较大，影响深的是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

强学会

1895年8月，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的原则，先创办了《万国公报》双日刊。主要宣传“富国”、“养民”、“教民”的方法，并具体论述了开矿、铸银、制机器、造轮船、筑铁路、办邮政、立学堂、设报馆等方案，从而使“舆论渐明”，随之募资集款，筹建强学会。¹¹月，由康有为提倡和创办的第一个学会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列名会籍的会员⁴³人，大部分在翰林院、都察院及各部衙门任职。其中，除了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占多数外，还有翁同龢、孙家鼐为首的帝党派大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洋务派大官僚，他们给了强学会以极大的资助。翁同龢从户部岁拨若干金予以赞助，并给予印书机器；孙家鼐将自己花园借出作为会址；刘坤一、张之

① 《郴州学会禀》，《戊戌变法》第442页。

洞、袁世凯各捐5000金等等。李鸿章也想捐金2000入会，但因李对日主和，被康、梁拒绝。参加强学会的还有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以及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等人。参加强学会的成员虽然如此复杂，但它大体上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帝党派结合的政治团体。通过这一团体，联合了反后党的势力，以实现变法维新。强学会大约三日一会，主要讨论时局，筹划变法。参加强学会的人数虽只数十人，但参加听讲的人数，则大大超过了这个规模，打破了士大夫集会议政的禁令。

强学会的主要活动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北京强学会，“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其内容有阁抄、照译英国路透电报、选译外国各报，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探讨“万国强弱之源”，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兼及自然科学知识。反映了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向西方探求真理的愿望。不久，强学会为了活动方便，改名为“强学书局”，议印一切有用书籍，并开“书藏”。强学会的规模日益扩大。

北京强学会初具规模，康有为离京南下江宁，企图游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北交通要道，士大夫聚集的中心——上海，设立上海强学会，“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①进一步扩大维新声势，推进变法运动。11月1日，康有为到达南京，居住20天，与张之洞“隔日一谈”，张表示赞许康的主张，并拨款1500两相助。11月中旬，康有为由南京到上海，不久成立了上海强学会。由康有为主持，张之洞出面负责。其成员有康有为、张之洞、龙泽厚、黄遵宪、陈宝琛、岑春煊等24人，成员完全是官绅。康有为等人议定了《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其宗旨是：

“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四），第389页。

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章程还规定了4项任务：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馆。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还出版了“专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的《强学报》，为宣传机关报。该报大胆地抛弃了皇帝纪年而用孔子纪年；刊录当时未经公开的“廷寄”，并加跋语，阐明变法的必要性；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其政治色彩比《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更为鲜明。

强学会的活动，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破坏。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贩卖西学”，请旨查禁。北京强学会随即被查封，《中外纪闻》也被禁止发行。接着，张之洞下令查禁了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至此，北京、上海两地强学会被顽固派扼杀。

南学会

1898年初，当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之时，谭嗣同、唐才常等“思保湖南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从而组织了南学会，以利“联群通力，发愤自强。”所以，南学会是一个救亡御侮的政治团体。《南学会大概章程》中规定，由湖南巡抚派本地绅士10人为总会长，再由这10人举所知，汲引会友。对其会友开展三项工作：一是“议事会友”，由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议定会中事务章程；二是“讲论会友”，定期开讲，随时答问，由皮锡瑞、黄遵宪、邹代钧、谭嗣同等分别主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三是“通讯会友”，“远道寄函，随时酬答。”所以南学会又是联结全省官僚士绅的政治组织。南学会的活动方式主要是讲演和答问。“讲演”主要大力宣传设学会，“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的必要性，为变法维新进行舆论宣传。“答问”就是讲学后遇有疑义或

有建议的问题，进行解答，再作讲演。南学会创立前后，湖南设立了时务学堂，培养年轻的维新人才，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这样，在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各地学会纷纷成立，各府州县都设立了学会，如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同学会、明达学会等。这些学会都想“联通群力，振兴新学”。他们名义上与南学会是兄弟学会，实际上是南学会的分会。湖南还相继建立推行新政的机构如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南学会与各分会的设立，对湖南各地的社会风气的转变，知识分子思想转变以及湖南新政的实行，都起了促进作用，湖南成为当时最富有朝气的一省。正由于如此，湖南的顽固势力极力反对、破坏南学会，并加以“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感世乱民”、“私立党会”等罪名。甚至将南学会领导人驱逐出境。结果，南学会只办 3 个月，即行中辍。

与此同时，康有为为了继续强学会的未竟事业，于 1898 年 1 月，在北京邀合同乡旅京人士 20 余人组织了粤学会。在他的策动下，林旭等发起闽学会，杨锐等发起蜀学会，宋伯鲁组织了关学会，杨深秀组织了陕学会。其他如浙江、江西、直隶、云南、贵州等省旅京人士也纷纷组织学会。这时，各省举人正云集京师参加会试，康有为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爱国维新宣传。刚好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有会合在京应试举人开会的主张，于是康、李联名发起成立了保国会，4 月 17 日，在北京集会成立，参加集会的京官和应试举人 200 余人。康有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起草了《保国会章程》30 条。宣布“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根救之，故开斯会议冀保全，各为保国会”；规定保国会的宗旨是：保国（国地）、保种（国民）、保教（国教），即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主，保中国圣教之不失。在组织方面，规定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府、县皆设分会。会中分选总理若干人；值理若干

人，常议员若干人，备议员若干人，董事若干人。经费方面，由入会者捐银 2 两，作为会中办事之需。此外还规定了保国会的权限、纪律、入会手续、会员的权利和义务、领导工作人员的职责等。保国会已是初具资产阶级政党色彩的政治团体。不久，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相继成立。

维新派的爱国救亡活动，引起顽固守旧势力的仇恨和惊慌，他们群起攻击保国会，御史潘庆澜上疏弹劾保国会是“聚众不道”，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皆由保国会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军机大臣刚毅则准备查究参加保国会的人。但被光绪皇帝制止议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御史文悌又上章弹劾康有为“名为保国，势必乱国，”

“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量我大清国于度外。”光绪下令革掉文悌的职务。保国会尽管因光绪帝的辩护，免遭查究，但许多会员，畏首畏尾，不久，保国会遭劾而未封，形存而实散了。一些人纷纷退出，连保国会发起人李盛铎也反戈一击，上疏参劾保国会。这样，保国会举行一次集会后，就无形解散了。然而，它的规模却超过了强学会，特别是御侮图存的爱国色彩比强学会更为鲜明。

戊戌时期学会团体的涌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也为近代资产阶级立宪政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是，它与后来资产阶级政党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些学会组织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维新派没有把变法维新运动中的政纲贯彻到政团组织活动中去，其宗旨只是一些笼统的政治口号，因此既没有具体要求争取实现的政治目标，更没有为达到这种目标而规定的实际步骤。这些学会组织没有严格的入会组织手续，吸收会员比较随便，一般“愿入会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揽”，“来者听之。”这些学会没有任何组织纪律约束，是一些松散的团体。就其性质而言，是属于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是后来出现的立宪团体，一个发展阶段

四、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活动及其失败

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改变中国贫弱落后的状况，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这场运动以1895年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为起点，到1898年形成高潮。

维新派7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早在1888年，康有为利用在北京参加应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皇帝，陈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请求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的危亡。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上书未到皇帝手里，但他却从此出了名。1895年4月，康有为到京参加会试，知悉签订《马关条约》消息时，便发动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即请求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处分丧权辱国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加紧练兵，将对日赔款移作军费；推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康有为认为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之谋”，后一项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通过“公车上书”把变法维新思想公诸于世，并把变法维新思潮进一步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上书虽被拒绝，但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地位。5月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和《公车上书》内容的补充说明。并将实施变法的纲领概括为三点：即“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第三书送达光绪帝手里，光绪阅后感到有利于挽救清廷统治的危机，十分重视，下令将上书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接着，6月底康有为又上清帝第四书，提出“立科以励智学”、“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还提出下情上达的具体办法是：“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设报达聪”、“开府辟士”，这样才能

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这次上书，康有为到处递送，但是顽固派都拒绝代呈。连续上书不达后，维新派转而去下面寻找支持力量，在京师和各地进行舆论宣传、人材队伍和“自主”基地的准备。使变法维新运动从北京向全国各地发展起来。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康有为第五次向皇帝上书。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系法俄、日以定国定，”就是“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把向西方学习政法具体化为向俄国和日本学习。中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群才”是指六部九卿等官吏中的维新才贤，择供咨询。下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主要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地方督抚争得一些推行新政的自主权力。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阻拦，未能送达光绪皇帝手中，但却为京中许多官员转相传抄，还公开发表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广为流传。后光绪帝令康有为把所有建议书递呈，并呈送所著《日本变政考》、

《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1898年1月，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强调要全面、彻底变法，“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提出三条变法纲领：“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这次上书，康有为进劝光绪仿效日本，实施变法，推行新政，得到光绪的赞赏。2月，康有为进呈第7次上书，重申仿效俄、日实行变法的主张。康有为等维新派连续向光绪帝上书，反复阐述变法维新的道理，全面地提出他的变法建议，以达到他“格君”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目的，他们坚信只要皇帝下诏变法，便会“天下雷动，想望太平，外国变色，敛手受约。”^①

维新派通过兴学堂、办报刊、开学会，面向社会，积极从广大的知识阶层中寻找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维新派认为，兴学堂和办报刊着眼于学，是广开民智的积极步骤。开学会则着眼于合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18页。

群，通过学会组织形式，团聚社会力量。它们三者是互相联结、相辅相成的。戊戌期间全国学会有70多个，遍及京、沪、津和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江西、湖北、贵州、陕西10省。有一部分学会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如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强学报》以及后来的《时务报》，澳门的《知新报》，长沙的《湘学报》、《湘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农学报》、《新学报》、《实学报》、《求是报》、《蒙学报》、《演义报》、《译书公会报》、《时务日报》、《东亚报》天津的《国闻报》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无锡的《无锡白话报》，广州的《广智报》等等。其中尤以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澳门的《知新报》影响最大，形成了全国的三大维新舆论中心。上述报刊，既有议论时政，宣扬变法的；也有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维新变法活动，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创办的学堂主要有：北京“京师大学堂”、“通艺学堂”、“八旗奉直小学堂”，湖南“时务学堂”、“校经学堂”、“算艺学堂”，广东“时敏学堂”、“逊业小学堂”，澳门“大同学堂”、“厚生学舍”，江南“储才学堂”，浙江“中西学堂”，陕西“励学斋”，广西“广仁学堂”，新加坡“实力学堂”，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等。其中湖南设立的时务学堂最有起色。此外，维新派还创办书局，1897年9、10月间，梁启超和康广仁在上海设立了大同译书局，次年改为官书局，出版重要的书籍有李提摩太的《时事新论》，孔广德的《普天忠愤集》，陈炽的《庸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唐才常的《觉颠冥斋内言》，程佐衡的《时务摘要》，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论议》，蔡尔康的《中东战纪本末》，梁启超的《西政丛书》，麦仲华的《新经世文编》等。这些书籍，介绍了“新学”，宣传了变法维新思想。总之，从1895~1898

年，全国各地维新派所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及书局达 300 多所。他们宣传变法维新思想，风靡于思想界，影响及于全国，维新运动不断高涨。

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联合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全面推行新政。1898年6月11日，在维新派强烈要求下，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从这一天起至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历经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并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特许专折奏事。康有为利用这一地位，不断地上奏折，递条陈，提出一系列的新政建议。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9月5日，又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4人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主要内容有：

政治上，裁汰冗员，取消重叠的行动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和鼓励发展农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路矿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文取士制度；奖励科学著作和科学发明；设立中小学堂，北京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

军事方面，裁减绿营，力行保甲，训练海陆军，各省军队皆使用洋枪，改练洋操等等。这些变法措施，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光绪帝对维新派提出的裁撤厘金、开制度局的要求则没有采纳。

维新派的改革措施，触犯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利

益。这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帝党和后党之间开展一场权力之争。6月15日，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连发3道谕旨：免去光绪帝师傅、赞助变法的翁同龢职务；规定凡授任新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而前谢恩；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控制北京和天津。这些打击新政的命令，实际上剥夺了光绪的用人大权和军权，剪除了光绪帝的羽翼。对此，光绪也进行过反击。9月4日，他毅然下令将阻挠下属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6人全部革职，任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事宜。7日，又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人从总理衙门撵走。这些反击措施，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震动，给维新派和帝党官僚以极大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慈禧和守旧派更大的愤恨。后党的重要人物荣禄、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等纷纷活动，策划政变，控告光绪皇帝，请慈禧垂帘听政。慈禧也不断派人赴天津与荣禄密谋，并调兵入京津一带，政变迹象日益明显。京津地区盛传慈禧太后将废除光绪皇帝。光绪帝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要求康有为、谭嗣同商量对策。开始，他们请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毫无结果。最后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想借用袁世凯的力量对付荣禄，粉碎慈禧太后的军事政变。9月18日，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他拥护光绪和新政，杀掉荣禄，袁一面借词推托，一面表示愿效忠于光绪帝。20日，光绪帝亲自召见袁世凯，袁再次表示“忠诚”。当晚，袁由北京回天津，见顽固派势力大，布置周密，而维新派无实力，便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与维新派。9月21日，慈禧太后和荣禄立即发动兵变，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上，正式宣布重新“训政”；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予以保留外，全部予以废除；下令逮捕、杀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9月28日，慈禧太后不经公开审讯，便下令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杨深秀等6人斩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为“戊戌六君子。”至此，“百日维新”失败。历时3年的变法维新运动最

后以失败而告终。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运动。第一，它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整个运动的发生、发展和高涨，都与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第二，它是一次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改革运动。他们以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为模式，提出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方案，要求改革封建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要求代表开明士绅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参与各级政权。他们的主张和方案促进了人们的政治觉醒，为日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新的层次上展开铺垫了道路。第三，是一次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维新派和帝党以兴办工业实现国家富强，以国家富强来挽救民族危亡，正是他们爱国的具体表现。第四，它是一次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冲击封建主义旧学，在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以后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

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表现在：第一，维新派希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不敢摧毁封建制度，甚至依靠毫无实权的皇帝和帝党官僚，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结果遭到失败。第二，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不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与维新派之愿望是完全相反的。第三，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只依靠一部分封建官僚为后盾，结果面对顽固派发动政变，只有束手待毙。因而，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资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初步传播

一、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观念的输入

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并不是说有阶级就有政党，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绝无政党可言。

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政党才随之出现，由此兴

起了政党政治，政党观念得以形成。直到19世纪后期，近代资产阶级政党观念，才逐渐输入中国，进而构成了中国近代一幅政党迭兴，斗争激烈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自古视“党”为不祥之物。《尚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论语·述而》有“吾闻君子不党之议”。《荀子·强国》有“不比周，不朋党”之论。《韩非子·有度》发出“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自大过，其蔽多矣”之叹！中国历代封建君主迭发旨令，严加制止，党禁森严。《大明会典》严厉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清政府早在顺治九年，其礼部即定有学宫条款，严禁诸生“结党多人，立盟结社”。顺治十七年，清廷发出严禁结社的谕旨：“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①

党禁虽然不绝，但党争仍充斥于史卷。如东汉之钩党，唐之牛李党，宋之蜀洛党，明之东林党、阉党、清之白莲、三合、哥老、大刀、小刀等会，几代代有之，相互倾轧不已。但这些“党”、“会”和近代的政党根本不同，因在封建社会“朕即国家”的专制政体下，没有政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政党政治、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传播而从西方输入中国的。

洋务运动时期，马建忠在《上李伯言出洋工课书》中，抨击了西方的代议制，涉及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情况。他说：“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于首相与二、三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

① 《大明会典》第162卷，律例三，第14页

②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盛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忘得治乎。”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西方议会的政党政治。他说：“英国上下议院，公保两党，选为进退，互相维制。公党者，主因时变通，裨益公务。保党者，主保守旧章，勿使损坏。两党胜负之数，视宰相为转移。保党为宰相，则保党在院皆居右，而公党皆居左；公党为宰相，则公党居右，亦如之……一出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济于平云。”这一阶段仅提供了西方议会及议会中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信息，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

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观念在中国的初步传播

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败北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相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为了拯救中国，他们都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模式来改造腐朽的“大清帝国”。因而，西方的议院政党政治开始受到重视，于是，有关西方政党活动、政党观念通过书刊、译著传播开来。

《时务报》第3册《美国共和党宣论新政》介绍了美国的政党情况，“美国统领，定制4年一举。国有两党，一曰合众，一曰共和，各愿举其党人从任斯职。”②第8册“加拿大自由党当政”条说：“加拿大保护党人执政权18年于兹矣，今岁自由党人取而代之。”③第17册《政党说》中，评介英美两党政治说：“上有万乘之君，下有二大政党，或进而群聚政府，或退而伏在草野，一去一就，相与授受政权，岂非英国立宪政治乎！……分为合众、共和两大政党，四年一次选立总统，上自全国之大权，

《戊戌变法》第1册，第164页。

② 《时务报》第3册，总第171页。

③ 《时务报》第8册 总第528页。

下至一村之行政，所争之宗旨主义，秩序不乱……是非北美合众国之实情乎？”①第38册《伯拉西儿（即巴西）风土记》说：

“政党分为二：其一为立宪君主党，现值共和党执政时期，此党人等多居国家枢要之官。”②第49册《日本维新守旧两党论兵备》中，记载“日人向分两党，其积不相能之处，实与英之守旧维新无异。”③

唐才常在谈及英、法两国的议会活动时，对它们的政党活动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法国“共国之党三、曰君党，志复君权者；曰民党，志保民权者；曰中党，中立二党间，无成见者。三党遇事辄齟齬，然以可否之多数定义”；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一日公，一日保。公党者，因时变通；保党者，守旧勿坏。二者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济于平”。④

王奇英所编《时分通考》所收《英国职官大略》说：“君主立相，两议院各以其党推举，君择一人，命为首相，则其党俱进为政府。……首相……与议院相持不合，则首相率其党俱退。”⑤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民说”，对政党政治进一步作了论述。他说：“政党政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也，予是自布其政策，以抨击在朝党之政策，曰使我党得政，则吾所施設者如是如是；某事为民除公害，某事为民增公益，民悦之也，而得占多数于议院，而果与前此之在朝党易位，则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孚民望而保大权，而群治进一级矣”。⑥

在初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观念的过程中，他们还力图阐

① 《时务报》第17册，总第1146页。

② 《时务报》第38册，总第2601页。

③ 《时务报》第49册，总第3339页。

④ 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湘学报》，第9册。

⑤ 琦英：《时务通考》第20卷，第3页。

⑥ 《新民丛报》第10号，第34—35页。

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朋党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唐才常说：“有议院必有党，有党必有公私，固然其无足怪，然诸国明许以党，党亦明张其帜，明异其途，以待权衡于党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无弗举。故西人党亦党，不党亦党；私亦党，不私亦党。中国自汉迄明，讳私讳党；讳而私，私而轧；轧而两败，以孤其国。何者？君子之党，往往蹶于小人之党。小人巧营其党，使人主不觉，乃辄以党名倾君子。君子俯首贴耳，辗转牢阱罟网中，供其一逞。卒之小人又有小人之小人，叠起相乘，不至庙社邱墟不止。”^①

严复在“论中国分党”一文中认为：“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承为报复之事，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之。其党也均以事势成立，不必以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及有所藉乎，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②

上述评介状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西方政党制度、资产阶级政党观念的认识，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对政党产生的原因、政党与议会的关系、政党与传统的朋党的区别等方面，是肤浅的、片面的，没有接触到政党的实质。但它对于清王朝的党禁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各种政治团体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上书李伯相出洋工课书》，《戊戌变法》第1册，第164页。

② 《戊戌变法》（Ⅱ）第75页。

第三章 资产阶级政党雏形 兴中会的出现及其活动

第一节 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型知识分子群的产生

一、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到了本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了进一步发展，从1905年到1908年，又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新设厂矿的规模和资本力量比前一次高潮均有较大程度的增长。这一时期，新建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为238家，拥有资本6100余万元，平均每家企业资本为26万元左右。1906年新设厂矿68家，共有资本2299万元，平均每年企业资本在33万元左右；而个别企业的资本有高达100万元以上的，如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山西保晋公司乃天津丹华火柴厂等，更是前所少有的。

在这一时期中，面粉、肥皂、水泥、水电及机器工业都陆续成了民族资本热烈追求的对象，投资范围更加广泛。如在1904—1905年的短短两年中，上海、汉口各地民族资本面粉厂即增加了10家，前此创建的荣德生经营的茂新面粉厂，则乘机扩建厂房，增添新的设备，把企业的生产能力从每昼夜生产的300包提高到800包，增加1.5倍以上。^①1905年以后，北京、天津、汉口、江苏、吉林和上海等地争相设立面粉厂，一直持续到1908年。其中资本最雄厚的北京丰顺面粉厂，拥有资本40万元之多，其余各家

^①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页。

的资本，也大多在25万元到30万元之间。织布业仅在1905年一年内，即新设织布厂9家，在这一时期中，棉纺织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1905—1908年的4年中，江苏、浙江、河南及上海等地又增设了8家民族资本纺织厂，共拥有资本484万元，增加纺锭12.9万枚。卷烟业也发展起来。在1905年前，国内民族卷烟厂仅有3家，且资本单薄，而英美烟草公司设在香港、上海的工厂生产的卷烟几乎垄断了整个烟草市场。但在1905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变，16家民族卷烟厂乘机兴起，产销兴旺，营业繁忙。其中，有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是在这时崛起的。其他如水电、皂烛、榨油、火柴、机器砖瓦业，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发展。

在收回路矿斗争的基础上，15个省的商办铁路公司积极筹集资金修建铁路，尤以浙江铁路公司最为突出，集得股金达925万元，超出预定计划54%。各铁路公司到1911年总计铺设了铁路420公里。在当时全国自主铁路只有950公里的状况下，各省商办铁路公司修建铁路的成果，还是很可观的。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对矿山投资也比较积极。如1897年筹建了规模宏大的官督商办的萍乡煤矿。还有经过复杂斗争收回自办的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山西保晋公司、安徽铜官山矿区、四川江北厅矿区，都加入了为数较多的私人资本。

在民族资本工矿企业发展过程中，引人注目的是，这时期出现了商办工矿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原为官办，1895年改为官督商办企业。1906年萍乡煤矿投入大规模生产，给汉阳铁厂提供了可靠的燃料基地。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了“汉冶萍煤矿股份公司”，并由官督商办改为完全商办企业，在集股活动中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此外，还在全国若干省分中，开始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集股商办的农业公司。从1902年开始，先后在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奉天、黑龙江等省，出现了集资经营的农牧垦殖公司，

到1912年时，共有171处^①。其中规模较大者有江苏通海垦牧公司、广东钦连开垦公司、广州普生农垦公司、广西桂林广益公司、漳州广美公司以及奉天锦州天一农垦公司等。它标志着在农业中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生产活动成为现实。其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有典型意义。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出现了官办企业向商办企业方面转化的情况。如1896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办的中路久通矿务公司，试办数年之后，情况不佳，由梁端甫承顶改为商办；1897年官办的木李坪锑矿（于湖南安化），后由华昌公司接办；1908年开办的吉林盘石咀铜矿，1910年由商人唐鉴章承办；1909年官办的湖北针钉厂，因蚀本于1911年由侨商梁柄农承办。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随之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社会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二、全国各类学堂的建立与留学生运动的兴起，新型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工业技术的变化，工场手工业向工厂转化，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做，劳动效率不断提高。机器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强烈要求教育为它培养具有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而旧的封建传统的教育从来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科宦仕途的门径，无新学识以后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改良。这就和资本主义发展对新型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而改革教育，兴建学堂，大批派遣去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留学生，便成了时代的迫切需要。

鸦片战争失败后，传统的封建教育的弱点明显暴露，因此，改革科举制度，加试实用学科，逐渐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迫切要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1集，第694—698页。

求。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认为，要使中国从封建落后状态中求得进步，必须反对封建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他们指出腐败的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的政策，只能使人脱离实际，闭塞聪明，根本不可能培养和选拔出有用的人材。梁启超指出，国家选官来自科举，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其后果是“生童无专门之学，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术。”他提请清政府，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堵死“为八股以应科举”的旧路^①。这篇建议于1898年7月转载于《国闻报》上，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1897年底，徐勤在《时务报》发表《中国除害议》一文，抨击了“八股愚天下之人”的科举选官制度。他说，不通古今，不通时务，浮腔滥调，可以登科，“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者”^②，维新派极力主张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培养人材，促使国家富强。同年4月23日，清政府决定筹办京师大学堂。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新的变法方针，进行改革，明令废除八股文，把科举改试策论；取消各地旧式书院，改设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建立报馆、学会，奖励新发明和科学发现。但它随着变法的失败而落空。

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决定改革教育，于1901年7月，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和废除武试。当时，在科举形式方面虽有一些变化，但是科举的封建性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1905年8月，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才完全废止了在中国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过去设置的书院逐渐改为学堂。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是为“壬寅学制”。它将学校分为7级；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高等小学堂3

① 《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346页

② 《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第126页。

年，中等学堂 4 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 3 年，大学堂 3 年，大学院无定期。此外与中学堂并存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校并行的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大学专门分科，课目分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业、医术 7 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中学堂的课程为修身、读经、算术、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国文、图画、博物、物理、体操 12 门。寻小功课为修身、读经、作文、习字、史学、舆地、算术、体操 8 门；高小功课为 11 门，除寻小之 8 门功课外，又增加了古文辞、理科、图画或加农工商之一。但这一学制因不完备，加之清政府对拟定人张百熙存有疑忌而多未实行。

1903 年 11 月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进学堂章程，即所谓《奏定学堂章程》，它是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通常又称“癸卯学制”。它分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 4 年、初等小学 5 年（7 岁入学）、高等小学 4 年，共三级 13 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 5 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本科及预备科 3 年，分科大学堂 3—4 年，通儒院 5 年，共 3 级 11—12 年。

与上述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和优级师范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两等，修业年限共 8 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相当高等小学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堂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三等，修业年限共 15 年。

此外，还设有译学馆，属于高等教育，修业年限 5 年。还有为新进士学习新知识的进士馆和为已任的官员学习新知识设立的仕学馆，均属高等教育性质。

我国创办的新式大学教育，实际上开始于 1895 年津海道盛宣怀所奏设的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内设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 5 科。1896 年 5 月，刑部左侍郎李瑞芬奏请于京师建立大学堂，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

局、J—立报馆 选派游历。1898年4月23日，总理衙门奉谕举办京师大学堂，并委派孙家鼐管理，开办经费，常年用款，由户部筹拨。5月22日下令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建为高等、中等与小学堂。在戊戌政变后，一切新政均被推翻，独京师大学堂获得保留，但清政府却于1898年9月30日下令停止各省书院改建学堂之举，各项考试仍用八股文试帖经文策问，停止经济特科。1901年8月2日，清政府迫于形势，复命各省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萱开办山西大学，将筹备的中西大学堂并入，是建立省立大学之始。下半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除京师和山西两个大学外，各省大学均按照章程改为省立高等学堂。从1906年推行法政教育，将仕学馆改为京师法学堂，各省也专设法政学堂。

这一时期，大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截止1909年，全国有大学堂3所，学生749人；省立高等学堂23所，学生3963人；高等专科学校97所，其中农科5所，学生530人；工科7所，学生1136人；商科1所，学生24人；法科47所，12282人；文科19所2546人；理科3所211人；医科8所336人；工艺7所485人。总计123所，学生22262人，法科学生占一半以上。①

于此同时，师范教育也开始发展起来。中国近代公立的师范教育始于1897年设立的南洋公学的师范学院，到1902年，在《钦定学堂章程》中，才正式规定了师范学校系统。但这时只是附设于各学堂内，尚未成为独立系统。中等师范附设于中学堂，高等师范附属于高等学堂。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置了师范学馆，开设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术、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等。它是今之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始将师范教育划出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182、184页。

来，而单独成立一个系统。它把师范教育分为优初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的教师；优级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及管理員为宗旨。1903年于南通创立的师范学校，是师范教育专设学校的开始。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较男子修业期限各缩短一年，开始确立了中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

到1910年，清政府设立的师范学校（包括各类的师资训练机构）共415所，学生28752人。^①

到1910年时，全国兴办各类学堂已达42444所，1911年激增到52500所，各级学堂的学生人数也随着上升。1903年全国已有学生数万人^②，到清政府覆灭前夕，全国学生总数已达156万人。

在国内各学堂的建立和发展的同时，掀起了一个出国留学运动。

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出于洋务运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需要，开始注意留学教育。1872年曾国藩奏派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侯补同知闵克任带领幼童赴美正副委员，常期驻美，主管一切留学生事宜。8月27日第一批留学生詹天佑、梁敦彦、容尚谦等30人赴美学习，是为中国选派官费留学生之始。1873年5月，第二批留学生赴美；10月第三批留学生30人赴美；1875年第四批留学生赴美。前后派遣四批，共120名赴美留学生。接着，李鸿章于1876年4月15日乘洋员李励协任满回国之便，派天津武弁、卡长胜等7人随同赴德学习陆军，以3年为期。1877年1月15日，沈葆楨、李鸿章奏请选送马尾船政学堂前学堂学生14名、艺徒4名去法国学习制造，后学堂学生萨镇冰等127名赴英学习驾驶，是为中国选派官费留学生赴欧洲留学之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185页

② 《清廷文献通考》（二），第8634页。

始。这一时期所派遣的去英、法、德等国的留学生，在洋务派的实用主义方针指导下，基本上处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阶段。

甲午战争以后，留学生教育进一步发展起来。许多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积极鼓吹留学，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成了朝野上下多数人的呼声。但在维新运动失败以后，留学运动转入低潮。这期间赴国外留学的为数很少。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加深。被帝国主义八国联军蹂躏的破碎山河，满目疮痍，戊戌政变的屠刀断送了维新事业的一线生机，从而严峻地提出了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环顾全球，首先看到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向西方学习而勃兴，遥遥领先于中国。因而得出结论：“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①。”于是，大批青年飘洋东渡，形成了20世纪初以留日为中心的全面留学运动。

当时出现留日热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人们把留学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挽救祖国危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留学救国思潮。与此相联系的是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出国留学的新政策。当时，清政府濒于灭顶之灾，面对着风起云涌的群众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要求各种政治、经济权力的请愿活动，他不得不在保护地主阶级统治利益的前提下，作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改革，以图挽救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危亡。于是，清政府接过来他们曾经反对过的戊戌变法时提出的口号，叫嚷变法革新，实行所谓“新政”，大搞智力开发，兴育人材，而新式人材在当时条件下，主要应在外国培养。清政府从关系其自身安危的“新政”的这种政治需要出发，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留学的政策 第一 鼓励出国留学 开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

辟留学作官的道路。1901年后，清政府多次号召青年出国留学，并允诺学成归国者分别赏与举人 进士出身 分配各种官职。1903年10月6日，清政府颁发湖广总督张之洞拟定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具体地规定了奖励留学的办法。即由日本普通中学堂毕业并取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由日本高等学堂毕业，取得优等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分别录用，由日本大学毕业，持有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持有博士文凭者，除了给予翰林出身外，并按翰林升阶。这等于给留学青年在科举之外开辟了一条读书作官的道路。因此，当时称这些人为“洋进士”、“洋举人”。清末受予留学生进士的达183人之多^①。第二，废除科举，使出国留学成为知识分子的最好出路之一。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堵塞了科举作官的道路，从而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谋求新的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其次投考学校，没有钱的人就投入新军当兵”^②。在考虑个人前途时，正如秋瑾给其兄信中所说的那样，“今日世界谋事，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年，谋事较易”；“赴东京（日本）方不虚掷青年也。”^③它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第三，开辟多方留学渠道，采取了多方派遣，官费与自费相结合的方针，发挥中央、地方、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派遣为官费留学生；社会团体派遣的属于民间性质，介于官费与自费之间；个人留学则为自费。

1903年出现了留日热，留学日本人数以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速度激增，大致情况是：1896年为13人，1898年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608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1907年10000人，1909年30000人。

清华大学编：《引得》特刊第19号，第241—245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3页。

③ 《秋瑾集》第42页。

李喜：《清末留日学生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

出国留学以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为最多，“游学之盛，至于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①。当时，偏远的四川省所辖的 100 多个县，每县都派留学生，而且还有自费留学生。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描述的那样，“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②

由于“兴学堂、派留学”高潮的掀起，使中国在 20 世纪初出现了一新型的知识分子群。大多数从学堂出身或留学归国的留学生，由于接受了资本主义“西学”、“新学”的熏染，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培养出一批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新兴的知识分子群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生长起来的。他们大多数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因而有很大的革命性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掌握资本主义的科学和社会学知识，政治敏感性强。他们在民族危机加深清政府对外妥协以及群众革命运动高涨形势的推动下，积极摸索和探讨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

第二节 兴中会的创立及其革命活动

一、孙中山的早期政治活动

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字逸仙。他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清政府统治的残酷，捐税的繁重，使幼年时代的孙中山对农民的痛苦有较深的了解，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因而，产生了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

①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留学译编》第 8 期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5 页

强烈愿望。认为“中国的农民不应该长此这样苦下去”^①。

孙中山由于家境穷困，9岁时才进私塾读了一点书。他深受珠江三角洲的反清情绪的激荡，对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权颇为崇拜，“慨然以洪秀全自居”^②。1878年时，由于他的长兄在美国檀香山经营垦牧而发展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遂接他和其母同赴檀香山。先当了一个时期的学徒，随后即到火奴鲁鲁英国教会办的奥兰尼学校学习，系统地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获得了丰富的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因而产生了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来改造祖国的愿望。正如他在1912年的回忆中所说的那样，“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数年后至檀香山就博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数人互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胞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吾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③

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返国，目睹封清朝封建政府的反动腐败和中国人民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状况，更加激发了他振兴中华，挽救祖国危亡的热情。他回国不久，即去香港拔萃书室学习，1884年4月转入皇仁学院读书。1885年受中法战争的刺激，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这时，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广东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和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中国工人群众掀起的反对法国侵略者的罢工运动，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当中国军队获得谅山大捷、临洮大捷以后，清廷却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卖国条约《越南条款》，更加充分地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这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乃下定了推翻清政府的决心。他后来在《革命原起》一文中写道：“予自己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896年秋，他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求医，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5页。

② 胡去非：《总理事略》，第5页。

③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141页。

术为入世之谋”。此间结识了三合会会员郑士良等，经常谈论革命问题。1887年秋，又转入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学习。在5年的学习期间，他一方面认真学习医术，借以做“入世之谋”，同时致力于革命的宣传，“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合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令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①。孙、陈、尤、杨四人都非常赞佩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的为人及其英勇的反清斗争事迹，并经常聚在一起谈论革命，因而被港澳的亲友称之为“四大冠”。即孙中山称之为“革命言论的时代。”

1892年7月，孙中山于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后在广州、澳门行医。由此结识了许多官僚、富商、大绅，进一步了解到清政府政治的腐败，因而感到“欲救国救人，非除去此恶劣政府不可。”^②1893年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尤烈、魏友琴等人，聚会于广州广雅书院内南园“抗风轩”，倡议成立一个革命团体，名为兴会中，以“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并未形成具体的组织。可以说，它是孙中山创建兴中会的一次预备会议。但这时，改良主义思潮也给他以一定的影响，就在他竭力鼓吹革命，开始准备从事革命之时，还进行了一次企图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尝试。1894年夏，孙中山抛开医生和药房的业务，回到翠亨村用十余日的时间写成了给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上书，条陈改革大计。在上书中，批评了李鸿章领导的洋务运动，说他是“徒为坚船利炮之务”，是舍本而求末。从而提出了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蓝图。他认为“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力则百事足，物能尽其用则财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

孙文：《革命原起》。

《总理全集》第2集，第141页

而四者之中，“农业之兴，尤为当务之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幻想依靠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实现这些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李鸿章充当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对孙中山的上书的态度极为冷漠，根本不予理睬。当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在芦台督师，见到他的上书后，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说吧，”从此束之高阁，不了了之。这次上书的失败，彻底破除了孙中山在实行自上而下改革方面存在的幻想，从而认清了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的道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从此，他义无反顾地作为一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开始了革命活动。正如陈少白在其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中叙述的那样，“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中山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清政府。”

二、兴中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孙中山上书失败后，1894年10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初战严重失利，高升号被日舰陆军在牙山战败，举国震动。他认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已不可救药，“和平方法，无可复施”^①，只有革命一途，乃深入武汉，了解长江形势，旋即赴美檀香山，“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举。”^②

孙中山到达檀香山后，积极宣传反清革命，并得到一批爱国华侨的协助，在他的推动下，1894年11月24日在火奴鲁鲁埠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会所设在界涉银行经理何宽家中。与会者20余人，推举永泰和杂货店司理刘祥为主席，何宽为副主席。选孙中山为会长，程蔚南、许直臣

《总理全集》第1集，第871页。

② 《总理全集》第1集，第871页。

为正副文案，黄华辉任管库，李昌、郑金、邓荫南等为值理。加入会的均填写入会盟书。会后另设银会，筹措经费。

会议通过兴中会宣言 9 条，为兴中会的第一个章程，是由孙中山亲自起草的。这个章程，尖锐地揭露了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严厉地谴责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虑远。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下，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仅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奠我中华，仰请同志，盍自勉旃！”章程第一条还规定兴中会的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昔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崇”。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救国宣言。

兴中会宣言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革命纲领，但在会员秘密入会誓词中，却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它鲜明地反映了兴中会反清革命，建立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标志着孙中山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

1895年1月末，孙中山抵达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他联络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黄咏商以及辅仁文社的首领杨衢云、谢赞泰等人，提议扩大兴中会组织。杨、谢二人决定取消辅仁文社组织，加入兴中会。1895年2月22日，兴中会总部成立。总部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路13号，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为掩护。

香港兴中会在宣言和会章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宣言进

一步揭露了清王朝“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社会危机，从而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满州贵族当皇帝的清朝政府，更充分地体现了兴中会的反清宗旨和革命性质。宣言还提出了“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的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它还强调进行救亡的宣传，要将“富国强兵之学，化成民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尔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

兴中会的组织形式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选举方式，章程规定：“本会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库一位，值理八位，差位二位，以专司理会中事务，^①”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②”这就扫除了旧式会党那种层层加封，唯首领之命是从的陋习和宗法制度的遗毒。同时规定，“不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从而打破了地域的界限。

兴中会第一批早期的会员共有 126 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有 82 人，内含商人 74 人 农场主 4 人 畜牧主 1 人，银行家 1 人^③，绝大多数为华侨资产阶级。又据对以后有稽可考的 286 位会员的考察，其中中小商人 122 人，工人 54 人，会党分子 34 人。此外为留学生、公务员、学生、传教士、教员等。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兴中会的主要力量，同时，会党分子在这一组织中又占有相当的比重，入会的秘密誓词中的革命纲领没有写在宣言中。在宣誓入会时，采用以左手放在耶苏圣经上，以右手向天的仪式，口诵“倘有二心，神明鉴察”的词句，说明兴中会还受着秘密会党那种原始仪式的影响。

^②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辛亥革命（一），第 85—86 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卷三，《兴中会初期孙总理文友好及同志》。

从兴中会的入会誓词、宣言、组织形式及阶级基础方面考察，它是从根本上区别于会党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雏形。

兴中会成立后，先后在国内外扩展组织。计有：茄荷雷、百衣分会、广州分会，并以“农学会”为掩护，设立数十处分会机关。

三、兴中会的革命活动

香港兴中会总部建立以后，便以此为基地，积极策划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并把起义地址确定在广州。首先是广州与香港毗邻，便于革命活动；孙中山在这地方行过医，对广州情况比较熟悉，并与各方面均有相当的联系；在广州发动起义，又便于对国内外扩大影响。

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以后，为筹备广州起义，孙中山乃偕郑士良、陆皓东等数人抵穗，成立了兴中会分会，会址设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会员迅速发展至数百人。此间，还组织了一个农学会，作为公开团体，以便掩护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在东门外盐虾街张公馆设一分机关，作为储备武器及起义各部队联系场所；又于河南头咀设一炸弹制造所，还购火轮 2 艘 以备运输之用。杨衢云则驻香港专任起义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

1895年3月，孙、杨于香港密商武装起义事宜。孙中山原主采取“外起内应”策略，即组织敢死队 100 余人发动起义，以 20 人攻衙署，20 人在要地伏击援军，20至30人围攻旗界，任务完成之后，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惟多数人认为人少力薄，冒险太甚，乃改用“分道攻城”之策。商定于 10 月 16 日（阴历 9 月 9 日）乘乡民归省重阳扫墓之便，使各民团分从顺德、香山、北江三路会集广州，同时举事。另于汕头及西江沿岸招募两军，同时向广州进逼。还采用了陆皓东的建议，用青天白日旗代替清政府的黄龙旗 以示推翻清政府 建立新国家的决心。于是 孙中山再返广州，在政学各界，防营水师以及绿林会党中进行联络工作。

时值甲午战争结束，清两广总督李瀚章遣散了 $3/4$ 之军队，引起士兵的不满，兴中会乘机运动，收为己用，形成了一支起义武装，由朱贵全统率，集中于九龙。还联络了广东北江的绿林，三元里的乡团，香山、顺德的会党，广州的防营水师。嗣派刘裕统率北江一路，陈锦顺统帅顺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统帅香山一路，麦某统帅尤眼洞一路，杨衢云统帅香港一路，吴子才统帅潮山一路，以牵制岭东清兵。为避免清政府侦悉，通令各路起义军一律乔装重阳扫墓群众，于重阳节前夕，10月25日晨（即阴历重阳节9月9日晨）齐集广州城待命起义。决定以“除暴安良”为口号，以带缠臂为暗号，以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10月26日重阳节到，起义各部队纷纷到指挥部领取命令，但香港一路没有赶来，并收到了杨衢云用暗语报告“货不能来”的报告，内称须改迟2日方能出发。指挥部认定起义不能按规定时间发动，势必泄漏消息，贸然发动恐遭失败，乃令各部返回候命，并电杨衢云勿令香港义军来省。陈少白、孙中山于当日晚和27日先后离开广州去港。果然，形势发生了突变。兴中会员朱淇之兄知悉兴中会准备起义情况，至期未能发动，怕事泄被株连，乃迫使其弟向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自首、告密，李急忙报两广总督谭仲麟，谭得报告后大为恐慌，乃急派兵增加广州防卫，并大肆搜查门底王家祠、咸虾栏兴中会机关，先后捕去陆皓东等5人。杨衢云接到孙中山停止行动的电报后，因为军械7箱已装上泰安轮运省，起回又恐败露，仍派朱贵全、邱四等带领数百人乘轮去广州。当轮船抵岸时，预伏的清兵当即将朱、邱等40余人捕去。至此，起义计划全部败露。

陆皓东在敌人的刑廷上表现非常英勇，对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直认不讳，虽遭受酷刑，亦拒绝供出同谋之人。并痛斥清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明确地宣布：“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

灭满清”^①。11月7日，他和邱四、朱贵全同被杀害。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等16人被清政府悬赏通缉。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也是革命党人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开端。它表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开始进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就采取了武装斗争的手段这是一个突出的优点。但是，这次起义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主要是暗中联络会党、绿林和军队，因而缺乏群众的基础，没有组成可靠的战斗队伍，加之，没有建成一个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内部的步调很不一致，以致起义在没有发动起来之前就失败了。

第三节 保皇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一、保皇会的建立及其政治纲领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光绪被禁于瀛台，西太后重新听政，六君子被害，康有为、梁启超飘洋东渡日本，维新运动终于夭折。

1899年春，由于清政府的对日交涉，迫使康有为离开日本作欧美之游。3月抵加拿大，去域多利、温哥华等地，曾拜访温哥华市长，发表演说，宣布政见：成立立宪政府；建国民银行；铁道矿山国有；大中小学学术自由；由政府设陆海军大学，实行金本位。是年4月，去伦敦，要求英国政府帮助他的复辟计划，但未获英议院多数席位通过，乃返加拿大，于7月21日在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人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

康有为声称，保皇会系奉光绪帝密诏成立。在《保救大清皇帝序例》中，阐明该会的宗旨是“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

《辛亥革命》（一），第229页。

黄种为主”；“凡我四万万同胞，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可为会中同志”，“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它把忠君与救国连在一起，救圣主就是救中国；救中国必须变法，变法又“非仁圣如皇上不可。”从而把救皇上、救中国、救黄种连结为一体。他们的忠君爱国的宗旨和反对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思想主张，当时引起了一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共鸣，也吸引了一些仍有正统观念的人们。这是在一个时期内保皇会组织得到比较迅速发展的因素之一。

保皇会成立之后，康有为即赴南洋发展组织，设南洋分会于新加坡，推侨商邱菽园为分会会长，将邱所创办的“天南新报”变为保皇会的机关报。此间，康又派遣在日的图谋与革命派合作的梁启超赴美檀香山发展会务，梁在此经过数月活动，以“名为保皇，实为革命”相号召，组织了檀香山保皇会，另设希炉、道威等岛分会，许多侨商受其蒙蔽，纷纷加入该会。由于保皇会成员的活动，一时组织发展很快，除美洲、南洋、檀香山外，澳洲、香港、澳门、上海、宁波等地，也有保皇会组织的出现。

澳洲保皇会：1900年春最早成立了雪梨分会，刘汝兴、欧阳万庆为董事，另设值理若干人，入会人数较多。经常利用节假日休息日，聚会宣传保皇会的救国、保国、保种宗旨。同年秋，梁启超去澳，又在巴扶、遮炉顿等设立保皇分会，以“东华新报”为其言论机关，由唐才常之弟唐才质任主编。

美洲保皇会：创始于域多利，以旧金山为总事务所。以后又在乌威士晚士打、砵仑、舍路、旧金山等地建立了组织。至1903年共设有11个总部，103个支会：

- (1) 加拿大总部，下属12个支会，以温哥华为总会。
- (2) 美国加罐宽尼总部，下属12个支会，以旧金山为总会。
- (3) 美国西北总部，下属26个支会，以砵仑为总会。
- (4) 美国东部总部，下属6个支会，以纽约为总会。
- (5) 美国中部总会，下属13个支会，以芝加哥为总会。

- (6) 美国南部总部，下属 4 个支会，以纽柯连为总会。
- (7) 美国汶天拿总部，下属 12 个支会，以气连拿为总会。
- (8) 墨西哥总部，下属 9 个支会，以莱苑为总会。
- (9) 中亚美利加总部，下属 4 个支会，以巴拿马为总会。
- (10) 南亚美利加总部，下属 3 个支会，以秘鲁之利马为总会。

(11) 檀香山总部，下属 8 个支会，以檀香山为总会。

亚洲保皇会：总部设于澳门。其所属支部没有全面统计，横滨分会成立于 1899 年，南洋各地以槟榔屿成立最早。1899 至 1900 两年间，英属各埠及荷属各埠也建立了保皇会组织，接着在缅甸、仰光、香港、菲律宾建立了分会。规模较大者为澳门总会。澳门原为孙中山早年进行革命活动之地，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适值康有所派之人在该地创办《知新报》，其弟广仁（幼博）及诸弟子徐勤、麦孟华等聚此活动，得到当地巨商何穗田的支持。他们还创办一些学校，扩展教育组织，为保皇会在该地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保皇会成立后，康有为建立组织，以何穗田为会长兼总会财政部长，并在当地开设“东义学校”，聘日人田野橘次为校长。澳门总会设于《知识新报》社，为亚、美、澳各地保皇会的总机关。

保皇会成立后，为聚集人材，宣传保皇主张，筹措活动经费，便积极创办学校、书局、报馆和商业。

在学校方面，早在 1897 年冬即创立了横滨大同学校，以徐勤为校长，秉承康有为的授意，以振兴礼教为宗旨，以“戊戌政变记”及康有为、梁启超诗集为教材，该校分设寻常、高等两级，各为 3 年毕业，共有学生 140 人。1899 年 7 月，由梁启超向横滨华商募款，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梁自任校长，分设政治、法律、商业、师范四科，参照日本中学校及专门学校的课程而酌情

增加或减少。该校在1901年改名为“东亚商业学校”，翌年又改称“清华学校。”1900年2月，在梁启超的主持下，成立神户同文学校，分设中文、西文、日文三科。1905年，开办了香港广东公学，有学生200余人。此外，何穗田于1899年在澳门创办了“东文学校”，林文庆于新加坡建立了“女童学堂”，李连喜于荷属加钒设立了“妇孺学堂”及南洋的“中西学堂”、仰光“辅仁学校”。

在书局和报馆方面，1901年创办了上海“广智书局”。1901年夏由梁启超集资成立横滨译书局，邀集留日学生翻译西文书籍，出版了许多鼓吹宪政书籍。早在1898年11月就由侨商募款创刊了《清议报》，由冯镜如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撰述，麦孟华辅之。

商业方面，颇受保皇会的重视，在香港创办了华益公司及中华酒店，由徐勤、方子节主持；在墨西哥创办华墨银行及电车事业由康有为亲自主持。在美国纽约开办琼彩楼餐馆，于广西设立太平山金矿公司，保皇会经营商业的主要目的在于筹措经费，但因资金不足，营业状况不佳，故其活动费用，除会员的会费外，主要来源于海外华侨的捐助。如《清议报》的经费主要由旅日侨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提供，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得到了华商曾卓轩、郑清璠的帮助。

二、保皇会的政治活动

保皇会成立后，即把光绪皇帝重掌政权，作为他们活动的主要目标，大造舆论，鼓吹“唯我皇上圣明，才能救中国。”1900年1月24日，西太后召集王公、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集议，拟立端郡王载漪长子溥儀为嗣，准备废光绪，使溥儀为帝。同日，光绪帝被迫发布旨意，自称“痼疾在躬”，经“叩垦圣慈”封溥儀

为皇子，“以为将来大统之归”^①。清廷此举，激起了保皇会的激烈反对，国内外保皇组织纷纷致电清廷，反对废立，并上书边疆大臣，要求支持。“诸如“美洲各属保皇会绅商等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书”、梁启超“上粤督李傅相书”、合美属保皇会侨民3300人“上粤督保李鸿章书”等。

是年10月，康有为还直接致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说明勤王之意；1901年夏秋间，保皇会人有三起上书两广总督陶模：一起，由檀香山阖府保皇总理黄亮，钟木贤等所上，要求保护保皇会员；一起，由加拿大各埠保皇会总理叶恩所上，要求广东自立，以存中国；第三起由巴拿马个郎埠保皇会代表所上，要求诛荣禄，救光绪皇帝。电称：“皇上为中国待治之圣君，荣禄为袒匪肇祸之罪首。今欲挽危局，非力扶皇上不可；欲求皇上，非先除荣禄不可。”1902年康有为在“清归政皇上立定宪法以救危亡摺”，力陈“且虑变法不行，圣主不测，即尽忠效命，尽赔此十万万后（著者注：即《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对侵华帝国主义国家之赔款），而中国亡可立见，大款之赔又再来也，”故“人人思发愤以杀奸。”他认定：“荣禄有可杀之罪四：戊戌之秋，亲调董福祥兵以入京师，以惑深宫，以幽圣主，罪莫大如以臣废君，可杀一也，推翻新政，杀戮忠贤，以绝中国生机，罪莫大于乱国致亡，可杀二也。己亥之冬，拥立溥仪，图弑皇上，罪莫大于助篡图弑，可杀三也。至于抚拳匪以杀外人，破京邑以危中国，赔款十万万以毒生民，夫罪大莫于君奔国破，戕害生民，可杀四也。”

保皇会组织还利用光绪皇帝生日之机，致电清廷，要求光绪亲政变法。《清议报》中曾作过具体的记述：“每逢万寿圣节，各埠保皇会无不麇集鳞萃，顶礼拜祝者，多则万人，少亦盈千。顷当（光绪二十七年）6月26日，恭逢光绪皇帝万寿圣节，……

^① 《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卷21。

美属各埠保皇会既于是日在会举行祝典外，复联名电祝，并呈请回銮亲政变法，或托英公使代达，或托美公使代达，电奏纷驰”^①。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保皇会诬蔑它为“拳匪”，叫嚷“能救皇上，则诸贼自除”；“必能和亲各国，保护教人，并准备讨贼勤王”，组织和控制了自立军“勤王”运动。

《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反动卖国本质已暴露无遗，人们对清廷已经绝望，革命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但是，康有为仍坚持其保皇宗旨，拚命抵制革命。他以很大的精力撰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阐述了“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学说，作为反对革命的“理论”根据。1902年又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能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奉劝人们“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②；说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法国一国，它是“欧洲特别之情”，而革命后还有“大乱发生”。宣扬革命不适于中国国情，只有“皇上复辟”，才能“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保皇会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亚东报》、《东方杂志》等刊物，连篇累牍地宣传君主立宪，讴歌光绪皇帝“圣德”，恣意诋毁革命。

保皇会在国内外的欺骗宣传，迷惑和蒙蔽了不少侨胞，占领海外舆论阵地，为革命派的活动和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

保皇会在大造舆论的同时，还在组织上大肆排挤和破坏革命团体，极力扩张保皇组织。梁启超打着“名为保皇，实在革命”的旗帜，大挖兴中会的墙脚，从而使兴中会的一些组织陷于瓦解瘫痪状态，三、四年间，檀岛“正埠及小埠均设保皇会所，而兴

^① “各埠保皇会祝嘏电示稿汇集”，《清议报》第90册。

^②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中会之名则已不复挂人颊矣”^①。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承认：“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②。温哥华入保皇会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则殆过半”纽威士绵士打“无一人不入会者”^③。旧金山致公堂大都加入了保皇会，横滨兴中会的冯如镜也加入了保皇会，港、澳、南洋、新加坡、缅甸等地加入保皇者也大有人在。因而，对兴中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孙中山直斥保皇会“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④

第四节 兴中会同保皇会的合作与斗争

一、合作的探索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进行政治活动时，尽管选择的道路不同，但彼此均感自身力量单薄，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寻求合作的愿望。早在 1896 年 2 月、10 月、参与创建兴中会总部的谢缙泰即分别与康广仁、康有为会见，提出双方合作的建议，康有为提出了维新计划大纲。1897 年与谢缙泰、康广仁又进行多次商谈，双方同意合作，并在日本横滨合作创办了大同学校。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孙中山对他们深表同情，力图争取康、梁转向革命，康有为抵东京翌日，孙中山即拟亲往慰问，但康以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来往为盾词，拒而不见。后经人斡旋，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举行会谈，详细地讨论了合作的方法。越数日，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去康寓访问，康、梁出见。陈痛言清廷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第 33 页。

② 《致南海先生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 124 页。

③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④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73 页。

国，敦促他们改弦易辙，共图革命大业。康有为则大谈以朋友之交，犹贵在久不相忘，身受皇帝知遇之恩，绝不能中道捐弃，而倒戈相向，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反复辩论，康仍顽固拒绝，并随即离日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

但康门弟子梁启超、欧榭甲却一度表现了同情革命的倾向。通过日本文部大臣犬养毅的斡旋，孙中山与他们“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因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①。拟定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起草了一份《上南海先生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此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功成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年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②。实质上，它是一份劝退书。康有为收到这封劝退书后，大为恼火，立即勒令梁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主持保皇事务，不得迟延。各地康徒指斥在劝退书上签名的13人为“十三太保”。梁为师命所迫，乃于12月启程赴檀，行前他向孙中山保证合作到底，矢志不移，并请孙中山将他介绍给檀岛兴中会，孙从梁所请，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结果造成梁对檀岛兴中会的极大破坏。

二、自立军起义，兴中会与保皇会的分裂

1900年，自立军勤王起事，是兴中会与保皇会合作共事的一次试验，同时，又是革命与保皇“决分两途”的起点。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封建势力也是一次有力的冲击。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均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会极力反对义和团运动，咒骂义和团为“乱民”、“拳匪”，同

^① 冯自由：《革命史初集》，第64页。

^② 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革命逸史》二集，第31—32页。

时认为拥戴光绪上台执政的时机已到，极力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指光绪帝）。妄图依靠英国支持，推翻那拉氏统治，然后在上海建立国会，成立政府，“迎上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义军一起，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复我维新之志”^①。

梁启超也积极主张兴兵勤王，但实际组织者和发动者为唐才常。唐为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为同窗好友，曾参加维新活动。戊戌政变发生后，他发奋举兵除奸，前往日本。在此会见康有为、梁启超，并接受了起兵勤王的任务。此间，他又和孙中山会晤，商谈合作事宜，通报在湘、鄂、长江一带起事的计划，孙中山表示支持，并说：“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②。唐为了实现他的起兵勤王计划，遂于1889年春回国。行前，孙、梁出席为之饯行，合作气氛融洽，孙中山特派毕永年、平山周去两湖地区联络会党准备起事。

唐返回上海后，初以“东文学社为掩护，继之又发起组织“正气会”以为起事领导机构。不久，为便于争取保皇派的更大支持，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唐又将“正气会”改为“自立会”。后以会名近于激烈，唐又于1900年7月26日，以“挽救时局”为名邀集各派人物80余人在上海愚园召开“中国国会”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宣布三条宗旨：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决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请光绪帝复辟。19日，在愚园举行第二次集会，到会者60余人，推举叶翰、邱公恪、汪子健人为书记，郑观应、唐才常、汪康平、胡仲翼、丁惠康、孙宝鎰等10人为干事。上述三条宗旨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否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请光绪帝复辟，两者是完全对立而不可调合的。它一方面请

① 《义和团》（丛刊），第4册，第186页。

② 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光绪帝复辟，另一方面又提出创造新自立国，两者也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到会各派矛盾斗争的折衷产物，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章太炎立即指出不应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事成之理。他声明：“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①于是“割辫与绝”，毅然脱离国会，改弦易辙，投身革命。这样，唐才常提出的“讨贼勤王，以清君侧，而谢万国”的主张就和康有为的“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一致起来，使他完全陷入了保皇派的圈子里。毕永年规劝唐才常与康有为绝交，两人辩论通宵达旦，但唐仍坚持己见。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策划、组织，唐才常编成了一支以两湖地区和皖赣两省会党及汉口新军下级官佐、士兵为基干的武装，称为自立军，共分 7 路：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总会亲军、先锋。唐任诸军督办，驻汉口，各路军均受其节制。

这次勤王运动从表面上看来，声势很大。康有为驻新加坡遥控；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日本方面有叶湘南、麦孟华、罗普等人活动；澳门方面由何穗田、王镜如、欧集甲、韩文举等负责；唐才常、狄葆贤于沪、汉主持；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广；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保皇党的重要人物几乎全部出动。但实际策动起义的人物为唐才常，唐在自立军组成后，决定于 1900 年 8 月 9 日分别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南常德、湖北新堤、汉口 5 处同时举事。8 月初唐才常到达汉口通过日本人劝说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妄图依靠洋务派军阀的支持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张之洞正在观望形势，根本不作任何表示。唐致电康有为请求汇款接济，却迟迟不到，自立军不得不将起义期后延，而没有及时接到通知的安徽自立军秦力山所部如期举事。但因孤立无援，寡不敌众，在清军围攻下迅速失败。这

^①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 1 期第 118 页。

时，张之洞经过观望之后，转而和英帝国主义勾结，派兵进入汉口英租界内，将唐才常等 20 余人捕获，迅即杀害，两湖地区先后被害者达 200 余人。至此，自立军勤王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自立军勤王起事，是维新派在戊戌维新失败以后，企图以武装斗争达到维新目的的一次尝试。但，他们导演的还是一场改良主义的历史悲剧，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流血的代价，教育了人们。自立军勤王起事的失败，促使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从此，很多人摆脱了康梁保皇派的影响而踏上了革命的征程，革命派和保皇派也开始划清了界限。因此，自立军“勤王”起事及其失败是革保两派从合作到斗争的转折点。

三、兴中会同保皇会的斗争

早在 1900 年，孙中山对梁启超在檀岛招摇撞骗，瓦解兴中会组织的卑鄙活动即给以严厉的谴责。自立军起事失败后，两派斗争日益激烈。随后，在孙中山的指导下，横滨的革命派半月刊《开智录》、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对保皇派一些报刊上的反革命言论进行批驳，初步展开理论上的交锋。1902 年康有为抛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持保皇主张，诋毁排满革命之说，公开挑战，章太炎奋起反击，于 1903 年 6 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予以驳斥。

康有为宣扬满汉已经“同化”，已无种族压迫，不能进行排满革命。说什么“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以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治之由，而非满洲特制也。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万人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章太炎列举清代民族压迫和大屠杀的史实，以及康、梁本人被通缉流亡的情况，有力地论证了种族压迫的存在。明确指出，当今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排满革命势在必行。

康有为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只能立宪，拥圣明“复辟”。否则就必然造成“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的“革命之惨”。章太炎以农民战争的史实，论证人民大众的实践，正是提高觉悟的有效途径；要用革命手段争得政治上的权利，实现民主政治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即使是英、德、日等国君主立宪，也是数经“民变”、“血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的。他论证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章太炎还列举了清朝专制的罪恶，直斥被保皇派吹捧为圣明的光绪帝为“戴活小仇，未辨菽麦”，是清朝的“亡君”，人民的“公仇”。连他自己都已不保，康氏欲保之立宪，夫复何用？如不推翻清朝统治，“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他向保皇派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指出，如再坚持保皇，将必“名实俱丧，为天下笑”。

章太炎对保皇派保皇谬论的批驳，铿锵有力，义正词严，拆穿了他们的反革命咀脸，鼓舞了革命派的斗志。

孙中山从1900年以后，在国内外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从保皇会夺取革命阵地和群众的活动，进一步看清了保皇派的真正面目，认识到必须严格划清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扫除前进道路的障碍，发展革命力最。为此，他先后指派干部在香港、檀香山、旧金山、日本等地创办、改组或支持《中国日报》、《国民报》、《檀山新报》、《大同日报》、《民报》等报刊，积极开展宣传，号召人们从思想上、组织上同保皇派划清界限。

1903年秋，孙中山在日本向兴中会作了“扫除保皇邪说”的战斗部署，随即在10月5日赶赴檀香山，领导对保皇派的论战。当他看到檀岛各埠亲手组织的兴中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时候，痛感保皇会的严重危害，认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下决心“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①。

《致黄宗仰书》，《总理全集·函札》第22页。

孙中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打击保皇毒焰，扫除保皇邪说，恢复革命组织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他在檀埠和希炉等城市，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公开讲演，驳斥保皇派的各种谬论，宣传革命道理。指出“革命为唯一的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实危惨地位”，“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孙之讲演，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加入保皇会的华侨迅速转向。

1903年底和1904年初，孙中山针对康门弟子、保皇党徒陈仪侃对革命的攻击和谬论，在檀香山先后撰写《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两文对保皇派的《保皇》宣传作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敬告同乡书》戳穿了保皇派的“名为保皇，实在革命”的谎言。揭露康氏“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不可行革命”的谬论，无非是为了“感恩图报”，延长清王朝的国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义正词严地宣告“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他警告人们要和保皇派“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这是一篇讨伐保皇派的战斗檄文，旗帜鲜明，他表现了孙中山的坚定的革命立场。

《驳保皇派书》一文，对陈仪侃的文章逐条地予以驳斥，无情地揭露了保皇派标榜爱国的反动实质。指出保皇派的所谓“爱国”是爱“大清国”，是“保满州政府”，绝不是爱国行为，“非爱国也实害国也。”文章还批驳了革命招致瓜分之谬论，指出正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才使中国无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

① 《孙中山在檀香山史略》，《檀山华侨》自由新报社，1929年版。

略，才使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危险境地。而只有首先推翻腐败无能清政府，才能使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因此，“欲免瓜分，非先倒满州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必先驱逐‘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国也。”文章还驳斥了在中国先行“君主立宪”，然后才能行“立宪民主”的谬论，强调，君主立宪并非中国必经之政治阶段，“必先破坏此专制，”然后取法“行之已收大效者”，才能“后来居上”。实行民主立宪，实乃“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通过这场斗争，使人们懂得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不同，懂得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使许多受保皇派蒙蔽的人们清醒过来，纷纷脱离保皇会，转入了革命派。在此基础上，孙中山着手恢复和发展组织工作，组织中华革命军，不再称兴中会。随之，发行革命债券，向华侨募款，使革命组织的革命活动有了经济上的保证。1904年3月末，孙中山离檀赴美国大陆进行改造致公堂的工作，4月初抵达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在美国华侨势力最大，旅美华侨，十之八九都是洪门，保皇会在美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梁启超、徐勤、欧榭甲均加入了洪门，利用致公堂大肆扩展组织。为了同保皇会争夺群众，使更多的侨胞支持革命，摆脱保皇会的影响，孙中山注意研究了洪门致公堂的历史和现状，认为洪门组织固有的反清复明宗旨与革命目标接近，许多爱国人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因而有必要发动洪门参加革命。为此，孙中山毅然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并被授予地位很高的职务——“洪棍”。但他也看到美洲致公堂章程陈旧，组织涣散，不能适应祖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积极倡议并领导“堂务改革”，提出举行全美洪门会员总注册的建议，主持重订了具有进步意义的80条新章程。它强烈谴责清朝的黑暗统治，驳斥和批判保皇派的言论。规定致公堂有光复祖国、拯救同胞的义务，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还偕同致公堂负责人访问美国几十个城市，深入侨胞中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大大

地削弱了保皇派在美国华侨社会，特别是在洪门组织中的影响，使广大侨胞纷纷脱离保皇会而转向革命方面。

此外，在南洋、缅甸、港澳等地，革命派在同保皇派的激烈斗争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侨商也相继脱离保皇会而倒向革命的一边。曾资助过勤王的有名华侨邱菽园，此间也对保皇派反唇相讥，撰文批判康有为；港澳保皇会会长何穗田宣布与保皇会断绝关系；仰光保皇会会长庄银安与保皇会绝裂，与康有为断交，转向革命。

经过 1903—1904 年兴中会同保皇会的斗争，大扫保皇毒焰，使革命派的革命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在组织上恢复和改造了被保皇会蚕食破坏的组织，改变了革命派在海外的被动局面。表明革命派在政治上已愈趋于成熟，预示着革命政党的即将诞生和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

第五节 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 与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一、留学生的爱国组织及其活动

20 世纪初，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式教育以及留学生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在民族危机加深和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下，他们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运动，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合起来，在宣传和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先锋和桥梁作用。

在知识分子群中，留学国外的学生比在国内受的政治压迫较少，涉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说较多。因而，留学生的组织团体和爱国活动也最早地开展起来。

1900 年春季，留日学生 100 余人在日本东京建立起第一个爱

国团体——励志会。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一些会员创办《译书汇编》，翻译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如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该会成立伊始，并没有明确政见，更没有提出激进的政治主张，且会员成分纷杂。后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以要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章宗祥、金邦平、吴振麟为主；一派以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为宗旨，叶涌、董鸿祯、秦毓鎰、张继等为代表。有些成员参加过自立军起事，失败后转向革命。1901年，秦力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国民报》，冲破改良主义的羁绊，提出颠覆满清主张，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明确同保皇党划清界限，显示了比较明确的革命立场。

1901年春，郑贯一等人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反对清廷卖国政策，反对清政府出卖广州湾，主张广东独立自保，因而得到旅日粤侨的积极支持，并有不少人参加此会。

1902年4月，在日本的章炳麟、秦力山等人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通过纪念南明的覆亡以激励反清革命。章炳麟起草了《宣言书》，号召人们向200多年以前的反清志士学习，起来同清朝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这一爱国行动得到了革命者的支持。孙中山亲自率人从横滨赶来参加此会。当会议由于清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破坏，而没有按原计划进行时，他返回横滨，并特邀大会发起人章炳麟，秦力山补行纪念式。与会者60余人。这次会议大大地激励了香港、澳门、广州、日本等地爱国者和留学生的斗志，影响颇大，它使留日学生打破了浓厚的乡谊观念，迈出了各方联合共同进行反清革命的重要一步。

是年冬，秦毓鎰、周宏业等，因励志会“日趋腐败”，和章

宗祥等人政见严重分歧，无法共事，乃决定另组团体，成立了中国青年会。它改变了励志会的“联络感情，策励志节”的活动宗旨，明确宣布“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因而，它是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小团体之一。该会成立以后，编译了《法兰西革命史》、《中华民族志》等书，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更多的会员则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随着留日学生思想上的逐步倾向革命，爱国团体的进一步扩大和拯救民族危亡爱国思想的宣传，从1903年起，在东京与上海形成了两个爱国活动的中心，掀起了较大规模的学潮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拒法”、“拒俄”运动。它使更多爱国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对革命小团体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

“拒法”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的严重形势下发生的。1903年广西巡抚王之春，不惜以出卖全省路权为代价，勾结法军侵入境内，联合镇压当地人民起义。这一消息于同年4月24日在日本报刊披露后，在日本和国内震动很大。当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即召开干事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发出通电，要求清廷拒绝法人，将王之春撤职治罪，28日，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召开声讨大会；29日在锦辉馆召开全体留学生大会，控诉了法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在大会发出函电中，列举大量事实，尖锐地揭露了法帝国主义以援助之名，行侵吞之实的罪恶行径。大会强烈要求清政府撤掉王之春的巡抚职务，并且废除他与法国私订的所有的卖国条约。

“拒法”运动，得到了国内人民的热烈声援。群众纷纷起来反对法国侵略，提出“拒法”、“驱逐王之春”的口号。在人民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免去了王之春的巡抚职务，“拒法”斗争获得初步胜利。

在“拒法”运动的同时，还掀起了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抗俄运动。1903年4月俄国不仅背弃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关于到期撤退在东北金川、牛庄侵略军的协议，反而于18日向

清政府提出 7 项无理要求，旨在确保东北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激起全国人民和留日学生的强烈反抗。4 月 27 日，上海群众千余人在张园集会，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 ①。”4 月 29 日上午，留日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集会议决致电南北洋大臣，要求他们主战；下午，在锦西馆召开有 500 余人参加的全体留学生大会，纷纷发表演说，同仇敌忾，一致主张对俄开战。大会确定了抗俄的措施：组织抗俄义勇队；致电上海各团体，请求协助；派人去国内各富庶地方及南洋各埠、欧美各国从事运动。会上留学生纷纷签名参加义勇队，女学生的共爱会也举行特别会，加入红十字会，随同义勇军北征。5 月 2 日改义勇队为学生军，留日一士官生出任学生队长。5 月 11 日，为避免日本警方干涉，又将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并制定了公约。规定“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教育为宗旨”；“公约之目的在拒俄，会员负责保全国土，扶植民力之责。”会员达 208 人。该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有：学习射击、学造火药，从事宣传和派人回国运动。

拒俄运动得到了国内学生的广泛响应。4 月 30 日，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集会，决定联名上书管李大臣，要求他代奏拒俄。同时，电各省督抚、各省学堂，并运动京官，督促他们一同力争。武昌各学堂于 5 月 13 日停课集会，决定上书兼湖广总督端方请他代奏。5 月 17 日，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校学生连同其他群众 300 余人集会，决定成立爱国会，宣布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 ②。”南昌、广州、杭州、福州、长沙、开封等地的学生和群众也参加了拒俄斗争。

“拒法”、“拒俄”是由新型知识分子领导的两大运动，广

①《呈外务部电》，《苏报》，1903 年 4 月 28 日。

②《安徽学生爱国会拟章》，《苏报》，1903 年 6 月 7 日。

大的学生、教师以及其他从事斗争的人士起了骨干作用。清政府虽迫于国内人民的反对和英、美等国的干预，始终没有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拒俄”运动却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从现实斗争中认识到要反帝爱国就必须进行反清革命。正如黄兴所说的那样：“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而今后唯有实行革命，始可挽危亡于万一耳^①。”许多过去受康、梁影响较深，希望清政府唯新变法，实行宪政的人士，也打破了幻想，翻然醒悟，从而转向反清革命。

二、中国教育会的成立与东南地区“学界风潮”的掀起

留学生爱国运动的兴起推动了国内学界风潮的发展 两者相互激荡。而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又是学界风潮兴起的契机。1902年4月，蔡元培、章炳麟、黄宗仰等人，在“要改造中华，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及灌输新教育不可”的思想支配下，在上海倡议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教育杂志”。同年冬，中国教育会正式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该会规定“以教育中国国民提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它下设“学校教育部”、“社会教育部”、预设“实业部”，其主要活动为设立学堂，编辑教材，创办书报社和演说会。通过上述方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它是国内学术界建立起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爱国团体。

“各处教育会及各学堂皆步尘而兴咸奉上海诸志士为全部之中心^②。”从此，很快地兴起了一个办学热潮，爱国活动也随之开展起来。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潮。南洋公学是由清廷官吏盛宣怀创办的一所旨在训练、培养洋务人材的学校，但该校当局思想顽固，极力钳制学生思想，竟应思想守旧、一贯压制学生的郭振瀛之请，以学生在他的座椅上放置墨水

^①《黄克强先生哀思录》，第25—26页，

^②《上海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之冲突》，《浙江潮》第6期，1903年7月。

瓶为由，开除五班的一名学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全班学生立即集会，要求学校收回成命。但遭无理拒绝，14日乃决定全班退学。15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向总办请求收回成命，仍遭拒绝。学生决定全体退学，并向中国教育会求助，公开要求建立“共和学校”。中国教育会支持这次学潮，于11月19日与退学学生集会于张园，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并给予“经济及教员之赞助，11月下旬，该社正式成立，推选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它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主要任务，学生经常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激励了整个学界，鼓舞了学生的反抗情绪。纷起响应，各地学生退学、罢课、集会等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在东南地区掀起了“学界风潮”。

1902年，浙江吴兴南浔镇浔溪公学学生因公开登报支持南洋公学学生的斗争遭到该校总教的干涉，有29名学生愤而退学。1903年4月3日，江宁江南陆师范学堂也因反对校方专制而有30多名学生退学，并加入了爱国社。4月13日，杭州浙江大学堂，因反对校方无理开除学生，乃有8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5月9日，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学院，因反对校方的欺侮压制，有53名学生集体退学，这是中国学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义举，被赞誉为“中国教会学堂惊天动地的第一次革命。”^①

这次“学界风潮”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表现了民主主义的觉醒，它对当时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起了动员作用。

三、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学生爱国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揭露清廷卖国政策，反抗帝国主义，打击保皇毒焰，进行反清革命，创立“中华共和国”的宣传，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团体的建立，因而在1903年前

^① 《杭州美国浸礼教会蕙兰书院学生退学始末纪》，《浙江学潮》第4期。

后，国内一些团体纷纷涌现。

华兴会：

该会是继兴中会之后，由黄兴在两湖地区创立的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

黄兴 字克强 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人，1874年10月25日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里。他幼入私塾，15岁考入长沙岳麓学院。20岁参加县试，被录取为县学生。1898年以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当时，维新运动高涨，新学流行，给黄兴以很大影响，促其开始探索救国道路。1901年夏被派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但他爱好军事，课余常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学习各种军事技能，这就为其日后从事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1902年11月，他和湖南留日学生创刊《湖南游学译编》，组织“湖南编辑社”，宣传排满思想，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1903年，在拒俄运动中，他积极参加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自愿担任归国运动员，去两湖和南京一带活动，从而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

同年夏，黄兴由日本返回长沙，以明德、修业等学堂的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1月14日，他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请刘揆一、章士钊、彭渊洵、翁巩、周震麟、胡宗琬等10余人，于长沙保甲局巷集会，议决成立华兴会，并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 又便于开展会务工作 对外以筹组“华兴公司”，“兴办矿业”的名义出现。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会员证，凡属会中重要同志，均给以股东名义，以便参与革命机密。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寓“扑灭满清”之意于其中。1904年2月15日，在明德学堂校董的西园寓所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有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刘道一、秦毓鎏、胡瑛、张健等人，先后入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共有四、五百人之多，还有个别经营民族工业的资本家参加。

华兴会的一些领导骨干，大都是革命实干家，他们只注重于

夺取革命胜利的策略，而没有留下正式的政治纲领和章程。在革命策略上，黄兴认为革命有二途；即“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根据他对中国状况的分析，不赞成采用英法资产阶级首先从首都发难称之为“中央革命”的办法，而主张用从一省首先发动，全国各省响应的办法，最后推翻满清。他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①”即“地方革命”的策略。它受到了革命党人的重视。

华兴会成立后，于长沙南门外设立“华兴公司”，作为该会活动的总机关。此外，还在各地设立不少的派出机关和分支机构，如上海爱国协会、东文讲习所、华兴会湖北支部，同仇会、黄汉会、新华会等。

上海爱国协会于1904年在上海成立，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笃生、章士钊分任正、副会长。其主要活动据点为“东亚图书译印局”、“昌明公司”、“国民日报馆”。华兴会通过它与上海、南京、江浙等地的党人进行联系，传递海内外消息。

东文讲习所，1904年5月由黄兴、宋教仁、张继等人于长沙创办，它对外以教授日语、数学，以备资送日本工厂学习工艺为名，招收学生，实则是一所培训党人的机关。

华兴会湖北支部，为华兴会派出的宋教仁、胡瑛所建，1904年于武昌成立。其主要任务为联络同志，运动武汉三镇新军。

同仇会为黄兴在华兴会外另设的专为联络会党机关。它仿日本将佐尉军制，编练各项组织。黄兴自任大将，刘揆一任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掌理会党事务^②，马领导的2万多人的哥老会员，成了以后长沙以外五路起义的基本队伍。

黄汉会为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安化、李燮和等6人发起组成。其主要活动是联络散于新化、邵阳、武冈等地的小会党，势力由湖南发展到赣西及长江下游各省，其在湘成员多加入华兴会。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277页。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153—154页。

新华会，是为响应华兴会而成立的一个组织，1904年4月，由湖南留学生仇鳌，罗杰等在日本东京发起组成。参加者多为两湖学生。是年秋，部分会员回国，拟参加华兴会组织的长沙起义，后因长沙起义事泄流产，乃留湘活动。

除上述分支机构以外，华兴会还设了许多秘密机关。如长沙的明德、经正修业学校、醴陵渌江学堂等。华兴会以此将分布在省内外革命力量聚集起来，准备进行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

华兴会根据黄兴的提议，确定了由湖南首先发难，然后谋各省之响应，以实现“直捣幽、燕，驱逐鞑虏”的革命方略，并决定从联络会党着手。华兴会在联络马福益所部2万余名的哥老会众之后，迅速地制定了一个长沙起义，五路响应的计划，并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为此，华兴会进行了一系列的筹备工作，积极筹款购械；散发进步书刊，宣传反清革命，广泛联络省内外革命力量，分派会员去各省联络党人，策应起义。但由于华兴会缺乏经验，组织群众沿用会党的陈旧方式；尤其是起义者轻率大意，致使起义先期泄露消息，遭到清湖南当局的破获而流产。

华兴会筹谋的长沙起义虽告流产，但却震动很大，是一次有声有色的壮举。正如孙中山所说：“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①

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是胡瑛等人创办的湖北地区的反清革命小团体。湖北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活跃的地区。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期间内，在鄂开办工厂，开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编练新军，使湖北成为开风气的重要地区之一。继之，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又对湖北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立军起义失败，教育了人们，许多人迅速地放弃改良思想，而转向革命。1902年湖北留日学生在

^① 孙中山：《革命原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10页。

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月刊，宣传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政治思想，言词激烈，振奋了湖北学界。在拒俄运动中，武汉地区的爱国活动也很活跃。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湖北省派留学生参加者很多，武昌学界曾于曾公祠集会演说，奔走呼号，声援拒俄运动。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组织“昌明公司”，以招待湖北留日学生，经售文化书报及革命刊物，并传递信息。黄公征在武昌水陆街设一名为“武库”的会所，形式类似阅报室。每月约集同志开会数次，议论时政。

1904年春，湖北学界人士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朱元成等经常在武昌多宝寺街时象晋住宅议论革命进行的方略。一致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功而强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军队则将官多重心利禄，偶得一二同志掣肘多则事不易举。①”几经磋商，成以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②”为此，胡瑛和张难先遂入第八镇工程营当兵，而朱元成、范腾霄、曹进也投入马队营。他们在军中，结纳士兵，开展革命宣传，散发《猛回头》、《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作品，激励士兵爱国思想。

是年5月，胡瑛、张难先、朱元新、陈从新、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李胜美及学界的吕大森、欧阳瑞骅、曹亚伯、时功壁、康建唐等，发起组织革命机关，在武昌中级营同庆酒楼开筹备会议，共推吕大森起草章程，组织的团体定名为科学补习所，7月3日正式成立。由吕大森任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时功壁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堂任庶务。所址设在多宝寺街，后移至魏家巷。

科学补习所表面上是一所补习学校，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

李廉芳：《辛亥武昌首义记》上卷，第4页。

②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亡录》，第55页。

补习。章程规定以“研究科学”为宗旨，“集合全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健全。^①”实际上它是一个开展革命宣传，进行革命活动的机构。参加者以学堂和军营中人为最多。该所活动的重点在新军方面，介绍大批知识分子从军，输送会党分子入伍。会党分子在入伍前，必须先接受科学补习所的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②”革命党人通过这种方式，对会党成员直接进行教育和送往新军中训练。

科学补习所还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胡瑛被推为华兴会鄂分部总理，吕大森为施南及四川分部总理，组织响应起义事宜。但正在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华兴会起义计划泄露，科学补习所因受牵连而遭到清湖北当局派军警的搜查，被迫停止了活动。

科学补习所，虽然只存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但它团结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并把其注意力投向新军营队伍，许多成员亲身入营当兵，在新军内部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力图将清政府为维护反动统治而精心培训起来的新军变成反动统治的掘墓人。它为获得革命力量开辟一道新的途径，对以武装斗争进行推翻清朝的革命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日知会：

日知会是原科学补习所发起人之一刘静庵在武昌创建的革命团体。刘为湖北潜江人，曾担任过武昌新军马队营书记。1904年与吕大森等人发起成立科学补习所，密谋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后，他避居候补街高家巷美教堂圣公会内。事后照旧回营供职，因遭黎元洪怀疑而辞去。圣公会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派，设于

《科学补习所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

②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4页。

1901年，同时成立阅报室，成为日知会。它订购各种新书及刊物，供人阅览。刘既失职，遂经曹亚伯介绍，被聘为日知会司理。刘就职后，添置书报，制订章程，热情接待读者，深受欢迎。数月之后，聚集了一批革命志士。在此基础上，刘静庵遂集议决定建立秘密革命团体，制订章程，吸收成员。但对外仍用日知会名义，1906年2月正式成立。它利用阅报室的名义，公开备置进步报刊，传播新思想，还利用星期日开会演讲，阐述世界大势、中华民族危机以及革命救亡之道。凡宗旨相同者皆可入会。以乐捐办法筹措经费，少则1元多者5元。会议推举刘大雄为总干事。还推举了干事和评议员，在各学堂、兵营中均设代表，以便联络。

日知会会员有180多人，大半是湖北人，且多出身贫苦家庭，大部为失业的知识分子。

日知会成立后，会务发展很快。梁耀汉在学校及军营中广泛联络同志，并捐出私款设立明新公学及群治社，为日知会训练骨干。熊子员、刘通、何自新、何子值等人分别设立黄冈军界讲习社及学社，以联络同志。余诚、李长龄、李斌等设立江汉中学和东游预备科，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材。张聘安、梅鼎川入伍当兵，合设集贤学社。时功壁在武昌城内散发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张难先在仙桃镇创办集成学校，对乡镇青年传播革命思想。其中尤以黄冈军界讲习社的活动最为突出。它每于星期日必组织大规模的集会演讲，宣传民族主义、民权思想，并集士兵10人为一组进行活动。1906年，清廷旨令南北军会操于河南，熊子贞拟乘机举事，在军学界联络发动。是年5月事泄，该社遂遭封闭。日知会也因1906年“萍浏起义”后受到株连而遭破坏，刘静庵、胡瑛等被捕。

光复会：

光复会是由蔡元培在上海发起组建的东南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东南沿海的江浙一带，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和最深的地区，而上海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这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因而，革命运动兴起最早，并且未有中断过。20世纪初，浙江学生的活动就很活跃。1900年江苏留日学生杨廷栋等曾在东京出版《译书汇编》介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拒俄运动中，江苏留日学生积极参加斗争，秦毓鎰等发起筹备军国民教育会，出版《江苏》月刊，鼓吹反清革命。在1901—1903年期间，掀起了东南“学界风潮”。1903年6、7月间，清廷查封宣传“革命排满”思想的《苏报》，使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革命运动受到了打击，但革命活动仍在继续进行。9月蔡元培在沪发起拒俄同志会，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将其改为争存会，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

1904年暑期，留日学生以杨笃生为首成立一个组织极为严密的暗杀团，最初成员只有6人。暗杀团以刺杀清廷首要为主要任务，并选中西太后为第一个暗杀对象。他们先到上海，后潜入北京，制订暗杀计划，因无从下手，只好返沪。暗杀团成员何成樵首先发展蔡元培加入组织，暗杀团返抵上海后，又发展了章士钊、刘光汉、陈由己、钟宾鬯等人。鉴于暗杀团的狭小圈子无法领导大规模的斗争，1904年10月蔡元培在暗杀团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成立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会址设于上海，推蔡为会长。时在狱中的章太炎也参与组织，陶成章成为该会的中心人物，起着主要作用。会员先后有560余人，其中知识分子和会党占多数，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和会党的联盟。

光复会的政治纲领见诸于徐锡麟起草的《光复军告示》和章太炎的《讨满檄文》中。前者宣布“誓扫妖气，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后者提出“自盟以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该会的入会誓词，提出了“光复汉族，还我河山，功成身退”的宗旨；“改制同族、谓

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①

总之，光复会首先是把“排满”、“反清”作为它的斗争直接目标，即“惟排满为其先务”。他们的“反清”、“排满”，就是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反对民族压迫，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正如陶成章所说的那样：“就是同族的人暴虐百姓，也要起来革命^②。”光复会的纲领还反映了他们对土地制度的设想与追求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自耕农的利益和愿望。不愧为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团体。

光复会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第一，创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制造舆论。章太炎与陶成章发行《教育今语》杂志，以“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教育”，传播新思想为宗旨。陶还在南洋积极支持华侨办报并亲自担任记者，写文章，作报导。光复会另一重要会员秋瑾在东京与同志合办《白话报》，又独自创办《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权，妇女解放。他们将思想激进的革命报刊，如《新湖南》、《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大量运入内地，又代为出资购送各报，尤以《国民报》、《国民日日新闻》、《警钟日报》为最多。在光复会的宣传鼓动下“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以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③”。

第二，创办学校，兴办教育，培养革命骨干。他们把办教育看成是培养人才，扩大队伍，推动革命的重要手段。光复会的许多成员都一面任教，一面革命。前期，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1905年9月23日，徐锡麟、陶成章创办大通学堂，召集许多会党首领入学。在校内设体操专修科，进行军事训练，并规定凡是入校的学员都必须是光复会成员，毕业后仍归学校节制。实际它成了一所训练会党首领、光复

章炳麟：《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3页。

② 《龙华会章程》的檄文，《辛亥革命》，第538页。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25页

会骨干学校，先后培养出 600 多名干部。后来，许多成员成了江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的骨干。

第三，联络会党，积极策划反清武装起义。蔡元培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要暴动就要联络会党。当时，浙江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十分强烈，反清会党遍布全省，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光复会认为会党是革命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因而一开始就把工作重点放在联络、发动会党上。它通过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与浙江会党建立关系。它“编制各洪门部下为八军，”组成光复军，由徐锡麟、秋瑾分任统领与首领，分统则“以洪门首领任之。”从而使浙东各府会党，实现了以光复会为核心的反清大联合。绍兴的平洋党，金华的尤华会，处州的双龙会都成了光复会直接指挥的力量。

但光复会发动多次武装都失败了。徐锡麟、秋瑾等人英勇牺牲，陶成章等人被迫逃亡国外，因而遭到极大的损失。

此外，在国内各地还有另外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革命小团体。在上海有旅沪福建学生会、对俄同志会、上海青年学社；江苏有励志学会、知耻学会、强国会；东北地区有抗俄铁血会；安徽有岳王会；江西有自强会、易知社、我辟社；福建有益闻社、文明社、汉族独立会；云南有誓死会；贵州有自治会、科学会、四川有公强会、华阳阅报书社、公德社；广州有群智社等等。星罗棋布，散处各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反清革命，议论时政，岳王会还曾发动过武装起义。

上述革命团体的建立和活动，冲破了清廷党禁的桎梏，加强了各团体及其成员之间的联系，有的还存在武装反清斗争中相互配合。他们在革命活动中比较广泛地联系社会各阶层，不断扩大影响。他们的宣传活动，使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对反清革命起了不可忽视的动员、组织作用。

但它们的力量还比较单薄和分散，许多团体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会党的某些特点和属性，远未达到堪称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水

准。以推翻清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最高理想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少数革命团体，才具有政党的性质。因此，这些革命小团体也不能适应革命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需要。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就急需克服地方性、分散性活动的弱点，聚集起来，合小群为大群，实现更大的团结，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急需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各革命团体参差不齐的斗争水准，提高到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严密的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顺应了这一历史的发展潮流，而出现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舞台上。

第六节 民主革命思想和政党观念的 广泛传播

一、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革命宣传

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开始进行革命斗争时，在思想战线上一方面要受封建统治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另一方面，又遭受康、梁保皇思想的钳制，处境极为困难。革命思想的影响极其有限，人们“闻革命思想而生畏”，“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①。因而推翻封建君主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启发人民的觉悟，掀起启蒙宣传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斗争中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正如孙中山所说：“欲唤起国民及不为康、梁所惑，首须创立宣传机关^②”。为此，革命派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了宣传工作，积极同改良派争夺舆论阵地。

革命派主要通过发行书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0—173页

② 胡去非：《国父事略》，1945年商务版第47页。

行反清革命宣传。1901年，秦力山、沈翔云等人创办的《国民报》月刊以崭新的面目在日本东京出现，“大倡革命仇满”，排斥保皇邪说，对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1903年、1904年出版了著名的《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发行了《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大陆》、《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有名报刊，从而掀起了一个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革命宣传高潮。截止1905年夏季中国同盟成立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或主持的主要的革命报纸有10余种：如《中国日报》、《苏报》、《国民日报》、《俄事警闻》《檀香山新报》、《警钟日报》等；主要期刊20余种：如《中国旬报》、《开智录》、《国民报》、《游学译编》、《大陆》、《女报》、《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等；主要革命书籍近20种：如《革命军》、《驳康有为书》、《辨康有为政见书》、《黄帝魂》、《猛回头》、《警世钟》、《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等。此外，还编辑了一些揭露清廷暴虐统治，宣传革命反满的史著：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太平天国战史》（刘成禺著）、《郑成功传》（匪石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陶成章）等。

书报传播的地区比较广泛，甚至深入乡村。如《苏报》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昌、汉口等23个地区设立33个分销处；《大陆杂志》在1903年设立在外地的代办处就有66个。革命书刊的发行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如邹容《革命军》一书发行之后，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各地纷纷翻印。此书在辛亥革命时期印了20多版，总数超过100万册。

在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而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章炳麟在1903年6月撰写发行的《驳康有为书》，全面地驳斥了康、梁的保皇谬论，宣传推翻反清，实行合众共和，才能免

为欧美奴隶的道理，击中要害，它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邹容在1903年5月撰写出版的《革命军》一书中，以火热的激情，犀利的笔调，驱歌革命，无情地鞭笞了清廷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要求“扫除数千年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主张。因而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没。

陈天华在1903年下半年撰写出版的《猛回头》、《警世钟》两部书中，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已成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清政府，“杀那洋鬼子”，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震撼全国，重刊10余次，清政府虽一再严令禁止，但仍阻止不住流传，成了革命志士必读的书籍。

在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较集中地宣传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主张。

第一，尖锐地揭示了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而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形势，指出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陈天华在《警世钟》书里，叙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造成中国人民极大痛苦的过程。他写道：“痛只痛，甲午年，打下败阵；痛只痛，庚子岁，惨遭杀伤；痛只痛，割去地，万古不返；痛只痛，所赔款，永世难偿；痛只痛，东三省，又将割献；痛只痛，法国兵，又到南方；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哂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时遭凌贱；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汤”。在《猛回头》一书中，又痛陈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祸，“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他说“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

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明存实亡。”

资产阶级革命派向人们发出警告，由于中国主权大量的丧失，已接近灭亡的边缘，中国已为“白人所有”，中国人民已沦为“两重奴隶”、“三层奴隶”、“数层奴隶”。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号召人民起来，坚决反抗列强的侵略，“只有苦苦死战，才能救中国”。

拯救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找出救亡的途径，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无情地揭露了“量中华之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清政府的反动丑恶的本质，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排满的主张。革命宣传家们认为，要抵抗列强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政府，因为它已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把中国的“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清政府的作用只是“替洋人做一个守土的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投降。”因而要抵抗列强，“除革去卖国之旧政府，建设救国之新政府，其道未由。”^①

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严厉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控诉了清政府实行种族压迫的罪行。他们从历史上历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害，指出：“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国”^②。他们认定，清政府是“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凡可以遏民气、抑民权、破坏国民之团体者无不为”^③。因此，必须推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统治才能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6期，1903年11月。

②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6月。

③ 书楼（朱孔文）：《教育会为民团之基础》，《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总之，革命宣传家们比较一致的结论是“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他们提出：“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①。集中到一点就是“革命排满”口号的提出。它虽然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会出现很多的消极的东西，但它在当时对人民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动员作用。

第三，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及其方案。“建立共和”口号的提出，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斗争发展的必然归宿。在批判君主专制过程中，建立一个与君主专制对立的“新国家”、“新政府”，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迫切的要求。而邹容则适应这一形势，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口号，激情地高呼“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万岁！”他还参照《美国独立檄文》提出了“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主要之点是：推翻清政府，绝不许“复有专制之君主”，“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各人的权利必须保护，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力之事”！“‘中华共和国’为独立自由之国”，“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后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这一纲领具有明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鼓舞人们进行反清革命的斗争。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深入传播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宣传君主立宪、民主革命的思想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观念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对政党产

邹容：《革命军》。

生的原因、朋党与政党的区别、政党与议会及立宪政治关系，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政党竞争和两党政治、政党组成要素、党的领袖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剖析。

（一）剖析了政党产生的原因。认为它是人们反抗专制主义，实行民主立宪政治的产物。在《国民报》刊载的《中国灭亡论》一文中说：世界文明之邦，其民之所以能革独裁专制之乱敌，脱压抑羁绊之巨祸，享平等自由之幸福，操代议专政之实权者，岂有他哉，是必先有豪杰之士……以结成一党为彼野蛮政府之劲敌”，乃能使国家“骤至冒盛”，此其“一定不拔之原因也”。《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认为，1830年、1848年“法国复大革命，影响所及，列国民主党，一时并起，谋覆专制之政府，有沛然莫御之势”。因之，人们认定“专制者党派之母也。有专制然后有党派，有党派即以倾专制，相生而相克，功用良不诬也。”^① ②

梁启超介绍了美国政党产生的情况，指出“华盛顿任大总统，网罗一时之贤俊，以组织内阁，而阁员之中，两派生焉”。“初次召集议院，而国会中之此两党也划然分明”，“及华盛顿退职后，而两党之形遂成”，“是为美国政党之始”。^③

上述政党产生情况介绍，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二）阐述了政党和明党的区别。在深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观念过程中，人们力图阐明近代政党的属性，从而将其与封建时代的朋党区别开来。

梁启超说：“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④。《时务报》刊载的《政党论》一文中指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之权力，而遂行其志，故联合国

① 《国民日报》，《中国灭亡之论》，《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85页。

② 《苏报》，《虚无党》。

③ 梁启超：《美国政治略平》，《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797页。

④ 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饮冰室合集文集》。

人为一党也”；“朋党者，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时，以营利于其间”。“朋党以互相倾轧为能，以互相诟病为得计者，中国之历史实多见之”，“文明各国之政党，有竞争之益无倾轧之害，有指摘之功无制肘之弊”^①。

唐才常全面地阐述了政党与朋党的区别。指出：“中国自汉迄明，讳私讳党；讳而私，私而轧，轧而两败，亦孤其国”。西方政党是“明目张胆主张国事者”，朋党则“鼠伏狐媚以售其奸”。他认为“有党，有党国；小入党党，君子党国。”^②

严复也指出：“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事，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之。其党亦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以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及有所籍乎，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③。

总之，当时普遍认为朋党不能和近代政党相提并论，朋党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而近代政党是在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看法也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三）论证了政党与议会、立宪政治的关系。认为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时务报》指出：“政党之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双翼。非有立宪之政，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翼耳”^④。人们还认为：“宪政之运用，所以能完全者，恃有议会，而议会之职务，所以能进行者，恃有政党。故宪政与议会的关系犹之议会与政党之关系也”^⑤。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状况。

赵振：《说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9页。

② 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湘学报》，第9册。

③ 严复：《论中国分党》，《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三、十四日，《政党论》，《时务报》第1册。

⑤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15、608页。

(四) 评介了西方议会中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唐才常在《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中说：“有议院必有党，有党必有公私，固然不足为怪”。“凡一国党派之成立也，必有激烈、温和二派”^①。在《时务报》第三册的《美国共和党宣政新论》一文中说：“美国总统定制四年一举。国有两党，一曰合众，一曰共和，各愿举其党人以任斯职”。英国是“上载万乘之君，下有二大党，或进则群聚政府，或退则伏在草野，一去一就，相与接受政权”^②。《浙江潮》指出：“夫一国政治之进化，恒视在朝党与在野党决战之胜负，以为民权消长之比例差”^③。两党“相竞争相轧，相增相长，以至无穷，其竞争逾速者，则其进逾速。欧美国政治迁移之大势，大率由此也”^④。

康有为以议会中两大政党为最佳。他说：“要而论之，党少者国安，党多者国危，党尤多则国可亡，若仅两党。则天与人合，国以富强，在朝在野，旗鼓相当。以大党在朝，则党势坚而行政强，以大党在野，则朝党不敢专制而为殃”^⑤。

这些评价，虽然没有涉及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阶级实质，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政党竞争、政党内阁的情况。

(五) 高度地评价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在中国组建政党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政权均控制在政党的手中，政党在国家起决定性的作用。《清议报》在《政党说》一文中指出：“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欧西各国政治，皆操之于政党”，“用以抵抗暴政，则暴政绝迹而不行；用以代表民情，则民情无微而弗达，故文明之国，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15、608页。

② 《时务报》第17册《政党论》。

③ 《论日本近时政党与政府之冲突》，《浙江潮》癸卯年第1期。

④ 梁启超：《新民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48页。

⑤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23页。

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①。《清议报》第79号刊载

《非立大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一文中说：“党也者，所以监督政治之得失而保其主权，使昏君悍辟无所得而行其私，其关系于国家者尚也”。罗普在《政党论》文中，认定“政党可以长国民之风，保和平之局，增国民政治上之智识，养国民政治上之能力，复可便宜民生，高尚人心，振国民之精神”。这些评述，对于政党的职能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他们还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政治腐败，受人欺凌，民族危亡，皆在于“无政党之故”。《新民丛报》说：“今者政府腐败于上，人民沉酣于下，其所以有一线生机者，唯有组织政党之一法”^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必须建立政党，“欲中国之强与亡乎，在今之党人”^③。

资产阶级宣传家们，还进一步地阐述了对于政党领袖人物应具备的素质及其作用。他们认为世人称之为政党领袖人物的“党魁”，特别重要，因为“党魁”是政党的开创者。《言言报》刊载的《论政党》一文中说：“有党魁斯有政党矣！有声望资格足以为党魁之人，斯人奉为党魁矣”。因而，党魁必须具有“忠义奋发不顾其身”、“魄力雄厚能包含一切”、“至死不变屡蹶不悔”、“宗旨一律无更换”、“诚实不欺无虚伪”的品质。^④杨度还认为，“政党之领袖人物，应本屈己伸人之公心”，反对“欲坐收权利固地位”、“扫除一切权利地位问题而求患难之友”。

（六）强调了政党政治纲领的重要性。宋教仁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说：“夫政党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

① 《政党论》，《清议报》第76号。

②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20页。

③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23页。

④ 《言言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活动于政治界也”^①。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上述情况表明，资产阶级政党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展现资产阶级政党观念的各个方面。虽然没有触及到政党的阶级实质，但它却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宋渔父：《近日各政党之政纲批评》，《宋渔父》第1集前编，民国二年《民立馆报》发行。

第四章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

第一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一、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及组党活动

孙中山从建立兴中会以来，虽经艰难战斗，但没有摆脱孤军奋战的困境。各地成立的革命组织，也都是些地域性的革命小团体，不足以承担成就革命大业的历史任务。孙中山从多次分散起义的失败中深切体会到：“但从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便决心“召集同志，结成大同”。^②所谓“大同”就是指全国性的革命政党。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不是集中精力从事兴中会的恢复工作，而是建立能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新政党。他用4年时间，“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③而是广泛开展革命宣传，为建立新的革命政党大造舆论。1903年以后，孙中山建立新型政党思想更为自觉。这年8月他在东京青山创设革命军事学校，规定学生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誓词后来成了同盟会的纲领。要求学生服从领袖，而没有要求学生加入兴中会。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华革命军组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第9页。

② 孙中山：《致陈楚楠告准备早日发动函》。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32页。

织，也采用这十六字誓词。同年5月他到美国旧金山，在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建议改组致公堂，洪门会进行总注册，为其修改章程，强烈谴责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揭露保皇派，并将青山军事学校十六字誓词作为致公堂宗旨而写进章程。1905年初，孙中山到欧洲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在布鲁塞尔参加者30余人，在柏林参加者20余人，在巴黎参加者10余人。7月，孙中山重返日本途中，经过新加坡的时候，他向当地爱国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强调建立政党和开展大规模革命运动是当务之急。7月19日，孙中山由欧洲来到日本，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筹措建立资产阶级政党，向各团体反复宣传分散起义失策，结成政党联合起义才有力量。他首先结识了黄兴，共同商谈了结成革命团体的问题，得到黄兴的赞同。7月28日他又会见了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再次谈到了结成革命大团体的重要性。他说：“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异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并且认为坚持十几年斗争的两广会党蕴藏着巨大的反抗潜力，只要加强联络。“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②

孙中山自觉地、不失时机地抓住整个革命链条中建立新型统一政党这个中心环节，指明革命斗争的目标和道路，因而赢得了聚集在东京的革命党人的信赖，为全国性的新型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建立，无论从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政治纲领和领导骨干等方面，都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同盟会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的住所，邀集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华侨代表70多人，召开筹

^{①②} 《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28日、29日）《宋教仁集》下册第546页。

备会议。参加会议者包括当时全国 18 个省区中的 17 个（因甘肃没有留日学生）均有代表参加，日人宫崎寅藏、末永节、内田良平列席。大家公推孙中山为会议主席。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说，谈了革命发展形势及革命任务和方法；强调为了更有力地进行反清斗争，须将全国各地革命组织团结成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作为发动革命的核心。然后孙中山主持讨论了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讨论名称时，有人提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认为，革命目的不只是“排满”，还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共和国，因而主张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提出带有革命字样党员行动不便。后又深入讨论，会议确定革命组织命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会议讨论革命组织宗旨时，孙中山坚持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誓词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当与会者有的主张取消“平均地权”，孙中山称“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应当专向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会议最终以多数通过了这一宗旨。誓词原文是：联盟人，××省××府××县人×××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日。随后，黄兴请入会者书写誓约、签名。签名后黄兴领众执行举手宣誓仪式。宣誓毕，他分别授会员以同志相见握手暗号，并道喜：“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②随后各会员一一行新握手礼。会议公推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汪兆铭等 8 人起草章程。

8 月 20 日，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尔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 300 余人，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然后选举总理。按章程规定同盟会总理由全体会员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2 集，第 138 页。

② 《国父孙中山先生传》1965 年 11 月，台北版，第 123 页。

投票选举，4年更选一次，可以连选连任，总理对外代表本会，对内执行事务之权，并有指派执行部各员及支部长之权。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与会者一致举手赞成此提议。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实行三权分立。执行部由总理直接管理，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以庶务最为重要，推举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如总理他适，则由庶务代理总理职务。评议部又称议事部，推举汪兆铭为评议长，选举田桐、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秋瑾、覃振、黄复兴等20人为评议员。评议部按章程规定，“有议本会规则之权”。司法部由判事长及检事长主持，判事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长宋教仁。司法部的职责是执行会内组织纪律。三部主要采取联席会议形式议事，很少分别开会。会议决定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同盟会章程规定：国内设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等5个支部；分辖各省区分部；海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等4个支部。并决定以1905年6月由宋教仁、程家桢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宣传同盟会革命主张。

中国同盟会有明确的组织章程和政治纲领；有公举的领袖；会员入会要履行一定手续，遵守组织纪律；中央本部到地方分会，是统一的组织系统。这些说明中国同盟会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革命小团体，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它的成员遍布全球，使国内外的联系加强；而且新型知识分子占90%以上，是同盟会的骨干；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等的加入，力量不断扩大，必然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伴随组织建立后逐步趋于完备的。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将其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

改组为《民报》（月刊），由胡汉民任主编，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把同盟会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号召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民生主义，“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鲜明地揭出三民主义的旗帜。1906年冬，孙中山与黄兴、章炳麟共同制定的《同盟会宣言》（亦称《军政府宣言》），以及12月他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演讲中，对三民主义基本内容作了进一步阐述。

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反满和建立汉族人当权的资产阶级统一的民族国家，实行民族革命。《军政府宣言》指出：“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声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也就是推翻满族当权者的统治，建立汉人掌权的政权，着眼于解决政权问题。相当程度上抛弃了单纯“种族革命”的观点。他把少数主政的满族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加以区别。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更加明确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更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又说，“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所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排满，不是种族复仇。当然，孙中山此时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根本局限性。

民权主义的中心目标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完成“政治革命”。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它是恶劣政治的根本。因此，仅有民族革命还不够，在进行推翻清朝统治同时，还必须实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他明确指出：“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

不能不革命”。政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军政府宣言》中说得更明确：“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因此，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国”，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是同盟会政治纲领的灵魂。同改良派的君主立宪主张相比，具有鲜明的进步性。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军政府宣言》解释说：“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这便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而且强调“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②孙中山认为实行此种办法，才能杜绝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端。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平均地权”主张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它反映孙中山对劳动人民苦难境遇的真挚同情，它力图打碎封建主义枷锁，解放农业生产力，具有进步意义。

同盟会的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并力图用革命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因而它不但受到资产阶级拥护，也受到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在内的一切民主派的拥护。它成为革命党人战斗旗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列宁称赞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动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第75页。

② 《民报》发刊词。

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的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①这就是对同盟会纲领的最精彩的评价。

三、同盟会国内外分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同盟会成立以后，海内外革命分子纷纷参加，会员人数迅速增加，不到一年时间，在籍会员达一万多人。会员主要来自工、商、海外华侨及会党分子，其中以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最多，按照同盟会章程规定，同盟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下按省设分会，并推定了各分会的主盟人。东部设于上海，下辖江苏、浙江、安徽等省；西部设于重庆，下辖贵州、四川、甘肃、新疆、西藏等省区；南部设于香港，下辖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北部设于烟台，下辖山东、山西、直隶、东三省、蒙古、陕西等省区；中部设于汉口，下辖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省。国外有四个支部：南洋支部设在新加坡；欧洲支部设在布鲁塞尔；美洲支部设在旧金山；檀香山支部设在火奴鲁鲁。支部下按国别设立分会。这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组织方案，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此办理。对于其他革命团体，章程规定凡宗旨相同而又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

孙中山为了发动两广地区革命，首先于1905年9月派冯自由、李自重到香港，组织港、澳及广州各地分会，并令冯自由主持香港《中国日报》编辑事务。冯到港后就与陈少白筹备分会组织。推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一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先后参加同盟会的有李纪堂、容星桥、温少雄、廖平庵、陈树人、李孟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哲等多人。这是同盟会最早建立的地方组织。接着，黄兴秘密潜入郭人漳营中，建立了广西分会，亲自吸收赵声、郭人漳等 8 人入会。到 1906 年，同盟会在国内地方组织大批建立起来，除广东、广西两省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都建立了同盟会分会。

1905 年底，留日学生纷纷回国，上海则是必经的集散地。回国的留日学生组织了“中国公学”，成为上海革命活动的中心。1906 年一部分江苏籍留日学生，不满意中国公学领导人，便于 1906 年春创办了健行公学。这时，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旭（江苏松江人）从日本归国，任健行公学国文教员，该校乃成为同盟会秘密机关。1907 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健行公学解散，江苏分会也陷于停顿。

1905 年 10 月，曾任爱国学社军事教员的何海樵由日本到上海，秘密介绍蔡元培加入同盟会。不久，吴春阳由日本回上海，建议在江苏分会外设上海分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同盟会本部表示同意，上海分会便宣告成立。由蔡元培主盟曾发展陈家鼎、林真干等 11 人加入同盟会。1906 年蔡元培到北京等候留学日本。1907 年上海分会实际已没有什么活动。

浙江分会是 1905 年秋瑾由日本回国后建立的，秋瑾任第一任分会会长。因为秋瑾既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光复会会员，她在发展革命组织时，有时要人加入同盟会，又有时要人加入光复会。除发展会员外还广泛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湖北分会活动是借助日知会进行的。曾任湖北新军黎元洪的书记官刘静庵，因思想激进被迫离开新军，进入圣公会基督教会，管理圣公会。日知会的阅览室，后来逐渐成为传播革命的地方。1906 年 2 月，日知会重新组织，制订章程，正式开成立大会。5 月，同盟会留日学生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回国，首先发展刘静庵、冯特民参加同盟会，并依靠日知会开展活动。创办学校、讲习社，宣传革命主张。7 月间，同盟会本部通知日知

会，法国军官来中国长江流域考察，拟帮助中国革命。刘静庵等在圣公会教堂举行了欢迎法国军官欧吉罗大会。刘在会上作了充满反满情绪的讲话。事后，湖北总督张之洞得到报告，但因涉及欢迎外国人，不敢轻易动手，便密谋破坏日知会。萍浏醴起义失败时，清政府借机逮捕刘静庵，日知会便无形解散，湖北革命形势一时又呈现低潮。

湖南分会建立是借助华兴会实现的。华兴会策动革命失败后，其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流亡日本。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于1906年致函委托湖南革命派人物禹之谟在长沙成立同盟会长沙分会。4月19日，禹之谟由其同乡、归国留日学生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禹按黄兴嘱托建立同盟会湖南分会，湖南革命运动重新开始走向高涨。6月，同盟会湖南分会在禹之谟、陈家鼎领导下，就陈天华、姚宏业灵柩回湘归葬事件，发动长沙学生及各界一万多人游行示威，给反动当局很大震动。

同盟会四川地方组织是1906年建立的。1906年留日学生中同盟会员陆续回川，开展革命活动。当时四川分会会长黄树中因故未能回来，便委托四川的会员陈道循、涂德芬、陈德元和林启一等人，归国后先行征集会员，本人随后前往主盟。1906年，邓家彦先期回四川，为四川分会主盟人。不久，邓家彦活动被四川总督发觉，便离职去外地活动。1906年7月，同盟会本部派熊克武和龚铁铮去湖南调查新军与警察冲突事件，任务完成后回到上海。随后，本部派董庆伯来上海传达命令，委派熊克武、谢奉琦、黄树中三人为四川分会主盟人。

熊、谢、黄三人接到命令后，先后到达成都主持四川分会工作。他们在草堂寺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起义问题和盟务工作。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计议学界、军队、会党三方面分别进行联络，学界由黄树中、张培爵、谢持负责联络；军队由龙光、秦炳负责联络；会党由余英进行联络。为同盟会在四川发动武装起义作了有益的准备工作。

同盟会云南分会是由早期同盟会员、云南留日学生吕志伊在东京成立的，并任分会主盟人。吕志伊回云南后，积极宣传同盟会宗旨和革命道理，先后发展会员 100 多人。

1906 年，孙中山由日本到越南，与黄隆生、甄吉亭等组建了河内分会。当时云南学生厦绍曾、徐濂等 10 余人先后参加同盟会。同年，徐濂秘密携盟书回滇，发展沈钟、张大义、杨大铸、唐元义、王九龄、黄嘉梁、董承志、李员伯、赵泽扬、马骥等 10 人为同盟会员，并组织了文明演讲会，徐濂为会长，杨大铸、王九龄为讲演员。每晚于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道理。徐濂等又编印《云南旬刊》，广泛开展革命宣传。

福建分会是在汉族独立会基础上建立的。汉族独立会是由福建一些学校激进分子组织的，主张反满革命。同盟会本部成立后，汉族独立会代会长郑祖荫首先加入同盟会，并被委任福建分会会长，随将汉族独立会取消，全体会员加入同盟会。

江西分会是 1906 年成立的，黄格鸥、魏会英受本部指派回江西组建同盟会分部，黄被任命为分会会长。黄、魏到南昌后，积极办理会员登记手续和入会申请。江西原有张惟圣等发起组织的革命团体易知社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同盟会。

安徽分会是 1906 年吸收了大量岳王会成员组成的。安徽原有革命组织是岳王会，总会在芜湖，安庆、南京有分会。同盟会本部成立后，任命吴春阳为安徽主盟人。1906 年吴首先回到南京发展同盟会员数十人，其中大多数是岳王会成员。随后吴又到安徽省会安庆，进入安徽新军第 31 混成协作为活动基地，同时与岳王会安广分部长常恒芳取得联系，不久，岳王会主要负责人大部分都参加了同盟会。吴春阳在安庆活动被当局发现后，又回到家乡合肥活动，也建立了同盟会组织并组织合肥学会，公开在教育界开展活动，宣传同盟会主张。

孙中山为了发动革命，筹集经费，于 1905 年 10 月偕胡毅生、黎仲实、邓慕韩等人赴越南，深入西贡附近华人聚居区堤岸，首

先联系当地华侨商人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黄景南等，宣传反满革命，以图共和道理，深受欢迎，随即成立西贡堤岸同盟会分会，公举刘易初为会长，李卓峰为副会长，并确定以刘易初经营的昌记行为活动通讯机关。该分会为以后国内粤、桂、滇三省革命军事行动筹集了大量经费。有的捐资数万元无吝嗇，有的倾一生积蓄资助革命。黄景南在堤岸以贩卖豆芽为业，以所有积蓄捐助，后以每日收入所得资助革命。孙中山自传中称：“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倾其一生之积蓄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其他则有安南西贡巨商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资数万，亦当时之未易多见者”。^①

孙中山从西贡到河内后，将河内兴中会组织改为同盟会，加盟者有杨寿彭、黄隆生、吴梓生、张奂池等数百人。继河内分会后又成立了海防分会，以刘岐山为会长，甄璧、林焕廷、陈耿夫等为干事。

越南分会成立后，孙中山等一行赴欧洲。1906年4月，孙中山等由欧洲返抵新加坡，由陈楚楠、张永福秘密安排于晚晴园居住。随即吸收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等三人首先加入同盟会，然后又吸收林义顺、许子麟、李晓生等9人加入同盟会。众人推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宣告成立。

1906年5月，孙中山偕胡汉民由日本再度来新加坡，推动了新加坡分会的发展。福建、广州籍华侨陈慎祥、丘得松、黄康衢、陈楚桃等数十人，此时参加了同盟会。然后，孙中山又偕陈楚楠、李竹痴、林义顺等到吉隆坡和槟榔屿活动。吉隆坡最先加入同盟会的有陈占梅、王清江、陆秋杰等10人，公举王清江为会长。槟榔屿最先加入同盟会的有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10人，公举吴世荣为会长。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三地同盟会成立以

转引《国父孙中山先生传》，1985年台北版，第134页。

后，南洋英、荷所属各埠分会也先后成立。南洋各地分会为国内各次起义出钱出力颇大。

第二节 中国同盟会与保皇会的大论战

一、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创办

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接受黄兴提议，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是1905年6月在日本创刊的。该刊的特点是宣扬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刊物发表的主要文章没有公开鼓吹革命的内容。作为该刊发刊词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提出的中心口号是“爱国主义”，即：“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为了保种保国最重要的是激发国民的“爱国心”，而“有爱国心与否，不可不以教育为前提”。创办该刊的目的，是启发国民“使其德其智其力皆有所进也。然后对于内足以组织完全之国家，对于外足以御列强之吞噬。于是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世界。此则我《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所以发刊之趣意也”。该刊宗旨是通过“教育”的手段，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宏扬传统的民族主义，与同盟会革命主张是不相适应的。

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决定以该刊改为它的机关刊物后，于8月27日，具体商议刊物移交问题，决定由黄兴代表同盟会总部接收。就在这天，日本政府指控《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刊登蔡序东的《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妨害安宁秩序，禁止颁布发卖”。并由神田警署没收全部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被迫停刊。伴随革命形势发展，创办一个新的为革命呐喊的刊物更为迫切。经党内多次会议讨论，决定改为《民报》，避去排外言论，以免日本猜忌。

《民报》就是适应革命发展需要而诞生的革命喉舌。

《民报》最初的编辑人兼发行人是张继，实际主要编辑人兼

撰稿人是胡汉民。其他撰稿人有汪兆铭、朱执信、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章太炎等人。编辑部设于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发行所的招牌挂宫崎寅藏之家。《民报》原每月出版一期，实际是不定期刊行。1905年11月26日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因陈天华自杀之故，一直延到1906年1月22日出版。1906年共出9期；1907年出8期；1908年出6期。

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阐明了《民报》宣传学说及理想的宗旨。他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把他的全部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更特别强调“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只要实现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中华古国臻于独立富强之善境。

《民报》的简章规定：“本杂志之主义如下：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一、建设共和政体，一、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一、土地国有，一、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一、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胡汉民在《民报》第三期上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实际仍是对孙中山三大主义的具体说明。

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了《民报》发行一周年纪念大会。孙中山讲演了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为“五权宪法”第一次见诸文字。对三民主义的阐述也较前更为确切：“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他特别指出：有些人以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权”。“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关于民权主义，他着重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

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关于民生主义，他认为：“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收拾起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他把这三方面革命总结起来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孙中山第一次正式提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立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除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还要实行“考选权”，即各级官吏需考试合格取得资格方能任用，防止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作为裁判官吏的专门机构。孙中山开创了有别于欧美国家“三权分立”政体的“五权分立”政体。《民报》成了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阵地。

《民报》出版以来，自觉担负起革命喉舌，宣传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和革命主张；交流了革命形势发展的信息；讨论了革命进程和实行革命的方法；不失时机同立宪派及形形色色的反对革命的奇谈怪论开展论战和批判，宏扬三民主义。具体形成如下特点：

第一，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论述中国不革命无以图存。

《民报》发表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先从甲午战争以后形势分析入手，指出中国已是“命悬诸旦夕”。每一个爱国者“必思有以救亡之道焉。其道维何 将舍革命无由”。作者客观地分析了，中国要改变现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进行革命，不能指望清朝统治者真诚推行改革，“其改革之权势不得不操之于在下者之手”，其结果“则上必极其残暴之手段以压抑之，而下必复出其相当之能力以反抗之者也。又时机相迫，非

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势殆有所不及也”。作者还认为，要革命必须付出代价，会有牺牲。他激励革命者，“诚以为奴而生，不若从容赴死而鬼犹雄也。且与其暂息忿于一朝，而久归分崩，则曷若及今鸣自由之钟，建独立之帜，传革命之檄，为吐气扬眉之举哉”！^①《民报》还探讨了推翻清朝统治的具体行动方案，比较多种方案之利弊。《发难篇》指出：“人民之革命也，非以一革命团体与一政府角也。政府唯一，而革命团体以千百数。其颠覆政府之目的同，而同时并举，星罗棋布，蜂起蔓延，此仆彼兴，西崩东应。曾不必臆，而土崩瓦解之状已成。是悉起天下之人，起而与政府为敌也”。^②

第二，宣传革命任务是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民报》简章开宗明义本杂志宗旨之一，“建设共和政体”。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也说：“日日之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后可以保种而竟存”。^③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虽然着眼于“反满”立论，集中阐述推翻满族人统治，但也指出革命还须实行“国民主义”，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他提出：“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颠覆二百六十年来之贵族政治！……吾愿我民族实行国民主义，以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明确表示自己侧重政治革命。在他的《绝命书》中倡导实行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不应由一人专制统治。他提出：“以一大民族形成国家，其间至平等耳，而欲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④所以，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是顺乎历史潮流的革命。

寄生：《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

扑满：《革命横议》，《民报》第3号。

③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

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

④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民报》第2号。

陈天华还阐述了他所追求的自由是国民总体的自由，而不是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共和者亦为多数人计，而不得限制少数人之自由”。“不问政府之内容，而一概排斥之，是不得谓为真爱自由者也”。^①这样，区别了民主政治、共和政体同无政府主义界限，较为正确地阐发了民主共和政体的函义，不失为指导革命的正确见地。

第三，重视社会革命，同情社会主义思想。

同盟会领导人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还了解不多，但朦胧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平”经济上的阶级，最终也将适用于中国，因此他们热情对待“社会主义”。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写到：“近世文明国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阶级，而经济的阶级，于是而发生社会主义。其学说虽繁，而皆以平经济的阶级为主”。为了防止经济上不平在中国发展，就要实行土地国有，“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权”。这样，“则地主强权将绝迹于支那大陆”。^②

《民报》创刊以来集中宣传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理论深入人心，成为动员革命者、组织革命者的主导思想；使三民主义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一面鲜艳旗帜。《民报》的发行扩大了中国同盟会的影响，完善了同盟会作为比较完全意义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形象，促进了它领导作用的发挥。《民报》在宣传三民主义中，带有汉族传统民族主义倾向及反对帝国主义旗帜不鲜明等弱点，以及某些不切实际的地方，是同盟会领导者历史局限性所致。但从总体看，《民报》确实开创了革命报刊中前所未有的崭新内容和宏伟气势，开辟了为革命呐喊的新局面。

二、《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

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民报》着重阐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

^①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民报》第2号。

^②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

领，深刻地论证民主共和较之君主立宪的优越性。然而，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仍然坚持改良主义道路，组织保皇会，竭力反对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廷发布“预备仿行立宪”，梁启超又将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利用《新民丛报》拚命鼓吹君主立宪，攻击革命派，叫嚣与革命党死战为第一义。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随后把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的小册子，全面阐述倡导开明专制的观点。这样，革命派与保皇派一场大论战势不可免。1906年4月28日，《民报》作为‘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民报与新民丛报辩论之纲要》十二条，申明近日《新民丛报》将本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亡得失》诸篇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期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并具体开列辩论十二个问题：

1. 《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2. 《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3. 《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4. 《民报》望国民以权立宪，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5. 《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6. 《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7. 《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

治革命只要求。

8.《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9.《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需有全副事业。

10.《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11.《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12.《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的发表，拉开了这场大论战的帷幕。于是以《民报》为一方的革命派与以《新民丛报》为一方的立宪派，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旗帜鲜明，规模巨大的思想论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卷入论战的海内外报刊 20 余家，持续一年之久，地点广及上海、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东京、横滨、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和南洋的曼谷、新加坡等。可以说是戊戌变法以来又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辩论的十二个问题，还是以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为内容展开的。同盟会要将“其理想灌输人心，而化为常识”，①立宪派测竭力反对同盟会革命纲领。

（一）关于要不要用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即民族主义种族革命问题。

梁启超攻击革命派说：“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他把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民报》第 1 号。

② 冷水：《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 76 号。

复仇——革命——共和——亡国连接成一个荒诞的公式。认为“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这又是一个荒谬的逻辑。立宪派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动摇国家之根本”。也就是保持清朝皇帝及其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作一些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的修补，以便资产阶级上层分享一点权力。

革命派以西方“社会契约论”为理论依据，把国家看作永恒的、超阶级的“国民总意”的体现，虽然是唯心主义的国家观。但比起“君权神授”，“朕即国家”来说，仍有进步意义。他们揭露立宪派是把“觉罗氏”当成国家的化身，对其政府只能改良，不能倾覆的谬论。指出立宪是大清律的翻版，是为了掩盖清廷卖国政策，以保觉罗氏苟延残喘的统治。因此，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必须进行种族革命，用暴力推翻清政府，不能改良。同时种族革命并非要杀尽满族人，而是推翻爱新觉罗万世一姓的政府。广大满族人民在革命成功后，将“与我汉族同生息于共和政体之下为致足乐矣”。^③因而，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排满复仇主义。

（二）关于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即民权主义，政治革命问题。

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所以“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也不能“行君主立宪制”，只能行“开明专制”，这是“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④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只能拾级而上，不能“躐等”。如以暴力躐等而为共和，必将杀人流血，引起下层人的暴动，造

饮水：《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77号。

②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13页。

③ 《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第19号。

④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77号。

成大乱，同时还可能遭受帝国主义的干涉，被列强瓜分而亡国。

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为武器，大声宣告：

“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通性也”。他们认为：共和立宪制度正是植根于国民固有的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

“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①只要积极启发国民这种固有天性，又有美、法等国家民权立宪制度可资模仿，国民一定能很快具有这种能力。

他们认为启发国民固有天性的办法是教育与革命。（他们所说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他们倡导教育无论在革命之前、革命之时、革命之后，都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强调革命实践对启发国民天性具有决定性作用。“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②

革命派还从历史上论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其聪明才智并不亚于其他民族，只是长期封建暴君、酷吏的压迫，使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不能很好的发挥出来，但有很大的潜力，短期内便可以恢复。肯定“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当负政治革命之责任者，惟我国民；有负此责任之能力者，亦惟我国民。所谓政治革命者，颠覆专制而为立宪之谓也。若能以国民之力，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则民主立宪政体必可终获”。^③

针对暴力革命“杀人流血”的滥调，革命派沿引世界历史证明其他国家的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而“杀人流血”是革命不可避免的，是官逼民反的结果。“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④甚而高呼：“流血者，自由之母

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

② 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

③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

也，立宪者，革命之产儿也”。^①“青天白日满地红”才能赢得民主共和政体的诞生。

至于“瓜分”问题，革命派认为中国革命合乎世界潮流，并不排外，不会引起列强干涉。同时认为“及今世界，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②只有革命，才能避免瓜分。

孙中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③这就是说，在进行种族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三）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即民生主义，社会革命问题。

梁启超在《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中，提出“三不”即中国不必行 不可行 不能行社会革命。理由是中国本来就没有“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在”，也没有“建设社会的国家”的人才。谁要实行社会革命，就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其结果是“必无成而荼毒一方”。^④他还叫嚷“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万人共诛之可也”。^⑤

革命派反驳说，中国尽管不象欧美国家那样贫富“悬隔”，但也存在贫富之分，不可不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使人民不受资本家的残害，就可以不象资本主义托辣斯“为一二私人所垄断”，^⑥而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 由国家分配产品 从而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社会革命还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即土地问

恨海（田桐）：《满政府之立宪问题》，《复报》第1号。

② 寄生（汪东）：《革命今势论》，《民报》第17号。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页。

④⑤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

⑥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

题。实行土地国有，废除土地买卖和土地私有制。用“定价收买”办法，使地主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成为大地主。人民向国家租种土地，向国家交纳地租，用此收入转营其他事业。这样既能使“劳动者有田可耕”，^①又可以使国家聚集的社会财富为国民所共享。

这些主张即革命派标榜的“社会革命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节制资本”和“土地国有”。其实质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范畴，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但它反映了孙中山为首的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力求避免重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新觉醒和新认识。

在这场论战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凌厉的攻势，驳得保皇派理屈词穷，人心丧失，迫使孤家寡人式的梁启超不得不于1907年向《民报》求和，但遭拒绝。《新民丛报》被讽刺为“纯然监督国民”的“御用新闻”；梁启超被讥为“文妖”。在这种气息奄奄，一蹶不振的窘况下，《新民丛报》于1907年8月寿终正寝。论战以立宪派的惨败和革命派的胜利暂告结束。

海外各地的论战，革命派也取得了辉煌战果，如加拿大的《大汉报》，批驳康梁保皇论调，宣传革命纲领，使保皇老巢亦趋于瓦解。

这场论战实质是要不要实行三民主义，要不要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在这场论战中，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理论上给保皇派以沉重打击，扫除了保皇派的反动影响，揭露了保皇派充当清王朝走狗与辩护士的咀脸。通过这场辩论捍卫并宣传了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从而夺取了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这场论战中，革命派也明显地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没有提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

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幻想帝国主义会同情和赞助中国革命，甚至企图以让步来换取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劳动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最主要力量，反而害怕和限制群众的革命行动，强调所谓的“秩序的革命”。这正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反映。

三、同盟会《革命方略》的制定

同盟会成立以后发展很快，各地分部和支部纷纷建立，革命党人遍布各地。同盟会成立时仅制定《中国同盟会总章》，并未发表宣言。同盟会主张只在总章第二条用 16 个字表述，与革命势力发展很不适应，也严重影响革命行动的统一。除此之外，同盟会成立已经一年了，革命不能只停留在宣传阶段，要为革命实施作政策和策略准备。因此，制定具体行动纲领和政策，成为关系革命党和革命事业发展的严重问题。

1906 年秋冬，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在东京共同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将官之等级》、《军饷》、《战士尝恤》、《军律》、《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田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 15 个文件。由同盟会总部颁发各地基层组织，作为各地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时的行动准则。

在这 15 个文件中，《军政府宣言》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文件开宗明义：“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腥膻，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阐明今日革命与前代革命根本区别。“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机关而已”。接着将同盟会纲领规定的“驱除鞑虏，

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分别作了解释。谴责满清专制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在解释“建立民国”时称：“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我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在解释“平均地权”时称：“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为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为实现同盟会的四项纲领，确定革命要分三步走，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第一期 of 军法之治。……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以天下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国之政事，依宪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在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资本，胥于是乎在焉”。

《对外宣言》中宣布：“1. 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2. 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3. 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4. 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5. 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6. 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7. 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其中前三条，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

于自身力量的软弱，幻想以不触动帝国主义在华既得利益的办法，以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这自然是它的妥协性的表现。 5·7 条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气概，即不允许帝国主义资助清政府，公开与革命党为敌和一定程度维护革命尊严的立场，它区别于一味媚外卖国的清朝政府。

《略地规则》和《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宣称：“同是汉人，地位虽殊，情谊固在”；“凡我国民之为满洲将校者，若能顾念大义，翻然来归，军政府必推诚相与，视为一体”。这些规定体现了革命党人政策和策略意识，有利于分化敌人营垒，有利于革命发动和发展。

《革命方略》的制定，说明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先进分子，已经由积极宣传，组织准备工作进到实行革命的直接准备阶段，将要转到大规模武装起义实际准备。预示席卷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即将来临。《革命方略》奠定了革命党人的各项政策基础。《革命方略》制定以后，在各省革命党人中秘密流传，影响很大。革命发动后许多政策都是《革命方略》中规定的。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正式照会各国领事，就是照录《对外宣言》，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5日发表对外宣言前4条也是照录《对外宣言》内容。就连起义后建立新政府称“军政府”，首脑人称“都督”等规定，各省起义革命党人也几乎都是照搬不差。

第三节 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武装斗争

一、武装大搏斗的先声——萍浏醴起义

萍浏醴大起义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爆发的。萍浏醴是指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它们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北段。这里山高林密、峰峦起伏，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沿罗霄山脉有许多小土煤矿，集聚许多破产农民。地处两省边界，是清

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地区，为会党活动创造了较好的客观环境。

19世纪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设汉阳铁厂后，这里社会经济条件发生急遽变化，萍乡县南15里路处的安源煤矿获较大发展，到1898年年产煤达1万多吨，这些矿工大多是附近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完全脱离农村，而是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作矿工。他们同萍浏醴一带农民有密切联系。他们背井离乡，生活贫苦，无依无靠，极易被会党所吸引，以便遇危难之机获得会员帮助。因此这里会党异常活跃，潜在势力很大。

当地会党势力最大的是1904年曾参加华兴会策划起义的哥老会，其首领马福益，醴陵人，所开山名为“昆仑山”，堂名“忠义堂”。势力遍及醴陵、浏阳、湘潭等县。各县会众达万人之多。1904年马福益参加华兴会策动的起义。事败后逃亡广西，第二年返回湖南，被清政府捕杀。会众及革命党人悲愤填膺，怀有强烈为马福益报仇心理。马死后，萍浏醴一带会党势力虽然未减弱，但更趋分散。其中浏阳会党势力较大的有三股：龚春台、姜守旦、冯乃古，各有会众数千人。龚、冯同属哥老会，但互不相属。姜部称“洪福齐天堂”，也称“洪福会”。三股势力相约互不侵犯，但也没有明显联合。萍乡安源煤矿会党首领为肖克昌，醴陵会党首领为李香阁，他们同龚春台之间有较为密切联系。

1906年春，湖南籍留日学生刘道一（同盟会会员）和蔡绍南回到湖南。刘道一留在长沙活动，蔡绍南到萍乡活动。蔡到萍乡后，遇到素与会党有联系的知音魏宗铨，经魏介绍，蔡同龚春台和当地武教师沈益古、廖叔保等相识。不久，魏以为祖先做冥寿之名，延请道士焚修三天，借以约集龚春台、肖克昌、沈益古、廖叔保、邓廷保等举行开山大典，成立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等内八堂，又设第一至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以魏宗铨在上栗市的全盛纸店为招待会友和筹划经费场所，另在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设立活

动机关。会后，各路码头分别开堂散票，发展会员。入会者需由码头官监行入会礼。誓词云：“誓尊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洪江会成立以后，发展很快，没有几个月就遍及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等数县。7月，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首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制造和购买军火器械；派人联络姜守旦、冯乃古，争取他们两部加入洪江会；派蔡绍南、魏宗铨赴上海、日本，与同盟会取得联系。9月初，蔡、魏到上海经宁调元、李发群介绍加入同盟会，正欲赴日本向同盟会本部汇报时，接到龚春台急信催回，未能成行，与同盟会本部联系未能实现。

蔡绍南、魏宗铨返回后，见形势发展急迫，便分赴浏阳普迹寺和萍乡安源，联络肖克昌、冯乃古等，商议这年农历年底各路同时举事。但清朝地方当局也严加防范和镇压与分化会党，时有会党首领和会众被捕被杀事件发生。于是，龚春台、蔡绍南等于12月2日晚召集各路首领在高家台紧急集会，商讨对策，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洪江会众已有10余万人，应乘清军尚无准备之机，急速发动各地会党同时举事，会攻长沙、南昌；另一种是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以军械不足，主张稍缓以待外援。廖叔保等对龚、蔡、魏等极为不满，认为洪江会众既有10多万人，加上各地友党足有20多万人，尽可决胜负，坚持立即举事，会议开到第2天，仍争执不下，各处会众也聚集很多人。廖叔保便聚集二、三千人在麻石举起书有“大汉”二字的义旗，又有书“官逼民反”、“灭满兴汉”的小旗百余面，向上栗市进发。龚春台等只得急告姜守旦、冯乃古等处会友同时发动，并将高家台所藏少量军械火药分发各部，并决定先取上栗市为根据地。起义就此爆发。

12月5日，龚春台等集合麻石会众，头缠白布，手持器械，共2万多人，向上栗市进发。6日晨，起义军攻占上栗市，各地响应的会众数千人纷纷向上栗市进发。洪福会首领姜守旦也派人

来通告，可以举兵响应，直扑浏阳，但不受洪江会节制。起义军暂推龚春台为大汉光复军南军先锋队都督，并以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7日夜起义军决定沈益古率数百人留驻上栗市，堵截萍乡清军来路，大队人马进兵浏阳，与姜守旦部会合后再图发展。第二天起义军很快进入浏阳境文家市、金刚头，直抵枫林铺。起义军队伍不断扩大，姜守旦也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集合齐山、大光洞、溪洞三处会党1万多人，进攻浏阳县城。

龚春台部大队开往浏阳后，留守上栗市的义军只有五、六百人，后方空虚。驻萍乡的清军连夜经山间险道直插上栗市。10日晨，出山峡到达距上栗市四、五里路的棚上，布阵射击。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武器极差，有的人只是徒手，闻枪声惊慌失措。沈益古等率武门弟子奋勇抵战，虽英勇顽强，终因人数太少难以力敌，上栗市遂告失陷。这时，另一支清军也由袁州出万载，直抵慈化。万载、慈化虽有义军会友甚众，但武器不精，又加上栗战事失利，不战而散。于是，起义军后方根据地全部丧失。

龚春台所率进攻浏阳义军虽人数2万多，但绝大多数处于无组织的自发状态，有些饥民会众担着罗筐行进，幻想到浏阳分富户粮食，而不是拚死战斗，又如指挥人员和会众都缺乏必要军事素养，战事一起临阵缺乏应变能力。浏阳清军击退姜守旦部的进攻后，同日集结兵力南下，攻击已进到南市街的洪江会义军。义军退至牛石岭。清军继续进攻牛石岭，义军在强敌进攻下，军心涣散，大批逃散，龚春台虽竭力整顿，但也无济于事，至当晚，起义军全部瓦解。龚春台、蔡绍南等逃往尚未发动起义的浏阳普迹市哥老会大头领冯乃古建请援，蔡在途中不幸被清军捕杀，龚到普迹市获知冯未及发动即被诱杀，龚只得潜往长沙。洪江会主力被清军击溃。洪江会姜守旦率余部400多人于20日在平山沙铺被优势清军击散。

醴陵洪江会于12月6日由李香阁率千余人进攻县城，在距县城10里处与清巡防第十队管带赵春廷部相遇，刚一交火，起义军便闻讯清军援军已到，军心涣散，未经激烈战斗，便四处溃散。因此，醴陵起义军活动地区不大，活动时间也不长，影响较小。

安源煤矿工人一直是清朝政府防范重点。11月27日，醴陵会党的左军统领殷子奇曾至函安源会党头领萧克昌，约其带领千余人由安源出发，会攻醴陵。萧未能马上答应。12月3日，洪江会众罗良初在醴陵被捕，供出起义计划。因而，使起义未待发动就在清朝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并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清廷命江西臬司秦炳直节制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军，向萍浏醴地区增派重兵。14日，江南新军第九镇第三十四标开抵江西九江。18日，鄂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步队三营、炮队一队抵萍乡，另派步炮一队专驻安源。25日，鄂军在安源捕杀了安源煤矿洪江会首领萧克昌。然后又在煤矿设立巡警局，派出大批军探清查矿内职工和附近居民，并实行矿工互保连坐，无保结者一律押解出境。这样，安源矿工酝酿的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

洪江会领导的萍浏醴起义主力被镇压下去以后，魏宗铨等潜返上栗市，同廖叔保、沈益古等秘密取得联系，准备再起，但在清军严密搜捕下魏宗铨、廖叔保、沈益古等几百人被捕杀。这样，前后历经半个月的萍浏醴大起义遂被镇压下去。

萍浏醴大起义，是在中国同盟会影响下发生的。在起义中发挥重大领导作用的蔡绍南、魏宗铨两人，起义前夕在上海参加中国同盟会，并力图取得同盟会支持与领导。起义主力是洪江会，其首领龚春台发布的起义檄文，体现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不仅标明“驱除鞑虏”，并标明“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党”，“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是单纯旧

式会党起义所没有的。这次起义规模之大是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起义所不具备的，龚春台所部起义军主力，最多时达2万多人。他们攻占萍乡上栗市后，萍浏醴各地会党纷纷响应，酝酿起义或自发参加起义军。

萍浏醴起义也留下了十分重要的教训。首先，这次起义不是同盟会本部经过认真准备、直接领导的。蔡绍南、魏宗铨推动龚春台等成立洪江会，准备起义时，龚春台尚不是同盟会员。龚春台所领导的洪江会在《起义檄文》中虽然体现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没有完全为起义队伍所接受。有些起义队伍成份复杂，思想混乱。曾参加起义的洪福会首领姜守旦队伍则打着“帝国”的旗号，自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所发《布告天下檄文》称“夫我辈之起，志在驱满贼耳”。甚至宣布：“有能起倡大义，至功同胞者，……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惓忱爱戴之念”。它充满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与宗法制度的思想主张，显示了参加起义的洪江会和洪福会两大会党之间，其主张明显不同，难于统一起义队伍的思想和动员更广泛的民众。洪江会檄文虽然有较明显的民主主义色彩，但也有利用旧式会党支配来维系内部的反映。龚春台的官衔自称“洪命督办民立自志社会总统全军”，年号称“汉德元年”。这支队伍声势虽一时很盛，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没有深入人心，民主主义革命意识还不成熟。

第二，这次起义在行动上也缺乏统一计划和指挥。起义前洪江会员总数已达10万余人。但起义领导机关对发动起义犹豫不决，一拖再拖，直到一部分队伍在麻石自动举起了义旗后才仓促行动。各地两会组织和会众行动不统一。萍乡东部宜春、万载两县虽有会众数万，但都未能积极投入起义，连安源矿工中会众，

也因清政府加强防范的威慑也不敢行动。这就给清政府统治者各个击破起义部队，造成可乘之机。

第三，起义准备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同盟会刚刚成立，革命宣传还属开始阶段。萍浏醴起义爆发时，同盟会本部领导人还一无所知，只从东京报纸获得此消息。他们一方面感到突然，一方面感到欣喜，对起义抱有热切期望。最后决定派一些同盟会员，赶回国内参加活动，以扩大事态。其中重点经营湖南、湖北和江苏等省。当谭人凤、宁调元、胡瑛等回国后，萍浏醴大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清政府从起义被捕人员口中获悉，起义是以中国同盟会成立为背景的，于是，清政府发布上谕，严令“著端方、张之洞、岑春煊等严饬各军扼要防堵，赶紧合力兜剿，迅速歼除。毋任蔓延窜扰，至为切要。并著会商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务将逆匪各党随时防范，严密查拿，以靖地方而消隐患”。^①在清军势力严密控制下的长江中下游，不仅新由国外回来的同盟会员无法开展活动，连同盟会长江中上游原有的活动基础也遭到严重摧残。

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武装斗争

萍、浏、醴起义给清朝政府以极大震动。他们认为这次起义策源地在日本东京，参加革命者多为留日学生，革命党领导人则为孙中山。于是，清政府命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政府交涉，一要求日本各大学开除参加革命活动的留日学生，二要求日本政府逮捕革命首领孙中山，并引渡给清政府。日本政府于1906年2月，早稻田大学等开除与革命党有关学生39人，引渡孙中山要求未予接受，采取劝其出境的变通办法。3月4日，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离开日本，经新加坡又转赴河内，于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革命机关部，策划革命活

^① 《萍浏醴起义清方档案》，《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2册，第513页。

动。同时确定革命活动重点为中国南部粤、桂、滇等省。拟定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同时发动起义，造成浩大革命声势，使清军无法集中力量与革命军作战。四州中的重点在钦廉地区，潮、惠两地为策应之师。此计划拟定的根据有4点：第一，钦廉地处粤桂边界，由此发难后可向南宁推进，取广西为根据地，再图北进，扩大革命成果。第二，钦廉毗连中越边界，便于取得与河内同盟会总部联系和接济。第三，驻钦州清军首领郭人漳和廉州清军首领赵声均为同盟会秘密成员，都曾表示，如有正式革命军起，必反戈相应。第四，钦廉地区正发生群众性抗捐斗争，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从钦廉发难是合适的。孙中山和黄兴商定起义具体部署是：集中同盟会员，并聘请法国退伍军官多人，首先占领防城东兴沿海一带，组织正式军队，与钦州各乡团练联合起义，再有郭人漳、赵声两支队伍响应，可以一举成功。但事与愿违。由于钦廉地区抗捐斗争声势浩大，震惊了两广总督周馥，便调郭人漳和赵声部前去镇压。郭、赵两部在接到孙中山通告前已经将与同盟会有联系的抗捐民众击散，造成拟议中钦廉起义力量自相残杀的惨局。孙中山原定起义计划全部打乱。

钦廉混乱之时，潮州起义却突然爆发了。潮州起义领导人许雪秋，自幼随父在新加坡从事商业活动，任侠好客，思想倾向革命，在会党中有一定影响。1906年春，孙中山至新加坡，许雪秋经张永福介绍谒见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许雪秋为中华国民革命军东军都督，授以组织潮州起义之责。许雪秋由新加坡返回汕头，继续联络会党，积极进行起义准备。经过一段活动之后，许亲赴香港与冯自由协商，并电孙中山请求派人协助举事。孙中山遂派乔义生、方汉城、方瑞麟、李思唐、郭公接、张煊、方次石及日人池亨吉、萱野长知等一同回国协助许雪秋。许与各路主事商定于1907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7）起义。但起义事被清吏探悉，起义不能如期进行。许雪秋再次赴香港电请孙中山。孙指示暂时不要轻率发动，需与钦廉惠州同时发动。许雪

秋、谢良牧、方瑞麟等暂留香港，等待总部部署。

黄冈起义。1907年5月21日晚 黄冈商民演戏 潮州镇总兵黄金福派驻黄冈的蔡河中部下防勇在戏台前调戏民女，引起公愤痛遭唾骂，狼狈逃回防营报告与蔡河中，蔡不仅不约束部下，还下令逮捕会党群众邱保、张善二人。当地会党领袖余既成等集会商议，以为如不先发制人，则为人所制，不能坐而待毙，遂决议不顾一切，先行发难。5月22日晚9时，黄冈会党聚众千余人，扑攻县城，与蔡军激战。香港同盟会机关的胡汉民、冯自由、许雪秋等获知革命党人准备起义消息后，立即举行会议，决定制止盲目起义，以免影响大局，但事变已发生，根本无法劝阻。这样，黄冈起义就自发地爆发了。23日，革命军攻占黄冈后，会众公推陈涌波为正司令（有材料称余既成为司令、陈为副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余家兴为总指挥。在旧都司署成立军政府，布告安民，收缴各衙署枪械千余支。革命军本应乘胜进攻潮州，但因起义事出仓卒，事发后领导人又心中无数，未能及时进兵，只是据守黄冈。25日清晨，忽报潮州总镇黄金福调兵驻讲州（距黄冈20里）。为保黄冈不受侵袭，陈涌波率部分革命军进攻讲州，因枪械不如清军，进攻不利。余既成闻讯增援，一度击退清兵。但待清兵援军赶到，众寡不敌，革命不得不退守黄冈。26日晨，革命军首领聚会商议，分析革命军械劣弹乏，粮食不足，久守无益。决议暂时解散，保存实力，以图再举。27日黄冈革命军自行解散。28日，清军占领黄冈。这次起义革命党人殉难于黄冈的17人，战死于讲州的77人，事后被捕遇难者60余人。

惠州七女湖之役。同盟会原订东路起义计划在潮惠两州同时发动，分散清军兵力。当孙中山派许雪秋赴潮汕活动时，先后派黄耀庭、余绍卿、邓子瑜三人从新加坡返香港，办理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处军事。此三人同惠州一带会党都有联系。孙中山寄希望最大的是黄耀庭。但黄耀庭到港后，住在同盟会机关，当有人告知港局警方已知其入境，请注意安全。黄闻讯后即自行逃回

新加坡，余绍卿回内地后不告而别。唯有邓子瑜坚信革命宗旨，虽旅居新加坡，但与内地会党仍有联系。1907年四、五月间，孙中山指令其返香港协助黄耀庭策划军事，黄不告而别后，军事全责便落在邓身上。黄冈起义发生后，邓子瑜准备在归善、博罗、龙门等三处分路起义。结果只有归善的七女湖起义了，其他两处都因会党未能集中起来，而没有起义。

七女湖距惠州城20余里，为归善县之著名墟场。陈纯、林旺、孙稳等，在七女湖号召会党100多人，于6月2日起事，一举夺下清军防营枪械。连日攻占太尾、杨村。7日，推进到柏塘。各乡会党纷纷聚来，人数迅速增加到300多人，声势大振。两广总督周馥急调驻惠各路营勇，东路巡防各营管带，督率所部围攻起义军。周唯恐力量不足，又令水师提督李准及进攻黄冈之清军从汕头往援惠州。这时邓子瑜正在香港购置枪械。获悉黄冈起义失败，遂派人告知林旺等相机解散。林旺等得报告，知黄冈失败，其他各地又无响应，便率起义军至梁化墟附近村庄，将枪械埋藏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解散。

钦廉防城起义。钦州之那黎、那彭、那思三墟人民抗捐斗争被镇压后，人民怨愤极大，便派梁建葵、梁少廷到河内谒见孙中山，表示三那人民愿为革命党人进攻钦廉的内应。孙中山察实二梁所言后，认为钦廉人民对清朝官吏的仇恨大可为用。便派黄兴赴钦州游说郭人漳，派胡毅生赴廉州游说赵声；令王和顺入钦州腹地联络民团大举发难。王和顺在三那停留数月，但苦于未找到发动机会。这时防城清军左哨官刘辉廷早与同盟会党人发生联系，经刘辉廷运动，右哨官李耀堂也有反正之意。此事报告孙中山后，孙认为防城除有队伍基础外，地近白龙口，有海上接济之利，便决定发动防城起义。

1907年9月1日，王和顺率革命军300多人，举义于钦州之王光山，大破清兵，乘胜进攻防城，刘辉廷、李耀堂二位哨官立即宣布反正。4日光复防城，防城知县宋渐元被活捉处死。革命军

布告安民，颇受欢迎。王和顺率义军攻下防城后，立即兴师进攻钦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取钦州为根据地。但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一日一夜才到达钦州城外，兵临钦州城，希望郭人漳军响应。但郭见革命军力量单薄，不敢行动。王和顺所率革命军 500 余人受防城守军数千人所阻，未敢攻城，便改变计划，决计攻取灵山，取道入桂。9 月 12 日革命军发起进攻灵山，清军已早有准备，攻城不下，又弹药缺乏，便退至廉州，寄希望赵声响应。赵部驻离廉州 80 里外的五利，见郭人漳按兵不动，也没有贸然举义。革命军既缺支援，又遭清军阻击，奔走近 10 日已经难以支持。王和顺带义军 20 余人进入安南，其余众革命军退回三那。因主帅王和顺离军，革命军处于群龙无首状态，9 月 17 日遂宣告解散，由梁建葵率精锐数百人，退入十万大山。

防城之役于 9 月 1 日发动，至 17 日而败，攻占防城首战告捷，进攻钦州，因郭人漳失信，存意观望，退至廉州，赵声未予响应。经营半年之久的钦州起义仍归于失败。

镇南关之役。防城灵山之役失败后，黄兴、王和顺先后回到越南。孙中山命王和顺再经营镇南关军事，准备再度起义。1907 年 11 月 20 日，王和顺偕何海荣赴那模村，与早和革命军有联系的凭祥土司李祐卿协商夺取镇南关炮台，并确定 28 日行动。但因李祐卿部游勇不服王和顺调遣，孙中山改派黄明堂、关仁甫经营镇南关军事。12 月 1 日黎明，黄明堂等率领那模村乡勇 80 人，快枪 42 支，从山背栈道突然向关上右辅山炮台攻击，守军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镇南、镇中、镇北三炮台皆落于革命军之手。孙中山于 12 月 2 日获悉革命军占领镇南关后，3 日晨即偕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等多人，乘越西铁路赴战地，并不顾旅途之劳累，连夜赶赴前沿阵地，给革命军以极大鼓舞。孙中山在镇北炮台调度一切，检阅战果后称：“余自乙未广州失败以来，历十有四

年，至是，始履故国之土地，与将士宣力行阵间”。孙中山拟议调十万大山梁建葵所率之众，会攻龙州，未能实现，于以百余人据守三炮台与清军数千人激战。4日晨，清援军已到，齐向革命军轰击，革命军奋勇抵抗。革命军武官狄氏亲自发炮，第一炮就命中清营，清兵死伤60余人，同时大小炮齐射清军营，浓烟四起。革命军因地势极为有利，仅有两名士兵负伤。孙中山亲自为伤员敷药包扎，起义士兵深受感动。

4日下午获悉清另一队援兵将在两日后赶到，孙中山立即召集黄明堂等讨论办法，一致认为三炮台大炮虽多，但快枪缺乏无法进取。决定由黄明堂率部坚守5日，孙中山与黄兴即刻回河内筹款购买枪械，待军械运到即进攻龙州。孙中山到河内筹款购枪械尚未就绪，黄明堂等即被清军重兵围攻。黄等虽率部英勇奋战，坚守数日，杀伤清军200多人，但终因众寡悬殊，枪械、军粮无以接济，不得已于8日夜率众弃炮台冲出敌人重围，退入到越南境之燕子大山，准备待机再起。此次战役历时9天，血战7昼夜，歼敌数百人，革命因得地利，仅阵亡1人，受伤4人。

法国接受清廷要求，强迫孙中山离境，1908年3月7日，孙中山由河内赴新加坡。临行前，孙中山命令黄兴继续发动钦廉会党，准备再次起义；命令黄明堂经营云南边境之河口镇，以图进取云南，命令胡汉民坐镇河内，负责接济事宜。这样，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越南督师钦州，爆发钦廉上思之役，坚持40多天。4月30日，黄明堂率所部百余人，由越南边界渡河一举攻占河口城，坚守河口20多天，队伍发展到数百人。5月26日，在弹械不足和强敌压境形势下，黄明堂率余部600多人放弃河口退到越南。史称河口之役。

三、安庆、广州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

河口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和发动的武装起义重点，由

《国父孙中山先生传》，1965年台北版第161页。

依靠会党为主开始转向清朝军队，特别是新军。其中影响较大的起义有安庆新军起义和广州新军起义。

安庆新军中最早宣传革命的是1904年成立于安徽芜湖的岳王会。1905年柏文蔚和常恒芳分别在南京和安庆建立岳王会的分会，并且进一步将活动重点放到新军中去。柏文蔚曾任新军第33标第2营前队队官。这年秋天，柏文蔚领导南京岳王会全体成员加入了同盟会，随后更多的岳王会成员先后加入同盟会。第二年春天，柏文蔚远走吉林，岳王会活动重心转到安庆。在安庆新军中充当中下级军官的革命分子有六十一标三营管带冷遹、六十六标二营管带薛哲，炮队队官熊成基等。在各营充当弁目的有范传甲、张劲夫等。他们在安庆三祖寺杨氏试馆内，设立了筹备起义的机关，冷遹为总指挥。后因走漏风声，冷遹被捕，总指挥便由熊成基代理。

1908年秋，清政府下令南洋各镇新军于11月间在安徽太湖进行秋操。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议决在秋操时发动起义，然后攻打安庆。随后清政府方突然通知，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训练尚未成熟，不必开赴太湖会操，并禁止发放枪械。这样，秋操起义计划就破产了。

1908年11月14、15日，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别死去，为革命党人起义提供了极好的时机。19日下午，革命党人熊成基、范传甲、张劲夫、薛哲、薛子祥、田激扬、洪承典等在杨氏试馆再次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于当晚由驻在玉虹门的马营举火为号，步营和炮营同时响应，首先占领火药库，然后合力攻城。薛哲率新军第二营在城内接应。熊成基根据会议的决定，颁布作战命令13条。晚9时许，新军马队在革命党人田激扬、张烈等带领下首先发难。炮营在熊成基的率领下，击毙管带陈昌鏞，将全营官兵开赴城北。马、炮营会合后齐奔菱湖咀子弹药库。守库正目范传国（范传甲之胞弟）打开库门迎接起义军。北门外驻扎测绘学堂的步营也起义响应。熊成基便率炮、马、步三营会攻省城安庆。

熊成基等率炮营起义时，该营队官徐召伯秘密逃回安庆，向安徽巡抚朱家宝告密。朱立即严令关闭各城门，并调巡防营把守，任何人不得出入。担任新军二标二营管带薛哲起义前决定打开北门迎接起义军进城。但临阵畏缩，未能执行原来决定，迟迟不开城门。当起义军与巡防营激战时，他又对起义没有信心，不敢决然起义。范传甲的辎重营，也因张劲夫在讲武堂被长官严密监视，而未能按计划行动接应。起义军迅速攻占省城的计划全部落空。第二天，城外起义军各营继续奋勇攻城，但因弹药不济，城防坚固、屡攻不克。朱家宝又调动停在长江上的军舰炮轰起义的炮营；调集清援军迫近城郊。起义军内外受敌，难于抗御，不得不于当晚10时许分两路突围。熊成基所部退至合肥时，余部已不足百人。清军又穷追不舍，起义军内部涣散，各奔东西，已丧失了战斗能力。熊成基被迫只身离队，余部也很快离散。

起义失败以后，清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扬等都死于清朝统治者的屠刀下，就连临阵畏缩不前实际没有参加起义的薛哲也没有幸免。全省牵连被害者约达300余人。

安庆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此之前，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是会党。会党虽然有一定战斗力，但成员主要是游民，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又缺乏必要训练。单纯依靠会党起义难于成就革命大业。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本来为清朝统治阶级服务的武装力量。安庆新军起义标志着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新阶段的开始，即新军革命。从此，革命党人秘密革命活动重心移向了新军。新军起义不断发生，直至武昌新军起义点燃了全国大起义的烽火，烧毁清王朝。

安庆新军起义之后，同盟会运动新军的自觉性更加强烈。1906年6—7月间，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醅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在新军

中发动革命。会议决定由赵声负全面发动新军革命之责，倪映典担任新军各营联络工作，张醅村担任巡防营新军联络工作，胡毅生担任农村会党联络工作。经过几个月发动联络工作，同盟会在广州新军中势力发展很快，到这年冬，在新军中发展同盟会员数千。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11月间，同盟会将南方支部作为南方各省党务军务领导机关。支部长胡汉民，书记汪兆铭，会计林直免。不久倪映典来香港报告广州新军发动情况，支部便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等来港共商广州起义大事。倪映典还拟定了《运动军事章程10条》，确定运动新军以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为重点，采用急进速成办法进行工作等项原则，更进一步推动了运动新军的工作。2月5日，倪映典再次来港向南方支部汇报工作，共同商定在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

2月9日（农历除夕）新军士兵与警察发生冲突，局面难以控制。正在香港的倪映典获悉后，立即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黄兴、赵声、胡汉民、倪映典等反复协商，决定起义日期改为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六）并确定了起义的指挥与领导，黄兴、倪映典分统新军、巡防营出江西、湖南；赵声留守广东；胡汉民管理民政和财政及后勤保证。会议决定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三人于2月15日赴广州。2月10日正值正月初一，香港至广州轮船停开，倪映典也未能及时返回广州。这时，广州新军士兵和警察冲突出乎意料的发展。被警察扣留的士兵返营后历数警方凌辱，更激起新军士兵愤怒，便自发携枪入城。新军与警察冲突正在升级，广州处于无法控制局面。两广总督袁树勋用阴谋手段收缴新军二标士兵的枪械，限制士兵上街，调动八旗兵运炮登城防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也调所部精锐扼守燕塘与省城的要道——牛王庙。

2月11日，倪映典深夜赶回广州时，新军士兵群情激愤，局面已难以控制，起义势在必行。但新军内部十分涣散，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统一指挥。二标枪械被收缴，一标虽有枪械，但弹药极

少，12日晨，倪映典至军中看到如此情景，感叹不已，便突入一标营垒，击毙管带齐某，召集新军士兵，晓以革命大义，义无反顾地举起革命大旗。众军士一致赞成，推举倪映典为司令。拟定袭取广州。倪率队至牛王庙时，李准所部营长李某等三人迎来，谎称牛王庙是自己所部，恭候调遣。倪映典轻信身为同盟会员的李某所言，未加任何防范便率队挺进，行至山隘，被李准事先部署的伏兵击毙落马，先头起义军死伤多人，后队义军仓慌溃散。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了。

广州新军起义再次证明，本来为维护清朝统治的武装力量，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是可以成为埋葬清朝统治者的掘墓人。赤手空拳的革命党人经过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仅能动员下层人民革命，而且可以动员反革命的武装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事实本身就增强了革命信心，鼓舞革命党人斗志，加速革命形势发展。

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领导历次起义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次。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的一年里，政治形势发展很快，国内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1910年10月16日，孙中山《致檀香山同盟会员函》正确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指出：“乃者时机日逼，外而高丽既灭，满州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内而有钉门牌、收梁税，民心大变，时有反抗。吾等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时机已算成熟”。^①11月13日，孙中山赴槟榔屿，约集黄兴、赵声、胡汉民、孙德章、邓泽如及南洋同志举行会议，商量再度起义计划。他鼓励大家：“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而”。^②他还分析了再次起义地域的选择，指出广州新军，特别是赵声曾任标统的第二标仍保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6页。

《国父孙中山先生传》，1965年11月，台北版，第214页。

持革命力量，基础较好；广州与海外联系密切，便于接济。他说服黄兴放弃图云南计划，决定继续在广州发动革命。为保证起义成功，会议还决定了各人各地区捐款资助军费具体任务。会议研究了集中全党人力财力，准备起义的具体部署，择革命党人500名作为先锋，以领导军队和民军，负发难之责任。占领广州以后，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各省乘机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槟榔屿会议之后，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先后返回香港，具体部署实施起义计划。1911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作为起义总领导机关的统筹部，黄兴为总指挥，赵声为副总指挥，胡汉民为秘书长。下设八课：（1）调度课，负责运动新旧军队，姚雨平任课长。（2）交通课，负责江、浙、皖、鄂、湘、桂、滇、闽各路交通事宜，赵声兼任课长。（3）贮备课，负责购运军械弹药，胡毅生任课长。（4）编制课，负责草定规则章程之事，陈炯明任课长。（5）秘书课，负责掌管一切文件之事，胡汉民兼任课长。（6）出纳课，负责出纳财政之事，李海云任课长。（7）调查课，负责侦察敌情，罗炽扬任课长。（8）总务课，负责掌管其他一切杂务，洪承典任课长。吸取以往教训，各课事务由课长主持，与总指挥机关实行单线联系。会议之后，孙中山及各领导人分赴海外各地筹款，至起义前共筹15万多元，为起义作了经费准备。

4月8日，统筹部于香港召开会议，具体部署实施起义计划，决定先锋增至800人，分10路进攻。黄兴率第一路南洋及闽省百余人攻总督府，杀张鸣岐。赵声率第二路苏皖百人攻水师行台，杀李准。徐维扬率第三路百人攻督练公所。陈炯明、胡毅生率第四路百人攻占大北门和归德门两城楼。梁起、黄侠毅率第五路东莞攻巡警署和广中协署，兼防大南门。姚雨平率第六路百人攻占飞来庙军械局，兼破小北门，迎燕塘新军入城。李文甫率第七队50人攻占马槽军械局。张六村率第八队50人攻占龙王庙高地。洪承典率第九路50人破西槐二巷炮营。罗则军率第十路50人破坏电信

局。派放火委员潜入满人居住区，准备起义发动时执行放火任务，以壮军威丧敌胆。会议决定 4 月 13 日（农历 3 月 15 日）正式起义，因从日本和越南购置军械未能如期运到和 4 月 8 日同盟会员温生才自发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发生，清朝政府加强设防，起义日期乃改为 4 月 26 日。黄兴等许多革命党人写下决命书后于 4 月 23 日潜入广州，以必死的决心投入起义。

黄兴到达广州以后，将起义日期改为 27 日。革命党人纷纷加紧准备。但这时传来了清方将新军的枪机全部收缴和陆路提督秦炳直所部清兵到达广州，说明起义消息已经泄漏。起义领导机关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领导起义机关内部消息纷纷，一部分指挥人员也提议改换起义日期，黄兴处于极端矛盾之中，乃被迫决定改期起义并令各部尽速解散以防被搜捕。但黄兴个人决心拚一死以谢天下，表示：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这种思想代表了一部分坚强革命党人的意志，林文、喻培伦等也纷纷表示以死相拚。这时又传来清方调来广州巡防营中也有革命党人，准备响应起义。于是当晚黄兴决心孤注一掷按期举行起义。并根据当时广州城革命党力量，将原订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一路黄兴率队攻占两广总督署；二路姚雨平率队进攻小北门，占领飞来庙，迎接防营和新军进城；三路陈炯明率队攻巡警教练所；四路胡毅生率 20 人守大南门。但陈、胡接香港暂缓起义一日后，27 日起义时，没有响应；姚也因故未举义。四路进军计划，变成了黄兴一路孤军奋战局面。

4 月 27 日起义日期确定后，黄兴一面电告香港总部，一面加紧布署，确定起义同志臂缠白布，穿黑色胶鞋，以吹螺角为号。

晚 4 时许，黄兴召集所部阵前动员。5 时 30 分，黄兴率林文、李文甫、喻培伦、朱执信、林觉民等百余人出发，直扑两广总督署。黄兴率林文、朱执信、李文楷等十余人，首先由侧门先行冲入署内，经过激战，守署清兵数十人部分被击毙，其余投降，只有极少数人生逃。总督署被革命党人焚烧。黄兴率部撤离总督署

至东辕门外，与李准大队亲兵遭遇，黄兴手、足多处负伤，仍从容指挥，将起义军分为三部突围。徐维扬率数十人出小北门，拟与新军接应；一部分同志攻督练公所；黄兴自率十余人出大南门，拟与防营接应。

三路起义军分道进行后，黄兴率队至双门底时正遇到防营大队，见防营兵士都没有臂缠白布，误以为敌军，便开枪射击，击毙了原为革命党的带队哨官温带雄，防营士兵也还击，造成革命党内互相杀伤的损失。当黄兴率队出大南门时，又遇防营百余人，又一次引起激战。至卫边街时，黄兴已经几乎无人跟随了。出小北门的徐维扬一路，遇大队防营逼来，退入源盛米店，激战一昼夜，因弹尽而遭惨重牺牲。刘梅卿等进攻督练所一路，行到莲塘街遇喻培伦等正与敌军激战。刘等即加入战斗，战到晚9时，折向大石街，又与敌激战。终因兵力悬殊，随战随退，牺牲也很惨重。

起义失败以后，革命党人潘达微主持将死难的革命党人72具遗体埋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事后进一步查实另有14名党人也死于这次起义，合计牺牲革命党人86人。

这次起义由于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教训是很大的。革命党人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因而革命力量很脆弱；起义前准备工作不充分，组织不严密。如起义日期一改再改，未能同时发动，给敌人造成分别消灭起义军之机；指挥不统一，配合不密切，甚至造成革命起义军互相残杀的可悲局面。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党人英勇献身精神和英雄事迹永垂史册，流传全国。他们中许多人出身于世宦家庭或留日学生，为拯救苦难的祖国，不惜牺牲宝贵生命，从容赴难，对人们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成为广大人民奋发爱国的精神力量。这次起义大大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日趋成熟，成为辛亥革命前的总演习。

第四节 同盟会内部的分歧与派系

一、同盟会内部思想分歧的产生与发展，共进会的成立

同盟会较兴中会在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上是进步的，可谓较全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但它又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同盟会还是一个相当松散的政治团体。参加同盟会的人从组织手续来说，必须填写入会盟书，表示承认同盟会的宗旨，履行宣誓仪式，主誓约人要当天发誓，承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表示“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同盟会成立之初规定宣誓的主盟人和介绍人是比较严格的，必须是本部三部的职员和地方分会会长或本部和分部指定或认可的会员，但后来各地发展会员较快，本部或分部派不出那么多主盟人，便由各地先行入会者作为主盟人，而参加同盟会以后，就很少受组织约束和教育。一般会员没有定期组织生活，除主动参加活动者外，一般会员也没有任何经常性活动。有许多同盟会员除履行宣誓仪式外，没有任何活动。有些会员参加活动也只是因与组织者同学同乡有关系参加，不是同盟会组织的约束力。甚至连本部负责人和职员任职，随意性也很大。宋教仁《日记》1906年4月17日条写道：“下午朱风梧来，言〔同盟〕会亟需余为经理干事，余辞不肯。彼再三言之，并言昨日开会已经报告。余言现尚有二职，何能兼任？彼言二职均可辞退，惟此必须担任；且此亦甚闲散，断无烦多之事也。余思既可以二易一，则就此亦无妨，遂允之”。1907年1月4日条：“黄庆午言明日往口口去，将有起义之举。此间庶务干事欲交余代理，并属余可迁至伊处居之云云。余思余现在养病，既不能做他事……且此职现亦无多事，亦可任也。遂允之。……夜8时至孙逸仙寓，庆午亦在。逸仙与余言代理庶务事，余问其一切事务如何，逸仙不多言”。本部庶务干事当总理不在时代行总理职务，本应属重要职务，但宋教仁视这一职务是无事可做

的闲职，孙中山也没有任何部署。可见同盟会本部组织的涣散。同盟会员还可以随意参加其他组织。他们在各种组织中活动不代表同盟会，也不受同盟会组织约束。如秋瑾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并任浙江主盟人，返回绍兴后又经徐锡麟介绍参加了光复会；蔡元培参加同盟会后并任上海分会会长，却将一个同盟会员介绍参加光复会。许多同盟会员只是填写盟书，举行了宣誓入盟仪式而已，并没有参加组织活动。足见同盟会组织十分松散。

同盟会成员思想也不够统一。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代表进步力量的，有革命要求，涌现出一批重要的革命活动分子。但他们思想上空虚和动摇也是十分严重的。他们长于革命空谈，而短于革命行动。邓文翬描写当时留日学生状况时说：“此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将逾 2 万人，加入同盟会者亦不下二三千人，留学生中已成了一种革命风气。人人谈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谈无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干者百无一二”。

同盟会成员出身和所受教育差别很大，导致思想差异难于统一。孙中山是较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代表人物，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较少。大多数同盟会员是在国内受较长时间封建教育后，又到国外留学，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这部分人思想受封建主义影响较深，趋于狭隘偏激。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同盟内部意见分歧。

同盟会内部分歧，从 1907 年开始暴露出来。第一次冲突是这年 2 月，因国旗图案而引起孙中山与黄兴意见分歧。孙中山由南洋来东京本部便悬挂起青天白日旗，作为创立共和制新国家的象征。黄兴则主张作井字旗，象征平均地权之意。并指责孙中山说：“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孙中山则反驳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俗毁之，先殡仆可也”。^②

邓文翬：《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②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黄兴在盛怒之下，甚至发誓脱离同盟会。后来，幸喜黄兴能顾及革命大局，表示同意孙中山意见。此次分歧未能扩大，以后也没有再提起，避免了给同盟会造成更坏影响。黄兴顾大局识大体的态度，有利于维系同盟会内部团结。

第二次冲突，起因于3月间，孙中山离开日本前接受日本政府和东京股票商资助事件。萍浏醴起义失败以后，清驻日公使受命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日方虽接受清政府要求，但未用“驱逐”而用“劝其离境”的办法，并赠送旅费5000元。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也赠送1万元表示好感。孙中山偕黄兴等离开日本前，在东京招待同盟会重要成员，从铃木所赠1万元之中拿出2000元留作《民报》用，其余部分带走作为发动潮惠革命之用。章太炎认为1万元都应留给民报社用，而孙中山只交出2000元，其余8000元显然是孙中山独吞，因而表现极为不满。随后又知道日本政府还赠送5000元，自忖是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贿赂，情绪更加激昂。章太炎、张继、宋教仁、谭仁凤等纷纷指责孙无端接受日本人赠金。章太炎最为激烈，竟将悬挂于民报社的孙中山画像取下，并在下面批：“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他提议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由黄兴继任总理。由此，东京同盟会本部掀起了反孙的轩然大波。唯有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庶务干事刘揆一力排众议，劝解各位为党军前途着想，勿要互相猜疑，并解释孙中山所携款项也是应潮惠军需并非私用。刘揆一还就同盟会本部的党内纠纷致函胡汉民、冯自由，希望他们就近劝告孙中山，向东京本部说明情况并引咎自责，以平众愤。胡、冯接受了刘的观点，建议孙中山采纳。孙中山称：“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黄兴也致书东京同志，谓“宜倾心拥护国父，万勿举己为总理，而陷于不义”。黄兴以革

① 《国父孙中山先生传》，1965年，台北版，第154页。

命大义为重，倾心拥护孙中山为总理，对平息这场风波起了重要作用。不久镇南关、河口起义爆发，这次风波便平息了。

1907年3月，孙中山率黄兴、胡汉民等离开日本赴越南后，宋教仁在同盟会中威望又不高，东京同盟会处于群龙无首状态。除上述同盟会中分歧冲突以外，一部分与长江流域会党有联系的会员对孙中山侧重中国南部建立革命大本营，首先发动革命的战略思想持不同意见，而主张从中国中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再向南向北扩展，形成席卷全国的革命形势；另外，同盟会成立以来，许多会党首领参加了同盟会，他们在长江流域会党成员和群众中颇有影响，理解会党群众不堪受压迫和剥削，强烈要求革命的愿望。既是同盟会会员又与会党有联系的张伯祥、邓文翬、焦达峰、刘公、孙武等人，便积极活动，酝酿成立一个统一的会党组织。当时任东京同盟会本部庶务干事的刘揆一也积极支持这一倡议。张伯祥、邓文翬、焦达峰、刘公等当时都在日本东斌步兵学校学习，中国有志留学生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很多，其中的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等省人数最多。这些人除每天上数小时正常功课以外，便研讨中国革命问题。张伯祥等便以此为基地，进行筹建统一会党活动。

1907年8月，在东京清风亭召开共进会成立大会，中国留日学生凡是赞成这个组织的都可以参加，四川的张伯祥、熊克武、喻培伦，湖北的彭汉遗、居正、刘公、罗杰，湖南的焦达峰、覃振、陈作新，江西的邓文翬、彭素民、汤增璧，浙江的傅亦僧、陶成章等100多人参加了成立会。张伯祥由于是四川孝义会的首领，在川东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且在会党中资格最老，熟习各码头情况，被公举为共进会第一任总理部总理。会址最初设在居正、罗杰的寓所，后在青山区租赁一屋，署名“华群舍”，作为共进会办公地点。采取的工作步骤是，“先从团结会党入手。再

联合军警各界，以厚声势”。^①

共进会成立时发表的宣言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大体仍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但突出了反满宣传。白话宣言中称：中国自盘古以来，就是汉人居住，汉人作皇帝，后来满人作了中国皇帝。共进会取“共进”二字，“增进我们兄弟知识，共拚死力，有进无退地去杀满人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②宣言还痛斥满人出卖中国依靠洋人保护它作皇帝，统治汉人。共进会所以要革命，“一来是要替祖宗报仇；二来是要早点预备，免得子孙绝种，这岂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吗？”^③

共进会宗旨将同盟会誓约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曾参加过共进会的吴玉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此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因为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④

共进会为了发展势力，联络会党，内部完全实行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并立有山水堂香名称。山称中华山，水称兴汉水，堂称光复堂，香称报国香。会员相见时互道隐语口号，参用同盟会行握手礼。

共进会规定了十八星革命军旗式样，红色旗面中间辐射出几个黑色锐角，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象征18省人民团结血战的革命精神。

共进会成立基本宗旨是反清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同盟会领袖忽略在长沙流域会党中开展工作的不足。它基本接受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与同盟会同站在革命阵线上，互为补充，而没有

李 白 真《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499 页。

李白真：《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499 页。

同上，第 501 页。

《吴玉章回忆录》第 49 页。

攻击同盟会 瓦解革命力量。共进会建立以后 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从而壮大了革命阵营。共进会在革命实际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升起的第一面革命旗帜就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所以说共进会的成立，从主流方面说对革命事业发展是有益的，为同盟会增加了一个群众基础较为广泛的外围组织，从而有利于促进革命运动的高涨。当然，共进会纲领中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与同盟会纲领相比又是原则性的倒退。

二、孙陶矛盾的发展与光复会的重建

孙陶矛盾首先来自陶成章，但也有深刻的思想根源。陶成章借助许仲清资助捐得了知府官以后，便赴日本拟学军事，以便回国后掌握军权图谋革命。到日本后事情办的不够顺利，并因此与徐锡麟发生分歧。1907年1月4日，陶成章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了光复会的活动。1908年4~7月曾一度主持《民报》的编辑工作，颇为积极。但陶成章思想基础与孙中山差异很大，陶成章是比较系统接受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教育后走向革命的，因此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较深，在“反满”问题上表现特别激烈，但对建立共和国制度并不十分热心；对农民土地问题比较重视，主张平均地权。革命方法上，陶成章过于相信个人力量，重视个人活动，而轻视组织作用。思想上的分歧，最后终会导至组织上的分裂。

陶成章与孙中山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民报》的经费问题。镇南关起义后 孙中山受法国政府胁迫离开越南赴新加坡 革命党人同被驱逐出境的数百人也都栖居新加坡。孙中山既要筹集起义军事费用 又要筹集抚恤费用 处境十分困难。当时《民报》经费也十分短缺。1908年9月 陶成章赴南洋向孙中山索款3000元 作为《民报》印刷费 并要求增加《民报》股款及维持费数万元。孙中山虽经努力也无法筹措 不得已将自身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 让其变卖 以

救《民报》燃眉之急。陶成章对此极为不满。然后又要求孙中山开具介绍信，直接向各地同盟会机关集资。虽经孙中山同意，但收效不佳。在此前后，章太炎、陶成章还攻击孙中山借革命之名，捐钱到家里用，已成富翁。陶成章对孙中山不满情绪不断发展，便产生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以与同盟会相抗衡的念头。

陶成章为分裂同盟会进行了一系列不体面活动。第一，歪曲历史谎称光复会是同盟会前身，同盟会是由光复会改名而来的附属组织。1908年冬，陶成章在为江浙皖赣闽五省同盟会筹饷章程中写到：“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巳夏，由总会长蔡、湖南分会长黄，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当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本会前日一切办事一切费用，均由内地同志担任。近因事务扩张，费用不敷，故商之总会，遣入至海外，以求海外同志人筹赞助焉”。他还谎称浙江同盟会分会是以浙江为根基，以江浙皖赣闽五省为本会活动区域。他给海外分会筹款收条上都写明：“今收到×××义士赞助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费并布置决行团一切费用金××元整”。收款人署名陶成章，加盖浙江同盟会分会章。其用意就是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作舆论准备。第二件事是在缅甸《光华日报》上连续发表《浙案纪略》，在记述光复会主要成员革命活动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过程中，多处美言陶成章自己。如：蔡元培从弟蔡元康到绍兴发动商界、学界加入光复会，必须声称陶成章已入会。“诸志士闻成章之入会也，迹遂群入其会，徐锡麟亦于是年冬¹²月到上海，见元培于爱国女学校，入光复会为会员也”。^①在写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时，称同盟会成立时，“黄兴与蔡元培谋迎孙文为会长，革命党首领本为蔡元培。元培德行有余，而方略颇

① 《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34页。

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故推孙文为会长，为自己倦勤地，非果重崇孙文也，黄兴则有意之。”陶成章这些作法的动机就是要抬高自己，夸大其作用并扩大他在海外的影响，蓄意与同盟会分庭抗礼，树立自己领袖地位。

陶成章在上述舆论准备之后，于1908年12月，由缅甸到新加坡，进行实际组织活动，捏造许多事实攻击孙中山。他首先拉拢主持新加坡同盟会会务工作的李柱中，利用李柱中对孙中山不满情绪进行造谣挑拨。陶成章和李柱中便串通一气，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等七省在南洋各地办事人员，罗列孙中山“罪状”三种十二条、善后办法九条，即《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陶成章在《意见书》中，极力散布对孙中山不信任情绪，造谣攻击孙中山借革命之名中饱私囊，残贼同志，蒙弊同志，败坏全体名誉；要求同盟会东京本部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重新改组同盟会。1909年夏，陶成章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交同盟会东京本部。陶成章、李柱中等的无理要求立即遭到当时主持东京同盟会本部工作的黄兴的坚决拒绝。黄兴从大局出发，联合谭人凤、刘揆一等致函南洋各分会及诸同志，耐心详尽地解释，以求消除误解，促进南洋不明真象同志醒悟。从而使陶成章、李柱中改组同盟会本部，夺取同盟会领导权的计划落空。

陶成章在同盟会内部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开始推向社会。这时，汪精卫续办《民报》，将章太炎、陶成章排斥在外，章太炎便作《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借革命之名行新骗术。追随陶成章的陈威涛将《孙中山“罪状”》用药水书写百余份，寄中外各报刊载。孙中山对此举极为愤怒，使命同盟会各机关开动宣传机器，攻击陶成章、章太炎、陈威涛等。陶成章又作《布告同志书》，罗列孙中山之非进行攻击，并略述自己生平经历，塑造自己领袖形象。1909年秋，陶成章致李柱中等两封信，都谈到脱离

① 《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34页。

同盟会，另开新局面，已准备就绪。信中称：“总会亦已一败涂地，无可整顿矣。弟乃邀集旧时同志最可靠者商酌数次，已议定草章，寄奉三张，乞兄等与各同志酌量之，再细加商榷、冀臻于完全，是所至盼”。信中还谈到光复会“此次设立会长，均以不置总会长为是”；组织机构设评议、执行二部。^①

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章梓为庶务员，沈家康为书记员。在南洋设立总部，由李柱中、魏兰、沈钧业为执行员，代表东京总部就近处理南洋事务。章太炎、陶成章等在东京办《教育今语杂志》，为通讯机关。

重建的光复会并不是原来光复会的恢复，而是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与孙中山政见不合的新的政治组织。新的光复会其成员包含陶成章等部分原光复会成员，而更多的是南洋一带原同盟会成员，由于不满孙中山而参加反孙的组织——光复会。国内原光复会成员大部分不是新光复会成员。连原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也未参加新的光复会组织。新光复会成员组合的共同基础是对孙中山的不满。其中章太炎、陶成章等少数骨干分子是与孙中山政治主张分歧所致。章太炎、陶成章等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较重，能拥护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坚持建立汉人政权，但对孙中山建立共和国制度不甚理解，对孙中山武装斗争主张也不够积极。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没能成为团结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强大凝聚力，最终导致组织上的分裂。

重建的光复会主张以教育为进取之法，迷信暗杀活动，甚至拟议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骗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夺取清朝中央政权。后又主张“中央革命”，但轻视群众性武装起义。这是在同盟会革命主张上的倒退。但新建的光复会与同盟会坚持推翻满清统治这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新建光

复会并没有视同盟会为主要敌对力量，有时又有某种程度上的合作。有的光复会成员还参加或支援同盟会所发动的革命斗争。

三、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及其主张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是经过长时期酝酿而成立的。孙中山自主张以武装起义推翻满清以来，一直将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区，但屡遭失败。1910年5~6月间，同盟会部分领导骨干谭仁凤、宋教仁、赵声等对孙中山只注重发动南部边境起义，而忽视对长江流域各省的发动和领导，深表不满。因此，他们在东京集会时，宋教仁分析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力量，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攻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中策为在长江流域各省，以武汉为中心同时发动，建立政府，然后北伐，夺取全国政权。下策为在边区省分首先发动，建立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全国。与会者经过讨论，认为上策发动革命，运动较难，不易做到。下策已经多次实践，屡遭失败，不应继续进行。唯有中策较为易于进行，便于成功。会议议决采用中策，集中力量发动长江流域武装起义。会议也议论了筹组同盟会中部总部事宜。会后，他们纷纷回国活动。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姚志强、吕志伊、谭仁凤、章梓、陈勤生等人，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会议决定设立总务干事，推举宋教仁、陈其美、谭仁凤、杨普笙、潘祖彝等人任总务干事。陈其美主掌庶务，宋教仁主掌文事，潘祖彝主掌财务，谭仁凤主掌交通，杨普笙主掌会计。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设于上海。会议通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宣言”总结同盟会以往革命经验教训称：“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表明：“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部”。中部总会针对同盟会存在的某些弊

端提出“机关制取会议、救偏僻，防专制。总理暂不虚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适如其分，不至鄙夷不屑就也”。同盟会中部总会还规定“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声称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这些体现了改组同盟会成立中部总会的宗旨与意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派居正成立湖北分会，焦达峰成立湖南分会，范鸿仙、郑赞拯成立安徽分会。这些分会组织直接受上海总机关统辖，主持长江流域联络军队，进行革命有关事宜。这时东京同盟会本部吴玉章、张懋隆来上海，即被派往四川，成立四川分会。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及长江流域各省分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重心已由南方各省转移到长江流域。因武汉早已有相当基础，便成为长江流域各省革命的中心。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促进了长江流域革命运动发展，积极作用是主导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仍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方支部为友部；虽称总理暂不虚设，系指同盟会中部总会总理，而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孙中山作用。宣言对孙中山也没有恶意攻击。因此，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不属于同盟会分裂活动，实际是对同盟会本部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将革命重点移至长江流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从事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并在促进正在联合中的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分歧意见解决，建立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组织领导机构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五节 清政府的立宪骗局与立宪党的立宪活动

一、清政府“仿行立宪”与立宪团体的出现

立宪运动发自康、梁并逐渐普及全国，而真正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则是从1904年开始的。这一年爆发了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我国东北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竟能“以小克大，以亚挫欧”，居然打败了强大的俄国。人们认为“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①中国人把日本对俄国的胜利，视为“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②“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③这一事实给立宪派一种新的启示，成为他们要求立宪的重要根据。于是，他们大肆鼓吹立宪则强，专制则败。一时间，君主立宪的呼声成了舆论中心。《中外日报》就此发表文章说：“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观念入人至深，感人至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阻之，吾知其不能也”。^④《大公报》也载文兴致勃勃地说：“今日中国政府又将现出一新问题 其机已动 其端已见 其潮流已隐隐然而欲涌出者，厥惟何哉？盖立宪之问题是也”。^⑤这种要求立宪的舆论成为当时全国上下的热门话题。

立宪派一面呼天吁地制造舆论，一面急切地展开实际活动。在这方面国内著名的立宪派领袖张謇居于重要地位。早在1901年，张謇著《变法平议》一书，以置“议院”、设“议会”为请，

^③ 《辛亥革命》（四），第10、12、10页。

^④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中外日报》1904年5月5日。

^⑤ 《论中国立宪之要义》，《大公报》1904年6月18日。

主仿日本之制。1903年游日归国后，“见到官员友人，遇到谈论通信、没有不劝解磋磨各种立宪问题”。同年7月，与赵凤昌合刻《日本宪法》，分送达官贵人与内廷，乞求立宪。9月，又复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送侍郎铁良，与论宪法，得到铁良、端方、载振等人的赞许。②1904年春，驻法使臣孙宝琦上书请立宪。③这一举动受到立宪派和当时舆论界的极大关注，纷纷发表社论推波助澜赞誉不绝。④直至1905年，统治集团内部某些枢臣疆吏、驻外使臣、宗室亲贵及一般官吏开始注意立宪问题，条陈立宪的人越来越多。疆吏如张之洞、端方、周馥、袁世凯、岑春煊及侍讲学士朱福诜等先后上书朝廷，均以“更革政体为请”，以“立宪为言”。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请清王朝于12年后实行立宪。未几，袁世凯又“奏请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政张本”。⑤朝廷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又因满族亲贵中有一部分人也主张改行立宪政体者，“铁良、徐世昌辈于宪法亦粗有讨论，端方入朝召见时，又反复言之，载振又为之助，太后意颇觉悟，故有五大臣之命”。⑥慈禧太后鉴于立宪呼声逐渐上升，民主革命不断高涨，为了缓和同立宪派的矛盾和消弭迅速扩大的革命影响，遂有采取所谓“仿行宪政”之命。

1905年7月16日，清廷发布上谕。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⑦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谋炸五大臣事件发生，清廷遂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徐、绍随同载泽、端方、戴鸿慈复出洋考察。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卷下，第56页。

② 《菑翁自订年谱》卷下，第56—58页。

③ 《东方杂志》1904年7月25日。

《大公报》1904年6月18日。

⑤ 《辛亥革命》（四），第4—5页。

⑥ 《菑翁自订年谱二卷》卷下，第58页。

⑦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页。

立宪派对五大臣出洋一举，以为是“朝廷以实心变法之意宣布天下”。①“自此以后，薄海人民，咸知朝廷实有与民更始之意，而希望立宪之情，乃益切矣”。②

继五大臣出国后，清廷颁布上谕设立“考察政治馆”，并命政务处王大臣参酌各国宪法筹定立宪大纲。③1906年“考察政治馆”正式开办。同年8月，五大臣在欧美、日本等国“考察”了9个月之后回国，向朝廷报告了“考察”经过。同时，载泽、端方等人又多次被召见，向西太后力陈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随后，载泽又向慈禧太后呈上一个《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说明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日皇位永固，大利一；一日外患渐轻，大利二；一日内乱可弭，大利三”。并向慈禧太后献策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④意思是说只要宣布“立宪”，先定下立宪的“国是”，稳住人心，而实行之期则可拖延下去。这样，即可达到愚弄立宪派，消弭革命、巩固清朝统治的目的。随后，又召集有王公大臣参加的御前会议，就立宪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诸臣有赞成者，有稳健持重者，有持异议者，但正反两方面经反复驳论后，“诸王大臣之意见，大略相同。……乃始涣发大诏，宣示立宪”。⑤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发布“预备立宪”上谕。声称：“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立宪，取决公论”；而中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所以，“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不可。但是，它又公然宣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⑥是不可移易的。

《时报》1905年6月16日。

② 《辛亥革命》（四），第13页。

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第43页。

④⑤ 《辛亥革命》（四）第28—29、14—17页。

⑥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第43—44页。

“预备立宪”上谕颁布后第一步实际活动就是改革官制。清廷派载泽、奕劻、孙家鼐等人任总裁议官，负责厘定。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地方官制一时难于制定，乃先定中央官制，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将各部加以扩充，计设十一部，各部仍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但“不分满汉”，于11月公布。这个中央官制与清廷中央的旧官制相比，除更换了几个部的名称以外，没有任何改变。

1907年，清廷上谕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负责“办理宪政一切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同年8月，直督袁世凯再上一个请立宪的条陈，9月，清政府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出使美、日、德三国考察宪政。9月20日，又命筹备设立“资政院”作为将来“议院之基础”，派溥伦、孙家鼐为总裁。10月，命各省筹设谘议局，并预备设立各府州县议事会。1908年7月，资政院拟定院章，公布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8月，公布国会召集办法，制定立宪准备案，以九年为期。9月，又公布宪法大纲及议院选举各纲要。至此，所谓“预备立宪”的措施依次进行，清政府假“立宪”丑剧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得到了国内外立宪派的拥护。当时，流亡海外的康、梁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喜欲狂”，认为“立宪救国”的时机已到。于是，康、梁及国内的张謇等立宪派首领开始组织立宪团体，以促立宪的实现。

当时，立宪团体起自国外的以“帝国宪政会”和“政闻社”为主，起自国内的以“预备立宪公会”规模最大，继而各省也出现某些小的社团为之联合呼应。现以各团体成立时间先后为序分别叙述如下：

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立宪团体。1905年清政府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上海的立宪派分子即组织宪政研究会，在这一基础上，1906年12月由郑孝胥、张

謇等人发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该会章程规定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①强调“尊敬谕旨”。本部设上海，后又在北京设立分会。

该会依据《简章》规定，由会员投票、公举会长15人，以正、副会长及董事组织“董事会”。又规定该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驻办员一人、书记员一人、会计员一人、编辑员若干人、调查员若干人。^②它的组织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是最健全的一个。在会内活动中，也有着相当完善的民主程序，这在各立宪团体中也是仅有的。成立时，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张謇、汤寿潜被举为副会长。其成员多为士绅、社会名流和资本家，也有部分留日学生，同时，还有少数现任官吏如瑞澂、谢远涵等人。

预备立宪公会会员的发展也比较快，第一年入会者153人，^③据1909年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所列会员共有385人。据不很准确的统计，有77人曾做过知县以上的官员，约占会员总数的21.5%；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及在各种工商企业中任职的有84人，约占会员总数的23%。这个数字说明直接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人数虽不甚多，但他们都是公会中的主导力量。会员中的官绅阶层也多是一身二职，兼有资本家身份。这表明预备立宪公会是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团体。

预备立宪公会由于它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所以，在思想上属于康梁一派。他们的重要主张是：请愿速开国会，实行立宪；反对出卖路权，反对铁路国有；开辟连山湾港口；设立美清银行、美清航空公司及东三省拓植银行；移民实边；主张改革，反对革命。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积极鼓吹立宪。1908年创办《预备立

①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206页。

② 同 第206—210页。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00页。

宪公会报》半月刊，1910年5月，在北京出版《宪志日刊》，刊文讨论国会问题、立宪问题及时评。该会还编辑出版了《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地方自治纲要》等十余种书籍，普及宪政知识。为训练宪政人才，该会还设立了宣讲演习所、国会研究所、法政讲习所等机构。

预备立宪公会一贯宣称“尊旨预备立宪”，所以，它的实际活动一般是在清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1908年各省发动国会请愿运动时，预备立宪公会并不热心，后来各省请愿代表纷纷入京，该会才以正、副会长名义致电清廷，请速开国会。1909年谘议局成立后，张謇曾以江苏谘议局议长名义，约各省谘议局派代表联合请愿，而真正在后台活动的只是雷奋、杨廷栋、孟昭常等人。在1910年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预备立宪公会头头们的态度仍然是暧昧的。当清廷下诏将九年预备期限缩短为五年时，各省代表仍表示反对，而张謇一派则表示满意，主张停止请愿活动。只是到了1911年春皇族内阁抛出后，他们才大失所望，态度有所变化。预备立宪公会由于受张謇一派所谓稳健势力所左右，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偏于保守。它的人力、财力雄厚，在整个宪政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帝国宪政会

清廷立宪丑剧上演后，远在美国的康有为一反常态，“至欢极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① 避居日本的梁启超也兴奋地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②

康梁不谋而合，此时的康有为亦在为改组保皇会而谋划。他说：“皇上不危，无待于保，归政虽要尚属更端。就本会之义务而言，此后当无所事事，而成立大党，遍于五洲，实居举国之先河，而为政党之前导者也”。^③ 乃有康有为改组“保皇会”为

^①③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00页。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5页。

“帝国宪政会”之举。

1906年12月，康有为发布《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要求将所有保皇会一律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并附有《行庆改会简要章程》二十四款，对改会缘由、宗旨、目的、要求和具体安排等作了说明。与此同时，梁启超在东京也在酝酿改组保皇会，初步议定改为帝国宪政会，并草拟了章程。梁对康的改会公启及章程表示异议，认为万不能用，应用“帝国”之名。康遂接受梁的意见，于1907年3月23日，正式将“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

《帝国宪政会章程》规定，以君主立宪，尊崇帝室、扩张民权为宗旨，表示要监督政府，讲求宪政。

“帝国宪政会”的中央机构没有单独的设施，只称总会，设总长，总董。总会没有固定的会所，它的省一级的会所可称总会所，但行政法令之权，皆以总长为主。若总长不在此地，则虽名总会，仍不得任总会之事权。总会职员，悉由总长派出，皆听总长随时在各埠会所设立代办总局，收管一切公款，办理一切事务。实际的领导人仍是康有为、梁启超。各埠支会设总理、董事、职员、值理议员，有财政、监察、法律、兵体操、演说等部门。

“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梁分别进行活动，康有为在海外筹款，梁启超则在国内，与立宪派联络呼应，扩大势力；同时，继续与革命派争夺地盘。梁启超说：“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①

1908年，国内立宪派掀起国会请愿运动后，帝国宪政会积极响应，康有为以海外亚美欧非澳五大洲二百埠中华帝国宪政会侨民的名义上请愿书，要求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尽除满、汉之名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579—606页。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1页。

籍，定国名为中华。它表明康、梁对国会请愿运动的立场是坚定的。当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后，康有为又发动美国30万会众联名上书请愿，要求“立下明昭，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①

帝国宪政会本来内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就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又因经营商业和经济、内部在财务上发生许多纠葛，再加上他们在海外的活动，常常受到革命派的批判和打击，使得它的声势和影响远远不及“保皇会”时代。1911年初，帝国宪政会改名帝国统一党，申请在民政部注册。^②从此，帝国宪政会之名便销声匿迹了。

政闻社

“政闻社”由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立宪派人士发起的立宪团体。清廷颁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一面协助康有为改组“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一面联络杨度、熊希龄、徐佛苏、麦孟华、蒋智由、罗普等在国内创建“宪政会”，以图在国内发展。但因与杨度政见不一，终至分道扬镳，遂有梁启超组建“政闻社”之举。

1907年10月17日，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政闻社。为给康、梁留位置，该社不设正副会长，而由马良任总务员，徐佛苏、麦孟华为常务员，下设庶务、书记、会计、编辑、调查、交际等科，另有评议员若干人。为避免清政府的疑忌，由蒋智由、徐佛苏、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为发起人，而康、梁均不出面，暗中主持。

会后发表了《政闻社宣言》和《政闻社社约》。宣布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为政纲，^③并标榜三项主义：一是确定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予国政之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13—314页。

②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13—314页。

③ 《政论》第1年，第1期，第10—14页。

权；二是对于内政外交指属其利害得失，以尽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三是唤起国人政治之热心及增长其政治上之智识与道德。^①

《宣言》特别强调，“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②表明了政闻社的妥协倾向。1907年10月，政闻社在上海创刊《政论》杂志，作为机关报，政闻社的《宣言书》、《社约》等重要文件及其它各种规章制度均在该志刊出；有关国会、议院、政党等宪政问题的论著译述等是该刊的重要版面，成为政闻社的喉舌。^③

1908年1月，政闻社本部由东京迁往上海。迁沪后，政闻社一面派特派员分赴各省建立支部，扩大力量，一面结纳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但因“党禁”未开，康、梁仍是被清廷通缉的政治要犯，所以，一般在野人士宁愿对康、梁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愿与之联合。政闻社成立时约有300余人，^④至年底发展到五、六百人，^⑤翌年，增至1500余人。^⑥

政闻社是国会请愿活动的积极参加者。1907年底，政闻社曾派黄可权、张嘉森到上海联络发动国会请愿运动。当时，上海各立宪团体正酝酿组织“国会期成会”，作为全国请愿总机关。该会由“预备立宪公会”发起，政闻社曾派代表常驻该会，积极参予联合请愿运动。1908年7月，在各省签名请愿高潮中，政闻社就曾以该社全体名义向宪政编查馆发出请愿电，请限期三年召集国会。

由于国会请愿运动呼声不断高涨，以及政闻社的活跃，引起清王朝当权派的严重不安。于是，决定从政闻社下手，以制止请愿运动。1908年7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⑦发出了取缔政闻社的信号。8月13日，清政府以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为由，下

①②③ 《政论》第1年，第1期，第121、16—17、124页。

④ 《政论》第1年，第2期，第139页。

⑤⑥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34、418页。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68页。

令取缔。

宪政讲习会

宪政讲习会，是杨度、熊范舆等人于1907年初在日本东京创立的立宪团体，后在国内建立支部，改称宪政公会。

1906年，留学日本的杨度与熊范舆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先是，杨拟与梁启超合组宪政会，但进行中双方矛盾很大，杨度遂另立旗帜，与熊范舆组建宪政讲习会。

宪政讲习会在《总章》中规定，它的“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在《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抨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是“亡我中国”之祸根，提出“设立民选议院”^②。1907年1月20日，杨度在日本东京创办《中国新报》月刊，作为宪政讲习会的机关报。

宪政讲习会成立时，会员不足百人，但其能量颇大。它以《中国新报》为阵地，大造速开国会的舆论，仅1907年一年间，就连续发表20余篇有关国会方面的文章。

1907年9月25日宪政讲习会向清廷上《民选议院请愿书》，提出6条理由，说明开设民选议院的重要性。^③由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领衔。署名者百余人。此次上书虽无结果，但它却是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声。

1907年秋，杨度因伯父病逝，从日返国奔丧。此后，宪政讲习会便在国内进行活动，扩张势力。湖南是杨度的故乡，所以，他首先联络湖南立宪派首领谭延闿等人，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同时，分遣党徒赴各省进行扩张。第二年，又与沈钧儒在北京发起宪政公会，一时入会者纷至沓来，^④发展颇为迅速。

湖南宪政会成立后，立即显示了极为活跃的态势。继熊范舆

① 《时报》1908年8月11日。

② 《时报》1906年8月12日。

③ 《中国新报》第1年，第8号，第142—150页。

④ 《中兴日报》1908年12月29日。

上书请开国会后，浏阳人雷光宇又以全湘士民的名义上书，呼吁召开国会。同年底，《中国新报》发表了《请开国会理由书》。^①第二年，以宪政公会为首的湖南立宪派又两次派代表赴北京催问都察院，请愿召开国会，揭开了全国国会请愿运动的序幕。

杨度回国后，得到考察宪政五大臣的信任，被授以四品京堂、“宪政编查馆”提调。他利用这一地位，在统治集团上层广为招纳，鼓吹速开国会。渐由立宪党领袖变成官方赞成立宪的人物。熊范舆后来被滇督李经羲召入云南，任知府。沈钧儒后来回省，任谘议局总参议。宪政公会的领袖人物相继步入官场，其组织遂告无形解散。

粤商自治会

1906年，各地立宪团体纷纷建立。广东资产阶级化了的商人——工商资产阶级陈惠普、李戒欺等人，鉴于内忧外患相逼而来，遂产生“组织力量，按步实现其拓财货，扩商权，进而参予新政，兴商富国之伟愿”。^②1907年冬，两广人民为维护主权，展开了反对英国攫夺西江扑盗权的斗争，陈惠普等人决定乘机组织团体。他们在戒烟会集会，准备呈文要求两广总督及外务部拒绝英国的干涉，但考虑“戒烟会名义薄弱”，经陈惠普建议，“即日成立自治会，冠以粤商名义”。^③这样，粤商自治会宣告成立。

粤商自治会的骨干人物大多以“士绅巨贾”为主，也有少数知识分子，但多不见经传，其主要成员有：陈惠普、李戒欺、陈基健、朱伯乾、李蘅皋、陈竹君、谭荔垣等人。

粤商自治会设议事会、董事会、干事会等机构。它的会员除第一批发起人的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外，“并无另招会员”，粤商自治会“无会籍、无会费、遇有拟办之事，动辄数千人……”。

① 《中国新报》第1年。第9号，第163—172页。

② 《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23—24页。

③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二十五年纪念刊》第50页。

会中主席，常以惠普主之，间以黄诏平、朱伯乾氏等，大抵不出路事巾九善堂，七十二行代表人物”。^①

粤商自治会成立时宣称：“本会尊旨预备立宪，先与同胞谋自治，将以研究内政外交之得失，发为议论，供朝廷采择；调查工商实业之利弊，力为整顿，以谋地方公益”。可见，粤商自治会是以君主立宪为宗旨，似与帝国宪政会及政闻社相同。它虽然在组织和会员成份结构上与其它立宪团体略有不同，但提倡君主立宪则是一致的，它受康梁影响较多，它的成员的一部分就是康有为的保皇党。因此，粤商自治会对革命派的态度较为复杂，但基本上是持敌对态度。

粤商自治会成立后，领导了一系列的反帝爱国斗争：西江扑盗权之争；二辰丸案之争；佛山轮船命案之争；澳门勘界之争等。

粤商自治会是以尊旨预备立宪为宗旨，所以，它也积极地参加了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是年3月，该会议决发函各省及海外华商，建议实行联合请愿。在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高潮中，广东立宪派也相当活跃，这与粤商自治会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粤商自治会的骨干多是一些资本家，富有财产，这使他们在各项政治活动中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在他们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受挫及通过立宪参与政权的希望落空后，便转而成了一个地方的“士绅大贾”团体，主要从事有关商业和慈善事业。

宪政预备会

宪政预备会 贵州立宪派的政治团体 成立于1909年。此前，贵州一批反对革命，坚持康、梁立宪主义的地主士绅、上层资产阶级早就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有康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在商学界占有优势。1907年，贵州教育会成立，唐出任会长；黔学会成立，任可澄出任会长；商总会成

① 《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28页。

② 《函件初编》，第10页。

立，华之鸿握有实权；而思想上倾向唐、任的于德楷任农学会会长。于是，以唐、华、任为首，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圈子。

1909年9月，贵州官立学堂学生马克明、杨文山集合同学，在贵阳组织宪政预备会，邀请唐尔镛、任可澄参加领导。唐、任以为有机可乘，便加入该会，并取得该会领导权，由任可澄任会长，陈廷棻任副会长，实权操在唐尔镛手里。参加该会者有何麟书、陈廷策、华之鸿、熊范舆、钱登熙、刘显治、牟思敬、蹇念益、陈国祥、姚华、熊铁岩、徐天叙、黄禄贞等。宪政预备会成立后，不仅控制了商学两界的领导权，还企图将势力伸展到其他方面，密议安排陈国祥为学务公所议长，熊范舆任法政学堂堂长，蹇念益拟任地方自治会会长，并拥有《黔报》、《贵州日报》为舆论工具。“盖駸駸由教育范围侵入政治范围矣”。^①宪政预备会到处扩张势力，引起了早些时候成立的在学界立足的自治学社的反对。自治学社是张百麟等人于1907年创立的团体，初期倾向改良立宪，1908年后，主张渐趋激烈，接近革命派。双方虽然共同参加了国会请愿运动，但在省内政治上，都有尖锐的斗争。

宪政筹备会

宪政筹备会是湖北地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团体。1909年5月20日，宪政筹备会正式成立于武昌。^②该会最初附属于教育会，姚晋圻任会长，汤化龙、余德元任书记，张国溶任编辑员，实际上汤、张掌握该会的领导权。汤化龙是湖北立宪派的主要领袖。张国溶对国会请愿运动非常积极。是湖北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者和联络人。1910年1月，国会请愿代表于定一、孙洪伊、罗杰等来武昌，张国溶曾联合武昌总商会及教育总会开欢迎会。^③同年5月，湖北“请愿国会同志会”成立，假宪政筹备会会所开

① 《辛亥革命》（六），第411页。

② 《时报》1909年5月20日。

③ 《时报》1910年5月28日。

会，由张国溶报告同志会简章，^①并选张国溶为干事长。此后，在张国溶领导下，湖北成为国会请愿急先锋，在第二次请愿失败后又发起第三次请愿，在颁布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上谕后，再请愿“明年即开国会”。^②当时湖北地区参加请愿的社团凡39个之多，^③虽以“国会请愿同志会”为主体，实际则以“宪政筹备会”为核心。宪政筹备会虽然成立较晚，但因汤、张二人活动积极，尤其在全国请愿活动中更为突出。所以，湖北立宪派在全国请愿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湖北同全国其他各省一样，立宪派与革命派同时并立。但湖北的宪政筹备会与革命派没有发生大论战和直接矛盾冲突，二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时有往还。这是因为宪政筹备会的首脑人物汤化龙、夏寿康、张国溶、胡瑞霖、陈登山等虽都有传统功名，但他们又都系统地接受过新学说的教育，除夏寿康在开设有新学科的两湖书院就读外，其余都是日本法政大学的留学生。这批人已成为一群具有新特点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具有资望而非绝对反对革命者”，^④对宪政运动持激进态度。这是湖北宪政筹备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吉林地方自治会

吉林地方自治会，系由著名绅士松毓等人所发起，于1907年1月6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大会经投票公举松毓为正会长，庆山、文禄为副会长；此外参议三人，并设总务、法制、文书、会计、调查、慈善等6课，每课举职员一、二名。^⑤

同时，拟定了该会试办章程共12章，后经修改，于1907年10月7日，颁布了《自治会简章》，共7章32条。^⑥自治会“以预备立宪，养成公民”及准备本省地方自治为宗旨。该会《章程》

《时报》1910年5月27日，11月16日。

③ 同上，1910年11月20日。

④ 《武昌首义》第50页。

⑤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第106—107页。

⑥ 同上，第106、118页。

规定：“本会对于本省大计关系较重者”，“得陈本省督抚或径达中央”；对地方官所办各事，该会可以上书质问，“地方官皆应答复”。^①

吉林地方自治会是以地方士绅和资产阶级上层为主而建立的资产阶级立宪团体。该会成立不久，“入会者已至700余人”。^②同年又成立了吉林商务总会。自治会成立后，在组织、领导国会请愿运动方面表现了很高的热情。

1908年夏，在自治会的组织领导下，吉林绅商各界，纷纷集会演说，征集签名，组织速开国会请愿活动。他们除派出代表参加全国的联合请愿外，又联合东三省“固有团体，公同入京”，^③组织第四次请愿高潮。1910年秋，吉林绅商各界爱国人士更形踊跃，“哀痛迫切”，奔走呼号，连续发出“泣血上言东三省危亡悬于眉睫，请即开国会”等上书，仅长寿县一次请愿签名者就达630人。^④1910年12月，东三省又派出代表十余人，来到京师，呈递请愿书要求明年即行召开国会。这些活动没有超出清廷“预备立宪”的范围，然而，即使这样温和的“合法斗争”，也遭到清廷的镇压和破坏。当自治会的影响扩大时，清政府竟发出布告，宣布自治会“不能认为有效”，并以“破坏政权”的“罪名”，将松毓奏参革职。

自1906年至辛亥革命前，在这五年“预备立宪”期间，还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小的立宪团体。有的标榜研究宪政，但更多的是以促进地方自治为宗旨。这类小团体在京、津、沪及东南沿海各省较多。其中上海的宪政研究会成立最早，1906年12月创办了《宪政杂志》，宣称它的宗旨是“考察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⑤参加者全是文化教育界人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第111、119页。

② 同上，第107页。

③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第101页。

④ 同上，第102、104、105页。

⑤ 《宪政杂志》第1卷，第1期。

士。如袁希涛、沈恩孚、黄炎培都是教育界知名人士；狄楚青、陈冷、雷奋、史量才都是报界名人，后来不少人都参加了预备立宪公会。

还有一些团体是在宪政运动中专为推动某一项宪政目标而结成的。如国会请愿同志会、国会期成会，几乎各省都有。又如谘议局研究会、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谘议局议案协赞会等。其中政闻社在东京成立的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规模和影响较大，它曾得到张謇及清廷官吏载振、胡惟德等人的赞助。1910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谘议局联合会集各省立宪派的领袖和骨干分子，为后来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政党——宪友会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北京的旗民中也出现了八旗宪政会，八旗维持宪政会、八旗公民期成会等小团体。

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海内外建立的立宪团体近80个。^①通过这些团体把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疏松地组织起来，而在国会请愿的高潮中，各地各派系的立宪派逐渐形成全国性的联合。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获得重要发展的标志，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趋于成熟的表现，它是中国近代政党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二、各省谘议局的创设与立宪党的国会请愿运动

1906年后，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强烈，统治阶级惊呼：

“长江千里，会党、革命党纷纷串结，……大敌之剋，匪伊朝夕”，^②人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同时，清政府的一部分官吏及立宪党的立宪呼声也日益高涨，清政府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作出一点宪政的姿态。1907年10月19日，颁布《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谕令“即著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90—143页。

② 王宝田：《奏陈时势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军机处档案。

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①

《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共 12 章 62 条。《章程》规定谘议局的宗旨是：“谘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自安为宗旨”。^②

关于议员资格，第二章第三条规定：“凡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 25 岁以上，有左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谘议局议员之权：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它公益事务满 3 年以上著有成效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 5000 元以上之营业或不动产者”。^③按规定的选民资格，显然是把广大妇女、工人、农民及城乡贫民和中小地主及商人等一律排斥在选举之外，只有大地主、官绅和资产阶级上层才有选举权。

《章程》规定谘议局设议长 1 人，副议长 2 人，常驻员若干人；谘议局设办事处，经理局中文牒、会计及一切庶务；办事处设置书记长 1 人，书记 4 人；议员任期为 3 年，正副议长任期亦同，但常驻员任期为 1 年。谘议局分常年会与临时会 2 种，常年会每年一次，会期为 40 日，自 9 月 1 日至 10 月 11 日止。在常年会期外，如有紧急事件，可召集临时会议，会期为 20 日。

《章程》对各省议员名额还作了具体规定，因户口无确实统计，参照科举时代的各省学额及负担漕粮数目来确定议员名额。按照这种分配办法，名额最多的是直隶为 140 名，最少的是吉林、黑龙江为 30 名。

从 1909 年 3 月起，各省陆续开始选举谘议局议员。谘议局的筹备及选举活动都在督抚监督下进行，并力排革命党的渗入。各省议员定额及实选人数各种记载不完全一致，据一般记载议员总数

^②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 684、670 页。

^③ 同上，第 671—672 页。

为1677人。^①再据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所载：确定额应为1708至1750人，实际选出人数，除新疆缓办不计外，甘肃、贵州皆以最高额计算，应为1677人。议员的成份，以乡绅为最多，从事教育及商业者次之，另外，尚有部分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或留学生等。

在当选的议员中，就其政治态度而言，大致可分三类：首先是顽固派，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清廷，力图使谘议局成为清朝的驯服工具。他们遍布各省谘议局，几乎控制某些谘议局。如山东谘议局在实有的93名议员中，就有62名顽固分子在巡抚孙宝琦操纵下进行活动，被称为“六二党”。^②其次是立宪党，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反对革命，主张立宪，与清朝既矛盾又妥协，在议员选举中极为活跃，在谘议局中占重要地位，并有一部分人取得了议长、副议长的职务，如张謇、汤寿潜、谭延闿、蒲殿俊、汤化龙等。再次“也有少数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对这些清谈机构并不抱幻想，他们打入谘议局一方面可以进行多方联络，一方面以此取得公开身份掩护革命的秘密活动。有相当一部分省份，如浙江、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山西的谘议局内部有一些革命党人当选为议员。突出的如广西谘议局议员有同盟会会员10余人，约占议员总数的1/4。连代理议长黄宠宪也是同盟会会员。^③再如贵州谘议局基本上是由倾向革命的自治学社所掌握，该社社员当选为议员的竟占议员总数的半数以上。^④

上述事实说明，虽然旧式官绅在谘议局里占有一定比例，有的省甚至占大多数，但掌握谘议局的领导权，在会内能左右局势的，一般都是立宪党人。因此，谘议局已多少具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地方议会的雏形。由于谘议局内包含顽固派、立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3页。

② 《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1册，第2—6页。

③ 《辛亥革命在广西》上册，第43—62页。

④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66页。

宪党和革命党三种政治力量，他们在各省谘议局中各有着不同的比重和影响，这就预示着在谘议局这个政治舞台上，必然要展开尖锐而复杂的斗争。

各省谘议局的情况大致略同，如：

(1) 江苏谘议局：1909年10月14日开会 张謇以54票当选议长，蒋炳章、仇继恒为副议长，选举马良、孟昭常、雷奋、黄炎培等123人为议员。会议开了56天，共收到议案184件，议员提案98件。议决案169件，其中议员提案72件，将近2/3，如：

《联合各省请愿议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案》及《预计地方自治经费厘定地方税限请由资政院议决案》等。江苏谘议局是公认办得较好的一个，议员中立宪党的阵营亦较为整齐，在谘议局的活动表现了较大的主动性。

(2) 浙江谘议局：1909年10月14日开会，到会议员112人。浙江巡抚增韫及所属各官厅官吏亦到会，并由增韫致开会辞。会议选举陈黻宸为议长，陈时夏、沈钧儒为副议长，不久，改举汤寿潜为议长。又举夏日培、叶浩书、王序宾、刘光跃、褚辅成等36人为常驻议员。②局下设资格、财政、法律、庶政、建议五个股，各股由审查员若干人组成。③11月23日，选出沈钧儒、褚辅成、陈敬第等14人为资政院议员。④年会按章开会40日，议决案27件 通过了《农田水利会规则》、《统筹全省师范教育议案》、《推广全省蚕桑议案》等等，届时即行闭会。

(3) 湖南谘议局：1908年12月，湖南巡抚岑春萱设谘议局筹办处于长沙，负责筹备谘议局的一切事务。1909年10月8日，举行预备会议，选出谭延闿为议长，冯锡仁、曾熙为副议长。10月14日，谘议局第一届常会，正式在长沙府学宫明伦堂开幕。会议先后选举了常驻议员及审议长、资政院议员等。

①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164—167页。

②③④ 同上，第167—169页，169—170页，173页。

嗣因各议案多未议行，又展限10日，至12月2日才闭幕。会议讨论了有关全省铁路、文化、教育、政治、实业以至外交诸问题的议案共59件，其中由抚部院提出的20件，由各议员提出的39件，并均作了相应的决议。^①湖南立宪党提出大量议案，慷慨陈词，十分活跃。他们公然宣称：“本局既为立法机关”，^②其议员不应“官可亦可，官否亦否，权不能争，害则共受”。^③他们力图使谘议局发挥地方议会作用。

（4）湖北谘议局：湖北谘议局的筹备工作始于1907年。10月19日，湖广总督赵尔巽遵旨设立了“湖北谘议局筹办所”，负责谘议局的筹办工作。1909年6月2日，湖北各府、厅、州、县逐级举行谘议局初选，选出“选举人”。7月31日举行复选，举出张国溶、胡瑞霖等83人为正式议员。10月3日，当选议员齐集武昌，20日，举行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吴庆焄为议长，汤化龙、夏寿康为副议长（不久，吴辞职、汤继为议长，议员张国溶增为副议长）；刘赓藻、吕逵先等17人当选为常驻议员，刘耕余等为候补常驻议员。

1909年10月14日，在武昌举行湖北谘议局开局典礼。到会议员71人。湖北地方文武官员陈夔龙、李岷琛、高凌慰、杨文鼎、马吉樟、张彪等作为“特级代表”出席会议，宣布湖北谘议局正式成立。

10月14日至12月2日，湖北谘议局举行第一次常年会议，选举张国溶为首的10人法律委员会，金式度为首的10人预算委员会、董钦墀为首的10人税法及公债委员会、胡柏年为首的6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但祖荫为首的6人惩罚委员会。最后，举行资政院议员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胡柏年等15人为资政院议员。会议之决议案70余件，议案的主要内容有“兴办教育”、“整

《湖南省志》，修订本，第1卷，第252—254页。

② 《湖南谘议局议事录》。

③ 罗杰：《复选演说》，《长沙日报》1909年8月第1512—1513号。

顿吏治”、“发展实业”诸项。议案虽多，可是，“督抚颁布施行者尤少”，议员煞费苦心，到头来却成了一纸空文。但它表现了立宪党人对资产阶级宪政的真诚。

(5) 四川谘议局：赵尔巽继任川督后，奉命即行组织宪政筹备处，拨筹备费 15400 余两，并委任在籍士绅马良卿、李念祖督工监修会址。按照选举资格要求，四川虽是拥有几千万人口的省份，经过初选选出“选举人”只有 191500 人，再由这些“选举人”复选出蒲殿俊、肖湘、罗纶、姚弼宪、白术铭、李有年、刘志成、郑家相、江潘、高凌霄等 127 人为谘议局议员。定额 106—108 名，多者为递补出缺的人。在 127 人中，有进士 2 人，举人 31 人，秀才、廪生 55 人，还有道员 1 人，拥有各种官衔者 25 人，著名富翁、典商 9 人，同盟会会员 4 人。

1909 年 10 月 14 日，各属议员咸集成都开成立大会。除议员到会者 104 人外，总督赵尔巽及所属官吏王人文、赵启霖、江毓昌、周善培、尹良、于宗潼、史久龙等亦到会。蒲殿俊当选为议长，肖湘、罗纶当选为副议长。

谘议局之组织分设编制、文牒、庶务、会计四科，各科设书记，又设议员办公室、书记办事处及全部委员会，各部举部长 1 人，理事 1 人。又置甲、乙、丙、丁四科委员，甲科 17 人，主查督部堂提议谘询并资政院咨询事件；乙科 17 人，主查议员提议事件；丙科 13 人，主查本省自治争议及本省自治及人民陈请建议事件；丁科 15 人，主查议员惩戒事件。嗣因特别需要，复由全部委员公推 13 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查提定要案。11 月 28 日—29 日，分别选出资政院议员及谘议局常驻议员。

会议期间，由都部堂提交议案 5 件，议员提交议案 37 件，决议案 19 件。所有议案均经议员反复讨论，内容详实完备，但议者多而施行少，议员们只能以“尽心竭力”而自慰罢了。②

《报告书之一、改良安陆航捐日章以抒商困案》。

② 《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 2—141 页

谘议局的出现使资产阶级立宪党人取得了一个合法的议事机关。它既反对革命，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它作为象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因此，它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而它的反动作用是主要的。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这个历史的弄潮儿，便被革命的怒涛而吞没了。

资政院是全国性舆论机构，正式开院于1910年10月3日，其筹备则始于1906年。11月7日，总核官制大臣奕劻等编成《资政院官制草案》52条，主张资政院以政务处改设，设总裁1人，副总裁2人，议员130人，以钦选、会推及保荐之法确定：（一）王公世爵勋裔已满30岁者钦选10人；（二）京员已满30岁者54人；（三）各省官绅士商已满30岁者，由督抚保荐66人。应议事件有：（一）奉旨饬议事项；（二）新定法律事项；（三）岁出入之预算事项；（四）税法及公债事项；（五）人民陈请事项。此为最初创议，未成定案，是为资政院轍始时代。1907年9月20日，清廷下令设资政院，派溥伦、孙家鼐为该院总裁，复令溥伦等会同军机详拟院章。^①1908年7月8日，资政院奏颁院章《总纲》和《选举》两章15条。^②随后陆续制定了《职掌》、《资政院与行政衙门之关系》、《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之关系》、《资政院与人民之关系》、《会议》、《纪律》、《秘书厅官制》、《经费》8章，合前订《总纲》、《议员》共10章65条及附则2条，并于10月14日颁布施行。^③改订后的院章对《议员》一章作了较大修改，原订钦选议员125人，民选议员167人。修订后的院章规定钦选和民选议员各100人，但资政院正、副总裁不由议员中选举产生，而由朝廷特旨简充，由此便造成钦选议员占主导的局面。其次，原订章程规定王公世爵、宗室觉罗不逾15人，改订章

①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6页。

② 同上，第627—629页。

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27—637页。

程增为 48 人，各部衙门官减为 32 人。^①

院章总纲第一条规定：“资政院钦遵谕旨，以取决公论，预备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②所谓“宗旨”说得明白就是：朝廷欲仿行立宪，而立宪的根本在于置上下议院，但目前中国尚不具备成立议院的条件，暂设资政院作为实行议院的预备机关。

资政院议员任期三年，任满一律改选。资政院设总裁 2 人，总理全院事务，由王公大臣简任；副总裁二人，佐理全院事务，由三品以上大员简任。资政院下设秘书厅，掌管全院文牒、会计、记载议事录及一切庶务；置秘书长一人，监督本厅一切事宜。秘书厅分四科：（一）机要科；（二）议事科；（三）速记科；（四）庶务科。各科设秘书官，承秘书长之命，执掌本科事务，并设书记及速记员若干人。^③

资政院章程颁布后，成立资政院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选举议员。选举方法，依据院章规定分钦选与民选两种。钦定议员大体自“官”而出，其选举方法由宗人府、吏部及民政部分别查明合格人选，造具名册，咨送资政院，经各该员互选后，由资政院将得票较多者，按照定额，多开数员，奏请钦选。^④硕学通儒议员，由各省提学使初选若干人，再由初选人互选若干人，进呈钦选。纳税多额议员类如此。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若干人，呈请地方督抚，再由督抚遴选若干人，送资政院。1910 年 10 月 3 日，资政院举行开院仪式，议员届时到会者 154 人，由总裁溥伦、副总裁沈家本主持开会，遂将议员分为 6 股，第一股股长赵炳麟，理事沈林一，议员 33 人；第二股股长许鼎霖、理事孟昭常，议员 33 人；第三股股长劳乃宣，理事顾栋臣，议员 32 人；第四股股长载功，理事陈宝琛，议员 33 人；第五股股长魁斌、理事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 631 页。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 628 页。

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 636 页。

④ 《清史稿》《选举志》（八）。

雷奋，议员 32 人；第六股股长陶葆廉、理事汪荣宝、议员 32 人。^①次日继续会议，选举专算任股员，计有预算股，股长刘泽熙，副许鼎霖，股员 24 人；决予股，股员 24 人；税债股，股长李渠，副闵荷生，股员 12 人；法典股，股长载润，副汪荣宝，股员 18 人；陈请股，股长赵炳霖，副陈宝琛，股员 12 人；惩戒股，股长魁斌，副讷勒赫，股员 6 人。每股设若干科，科置审查长。至此，资政院的组织逐次健全。

资政院的成立，虽属不伦不类，但作为代表全国舆论机关的存在，也使封建专制统治受到一定程度的钳制。资政院内虽然钦选议员与民选议员各半，但其活动能力则相差悬殊。钦选议员中，除少数较年轻的官吏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和活动能力外，其余多数或者是昏庸老朽的贵族，或者是只能保守奉禄的官僚，这些人既无知识又无主张，只能随声附和而已。另有少数顽固分子，虽有一定主张，但势孤力单，并无所作为。而在民选议员中，他们都是来自各省谘议局中的佼佼者，多学习过法政，富有宪政知识，并能言善辩，在宪政活动中显露了才华。如雷奋、孟昭常、刘春霖、于邦华、易宗夔、罗杰、邵羲、汪龙光、吴赐龄等，都是著名的立宪党的骨干分子。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民选议员几乎完全控制了资政院这块舆论阵地，这一点确实出乎清廷的意料之外。

国会请愿运动是由立宪党人、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首先发起的。1907 年 9 月，他与沈钧儒等联衔上书清政府，请求速开国会。接着，雷光宇以全湘士民的名义上书，力陈速开国会的必要。此后，朝野官绅、立宪党人无不大谈国会问题。到 1908 年，湖南、江苏、河南、直隶、安徽、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的立宪党代表先后赶赴北京上书请愿，有的要求二、三年内召集

^①《国风报》第 1 年，第 23 号、第 108—110 页。

^②《时报》1910 年 10 月 12 日，二版，《北京专电》。

国会，有的甚至提出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以及驻外使节也上书或电奏请速开国会。一时间，要求速开国会成为全国舆论的中心。

清政府对立宪党的国会请愿运动十分害怕，极为恼火。于是，它借口政闻社“纠集党类”、“图谋不轨”，于1908年7月15日，下令将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拿问，并下令查禁政闻社，给国会请愿运动以沉重的打击。政闻社自行解散，其他各省代表也被迫相继回省。在镇压国会请愿运动的同时，清廷又宣布自本年起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并于9月20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32条，其中维护君上大权的有14条，另有9条多为有关人民“义务”的规定，而毫无人民权利的实际内容。溥仪继位之后，摄政载沣积极推行皇族集权政策，立宪党不仅没有得到实惠，并且产生了对清廷假立宪的不满。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正式成立后，立宪党的许多代表人特被选为议员，这就给立宪党人利用谘议局的合法地位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沉寂了一年多之后，再度发起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这次是由江苏谘议局首先倡议发起的。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与江苏巡抚瑞澂协商：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谘议局，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分别请朝廷速开国会和速设责任内阁。张謇一方面派孟昭常等分赴各省谘议局联络，邀请他们派代表共商请愿事宜。同时，张謇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呼吁各省组织起来，联合请愿。12月，湖南、湖北、江西、奉天、吉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苏16省共50多名代表齐集上海跑马厅立宪公会事务所。从12月18日至25日，先后进行六次“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经过充分协商，推举孙洪伊、方还、周树标、罗杰、陈登山、彭运斌、郑际平、刘崇佑、闵荷生、沈康文、吴赐龄、刘兴甲、李芳、潘祖先、渠本尧等31人为代表，组成赴京请愿代表团，由孙洪伊为领衔代表。这

些代表多为立宪党的骨干分子，出发前情绪十分热烈。他们表示：“不请则已，请必要其成，……不得请，当负斧钺死阙下”。^②湖南善化人徐特立则以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赠行。但是，号称立宪党稳健派首领的张謇，在代表团北上的饯行会上，则嘱咐代表团要“秩然有礼，输诚而请”，^③它反映了张謇一贯的保守立场，同时也束缚了请愿团的手脚。

1910年1月初，代表团到达北京，16日向都察院递交了请愿书，主要强调内忧外患严重，要求朝廷在“期一年之内，召集国会”。^④但是，统治阶级内部极为混乱，那些老于事故的大臣只知“明哲保身”，或沉默不语、或不明确表态、或不敢力争。1月30日，清廷发布旨意，借口“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⑤拒绝提前召开国会。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遂告失败。

这次请愿的失败，立宪党人并未气馁，他们抱定“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奋起继续请愿。

为了集结力量，加强请愿的后援，孙洪伊等依早在上海会议期间的成议，决定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设总会于北京，各省设分会。该会《简章》明确提出以“请求政府即开国会为目的”，并宣称，“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⑥同时，北京还成立了“国会期成会”，声援请愿运动。黎宗岳等还创办了报馆，加强请愿运动的鼓吹。立宪党人还派人到各省及海外进行联络，扩大请愿的规模。随着各省请愿同志分会和国会期成分会的成立，掀起了第二次请愿运动高潮。4—5月间，各省纷纷召开大会，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同时，发起请愿签名运动。5月间，各省请愿代表150余人相继到京，假昆新会馆开会，通过请

^②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九子录、文录》卷10

^{③④} 《清末筹第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41页。

^⑤ 《请愿即开国会简章》，《时报》1910年2月23日。

愿书。6月16日，清愿代表80余人前往都察院以不同团体的名义分别向都察院、摄政王载沣及王公大臣等共上10份请愿书。其中孙洪伊等人的上书在指斥政府“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①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弭乱救亡之策非开会果有他术乎？”^②但载沣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于6月27日发布谕旨，以“财政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为由严词拒绝，并责令以后“毋再行渎请”。^③这样，第二次国会请愿又遭到失败。

这次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显示了资产阶级立宪党力量的壮大。这次请愿运动无论就参加人数、组织方式和活动规模等，都较以前有较大的进步。立宪党破除了地区界限，打破了各派系的门户之见，在共同利益和目标相同的条件下，采取了联合行动。在舆论上进一步揭露了清朝假立宪的阴谋，使清朝统治者感到十分狼狈而难于招架。

三、立宪党政治的尝试

依据《咨议局章程》，咨议局“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其权限除对本省预算、决算、税法及公债事件享有议决权外，对于地方督抚则为咨议机关。督抚对于咨议局有裁夺议案、停会及解散之权。这个规定本身一方面赋予咨议局对地方政权有一定的监督和牵制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赋予地方督抚以极大的否决权。当时民权思想已经相当普及，立宪党议员按照本阶级的愿望把咨议局当成分享地方政权的阶梯，视咨议局为“立法”、“监督”机关；地方督抚以顽固派的立场出发，对于在官署衙门之外，另设“咨议局立于一省行唯一监督之地”则表示不能容忍。双方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发生矛盾是必然的。

地方督抚对于咨议局的议决案，多半持敷衍态度。议案呈报

^② 《时报》1910年6月30日，7月21日。

^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下册 第645页。

告，往往拖延时日不予公布施行。有的督抚甚至对本省的重大事项根本不交谘议局复议，越权把持。谘议局与督抚争权之事时有发生，江苏、广东、四川等省尤为激烈。以四川为例。谘议局第一次会议，原议定议员要赴各局所学堂及工厂参观调查，结果竟被官府所拒绝。并说：“宪政编查馆前有电咨，各省谘议局调查事件，只可函请抄交答复，勿庸派员迳往”。提学使刘家琛通令省城各学堂不许接待议员。议员们气愤的说：“普通人和外国人尚可参观，乃不许议员参观，非别有用心，安能出此？”

谘议局第二次会议时，总督赵尔巽交议宣统三年地方预算案，仅列省地方行政岁出，而无地方岁入，议员当场提出质询。赵尔巽答复说：度支部未划分地方税和国家税，故地方税无法确定范围，拒绝议员议及岁入。议员认为按谘议局章程有议决本省岁出入预算之权，既无议决岁入，则议决权仅占其半。于是，通电各省询问办法，并电资政院请求办法解决，后得部、院电准行，乃开临时会议，审查预算。

谘议局成立之后，曾纠劾过一些贪官污吏，如巡警道周肇祥违法贪污案、崇庆州牧张溥酷虐玩法案、安岳县令王志昂勒派非刑案等。周肇祥是赵尔巽的亲信，自任巡警道以来，寻隙苛罚，滥用权力，对偶有触犯者，以修理街道为名，罚石板数百块不等。又派侦骑四出，借名“拿赌”，夜晚无故闯入民室，危害无辜，广大居民住户惴惴不安。谘议局列举事实请赵尔巽从严查办，使赵极为不快。再如张溥、王志昂等也是勒派浮收、非刑毙命、包税敛财的恶棍，经谘议局纠举，赵尔巽虽都是重罪轻罚，但毕竟惩办了几个类似的贪官酷吏。^①江苏谘议局在第一次常会期间，江督张人骏对其议决案极为不满，在札复谘议局所议11案中，有两件交令复议，有5件予以驳回，专门与谘议局作对。当时《时报》曾发专文评论张人骏“以排斥谘议局为保持禄位之第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53—155页。

一妙诀”，骂他们是“路肉食者鄙”^①。浙江谘议局因浙路公司经理奉旨革职，不准干预事起而反对。谘议局认为公司经理，系由股东公举，载在商律。于是，谘议局以停会待旨提出抗议，并请浙抚代奏，请求收回成命。浙抚允先开会后代奏，谘议局坚持先代奏，后开议。后浙抚允代奏，遂复会开议。江西以加收统税，而不要谘议局议决，系纯属侵夺谘议局权限，提出抗议。最后，呈请资政院核办了事。湖南谘议局开会期间，湖南抚院交议房捐一案，规定抽收房铺捐充作警费。在讨论此案时，多数议员以“官吏未能切实改良，恐民人未便负担”，“骤增人民负担，必多窒碍难行”^②为由，予以否决。广东谘议局亦因行使职权问题，与督抚发生冲突，并致函署两广总督袁树勋说：“立宪政体官民同负责任，必人人有政治上之常识，乃能享受立宪之福利。谘议局者立宪之基础也，建言之权在议员，行政之权在官吏”。^③这代表了立宪党议员对谘议局与地方督抚权限的基本看法。

谘议局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和斗争，本质上反映了立宪党与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在斗争中，立宪党常常表现出某种妥协，但它所作的努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它对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多少起了些牵制的作用。这种民意机关在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事，给古老的中国多少带来了一点民主的新风气。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开院举行第一届常会。在谘议局会议期内，有湖南谘议局纠举巡抚杨文鼎不经谘议局议决而在本省发行公债，侵夺谘议局的正当权力，要求资政院核办。经资政院审核，认为依据谘议局章程所规定，议决本省公债事宜，纯系谘议局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杨文鼎不经谘议局议决而擅自发行公债，是违背法律侵夺谘议局正当权力的严重事件。于是，决议据

《时报》1909年12月7日。

② 《湖南谘议局议事录》，1909年9月14日

③ 《时报》1909年12月7日。

实上奏。但清政府对这个重大案件作了极不严肃的处理，说杨文鼎未交谘议局议决，“系属疏漏”，不承认是违法侵权事件，仅以“疏漏”二字不了了之。而且还说，公债已经度支部核准，“仍照旧办理”。^①这样，杨文鼎违法侵权既不予以处分，也不令杨文鼎将公债案补交谘议局议决，这是对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极大蔑视。立宪党议员对此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应当追究副署谕旨的军机大臣的责任。于是，纷纷提议要军机大臣，特别是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到资政院接受质问。奕劻等竟公然拒绝到院。在这种情况下，资政院议决以咨文的形式质问军机大臣，质问他们对内政外交是否负完全责任？军机大臣复文称：“此种问题，须俟内阁成立，方可解决”，现在无从答复。此后，又发生了许多类似事件，更使立宪党议员十分愤慨。

云贵总督不经谘议局议决，实行盐斤加价；广西巡抚不经谘议局同意，反对高等巡警学堂限制外籍学生。为此，云南、广西两省谘议局分别呈文资政院核办。资政院完全赞成两省谘议局的立场，遂经院议将两案据实上奏。结果，朝廷竟下令将两案分别交盐政处和民政部议奏。这一方面否定了资政院对两案的议决权，另一方面，俨然把盐政处、民政部视为资政院的上级机关。立宪党议员认为这是一种蔑视，感到不能容忍。在对拟旨的军机大臣们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之后，决定上折弹劾。这时，奕劻等人迫于舆论的压力，便假借上谕的形式，表示对云南、广西两案准如资政院所请，企图蒙混过关。但是，多数议员认为，两次上谕出尔反尔，互相矛盾，完全是由拟旨的军机大臣不负责任所造成的；而且数年来内政外交危机日益严重，也都是由军机大臣不负责任造成的。“军机大臣不负责任，就不可不弹劾”，^②“若不弹劾军机大臣，就是资政院不负责任”。^③当时，钦选议员陆宗輿

《辛亥革命》（四），第70页。

② 《国风报》第1年，第32号。

③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1号。

发言说：军机大臣是乾隆以来旧制相沿袭下来的，非责任内阁可比。所以，不应以国会对内阁的关系来比拟资政院与军机大臣的关系。他主张“还是不要轻用这个弹劾权的为好”。陆的发言遭到立宪党议员强烈反驳。最后，仍决定上折弹劾军机大臣。劾折于12月18日奏上。劾折首先批评军机大臣在资政院开院后始终不到院宣布行政方针。而当质问其对内外行政是否负完全责任时，竟回称：“无从答复”。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强烈谴责这些大臣“受禄则唯恐其或后，受责则唯恐其独先”，只知“持禄保位，背公营私”；“徒有参予政务之名，毫无辅弼行政之实”。劾折还要求朝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必应承担责任之处宣示天下”。^②还提出要尽速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资政院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如此严厉地纠弹朝廷所信任的大臣，在清朝当局看来，未免过于放肆，于是，当即明降谕旨训斥资政院，宣称：“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是朝廷大权，……军机大臣负责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予，所请著无庸议”。^③这个上谕的词气表面看来似乎十分严厉，但却暴露了清廷的轻薄和不顾体面的丑恶嘴脸。由于资政院顽强持续的斗争，迫使军机大臣全体提出辞职，载沣温语慰留。这样更激起了立宪党议员的愤慨。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立宪党强烈地谴责军机大臣，“平日将君主大权四字附会欺哄皇上，遇事便抬出君主大权，使旁人一句话也不能说”。^④如此下去，只能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积极的专制，甚么资政院、甚么国会、甚么立宪，都可以不要”；另一个结果就是逼得“人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拿出他的暴动的手段出来”。^⑤立宪党议员已经看出了清廷假立宪的阴谋，也感觉到了革命危机日益严重。他们

③ 《宣统政记》第28卷。

《国风报》第1年，第32号。

③ 《宣统政记》第28卷。

④⑤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7号。

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了不懈的抗争，表现了立宪党的势力有了进一步发展，政治上不断趋于成熟。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立宪党先天的软弱性，始终没有冲破“合法”斗争的羁绊。

此后，关于宣统三年预算案、新刑律的颁布，以及资政院召开临时会议等问题上，资政院与朝廷都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虽遭到清廷的阻挠和破坏，但清廷及顽固势力仍感不安，于1911年7月3日公布了资政院修改院章。修改后的院章对原章中资政院的权力大加削夺，使资政院形同虚设。所以，梁启超说：“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①

资政院的存在，是清末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产物。资产阶级立宪党利用资政院合法的讲坛，批评朝政，弹劾疆吏枢臣，甚至与最高统治者分庭抗礼，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使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尊严发生了动摇。在斗争中，资产阶级立宪党人得到了锻炼、获得了经验，为此后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打下了基础。

1910年上半年，立宪党曾发动了两次国会请愿运动，均遭清政府的无理拒绝。但是，立宪党人并没有被清廷的恫吓所吓倒，在发布“毋再渎请”上谕的第二天，各省即发电致北京，要求代表团坚决请愿到底。代表团领衔代表孙洪伊当即复电说：“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②。表明了立宪党请愿到底的决心。原来驻京请愿代表团的成员只限于谘议局议员。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代表团又吸收了各省各团体的代表参加，扩大了代表团的规模。同时，选举孙洪伊、方还、吴赐龄、邓孝可等10人为干事员；推雷奋、孟昭常、徐佛苏、汪龙光等为编辑员；另由各省代表中推一人为评议员。因当时成立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已报民政部立案，是做为请愿运动的合法机构，代表团的职员又兼做国会请愿同志会的职员。

《国风报》第1年，第35号。

② 《帝京新闻》1910年7月2日。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比历次都显得更加活跃。7月12日，湖北咨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及绅商学界各团体数百人集会，提出“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四川、山东、陕西等省也相继派出第三次请愿代表入京进行活动。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北京请愿团，予以声援，并派代表回国参加请愿活动。另外，做为请愿代表团强大后盾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于8月9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各省咨议局的正副议长也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如直隶议长阎凤阁，副议长王振尧；浙江省副议长沈钧儒；福建省副议长王崇佑；四川议长蒲殿俊；湖北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奉天副议长张百斛；黑龙江省副议长战殿臣等。参加会议的还有江苏的孟昭常、雷奋、杨廷栋、方还；江西的汪龙光；广西的吴赐龄；湖南的罗杰；山东的周树标等。这些人都是各省咨议局中有影响的立宪党的骨干分子。会议选举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推举孙洪伊、杨廷栋、雷奋、刘崇佑、周树标、汪龙光、孟森、吴赐龄、王法勤为审查员。会议着重讨论了各省咨议局联合请求速开国会案。

10月3日，资政院正式开院，立宪党决定借资政院开会之机发动第三次请愿高潮。10月7日，请愿团代表孙洪伊等6人及从天津赶来的直隶代表李长生、温世林等17人，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因载沣外出，孙洪伊等决定留下6人等候以便面交请愿书。后王府警卫电告民政部尚书善耆，善耆带领随员亲到现场劝慰，并表示他本人保证将代表的请愿书当日代呈。10月9日，请愿代表团前往资政院递交请愿书，并四处活动走访王公大臣，希望得到他们支持。这次请愿活动带有很大的群众性，各省绅商学界纷纷召开群众请愿大会，甚至举行游行，要求地方督抚代递请愿书。如河南开封绅商各界举行请愿大会，并提出“此行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咨议局亦不许开会”。各省咨议局的立宪党人更形活跃，纷纷致电北京请愿代

① 《国民公报》1910年10月21日。

表团，其中如湖南、四川等省都表示了激进的态度。他们主张如果政府“始终坚持不开主义，资政院民选议员宣布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可同时解散，以揭开立宪之假面具”。^①表现了地方谘议局及绅商学界的高昂的情绪。

在这次请愿运动中，资政院的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开院之初，会议讨论的议案全是政府提出的议案，而对孙洪伊的请愿书及谘议局联合请速开国会的提案，则一直不予讨论。对此，立宪党议员极为不满。10月17日，正当讨论理蕃部交议的提案时，湖南议员易宗夔突然起立发言说：资政院开院已半月余，但所讨论的问题全是枝叶问题，而“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速开国会”。^②他要求议长改变议事日程，立即讨论速开国会问题。他的发言得到议员们的赞同。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副议长沈家本不顾议员的请求，进行阻挠。结果，直到10月22日，才把请速开国会案同另外3项作为本日议程的最后一项。当开始讨论请速开国会案时，立宪党议员争先恐后，慷慨陈词。湖南议员立宪党人罗杰发言说：“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控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他要求：本院议员应全体赞成通过速开国会案；议长应从速上奏；摄政王应即允速开国会。^③当表决此案时，沈家本主张用投票法，而立宪党议员主张用起立法，双方争持不下。这时广西议员吴赐岭起立发言，揭露沈家本袒护反对派的立场，弄得沈家本十分难堪，只好同意起立表决。当通过该案时，全体议员一致起立，表示赞同，并高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了请速开国会的奏稿。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把奏稿连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提案、孙洪伊等所上请愿书、汤觉顿代表海外华侨所上请愿书，一并上奏朝廷。

《国民公报》1910年10月17日。

②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7号。

③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7号。

立宪党通过资政院上书请愿的活动，得到了地方督抚的支持。这些地方实力派迫于形势的压力和从维护自身利益起见，便打出了迎合立宪派的旗帜。10月25日，19名督抚将军联衔入奏，提出“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①的要求。这一举动给最高统治者造成了极大压力，使他们不能等闲视之了。

以载沣为首的满族贵族，一方面对于自己将要失去最高统治权而忧心忡忡，一方面又不能无视立宪党及督抚们的动向。于是，经过再三筹划，作出了先设内阁，和提前三年召开国会的决定，以此作缓兵之计。

11月3日，载沣召开王公大臣会议，第二天发布谕旨，决定：“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予即组织内阁”。同时，又宣布：“此次缩定期限……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籍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②接着，又发一道谕旨，要求“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剴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③这一谕旨表明清廷对国会请愿十分恼火，并将不惜采取镇压手段对付请愿运动。

初步联合起来的立宪党人，在谕旨颁布后即开始动摇、分化了。首先是江、浙立宪党首领张謇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资政院，表示拥护朝廷谕旨。这一妥协行为动摇了全国联合请愿的决心，国会请愿代表团遂遵旨解散。至此，全国性的请愿运动陷于瓦解。这次请愿运动虽未能实现即开国会的预期目的，但它的规模 and 影响都超过前此所有的请愿运动，并迫使清廷作出缩期召开国会的决定。因此，立宪党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是起了作用的。

《国风报》第1年，第26号。

②③ 《宣统政纪》第28卷。

四、“皇族内阁”的建立与立宪党的分化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由于张謇等人的叛卖而自行瓦解。但是，大多数的立宪党人对清廷的谕旨表示不满。直隶、奉天、吉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黑龙江等省的立宪党人仍然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主张。他们有的致电资政院、请愿团或请愿同志会，有的组织群众大会，少者数千人，多者上万人，继续进行请愿活动。特别是地处东北的奉天省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运动。奉天省受日俄侵略最早，民族灾难最深，因此，救亡图存尤为迫切。而上书请愿速开国会的唯一理由就是救亡图存。当第三次请愿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时，奉天省的立宪党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尤为激切，誓欲拼死力争。奉天谘议局连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请求协力进行第四次请愿。12月6日，谘议局的立宪党人组织省城八团体及46州县的代表，集众万余人，“手执请开国会旗帜”，列队“伏泣于公署之前”请愿。请愿者齐声痛哭，情绪异常悲愤，锡良不得不答应代奏。12月7日，锡良代奏《奉省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折》，其中引述请愿书内容说：“大意则以东省大势……已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其情词迫切，出于至诚。万余人伏地悲泣，至有搏颡流血、声嘶为竭不能自己者”。要求朝廷“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清廷一方面申斥锡良“不应再奏”，一方面又慰留他“力任其难，毋许籍词诱卸”。^①

12月11日，奉天第四次请愿代表团启程赴京。出发前各界群众集会送行，许多人写血书激励请愿代表。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纷纷下乡，深入民间宣传请愿运动。

奉天发动的第四次请愿运动得到了天津学界的热烈响应。他们分电各省谘议局、商会、教育会、倡议学生罢课请愿，并联合

^①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第648—649页。

天津各界举行大会，上请愿书要求督抚代奏。直督陈夔龙得旨要他“剴切晓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同时，密电各省严加防范。天津学界不顾朝廷禁令，继续进行请愿活动。12月23日，清廷再次谕令陈夔龙“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查拿严办”。^①清廷三令五申，仍无效果，一方面感到十分恐惧，同时又非常恼火。24日，奉天请愿代表正前往徐世昌官邸的途中，途中被军警阻止，并当面宣布了清廷刚刚发下的谕旨，令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解回籍，立即出京。请愿代表坐地不动，不饮不食，坚持到第二天早晨。最后，军警强行将代表押上车，解送回籍。东三省代表被强行押解出京后，1911年11月2日，清廷又颁布了镇压学生的谕令，其中指斥学生“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等罪名，要求各省督抚“再行剴切晓谕，随时弹压，……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②接着，陈夔龙又进一步镇压请愿运动的组织者，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是历次请愿的骨干分子，因此，受到陈夔龙等官僚的极端仇视。1月2日谕旨发布后不数日，将温世霖逮捕，以所谓“结会敛钱”、“妄图煽动”等罪名，上奏朝廷将温世霖发配新疆。当时的《时报》指出：这是“揭出假立宪面具之一铁证”。^③至此，国会请愿运动被清廷完全镇压下去。

国会请愿运动是资产阶级立宪党人独立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显示了资产阶级立宪党一定程度的政治能动性。

国会请愿运动表现了资产阶级立宪党强烈的爱国精神，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打击了清廷的封建统治。同时，国会请愿运动也是立宪党用来抵制革命的手段，因此，它又阻碍了革命的进程。

① 《宣统政纪》第29卷。

② 《时报》1911年1月8日。

③ 《时报》1911年1月8日。

④ 《时报》1911年1月12日。

在将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清廷继续玩弄“预备立宪”的丑剧，以履行缩期立宪的诺言。按照修订的筹备事宜，应于宣统三年颁布内阁官制，设置内阁。1911年5月8日清廷下诏颁布《内阁官制并办事暂行章程》，同时，任命了以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为协理大臣的内阁。

内阁13人中（汉族4人，满族9人）皇族7人，因而被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建立，完全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集权的丑恶嘴脸。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于是，一个要求撤销“皇族内阁”的请愿运动迅速兴起。

鉴于清廷倒行逆施，立宪党人相约提前进京举行第二次全国谘议局联合会商讨“倒阁”对策。由于时局紧迫，到京代表多为各省谘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先后到京的14省代表计有：直隶阎凤阁、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奉天袁金铠、吉林庆康、四川肖湘、河南方贞、陕西李良材、山西梁善济、安徽窦以钰、广西甘德蕃、福建刘崇佑、江西谢远涵、江苏雷奋等35人，①“可谓极一时之盛况”。②6月4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一折，请求代奏。其中强调指出：“立宪国家，重内阁之组织，尤重总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公例，在不令组织内阁之总理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此非薄待皇族，谓其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实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势不得不然也。……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于君主无亲族之关系，倒一内阁，不过倒一某总理内阁，君主毫不受其影响。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为密隶于君主之皇族，倒一内阁，即为倒一皇族内阁。皇族内阁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严。君主神圣，必有不能永保之虑……”③立宪党援

①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58—565页。

② 《时报》1911年5月15日、21日。

③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47页。

④ 《东方杂志》第8年，第5号，《中国大事记》第7—8页。

引立宪国家公例，力陈皇族亲贵不应组阁的理由，但清廷为防范“权臣窃柄”、“鼎祚潜移”，拒不接受，未予答复。

7月4日，谘议局联合会上《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请另组责任内阁呈》，请都察院代奏。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世界各国苟号称立宪，即无一不求此与原则相吻合”^①。立宪党奋起“倒阁”不遗余力，但终不能扭转乾坤。

7月5日，清廷立即发布《各省谘议局议员请另组内阁议近器张当遵宪法大纲不得干请谕》，对立宪党大加呵斥：“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进器张。若不亟宜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懍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②至此，“倒阁”运动失败，清廷“预备立宪”的欺骗性彻底暴露。一贯思想保守的张謇也不得不承认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③

第三次请愿运动失败和最后一试的“倒阁”请愿碰壁，使立宪派对清廷的幻想完全破灭了。由于对清廷的绝望和受革命影响，立宪党开始分化。

早在第三次国会请愿失败后，立宪党中的许多人开始改变拥护清廷的态度。“当勒令请愿代表出都之日，曾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汤化龙、蒲殿俊等同为请愿代表参与密议之人”^④。立宪党同清廷已处于决裂的边缘，而其中少数人开始倾向革命或变成了革命者。上海总商会负责人沈缙云在第三次国会请愿时“进京往谒庆亲王奕劻，请从速召开国会”为奕劻所

①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第577页。

②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9页。

③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

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香港1952版，第16页。

拒绝，沈“退而叹曰：斧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请自此辞”。^①1910年10月，《民主报》创刊，沈缙云“独负经济责任，认股2万元，垫资3万元”后又与宋教仁、谭人凤、陈英士、傅梦豪、章梓先生等组织中国国民总会，被推为会长，^②并渐与革命党人接近。同沈类似的人还有李平书、顾馨一等，在政治上都有所转变。满族立宪党人松毓，原是吉林自治会会长，因受清廷和巡抚陈昭常的压制，在同盟会会员李芳的影响下逐渐倾向革命。^③武昌起义后，他筹设“吉林各界联合会”，图谋起义，^④他在给孙中山先生的信里说：“毓十余年来既屡谋苏息之道，不惟无成，而身遭摧折，殆濒于死。专制毒焰，思之真寒人心也。武昌起义，公归而造新政府，四海响应，功已过半。奈袁贼再起，舞其爪牙，转瞬间北方大势竟入其手……毓屡有所图咸不能就，现虽组成一会，然无实力以盾之，亦恐无补，近日焦急万分”。^⑤表露了松毓响往革命的思想。多数立宪党人，从拥护清廷的阵营中分离出来改弦易辙，另作他图，为着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前途作应变的准备。

早在国会请愿时期，立宪党就存在着激进、稳健与保守的不同派系。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比较发达，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比较大的江浙地区的立宪党人张謇、汤寿潜等是政治态度比较稳健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宪政活动中，从不逾越清廷所规定的樊篱。当清廷宣布9年预备立宪期后，他们则表示满意，主张停止请愿。当“皇族内阁”成立后，他们对清廷也感到绝望，不得不离开清廷的怀抱，而与蛰伏在彰德的袁世凯密商合作，企图抬出袁世凯，以便在未来的政局中以某些从权应变的方式，另辟蹊径。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页。

②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2页。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76—577页。

④ 《盛京时报》1912年1月30日。

⑤ 《盛京时报》1912年1月27日。

在近代企业比较薄弱的地区，立宪党的政治态度反而比较激进。湖南的谭延闿，湖北的汤化龙，四川的蒲殿俊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些人既是这些省立宪党的头头，又是谘议局联合会的重要成员，请愿呼声最高，行动也最积极，是宪政运动中的激进派。第三次国会请愿碰壁后，他们很快与清廷决裂，并积极着手组织全国性的政党；在革命行将到来时，他们转而附合革命。号称维新先驱被清廷通缉的“悖逆要犯”康、梁一派，其政治态度最为保守，他们始终以保皇为宗旨，反对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在宪政活动中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运动、贿买清朝权贵身上，要求朝廷俯顺舆情，实行立宪。然而此时他们对清政府也失去信心，认为清政府“多存留一日，则元气多斫丧一分。”

总之，立宪党的分化使清廷完全陷入孤立的地位，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立宪派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立宪派组建政党的思想产生较早，可以说，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等政团的建立就是这种组党思想的初试。这些团体基本上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只是尚未摆脱地域的限制，规模较小。至于全国性政党的建立则是在资政院开院以后。1910年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给立宪派造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联合，这就给组建全国性的政党提供了有利条件。

1910年11月，第三次请愿碰壁，请愿倡导者在解散前曾发表一份《通告书》，里面讲到：“各处函电，皆属改组政党。兹事体大，势不可不慎重将事。今议先拟纲要一通，已经举人起草，月底发表，大概作一底稿，至如何组织，均祈海内贤达指示方针”。^①在组党过程中，政闻社的徐佛苏与梁启超经常秘牒往还，积极进行策划。于是国内外立宪派为日后夺取国会议席，参与政府权力的重新分配纷纷展开组党活动，从而出现了一些全国性的立宪政党。

① 《东方杂志》第7年，第1号，《中国大事记》第159页。

宪友会 宪友会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及各省谘议局组合而成。1910年11月5日，国会请愿同志会开会，决议重新组织政党。会议举孙洪伊等4人为起草员，负责拟定党纲。1911年1月1日，在北京全蜀会馆召开发起会，到会者38人，由王敬芳宣布开会，推孙洪伊为临时主席。首由王敬芳宣读草拟的党纲，后由与会者讨论。嗣因与会者多有异议，旋推吴赐龄，李文熙、席授、康咏、彭占元、汪龙光、王敬芳、陈登山、雷奋、罗杰、易宗夔、齐树楷、张之霖、李素、牟琳、江辛，孙洪伊等17人为修正员，负责审议事宜，党名也一直未能确定。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是资政院议员，但康，梁一派也是重要参与者之一。所以，孙洪伊曾致电梁启超“促定党名”，梁遂拟名为“帝国统一”。因避清廷之忌，孙洪伊等人未采用“帝国宪政会”之名，而改用“帝国统一党”。康有为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宪广来书，言北中已改为帝国统一党，已注册民政部中。”^②由此可见，海外的康，梁对国内立宪派的组党活动仍然发生着重要影响。

在帝国统一党成立前，北京地区已有四、五个类似政党的组织存在。^③徐佛苏曾有联合诸党而建一大党的计划。他给梁启超写信说：都中现在已有团体四五，其中主持者，均不过三五人，附从者不过数十百人，一筹未展，而攻讦之风已大著。识者深为忧虑。盖此种团体若不从速消除彼此意见，必日决裂，其流害甚于无党者远矣。然其欲消除，不能积极的锄而去之，当思所以揉而合之，且未入团体者，人才尚多，亦当冶之于一炉。故此次开联合会之时，万不能不组政党”。^④

8月9日，14省谘议局议长、副议长先后到京开第二次联合会，会议推举谭延闿为主席，王振尧为副主席，汤化龙为审查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29页。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34页。

③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479页。

④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48页。

长。会议主要议题之一为等组政党事宜。由徐佛苏从中联络，经过商讨，决定改组“帝国统一党”，联合其它团体，组建大党。

会议推黄维基，雷奋，张国溶，徐佛苏四人为起草员，负责草拟章程和政纲通过定名为“宪友会”。5月30日，在松筠庵召开发起会，到会者53人，推谢远涵为主席，李文熙为书记。由起草员张国溶报告开会宗旨，大意谓：而今危亡之患迫在眉睫，政党之建立，当以救亡为第一要义。随后，全体公决会章，推举肖湘、袁金铠、康士铎、梁善济、陈登山、孙洪伊6人为临时干事，负责筹备成立事宜。

6月4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宪友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者有百余人。推举谢远涵为临时主席，黄维基、李文熙为临时书记。第一项投票选举雷奋、徐佛苏、孙洪伊3人为常务干事^①。第二项，由常务干事推定各科职员，计庶务员文耀；文书员李文熙、吴赐龄；会计员李素；交际员欧阳弁元、陈登山；调查员康士铎，何宗翰；编辑员王葆心、余绍宗。第三项，决定设总部于北京，各省设支部。各省支部发起人由各会员当场推定。于是，推定甘德蕃（广西）、汤化龙（湖北）、梁善济（山西）、袁金铠（奉天）、周树标（山东）、邹树声（江西）、高登鲤（福建）、方贞（河南）、李良材（陕西）、蒲殿俊（四川）、汤尔和（浙江）、谭延闿（湖南）、何印川（吉林）、窦以钰（安徽）、籍忠寅（直隶）、杨寿钱（贵州）、伦明（广东）、马良（江苏）等人，为各省支部发起人。

本部的组织初定以后，各省支部也相继建立。主要有湖南、山西、直隶、福建、贵州等省。

宪友会章程共25条，规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6项^②：（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二）督促联责内阁

① 《时报》1911年6月7日，6月10日。

② 《时报》1911年6月10日。

(三) 整理行省政务；(四) 提倡尚武教育；(五) 讲求国民外交；(六) 开发社会经济。

宪友会搜罗了大部分立宪派知名人士，是宪政党最大的一个。徐佛苏给梁启超的信里不无自得的说：“现在此会已成立矣。其总揽者，系三头政治，弟与雷继兴、孙伯兰当选。此会声势极隆，三数月之内，各省必皆有分会成立，且必有七八省占全盛之势，在宣统五年之国会，必占大多数议席。若中央总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则真泱泱大党之风也”。立宪派对未来政党政治沾沾自喜、踌躇满志的意态，已经溢于言表。当时上海的《时报》评论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所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之所难言者，则留待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②”隐约的透露出立宪派努力确立其独立政治地位的企图，并在未来政坛上大显神通的架势。

宪政实进会 初名“宪政维持进行会”亦称“帝国宪政实进会”。是由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王公贵戚和所谓硕学通儒议员共同组织而成。这派人在资政院议决新刑律时持反对态度 因投票时用自票，故称“白票党”。该会会则12章31条，本部设正副会长，下设常任议员及调查、编辑、审议各科，各省设有支部。该会会长陈宝琛、副会长于邦华、姚锡光。其具体政纲共10条：(一) 尊重君主立宪政体，期上下意思之疏通；(二) 发展地方自治，巩固宪政之基础；(三) 谋政治全体之改善；(四) 期法律之完备；(五) 定教育之方针；(六) 完成移民事业；(七) 实行财政整理；(八) 开发人民生计；(九) 研究外交政策，集中国家权利；(十) 谋军备之充实。^③宪政实进会属官僚系统，其立场守旧，被时人视为保守党。

宪政实进会在1911年7月1日开了一次常会，议决了下列诸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49页。

② 《时报》1911年6月12日。

③ 《辛亥革命》(四)，第74—75页。

事：（一）公推常议员；（二）规定总分会之关系，并分省担任组织分会事宜；（三）分发各省调查表；（四）呈请资政院从速发布民法及商法草案，以备研究；（五）提具资政院议案；（六）推举拟分会章程及呈资政院文之起草员。^①该会势力仅限北京，虽有扩张各省的计划，但进行极不顺利。当时，只有直隶分会较有成绩。

宪政实进会为 首的有庄亲王载功、劳乃宣、陈宝琛等，这些人系保守分子，封建专制主义的辩护士，政治态度保守甚至反动，在谘议局和资政院中与宪友会明争暗斗，互争雄长。武昌起义后，坚持反对革命的立场，并通过决议反对共和政体，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辛亥革命成功，该党即告消灭。

辛亥俱乐部 其政治主张与宪政实进会略同，时人称之为“乃宪政实进会之别动队，当世称为资政院之官僚党。”^②所不同者只是其组织成员以“民选”议员居多，杂以少数“钦定”议员而组成。1910年冬，当宪友会前身帝国统一党尚在筹组织时，资政院“钦选”议员刘泽熙、王璟芳和民选议员易宗夔等各有一派势力。他们鉴于宪友会和宪政实进会已成为政界两大党，乃联合各方人士组织第三党。由长福、罗杰、易宗夔、黎尚雯、胡骏等任本部发起人。1911年6月15日，在香炉营五条事务所开会成立本部。本部常议员有长福、郑际平、程明超、赵椿年、陈明官、王璟芳、等12人。评议员有罗杰、汪龙光、牟琳、张竞仁、杨梯、顾澄等12人。庶务员有刘诚、张友栋、张东荪、宁调元、田桐等10人。^③

辛亥俱乐部党规9章31条。其政纲共八项：

（一）阐扬立宪帝国之精神；（二）提倡军国民教育；（三）发展地方自治能力；（四）主张保护政策，以振兴实业；（五）整理财政以增进富力；（六）酌量公私财力以谋交通发展；（七）整

《时报》1911年7月12日。

《辛亥革命》（四），第75页。

③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491—492页。

饬军备以充实国力；（八）体察内外情势，确定外交方针。辛亥俱乐部是介于宪友会和宪政实进会之间的党派，其政治主张基本是老调重弹。

辛亥俱乐部成立后，会员约有60余人，资政院议员与院外人士参半，以度支部尚书载泽为后台，以杨度为其幕后主持人，当时有“官党”之称。后来会员增至270余人，有民间人士参加，并公然以民党自居。实际上，因有革命派人物如宁调元、程明超、田桐、魏宸祖等人加入，始渐由官党向民党转化。^②

政学会 亦名政学公会，1911年春成立。该会党员约有余20人，以资政院议员为限，^③即资政院中赞成新刑之蓝票党人^④所建立。其骨干分子多为日本法政学堂留学生，如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⑤可谓资政院中的第四党。这些人多在清廷任职，在资政院中与白票党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互竞雄长。但因该会人少力弱，不久即告瓦解。

立宪派的主要目标即为早定宪法，速开国会。但多次请愿的失败，使他们感到“预备立宪”实际上成了可望不可及的代名词，对清廷的“立宪”遂产生绝望之感。所以，这些宪政党的建立，一方面表明立宪派对清廷宣布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的许诺尚抱一线希望，为一旦国会召开之日的竞选作准备；另一方面他们看到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对清廷的统治能否延续到宣统五年也持怀疑态度。因此，为了在未来的政坛上作出迅速的应变选择，亦需作事先的必要准备。武昌起义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赞成附和甚至与革命党人合作。宪政党的建立，对武昌起义前的保路运动和起义后某些省的独立和光复，对结束清朝260余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起了一定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① 《辛亥革命》（四），第75页。

《时报》1911年6月28日。

③ 《时报》1911年3月15日。

④ 参见《时报》1911年1月7日、22日、3月15日、16日。

⑤ 日本参谋部：《支那政党史》，第2页。

立宪派在清末宪政时期 组织各种政团或政党 要求实行君主立宪 实行议会制度。他们利用谘议局、资政院开展类似议会制度的政治活动 对政党政治作了某些尝试 为民初政党的纷起及其政党政治的开展打下了有力的基础。但这种政党政治的尝试，还只能在清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立宪党由于自身的软弱无力，在封建顽固势力突然袭来时，便迅速地败下阵来，宣告失败了。

第六节 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一、同盟会与武昌起义

“辛亥首义”是在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湖北地区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和指挥的。

在湖北的革命团体中，最早出现的有“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日知会失败后，湖北革命党人竞相组织团体，结纳同志。主要有“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30余个。到武昌起义前夕，化合成为两个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而文学社在军队中的力量更加雄厚。“武昌首义，扛枪拖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①。文学社和共进会可以说是自1903年以后湖北各革命团体的总其成者。

“文学社”是在“振武学社”被破坏之后，军学两界革命党人重新创建的。振武学社被查后，社务交蒋翊武主持。他认为“此时风声仍紧，望各同志忍耐，不可轻躁”。^②于是，决定会务暂停，静观形势。两个月后，风潮渐趋平静。1911年1月下旬，在各标营革命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于阅马厂集贤酒馆集会。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恢复振武学社，蒋翊武则建议说：“鉴于屡次失败，欲求一完善保全之策”。^③

李廉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记》，第9页

②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6页

③ 《辛亥革命》（五），第4页。

蒋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遂决议改名文学社。《简章》称：

“本社以联络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①

1月30日（辛亥元旦），文学社以新军团拜名义，在黄鹤楼畔风度楼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除各标代表外，有蒋翊武、章裕昆、詹大悲、刘复基、王守愚、邹毓琳、蔡大辅等10人，蒋翊武为会议主席。会议首由蒋翊武报告更名意义及《简章》，与会者均无异议。随后，选举职员，共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琳为会计兼庶务员，张廷辅为参议，黄振中为参谋，彭楚藩为交通员，胡经武为外交员，李桂森为招待员。

文学社入社手续较为简便，凡经社员三人介绍，再经审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即可入社。入社志愿书也不是固定的格式，而是随使用什么纸张均可填写，只须写明经某人介绍，愿意加入本社为社员，即算履行了入社手续。且为保密起见，愿书经登记后，即行销毁。

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楼召开代表会议，决议派章裕昆赴马队八标当兵，发展社员。10天之间，发展社员40余人。不久，四十二标胡玉珍、邱文彬等组织的益智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汉口商团刘少舫等组织的神州学社也全体加入。这样，文学社的势力又从军界扩展到学界和商界。

发动新军，始终是文学社活动的重点，许多革命党人投入新军，以一介“莘莘学子”一变而为“桓桓武夫”。如杨王鹏原在湖南入伍，因发动革命被驱逐，又到武昌入陆军四十一标三营为兵，长期过艰辛的行伍生活。又如留日学生、《商务报》总编辑刘复基亦入新军当副兵。由于革命党人扎扎实实地工作，会务不断扩大，遂在新军中建立了标、营代表制，各级代表即为各级军官，在新军中有了完备的指挥系统。后来，基于社中部分党人随

军分驻汉口、汉阳，便建立了阳夏支部，以胡玉珍为支部长，郑兆兰为交通，在汉口郑寓设立交通处。当运动渐至成熟时，又决定在小朝街 85 号设立总机关部，由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驻社办公。文学社对于革命思想的宣传极为重视，先后办有《商务报》、《大江报》，用以鼓吹革命。

文学社成立后，社务发展极为迅速。成立仅两月余，在湖北新军中几乎都有文学社社员。左旗的四十一标、三十一标，右旗的二十九标和三十标，再后及于马、炮、工各标营和驻南湖的三十二标等，都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11 年夏季是文学社发展最快的时期，该社成立时，新旧社员仅八百余人，^① 6 月，新军中社员“将近 2000 人”，^② 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更增加 3000 之众”，^③ 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湖北共进会源于 1907 年在日本成立的东京共进会，是武汉地区又一重要革命团体。

共进会在湖北的主要组织者是孙武。1908 年冬，孙武由日本回到汉口，受到湖北同志的热烈欢迎。邓玉麟、查光佛、黄申芑、刘英、袁菊山、钟雨亭、李白贞等相继来访，询问东京共进会的组织和现在进行方针。孙武出示共进会章程、印信和旗帜样式等，来访者皆受鼓舞。遂约集同志组织机关，黄申芑以种族研究会全体加入，同时入会的有刘玉堂、丁立中、汪性唐、钟雨亭、刘燮卿、李白贞、吴肖韩等人。于是，孙武等人以共进会名义相号召，积极准备，筹划经费，分头运动会党和新军，以扩大革命力量。

1909 年初，焦达峰从日本回国抵达汉口，“与孙武协商两湖入手方法”。^④ 决定成立湖北共进会，以联络会党为入手处。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254 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辑，125 页。

③ 《民立报》1912 年 10 月 7、8 日。

④ 《辛亥革命》（二）第 9 页。

长江各会党，名目纷歧，特改“中华山”名目“以统一之”。^①为联络起见，在汉口、岳州、长沙、宜昌等地设秘密机关多处。

1910年春，共进会党人经过再三讨论，认为对于会党必须予以军事编制，方能接受命令，听从指挥。于是，编襄阳会党为第一镇，由袁菊山任统制；安陆会党为第二镇，由刘英任统制；武汉会党为第三镇，由刘玉堂任统制；兴国会党为第四镇，由黄申芑任统制；黄州会党为第五镇，由彭汉遗任统制；以孙武为大都督。^②各地会党经过整顿后，“日有起色”。另设总机关于汉口鸿顺里34号，为指挥联络和重要人员集会的地方。^③

同年8月，岳州潘平界部焦逸仙暴动，被清吏捕杀。接着刘英所属龚世英、刘伯旗两部，不受约束，擅自暴动，被清军击溃。黄申芑所属柯玉山部，也因盲目暴动而失败。武汉地区出现的会党“暴动”引起清政府的严重注意，并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湖北共进会紧急会议，决定五镇军队暂停活动。

湖北会党暴动失败后，孙武基于两湖会党债事，忽闻广西刘玉山行将举义，应共进会广东都督聂荆电召前往协助。9月15日，孙武和潘公复、汪钰首途赴粤，10月初到达广东，会见聂荆，决定在广西发难，不料行抵南宁时起义事泄，孙武避匿香港，^④晤冯自由于《中国报》社，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⑤此间，吴肖韩由汉来粤，孙武得知汉口巡警道冯启钧被参革职，著名侦探徐升被杀，武汉紧张气氛略趋好转，遂偕吴肖韩、潘公复、汪钰等乘轮经沪回鄂。

1910年6月，孙武回到汉口。同年7月，刘公、杨时杰由日返国。刘为共进会第三任总理，负责长江革命任务；杨乃向以“力持非武汉不可”者，两人密约“回鄂图之”。^⑥抵汉后，刘因病回

《辛亥革命》（二），第94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504—505页。

③ 《辛亥革命》（二），第94页。

④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507页。

⑤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卷上17页。

⑥ 《湖北革命知之录》，179页。

襄阳原籍暂息，杨时杰访原《雄风报》编辑杨玉如，两人密谈深夜，不谋而合，要在湖北“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当时，湖北共进会会务因第一次受挫已停顿多时，杨时杰鼓励孙武“重整旗鼓”，孙“颇心动”，^①共进会又重新活跃起来。1911年2月，在武昌胭脂巷24号设立秘密机关，专为“接洽党员之所”。^②

鉴于会党纪律散漫，不易统一指挥，孙武等人决定把共进会的工作重心转向新军。认为“只有从运动新军入手，利用敌人实力，转而为革命的劲旅”^③才是上策。3月31日，在武汉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由邓玉麟任经理，专为吸收新军士兵。自此，很多党人潜入军界做策反工作，收到极大效果。到武昌起义以前，共进会在湖北军界的总人数，约近2000人左右，^④成为仅次于文学社的第二支革命力量。

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以新军士兵为发展对象。初时，各自分头进行，亦无妨碍，但在发展党员过程中时有“互相争取党员”之事，使两团体发生摩擦，甚至彼此歧视。双方有识之士看到，此种情况给革命运动带来诸多不利，遂力促彼此联合。经刘复基、邓玉麟等往返奔走，多方斡旋，两团体派代表进行了多次协商。1911年6月保路风潮高涨，革命党人深感两团体联合的必要和紧迫，遂于6月14日在武昌长湖堤龚霞初宅举进第二次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文学社有刘复基、王守愚；共进会有邓玉麟、杨时杰、杨玉和、李作栋等。会上，杨玉如、李作栋表示：“我们两个团体本来是异途同归，现在正是要同归的时候，不能再异途了”。^⑤刘复基、王守愚也表示：“我们两个团体都是以排除满人为革命宗旨，本来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都能和衷共济，就能达到目的地”。^⑥双方都表示了联

① 《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页。

② 《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6页。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506页。

④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642页。

⑤⑥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515。

合愿望，并达成“万不可互争党员”的协议。由于双方仍存戒心，未能就联合和领导人选等达成具体协议。

1911年8月，四川保路风潮扩大，湖北新军一部奉调入川。新军的陆续外调加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紧迫感。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宅举行了第三次联合会议。会上孙武首先发言，认为：“现在所筹备的秘密工作，已经相当成熟，决定就要动手，只有两个团体联成一气，集中力量，同向敌人进攻，才能取得胜利”。^②刘复基表示：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因此，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取消，“再不要存在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③刘公也表示：“以前所有某社某会名义……应一律不用”，并建议：“就是从前所预拟的个人负责名义，……都应一概废除重新改选。”^④会议气氛十分融洽，决定取消从前所有名义，两团体合并为一，一切重要事情，都应取决会议。当推举起义领导人时，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诸人互相谦让，不肯担任。于是居正建议派人赴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汉主持。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当即推居正、杨玉如即时赴沪。

居正、杨玉如于9月19日到达上海，当即会晤宋教仁于《民立报》馆，汇报了武汉准备情况。不料，此时在武昌狱中的胡瑛也派人到上海，力言武汉不宜发难，遂使宋教仁等疑信参半，未能即时赴汉。但武汉的革命形势已刻不容缓。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在胭脂巷11号胡祖舜宅召开联合大会。出席会议者除刘复基、孙武、邓玉麟、蔡济民、李作栋、彭楚藩等数人外，还有新军中各标营代表杜武库、张喆夫、方维、赵士龙、蔡汉卿、祁国钧、熊秉坤、胡玉珍、方兴、雷洪等60余人。因蒋翊武随军驻岳州未到会，以孙武为会议主席。会上由刘复基报告“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经过讨论被一致通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515页。

②③④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516、517页。

过。会议决定10月6日（中秋节）为发难日，推蒋翊武为战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起义后建立军政府的总理。以刘公、孙武、李作栋、潘善伯等20人为政治筹备员；刘复基、邓玉麟等30人为军事筹备员；在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部设军事总指挥部，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负责草拟文告、制造弹药、旗帜、印信等，还派人与附近各省联络，策应起义。同时也制定了起义的总动员计划，预计分八路同时出击，分别占领凤凰山炮台、楚望台军械库、总督署、蛇山、武胜关、龟山等战略要地及要害部门。

文学社和共进会以革命大局为重消除门户、畛域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为武昌首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湖北革命党人原定10月6日，即农历中秋节举行起义。但因连续发生突然事件，使起义未能如期举行。10月9日孙武等人在俄国租界宝善里机关制造炸弹，由于失慎引起火药爆炸。早已在这里警戒的沙俄巡警闻声赶来，孙武带伤逃走，准备起义的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纸钞等全被搜走，“并将未逃出的刘燮卿带走”。^①一时间，军警四出，巡查街巷，气氛十分紧张。同日，蒋翊武从岳州驻地赶回武昌，与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等聚集在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商议具体行动计划。正进行中有人前来报告宝善里失事的消息。刘复基认为形势突变，应即时起义，遂决议10月9日半夜12时起义。于是，由蒋翊武发布起义命令，并派同志分头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递。会后，蒋、刘、彭等在机关等候各营举义。

这天夜里，武昌城门紧闭，清军布满街巷，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当起义号令尚未发出时，小朝街总部突然被敌人破获。起义领导人蒋翊武在混乱中逃出武昌，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扑。“一日之间。武昌各革命机关全被破获，被捕男女达数十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525页。

人”。①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烈士就义于督署辕门外。

三烈士牺牲后，武昌城气氛极度紧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义愤填膺，群情鼎沸，深感形势危急。在起义机关遭到破坏，起义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避“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广大士兵自动集议：“与其待缚，不如奋斗，死里求生”，②决心冒死发难。

10月10日晚，驻武昌城内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革命党人熊秉坤等首先发难，冲出营房，率领起义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标营闻讯也相继举义，分别占领凤凰山、蛇山等制高点 and 军事要地。然后，各军又相继集结于楚望台，熊秉坤推举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起义军在楚望台军械库得到大量武器弹药，队伍迅速扩大，立即分三路向总督署进攻。革命士兵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血战一夜，占领了总督署、藩库等重要衙门。总督瑞澂心惊胆裂，乘兵舰逃跑。第八镇统制张彪率残部逃窜汉口。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11日，汉阳新军在革命党人率领下起义。12日，起义军光复汉口。至此，武汉三镇被起义军占领。

“武昌起义实际上是湖北的士兵革命，是士兵群众作了清王朝的掘墓人”。③武昌首义的胜利，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领导的广大士兵群众发动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敲响了反动的清王朝的丧钟，造成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武昌胜利后，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以领导革命取得全国的胜利。但是，他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一方面，革命党人所尊敬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尚在海外，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又在上海或香港。起义前军事指挥部的领导人或死（刘复基）、或伤（孙武）、或避（蒋翊武），或

《辛亥革命先著记》，第58页。

② 《辛亥革命》（五），第105页。

③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5页。

捕（胡瑛、詹大悲），一时，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另一方，封建官僚、立宪党人改头换面，伪装革命，妄图窃取权力。

10月11日上午，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党人，聚集在湖北省谘议局开会，准备推举都督，建立革命军政府，参加会议的革命党错误地认为需要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出面号召组织政府，“首先要得到谘议局的赞助，才能成功”。^①

由旧军官、起义时充当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提议，会议很顺利通过了以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决定。同时，举立宪党人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在军政府成立后的头两天，黎元洪对军政府事概不过问，鉴于黎不肯任事，革命党人蔡济民提议成立主要是由下层党人组成的“谋略处”。谋略处的成立，实际上承担了军政府的领导工作，“大事皆决于谋略处”。^②在谋略处主持下，革命党人作出如下重大决议：^③

- (1) 名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通称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 (2) 府址：以谘议局为军政府所在地。
- (3) 国号：称中国为“中华民国”。
- (4) 年号：废除清宣统三年年号，以本年为黄帝纪年4609年。
- (5) 旗帜：共进会的旗帜为九角十八星，红地黑星，星间联以虚线，意为联合十八行省，以铁血主义实行革命。
- (6) 都督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通电全国。

11至12两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革命党人认为“临时总指挥”不必存在，应以都督名义发布命令。12日下午六时，谋略处开会，决定：^④(1)继续以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告以武昌光

《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2辑，159页。

《辛亥革命》（五），第209页。

③ 《辛亥革命》（五），第209页。

④ 《辛亥革命》（五），第210页。

复。(2) 致电上海，促正居、黄兴、宋教仁等来鄂，并请转电孙中山总理从速回国，主持大计；(3) 请咨议局电各省咨议局，以谋响应。(4) 设立招纳处，接待各方投效人员；(5) 严禁滥杀旗人。

湖北军政府从 12 日开始至 16 日止，主要围绕革命战争和巩固政权为中心，在谋略处主持下，进行了大量活动，巩固起义的胜利成果。

湖北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政权的雏形，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为中国人民的思想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给中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光明之路。在它的创立和活动期间，革命党人前驱开路，率先垂范，发挥了极大的首创精神；为维护这个新生政权，同旧官僚、立宪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表现了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共和制的坚强意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同盟会从成立那天起，就宣布它的宗旨是：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武昌首义的胜利，唤醒了全国，不到两月，内地 18 省中就有 14 省举起义旗，宣告独立，使清政府迅速地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这就为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但革命党人一直把他当作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活动是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武昌起义后，湖北共进会鄂部总会入会志愿书上说：“谨祈本会参谋长宋教仁保送，本会总理刘公承认，本部特别员谭人凤申报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注册。”^①湖北军政府主办的《中华民国公报》在 1911 年 10 月 31 日发表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孙》的布告，^②这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领导地位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湖北军政府成立后 要向全国发号施令 就要打出已为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

《中西日报》1911 年 11 月 17 日。

② 原件藏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

山这面旗帜。当时美国报纸也曾报导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政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①所以，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下进行的。

二、同盟会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理所当然地落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及其革命党人肩上。但立宪党、旧官僚及各色政客、野心家乘机而起，觊觎非分，排挤革命党人，妄图取而代之。因此，筹组中央政权的活动，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先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提出在武汉召开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问题，而上海集团则提出应在上海开会，二者主张不同，目的却十分相似，都是企图以地利之便来操纵会议，力争由自己来控制临时中央政府。结果，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先在汉口召开，继之又移至南京。在立宪党的策动及部分革命党人的迎和下，会议的妥协空气非常浓厚。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缓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接着，会议又在选举大元帅问题上争持不休，反反复复，致使临时政府难产。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当得知武昌首义胜利的消息后，他立即游说美国朝野，开展外交活动。然后，又转赶欧洲，到法国活动，11月下旬返国。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与前往迎接的廖仲恺、胡汉民等会晤。当时，胡汉民建议孙中山留在广州，组织武装，然后举兵北伐，统一南北。孙中山拒绝说：“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②又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而就易。

《孙中山选集》上卷，184页。

② 《建国月刊》第1卷，第6期。

“...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并强调指出：“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②孙中山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力任其艰，自觉地负起筹组中央革命政权的重担。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他本着“选举及组织政府问题，当然由党而决”^③的方针，力图组建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新政权。12月26日，孙中山在他的寓所召开同盟会干部会议，讨论组织政府方案。出席会议的有黄兴、汪精卫、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人。会议在讨论政体时发生了分歧，孙中山主张采用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采用内阁制，设总理。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分歧并无实质性不同，因为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争论的关键是由孙中山掌权还是由宋教仁掌权的问题。如果采纳宋的内阁制，实际上就架空了孙中山的领导。而且“同盟会为革命之原动力，欲实行本会政策”采用内阁制是不适宜的。因此，孙中山坚决反对内阁制，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黄兴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并由黄兴等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孙中山为总统，由马君武在《民立报》披露。^④又经“黄兴询众议，多数赞成总统制，照案通过。”^⑤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已是众望所归。

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出席的有苏、浙、鄂、湘、川、滇、奉、直、鲁等17省代表45人，华侨革命党人代表2人列席会议。上午9时，正式投票选举，每省一票。选举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

^② 《胡汉民自传》第54—55页。

^③ 《胡汉民自传》
《远生遗著》第2卷，第14页。

^④ 《胡汉民自传》

^⑤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6页。

章天觉；《回忆辛亥》

总数 $\frac{2}{3}$ 以上，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消息当天传到上海，正在出席同盟会欢迎孙中山大会的革命党人，心情万分激动，由黄兴带领，会场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共庆得来不易的胜利。

孙中山得知当选的消息后，立即复电南京代表会，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子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诸君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不敢弇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①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就职。下午6时许抵达总统府。当晚11时，孙中山举行大总统受任典礼。首由孙中山宣读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谨以此誓于国民”。^②同时，发布《告全国同胞书》、《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中华民国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规定对内政策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方针是：“满洲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③然后，授大总统印，并将其盖于宣言等文件上。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令各省一律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并规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红黄兰白黑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即所谓“五族共和”。

1月3日，各省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同日，孙中山发布国务员9部人选，各部总次长名单如下：

《民立报》1912年1月1日。

② 《国史馆档案（三十四）》，（2）34。

③ 《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

④ 《民立报》1912年1月5日。

陆军总长	黄 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总长	黄钟瑛	次长	汤芑铭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组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正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鸿猷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跃月
实业总长	张 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

从形式上看，国务员名额的分配以革命党人为总长的只有三个部（陆军、外交、教育），仿佛是革命党、立宪党、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体，但南京临时政府的实权，是通过同盟会“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掌握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手里。全部次长除汤芑铭已退出同盟会外，是清一色的留学日本和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代理总长，处理部务、制定政令、出席国务会议，所以当时有“次长内阁”之称。临时总统直辖九部三局。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三局局长宋教仁、黄复生、但懋以及任其他要职的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一派的革命党人。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主体的政权。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中华民国正式诞生。它不仅结束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按照同盟会“建立民国”政纲的精神，立即着手建立临时参议院。南京代表会在致各省都督府的电文中说：“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必须组织参议院。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派遣参议员 3 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遣参议员 3 人，付与正式委任状，克日来宁。参议员未至以前，各省暂留 1 人以至 3 人，驻宁代理其职

权。”^①

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开正式大会，各省到会议员共43人，以林森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

43名议员中，革命党人33，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这说明孙中山回国后确实团结了一大批革命党人，在组建中央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为了用法律的形式把资产阶级的国体和政体确立起来，以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南京临时参议院又于1912年2月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于3月11日签署公布。《临时约法》共7章56条。^②它的核心在于通过立法程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2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内阁向国会负责，内阁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组织行政机构，行使行政权；参议院为立法机构，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和行使立法权；法院为司法机构，独立审理民刑诉讼，行使司法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依照法律规定人民享有人身、住宅、财产、营业、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居住，迁徙、信教等自由权；依照法律规定人民享有请愿、陈诉、诉讼、任官、考试、选举、被选举等权利；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有纳税、服兵役之义务。

《约法》中关于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规定，表现了资产阶级革

^①《民立报》1911年12月31日。

^②《辛亥革命》（八），第30—36页。

命党所一贯倡导的民主精神。它把西方资产阶级一向宣扬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加以条文化和法典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时代，给人们留下了民主共和的新观念。

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颁布《临时约法》的同时，还在短短的 3 个月时间内，颁布了不少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法律法令。除在《约法》中规定人民享有自由、平等、选举、参政等权利外，还积极改革官制、整饬吏治，确立选拔官吏的原则和方法，严禁任人唯亲，营私舞弊。司法制度方面，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严禁体罚。在保护人身自由方面，通令废除从前买卖契约，保护华侨，严禁买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废除主奴名份；解放“旦户”、“惰民”，许其享有“公权”、“私权”。在移风易俗、废除社会恶习方面，命令革除前清“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蓄辫、缠足、赌博，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在发展实业方面，宣布振兴实业的方针，颁布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制度；废除前清的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宣布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提倡“自由平等友爱为纲”的“公民道德”；规定学校不准尊孔读经，废止前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等。

总之，这些除旧布新的政令和举措，表现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移风易俗、解放思想、提倡科学、推动民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都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使民国初年一度出现了新气象。

在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积极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同时，袁世凯也加紧了破坏革命夺取革命政权的阴谋活动。

武昌起义不久，被清朝罢黜在洹上村“养病”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扶持下，东山再起。他一方面利用南方革命势力，

迫使清政府让出全部权力；一方面利用清政府的退位问题和革命党讨价还价，与立宪党共同策划了所谓“南北议和”，诱使革命党人让出革命果实。南方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即陷于涣散、分裂。他们一怕帝国主义干涉，二怕袁世凯的兵力，希望革命早日成功，尽快结束战争，妥协气氛弥漫全党。早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汉口会议，就作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当时，妥协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孙中山在回国途中虽然有“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①的想法，但当他到达上海后，立即改变了原来的想法，郑重宣布：“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孙中山鲜明的旗帜，坚决的态度，给妥协涣散的革命党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创建了南京临时政府，使袁世凯的阴谋暂时未能得逞。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同盟会中的妥协气氛十分浓郁。“党人之朝气渐馁，只求保守既得之地位，而聚减冒险精神，又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以是对于开国之进行，多附合官僚之主张，而不顾入党之信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悉置之脑后，视为理想难行”。^②孙中山“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许多同盟会员不仅不支持，反而“多期期以为不可”；^③“辩论再四，卒无成效”。^④孙中山反对议和，力主北伐，但他的“内外负主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议和”。^⑤汪精卫、章太炎、宋教仁等自不待说，就连曾支持过孙中山的黄兴，在旧官僚、立宪党的影响下，也妥协退让，不赞成北伐主张。^⑥当柏文蔚劝黄兴不要和袁世凯妥协时，黄对柏说：“以革命目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只要袁世凯承认这种主张，我们就可以将总统让给他，他虽然狡猾，也一定可以与我们合作。假如若完全靠

《孙中山全集》第3册，163页。

② 《总理全集》第1集第1030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1页。

④ 《革命文献》第3辑，60—61页。

⑤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212页。

武力解决，将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①革命党人因缺乏信心，只好放弃北伐，与袁世凯妥协了。孙中山不仅遭到外部敌人的进攻与压迫，而且还受到革命党人和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有力人物的非难”。^②他虽然“对议和本不赞成”，^③“始终不愿妥协”，^④但在党内、党外夹攻下，“半筹莫展”，^⑤只有步步退让。

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这个事件的教训时说：“予非畏袁世凯之势力而议和者”；只因党员多已放弃革命初衷，无意三民主义，“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升和议也”。^⑥正是在上述条件下，“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就曾决定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袁世凯承认共和，孙中山当即辞职。孙中山这时很难改变这种形势”。^⑦所以，12月29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就至电袁世凯说：对于大总统的职务，“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⑧表示准备对袁世凯妥协。

革命党人的软弱可欺，使袁世凯的独裁野心更加嚣张，他声称：“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⑨所以，当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袁十分恼火，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发出“誓死抵抗”的叫嚣，并撤消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故意制造决裂的姿态，压迫革命党让步。

面对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形势，孙中山针锋相对，1月11日，

①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② 吴玉章：《辛亥革命》，157页。

③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1523页。

④ 《革命文献》第3辑，60页。

⑤ 《孙中山选集》上册，105页。

⑥ 《孙中山选集》上册，152页。

⑦ 《广东文史资料》第19期，193页。

⑧ 《总理全书》（文电）17页。

⑨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他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并制定六路北伐的计划，^①13日，在津甯路线上首战告捷，大败清军于宿州等地，占领重镇徐州。

这时，帝国主义公开支持袁世凯，出动大批军舰和军队，以武力相压迫。革命党人内部“许多拥有实力的人”也都无意北伐，说“现在官多于兵，那一个能打仗”？遂使北伐“卒无事实之进行”。^②

袁世凯突然中断南北和谈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派心腹徐世昌转告抵抗北伐的张勋，说：“目前党人势盛，人心受其蛊惑，其势不可力敌。宫保（袁）通权达变，与党人言和，假以时日，必败党人”。^③袁深知共和为人心所向，是不能以兵“力敌”的，于是，以接受共和为诱饵，以达窃权之目的。因此，唐、伍公开谈判虽表面停止，但双方秘密谈判仍在继续。1月上旬，南北双方达成秘密协议：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同意建立“共和政体”；然后举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接伍廷芳电后，立即复电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④

袁世凯在得到革命党作出转让政权的保证后，篡权野心不断升级，在帝国主义主子支持下，妄图解散南京临时政府，由清廷“授权”另行组织政府，借以摆脱南京临时政府业已确立的共和制度和革命党人的约束。孙中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虽然同意将总统的席位让给袁世凯，但维护革命成果和共和制度的信念则是坚定的。就在袁世凯提出这个篡权方案的当天，即有针对性地提出5条，^⑤让伍廷芳转电袁世凯。20日又连致二电请伍廷芳转告唐绍仪、袁世凯拒绝两日内取消临时政府的企图。并针对袁的阴谋，强调指出：“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

① 《总理全书》（电文），26页。

②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3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23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2卷，26页。

“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授权”。孙中山认为：“此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在所必争”。^① 22日，他又致电伍廷芳及报馆公开驳斥袁于北方另立政府的野心。他指斥说：“此种临时政府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谁人知之？纵彼自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之保证？”^② 29日再电伍廷芳，无比义愤地指出袁世凯以“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启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③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抗争，表现了他维护共和的坚定立场；打击了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使他们的阴谋“宣告破产”，遭到“不及预料的顿挫”。^④ 袁世凯被迫改变计划，转而迫使清帝退位。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抗争未能得到党内同志的支持，相反，党内的妥协势力不断扩大。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等极力给孙中山施加压力，高唱“功成不居”、“权力为天下之罪”，甚至攻击孙中山“恋栈”叫嚷“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⑤ 就连黄兴也“忍辱劝孙前总统禅位于袁。”^⑥ 孙中山在党内的处境已十分困难，被迫于1月22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5条件，并声明：“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⑦ 5项条件公布后，急于登上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于1月27日，授意段祺瑞等40多名北洋军官发出通电，强烈要求共和政体，对清廷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满清皇室中再没人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0—3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50页。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214页。

⑥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49页。

⑧ 《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⑦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35页。

敢反对退位了。2月6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12日，清帝正式下诏退位。

2月13日，袁世凯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所造成，亦民国无穷之光荣与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①这无疑是向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索取大总统的哀的美敦书。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以自代。同时，孙中山为了防范袁氏的反革命野心，辞职咨文附有3项条件：^②（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授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孙中山采取这样的措施，目的在防止袁世凯实行专制，危害民国。孙中山以为有了“参院”，有了“约法”，就能迫使袁世凯遵守宪法了。3月11日颁布的《临时约法》其用心亦在此。但是，他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③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进行大总统选举。到会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袁世凯以十七票当选。随后，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孙中山深知袁世凯不愿离开他的北京老巢南下就职的，所以，特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专使，北上迎袁。2月27日，蔡等抵达北京，袁表面上举行盛大欢迎，表示愿意南下就职。但暗中却唆使他的亲信曹锟的第三镇于29日在北京发动“兵变”，接着，天津、保定地区相继出现“暴乱”。于是，这场闹剧的导演袁世凯致电孙中山说：北方秩序未靖，商民“函电吁留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84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8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1卷，98页。

日数千起”，因而只好“尊重民意”，拒绝南下就职。

蔡元培等向孙中山报告北方“兵变”的情况后，党内、党外和社会舆论一齐出动向孙中山压来，这时，帝国主义又再次出面，纷纷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在帝国主义和妥协舆论压力下，孙中山维护共和的最后努力——奠都南京和新总统南下就职也被迫放弃。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孙中山的解职和临时政府的北迁，标志着革命遭到了严重挫折。孙中山为维护共和所能作的一切努力全部破产，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总代理人袁世凯所窃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交出政权后，企图依靠一纸约法和政党政治，以实现其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使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

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政党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在民国成立后则是历史的必然。孙中山在1913年3月1日的讲演中说：“今日欲巩固中华民国，政党最为紧要”。且说：“今日之政党比较从前之革命党实大有不同”前之革命党专事冒险和破坏，“与专制政体相对抗”，以推翻专制制度为目的。而今日之政党“均以国家为目的”，“均以国家为本位”。政党之用意在于“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政党有革命政党和议会政党之别；前者因专制既倒而告竣，后者因共和告成而方兴。因此，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党公开为资产阶级议会政党几乎成为同盟内部多数同志的普遍要求。但是，关于公

开时间、公开后的宗旨和任务等问题，无论同盟会的内部还是外部，各方面的认识和主张则是颇为歧异的。

同盟会本来即为几个团体的联合，其成员成份复杂，流品不一。武昌起义后，“皆不惮公然攻击同盟会”，“机械”、“专制”之谤不时于耳，纷纷要求“改为公开之政党”。曾任同盟会本部庶务部干事的刘揆一于1911年12月10日发表了《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会党名义书》，首先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凡从前所立党团“应请一律取消”。^①章太炎步其后，与立宪党人张謇一唱一和，高喊“革命军兴，革命党销”^②的口号。翌年1月，张謇致函黄兴说：“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③接着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均以公开为倡，声言“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宋意欲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也”。^④但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坚决反对上述主张。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召集了各省分部负责人参加的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在孙中山主持下，会议通过了改订《中国同盟会总章草案》，针对同盟会“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的涣散分裂局面，会议强调“唯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进而“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⑤会上，对“革命军兴，革命党销”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此谬说完全背离了同盟会“所持之主义”。会议严正指出：同盟会虽已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吾党之责任，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民生主义”，“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

① 《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1--62页。

② 《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0日。

③ 《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

④ 《黄兴集》，第141页。

《宋教仁集》下册，390页。

⑤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79页。

无遗”。同时郑重表示：“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以后，再定期召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阔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②这表明孙中山同意改组同盟会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但不同意取消同盟会名称和马上改组。

孙中山所以不赞成马上改组同盟会，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凡我同志，皆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党事。”^③二是“自己已执政权，倘又立刻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皆系同盟会，而又复似专制”。^④三是持其它政党之先出以行监督之责。因此，孙中山坚持保留同盟会之名称，暂不改组同盟会为公开议会政党。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的支持，1912年3月4日，江北第二军参谋长袁祖成致电黄兴，要求“将同盟会名目取消，改组政党”。黄兴在复电中明确指出：“同盟会初为秘密结社，原带政治性质，无非为联合民党、推翻帝制起见。……方今帝政虽倒，民国未固，本党尚多遗憾，必期克竟全功，既无解散之理由，复无取消之办法，自应改造政党，发阐政治。惟宜仍沿本党名称，留为国人纪念”。^⑤

孙中山这次整顿同盟会的努力，团结了部分同盟会干部，对组建南京临时政府起了积极作用，但却未能阻止多数同盟会员改组议会政党的意图。会后不久，美洲华侨同盟会会员伍平一，拟就《改组政党大纲》于1912年1月15日致函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提出“正宜乘此时机，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⑥3月初，全国出现了组党高潮。旧官僚、立宪党及各种投机政客纷纷组党，以与同盟会对抗，形势对同盟会极为不利。这时，同盟会内部自行设会组党，各行其事的现象更趋严重，使同盟会的实力大受影响。加之孙中山已让出大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81页。

② 《天铎报》1912年1月2日。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4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3卷，40页。

⑤ 《黄兴集》第141、166页。

总统职给袁世凯，同盟会亦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在未来国会中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讨论改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以为武装革命已告終了，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另一派“则以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广推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①前者以宋教仁为代表，后者以胡汉民为代表。争论结果，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派占了多数；同时，也争得了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同意后，大会决定把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大会制定并通过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②为协理 汪精卫为总务部主任干事 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改组后，会务有所扩张，“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致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③临时政府北迁后，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往北京。

新《总章》共7章34条，第一章《总则》规定：“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它的政纲共九条：

- 一、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
- 二、实行种族同化；
- 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
- 四、普及义务教育；
- 五、主张男女平权；
- 六、励行征兵制度；
- 七、整理财政，厘定税制；
- 八、力谋国际平等；
- 九、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①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2期第61页

② 黎因张振武案被去职并除名

③ 《天南日报》1912年8月19日

新《总章》与原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相比较，可以说有进有退，总的趋势力图与民主共和的建立相适应。革命精神有所减退，力谋国际平等和采取国家社会政策流于空泛无实际内容。地方自治、义务教育、男女平权、移民垦殖等项具有积极意义，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平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同盟会改组后，大批旧官僚、立宪党和各种投机政客纷纷涌入，成份复杂，流品不一，组织上严重不纯，使之“纯粹的革命党”“多变了官僚派”，①一般党员也“由铁血主义一变而为权利主义”。②因此，革命性较弱。孙中山和黄兴虽被举为主要领导成员，但孙、黄二人都不注重“党事”，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实际事务只是宋教仁一人操持，缺乏战斗力。

四、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辛亥革命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才有正规的、比较明确的、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使中国各族人民从满族贵族的“民族牢狱”中解放出来，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这种落后的政治制度便不复在中国存在。辛亥革命后，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遭到彻底的失败。辛亥革命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

《时报》1912年5月22日

② 《谭人凤集》第45页。

级民主共和国；此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辛亥革命后，由于民主精神的高涨，人民多少获得了某些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束缚和阻挠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和放松。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壮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的支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础。因此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从此，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它促进了亚洲人民觉醒，推动了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帝国主义在亚洲建立的殖民制度不断瓦解。列宁对这次中国革命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高度的赞扬，他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③因此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革命风暴，“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④

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的因素还在领导这次革命的政党——同盟会自身。

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同盟会从未提出过明确、坚决的反帝纲领，更没有反帝的具体行动和措施。同盟会始终抱有希望帝国主义能“中立”甚至支持中国革命的幻想，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然承认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赔款和借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

《列宁全集》第2卷，第448页。

款，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不敌视革命。同盟会在宣传中，虽然也反复地陈述了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并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表现出了义愤，但更多的则是将瓜分险况归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也就不会提出直接的反帝主张和具体方法。在同盟会发动的历次武装斗争中，没有一次是针对列强对中国的奴役、压迫的。他们不懂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首先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统治者和敌人，在不反帝的情况下，企图使民族独立、解放、只是天真的幻想。由于革命党人始终抱着软弱妥协的态度，从而使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从容不迫地策划扶植袁世凯的阴谋，破坏中国革命。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①“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②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如果不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没有他们的参加，任何阶级和政党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同盟会恰恰不了解这一点，同盟会没有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和发动农民的具体措施。革命党人虽然也曾联络过会党和新军，但对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做广泛地、深入地发动和组织工作，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在农村的社会基础。相反，他们漠视农民，不赞成农民用暴力手段夺取地主的土地，要求农民有“秩序”地实行“文明”革命，等待他们“永远不用纳税”的恩赐。因此，同盟会便失去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袭来时，只好妥协、让步、败下阵来。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③

同盟会的反封建斗争也是极不彻底的。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的主要目标是“排满革命”，“反满”的呼声淹没了反封建的

①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76、167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页。

斗争。在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大地主大官僚的斗争中更显得软弱无力，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袁氏的力量，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缺乏应有的信心；另方面寄希望于袁氏反正，赞成共和。他们以为无论由孙、袁谁来掌权，只要清帝退位，建立了共和制度，革命就大功告成。革命党由于政治上的软弱和幼稚，产生了对袁的轻信，使革命果实付诸东流。犯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①

孙中山和黄兴历来重视武装斗争，曾先后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力图通过武装革命来夺取政权，但他们所依靠的仅仅是“会党”和“新军”。革命党发动会党和新军，是他们在武装斗争中卓有成效的一项工作，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无论会党还是新军都不是革命党自己建立的武装力量，很难保证同盟会有绝对的领导权，而且缺乏组织性与纪律性，“器悍难制”，在实际运动中往往不听指挥和调动，又多数属于单纯的军事冒险，黄花岗起义即足资证明。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建立的民军，数量小，成份复杂，缺乏训练，战斗力弱。同盟会也未能主动地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使独立各省的军权多数落到旧军阀、立宪党和旧官僚的手里。这些人朝秦暮楚，对革命阳奉阴违。使同盟会在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斗争中，软弱无力，甚至一筹莫展。

同盟会作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只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们的阶级观点是十分模糊的。武昌起义时黎元洪亲手杀害了两个革命党人，后来又阻止革命士兵响应起义。起义胜利后，就是这个两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反革命刽子手，竟然被革命党人举为军政府的都督。由于革命党阶级阵线不清，至使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旧官僚、地主、买办、趁机钻进革命政权机关，窃取了领导权，在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武昌起义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435页。

后，各省的立宪党人纷纷附和革命，这并非坏事，但同盟会却被这种“咸与维新”的景象所迷惑，忘记了与立宪党人的原则矛盾和对立宪党人应有的警惕。不少人反而为立宪党人所操纵，在立宪党人的操纵下，一步步走向妥协，使革命迅速右转。

领导辛亥革命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原初就是几个小团体的松散联盟，传统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封建地域观念存在于党人的脑中，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开始就不统一，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早在武昌起义前就出现了组织分裂和派别活动，东京共进会的成立，光复会的重建，同盟会长江总部的建立都是组织上的分裂行为。这些团体与同盟会分门别户，争雄竞立，不受同盟会约束，严重削弱了同盟会的战斗力。武昌起义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深化，同盟会的派别分裂活动更加严重。章太炎最先脱离同盟会，与立宪党、旧官僚合流，另立“中华民国联合会”，把攻击矛头指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湖北派的孙武、刘成禺、时功玖、张振武等大骂孙中山为“海贼”，并与旧官僚和立宪党相勾结，组织小团体“民社”，“他们各有私图”，“以排斥南京政府”，“无视孙、黄及同盟会核心人物”。此外，谭人凤、汪精卫、宋教仁等不顾入党信誓，与旧官僚、立宪党人张謇、熊希龄、汤寿潜相“结纳”，从事派别分裂活动、攻击孙中山。辛亥革命是一次不成熟的革命，同时领导这次革命的政党——中国同盟会，也是一个不成熟的党。因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孙中山后来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说：“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扶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不致为其所乘”。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53期，242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下卷，521页。

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如革命需要一个好的党，通过政党来领导阶级、领导革命；革命需要有个真主义并拿主义来指导革命斗争；革命需要有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借以发动群众、号召群众；革命需要大造舆论，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革命必须坚持暴力夺取政权，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必须划清敌我友，团结朋友打击敌人，等等，是一笔珍贵的遗产，给后继者以巨大的影响和启迪。

第五章 民初政党的兴起与政坛风云

第一节 民初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

一、民初政党兴起的原因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胜利，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民初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就是突出的表现。武昌起义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各种名目的政党、政团、社团纷纷成立，如“过江之鲫”，“雨后春笋，蓬勃兴起。”^①不仅在上海、北京、南京、武汉等政治中心城市，即令如吉林、奉天、热河、贵州、云南等边远省区，“自立之政党亦有层出不穷之概。”^②仅广州一地，就有政团、社团百余个。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共和制度的建立，又为政党的成立与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他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③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辛亥革命前已有一定发展。辛亥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推行了多项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章

陆丹林：《革命史谭》第179页。

② 宗方小太郎：《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第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

程法规。长久渴望发展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异常活跃，认为“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①一时兴办实业的热潮勃然兴起，“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②据临时政府工商部的统计，1912年注册的厂家就有1504家，比1911年增加一倍，其中万元以上资本的厂家就有44个，资本总额为370多万元。1913年的设厂数超过了1300家，其中万元资本以上的有49个，资本总额达528万元。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活动提供了经济的基础和动力。不仅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而且许多政党政团都把“发展实业”或相似的主张列为政纲的重要内容，希望通过政党活动来开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初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又是近代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结果。在封建专制时代，集合结社是被严格禁止的。“士人以结党为畏途。”除了秘密结社外，公开的政党根本无从发生。辛亥革命的胜利彻底打破了这一禁锢，“今中国共和立国，有志之士，群起相仿效。”^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首次把结社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用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政党的存在及其活动具有了合法性，政党观念也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当时的报章舆论普遍认为，政党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共和制度“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④有人对政党的作用进行了总结，认为政党可以向国民灌输政治常识、培养国民“抉择政策善恶之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国民对政党政纲的赞成与否，了解舆论的向背，来决定政策；通过政党的活动可以化除国民种族、地域、宗教畛域，培养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2、849页。

③ 郭孝成：《民国各团体之组织》，《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3编。

④ 《民立报》1912年8月18日。

国家观念。^①甚至连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环球各国，皆恃政党与政府相须为用。”^②1912年9月，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取缔“秘密之集会结社”，但对于公开的政党的组织，由于“结社集会之自由载在约法”，不敢反对。^③

在政党观念深入传播的同时，政党政治也为人们普遍认可。民国建立之后，资产阶级中无论左翼右翼，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认为政党政治是导共和于“正轨”的必由之路。“政党政治虽非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规者。”^④他们希望组建政党和进行政党活动，使中国出现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两大政党竞争的局面，来推进共和宪政的建设。革命派的杂志宣称：“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以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抱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策以图进步焉。”^⑤立宪派的报纸也认为：“宪法政治之下，则必有扶植政府之政府党，于一方面则又必有反对政府之反对党。故一党在朝，以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判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⑥政党观念与政党政治思想的深入传播，对政党、政团的纷纭而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初政党的蓬勃兴起，还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息息相关。辛亥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出现了革命派、立宪派与封建军阀旧官僚三足鼎立之势。革命派自视为共和制度的创建者和维护者，他们对于让权于袁世凯虽然还未认识到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也感觉到袁世凯“极不可信”，出于这种感觉，他们认为“进步派人士苟不互相联络，互相结合，为一

① 《国民协会干事长温宗尧演说词》，《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3编。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3辑，第42页。

③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153号

④ 《盛京时报》1912年8月18日。

⑤ 《国民月刊创刊词》，《国民月刊》1卷1号。

⑥ 《党论》，《党报》，第3期。

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①为此，必须建立“强健而良善”的政党，作为共和制度的政治中心势力，对袁世凯有所钳制，从而使民国赖以不坠。武昌起义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失去了市场，但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立宪派并没有风流云散，匿迹消声。他们预见到，“共和既成立，中国将为政党世界，”而且自认为“今后建设之责，实在我党，”也亟谋组织政党，重新集结力量来参与政权。这一点，当时的报章即有披露：“前此已失败之主张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者，乘机而起，始则自为流派以组织政治上之结社，继则同声相应，合同而组成一大政团，为政治上之活动，抵抗改革派，以图揽政权，以恢复其旧日之势力焉。”但是，南北对峙的政治局势已使立宪派无法独树一帜，历史渊源的亲疏不同及作为资产阶级上层代表的政治性格所决定，立宪派投向了袁世凯一边，企图“借助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于各省。”^②这样，建立政党不仅是立宪派东山再起、继续与革命派对抗的条件，也是与袁世凯建立政治联盟的资本。这是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后组党十分活跃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能打垮封建买办势力。这一政治势力的代表就是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和旧官僚。他们利用革命派的妥协软弱窃夺了革命成果后不久，就开始了对革命民主派的反攻倒算。但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一段时间内民主潮流的高涨及革命派还具有一定实力的现实，又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暂时对革命民主势力作出让步，允许包括政党活动在内的民主形式存在并加以利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一方面指使他的亲信党徒组成各种名目的团体为其篡权窃国摇旗呐喊；一方面大力支持、扶植立宪派政党政团作为他的工具来与革命派斗争。上述表明，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三种

① 《民权报》1912年8月30日。

② 《民权报》1912年8月29日。

③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0页。

政治势力围绕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各方都以政党作为斗争的工具，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种斗争是政党林立局面出现的政治动因。

此外还需指出，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也影响到了民初的政党潮流。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涨。与辛亥革命前相比，民国初年的工人运动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斗争频繁发生，规模越来越大。1912年至1913年较大规模的罢工就有20余次，其中有些罢工斗争，人数达数千人。如广东顺德丝厂女工罢工达五千人，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达三千余户。其次是斗争水平提高，已由维护最低生存权利的斗争转向自发的经济斗争，要求改善经济生活和待遇。1912年7月至1913年6月发生在上海的17次罢工中，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就有12次。第三是工人阶级不满足于封建性的行会、帮口等组织形式，开始出现类似工会的组织，如1912年3月洛潼出现的铁路职工同人共济会，4月南京浦路南段职工组织的职工同志会，上海缫丝业出现的缫丝女工同仁会，5月江南制造局工人发起的制造工人同盟会，1913年5月汉阳翻砂工人成立的砂帮联合会等等。^①这些组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会组织，特别是其领导成分还比较复杂，但这些组织的出现表明了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的新局面引起了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意。在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曾进行过“社会主义”的宣传，一些报刊也只鳞片爪地介绍过欧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甚至个别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庸俗社会主

① 参见赵荣：《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

李时岳：《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华民国工党》，《史学集刊》1957年第1期。

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杂烩，他们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病态表现。他们自信有能力防止中国出现社会主义革命，方法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改良来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当辛亥革命后工人运动有所高涨后，他们便急于加以控制，以防出现阶级冲突的“莫大危险”。也有一些人感到蓬勃兴起的工人斗争是可资利用的一种力量，希图借助这种力量来获取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势。这样，在民初的一段时期里，又出现了一批自称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如工党、社会党、劳动党，自由党、甚至出现了“中国共产党”。^①这些政党的出现，使民初政党林立的局面显得更为斑驳陆离，五彩缤纷。

从总体来说，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是革命带来的新气象，也是民主政治潮流继续发展的一个象征。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成熟，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与力量的不足，也由于政党观念传播得还不充分，民初丛生的政党又呈现出种种病态。除了少数几个较大的政党外，多数政党都不与民众发生联系。即是这几个较大的政党，活动的重心也主要在社会上层，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和正式国会之中，所谓的政党活动实际上只是少数党魁的活动。由于多数民众游离于政党活动之外，民初的政党很难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成为如他们所期望的“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政纲是政党区别于其它社团的标志之一，集中地反映了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意志。是“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②但是，民初的数百政党政团中，具有较完整政纲的只有几十个，而且内容多雷同，从中几乎无法看出他们的区别。其余的政党政团或纲领不明，或干脆没有政纲。政党本是一定阶

① 《民权报》1912年3月31日，《盛京时报》1912年4月28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4页。

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代表，然而，民初政党的成分却十分复杂，既有革命派，也有立宪派，也有官僚政客。大致来说，这些政党政团分属两个阵营，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阵营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营垒，但是具体到一个阵营的内部，却很难分别它们各自代表了哪些阶层或集团。有些政党政团则纯粹是政客争权攘利、甚至“饮食奔走”的工具。政党成分的复杂带来了两个相关的奇特现象，一是政党的聚散分合变迁神速，这种变迁大都以党魁的利益为出发点，其聚也疾，其散也速，合也匆匆，分也匆匆，变幻莫测；二是跨党现象十分普遍，一个人同时加入几党并不罕见甚至“跨尽各党者 亦有其人。”^①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黄兴、黎元洪、伍廷芳、熊希龄、汤化龙、张謇、陈其美诸人，少者兼有六党籍，多则兼有十一党籍。民初政党的畸形与病态表明，它们与真正的近代资产阶级政党还有一定的距离，决定了在民初的政争中，政党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二、民初政党的迭兴

据不完全统计，自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新成立的公开的团体就有682个，其中政治类的团体312个，主要集中在京、津、沪、南、京、广州等地，而京、沪两地又占了二分之一以上。^②在这些团体中，不少既无章程纲领，又无固定的机构组织，甚至旋起旋灭，在报纸上刊出了一个发起宣言后就不见下文。真正有一定政治影响、有一定号召力的政党政团不过十余个。现将临时政府北迁前出现的主要政党政团概述如下：

国民协会 国民协会由张嘉璈、伍光建等人于1911年10月发起组织，1912年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名誉会长为唐文治，干事总长温宗尧，干事22人。成立后不久，唐、温借故辞去，国民协会又改举唐绍仪为名誉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国民协会的

^① 《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8册，第88页。

^② 张玉法：《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

政纲为统一国权、培养元气、发达民力。^①后来又发布九点政见：一、实行厘定行政区域。二、提倡实行地方自治。三、奖励移民实边。四、期望整顿并充实海陆军备。五、促进整理财政及刷新经济政策。六、保护农林、矿产者予以奖励。七、谋求振兴实业教育。八、注重国民外交。九、期望司法独立。^②国民协会的成员是立宪派及与其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和旧官吏。

国民协会发起之时，正值对武昌起义“四方响应、舆论翕从”之际。由于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的推动，国民协会持赞同革命、支持共和的态度。它宣布：“本会以谋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共和政体之完成为目的”，把“赞助临时政府之成立”列为它的重要任务之一。^③1911年12月下旬，国民协会针对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提出的改清帝为联邦国王、实行“虚君共和”的方案发表通电，指出君主专制已“万无存理”，民主共和为大势所趋，清帝必须退位。^④1912年1月初，它又联合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会等团体发表公启，号召人民“一鼓作气，坚持到底”，争取共和制度的实现。^⑤但是，在赞同共和的同时，国民协会又有明显的妥协倾向。它惟恐“战祸延长”，“伏莽乘之因而窃发”，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⑥又积极主张与袁世凯议和，对袁世凯寄以厚望，企图以妥协让步换得一个廉价的共和。所以，当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国民协会便转向拥袁，称袁世凯是建立共和的“元勋”，公开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攻击同盟会坚持袁世凯南下就职、定都南京是“直欲陷中国于无政府之地位。”^⑦而当国民协会被“袁氏股肱之徒”杨士琦、袁树勋“主

① 《大公报》1912年2月8日。

宗方小太郎：《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第96页。

③ 《国民公报》1911年12月28日。

④⑤ 《申报》1911年12月24日、1912年1月2日。

⑥ 《民立报》1911年12月24日。

⑦ 《京都日报》1912年3月6日。

宰”后，^①更是以同盟会的反对派自居。在陆征祥内阁风潮中，它毫无掩饰地为袁世凯张目，指斥同盟会挟持私见、有意纷扰，“陷国家于无政府之危，”^②建议袁世凯“勿拘牵临时约法之虚文，”“毅然独断，速组内阁。”^③已经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附庸。

社会党 社会党的前身是1911年7月由江亢虎发起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江亢虎在留日期间，曾耳食了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并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有过接触。1910年他又游历了英、法、德、俄数国，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走马观花式的考察，1911年回国后即开始“倡导社会主义”，于7月10日在上海发起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5日又经江亢虎提议改为社会党。

社会党由江亢虎任本部部长和党的总代表。初期领导人物还有自由党主席李怀霜及同盟会重要人物张继等人。社会党的政纲是：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④社会党成立后，支持建立共和制度，拥护革命党人的斗争。孙中山自海外归国后，它通电赞同孙中山任临时总统，对推进民主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社会党以“社会主义”标榜，“主张绝对平等自由，争取女子参政权，倡导民生主义，这些在当时都赢得了一些人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的支持，因而各地响应者颇多；党势之扩张恰如燎原之势正向全国蔓延。”^⑤它自己宣称，到1912年底，已有支部490余个，党员52万多人。^⑥主要是商、学界中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

宗方小太郎：《1912年中国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第96页。

②③ 《大公报》1912年7月23日。

《天铎报》1911年11月24日。

⑤ 宗方小太郎：《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第102、103页。

⑥ 《中国社会党传单》，转引自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第91页。

但是，社会党提倡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与中国“固有习俗观念”的杂烩，江亢虎本人也仅是一个以政党为资本，捞取个人权势的投机政客。因而，社会党不可能是一个有生命力、战斗力的政党。袁世凯上台后，社会党陷入逆境，遭到种种摧残压迫，江亢虎却极力主张对袁世凯逆来顺受，让步妥协。1913年8月，袁世凯下令解散社会党，江亢虎竟然置党事于不顾，一走了之，社会党也随之无形解散。

1920年夏，江亢虎自美返国。翌年6月，又以中国社会党领袖的名义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江亢虎宣布恢复中国社会党，1925年1月改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这时的江亢虎已完全堕落为封建军阀的走卒，新社会民主党不过是他招摇撞骗的工具。1926年大革命趋向高潮，他又将新社会民主党解散。1927年江亢虎转道美国赴加拿大。此后日益投靠反动势力。抗日战争中参加汪伪政府，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捕，1954年死于上海狱中。

民社 民社是两湖人士发起组织的政团，1912年1月16日成立于上海。民社总部设在上海，以吴敬恒为总干事，但它的大本营却在武汉，实际的党魁是黎元洪。骨干人物有原湖北共进会领导人孙武、“首义之士”汪彭年、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及政客孙发绪等人。在辛亥革命中，孙武等人即与同盟会存在着分歧，对同盟会纲领中的“民生主义”一点尤为反对。民国建立时，孙武等人自视功高勋重，却没能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谋得位置，因而对同盟会十分不满，遂投靠黎元洪，集合立宪派、旧军官及失意同盟会员，发起民社，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民社没有提出明确的宗旨，仅表示其“爱卢梭人民社会之旨”，“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①并制定了提倡军国民教育、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扩张海陆军备三条政纲。^②它的实

《天铎报》1912年1月21日。

② 《民声日报》1912年3月21日。

际活动则是维护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作用十分恶劣。它否认同盟会对武昌起义的领导作用，称同盟会“掠他人之功以为功”，攻击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日谋本党盘踞之私利”，^①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暂行报律》是“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之覆辙”，^②南京临时参议院是“亡国之参议院”，参议员“未必皆不为政府走狗”，不足以代表国民，要求另组国民会议取而代之。^③南京临时政府拟议举借外债以救燃眉之急，民社却诬称孙中山与黄兴以此来“长保”总长职位，“为运动大总统之用”。^④总之，几乎同盟会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所有举措，都在民社的攻击詈骂之列。

民社以同盟会为敌，就必然要站在袁世凯、黎元洪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一边。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民社极力抬高黎元洪的地位，鼓吹定都于武汉。当这一主张无人响应后，民社又转而支持袁世凯，宣称“舍南京不致乱，舍北京必致亡。”^⑤同盟会为钳制袁世凯，在《临时约法》中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民社也为袁世凯大鸣不平：“谓有内阁总理，而总统不负责任，则直视总统为君主矣。”^⑥由于政治上“与袁世凯接近”，^⑦民社成立后不久即谋求与其它亲袁政党合并，1912年5月，终于与国民协进会等政党政团合并为共和党。

中华民国工党 中华民国工党由徐企文、朱志尧发起，1912年1月21日成立于上海。朱志尧任正党长，徐企文、钟衡藏任副党长。以促进工业之发达，开通工人之智识、讲求救济工人之法，鼓吹工人尚武精神、主持普通工界人士之参政权为宗旨。该党虽然以工党为名，实际是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宣言书说：“惟文明愈进步，人道愈重，自由平等之幸福，人有应享之权，不能有所轻重偏畸于其间，于是工党出现矣。工党为

②③ 《民声日报》1912年3月15日、3月7日、3月3日、3月11日、3月16日。

⑤⑥ 《民声日报》1912年3月7日、3月24日。

⑦ 宗方小太郎：《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第88页。

联络感情、共谋进步、尊重人道、趋向平等，非专为反抗资本家而设也。”工党认为它与欧美的工党不同，欧美的工党持“破坏举动，其势力足以扰乱治安，破坏工业，甚至足以陷国家于死机而推其祸于资本家。”^①而它则提倡民生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来推进劳资合作，^②消除阶级对立。工党的成员也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工头、间或有工人隶属，也多为工头包办，“介绍全体入党”，而非工人自愿参加。^③工党自己也承认，它是工界之党，而非工人之党。^④

从阶级调和、以推动实业发展的目的出发，工党对工人的利益表现出了一定的关心。工党成立后，曾制定了一些计划，如设立工人医局、阅报书社、对工人演说，开办公余夜课教育、创办企业以解决工人就业问题，创办工人银行等等。这些计划多为纸上谈兵，实行者也多是昙花一现。对工人向个别“不人道”的资本家进行的斗争，工党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如1912年7月上海翻砂业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同年6、7月上海豆腐业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11月上海小木作工人的罢工斗争、12月上海银楼业工人的罢工，工党都曾参与其中，成立声援机构、代表工人诘问厂主，甚至直接组织领导。正式国会召开前夕，工党制定了“关于规定儿童工作、成年人工作之时间，星期休业，最少数之工金，以及劳动保险，罢工律等十余种议案，”^⑤准备在国会开幕后组织愿团请愿。这些活动在当时的政党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中华民国工党在政治上支持同盟会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赞同民主共和制度。徐企文曾数次组织宣传讲演，阐述“军人与共和

《民立报》1912年1月28日。

② 《太平洋报》1912年7月6日

③ 《申报》1912年3月26日。

《民立报》1912年1月29日。

⑤ 《民权报》1912年2月22日。

宪政之关系及工人对于共和宪政须力图进步。”^①工党推举孙中山为名誉领袖，表示拥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徐企文代表工党通电，要求袁世凯、赵秉钧辞职，“早受法庭之裁判，以谢天下而定人心。”^②1913年5月徐企文与柳人环、张尧卿等人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进攻上海制造局，被俘牺牲。此后工党也随之瓦解。1916年工党又由韩恢重建，改名中华工党，重新发布宣言及章程，但无大起色。后并入中华工界联合会。

统一党 统一党于1912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唐文治等17人为评议员，汤寿潜、赵凤昌、温宗尧等13人为参事。统一党的前身是以章炳麟、程德全为会长、1912年1月3日在上海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该会以“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③颁布了确定共和政体，建设责任内阁，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担等十条“假定政纲”。在反对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斗争中，中华民国联合会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它又把斗争矛头指向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章炳麟在武昌起义后，公开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同盟会离异。他发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联合部分对同盟会不满的原光复会员、立宪派及旧官僚，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百端待举、战和未定、未及设立民选参议院，建制亦不完备，该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趁机大作文章，进行含沙射影式的攻击，称“无民选组织之机关，主权所在不明”，“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宪法未定，阁既不设总理，总统府秘书官长，乃真宰相矣。”^④孙中山在让位袁世凯

① 《申报》1911年12月14日。

② 《民立报》1913年5月1日。

③ 《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

④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8日。

时，曾提出三条方法对袁钳制，第一条即“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中华民国联合会却声称“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主张定都北京，并要孙中山“不可以意气争也。”在临时参议院讨论时，部分参议员主张建都北京，孙中山对此非常气愤，咨回复议。中华民国联合会致电参议院，称定都北京为“天下公论”，要参议员以去就相争，“务望坚持”。^②

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后，这种政治倾向愈演愈烈，由反对同盟会进而拥护袁世凯。统一党所标榜的“统一全国建设，强国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的宗旨，不过是支持袁世凯统一革命党人、加强专制的代词。章炳麟对同盟会的攻击也变本加厉，称“南京政府既成，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同盟会“盖与贵胄世卿相等。”^④南京临时政府为维护共和，颁布报律三章，规定对破坏共和的报章停止出版，发行者和编辑也要“坐以应得之罪”，统一党立即表示“所定者又有偏党模糊之失”“绝不承认。”^⑤在组织发展上，统一党公开声言，要对“曾任北廷、南京两府人”严行甄别，“摒不入党”。^⑥而大批立宪派分子、旧官僚却被接纳。在张謇等人的积极谋划下，统一党很快即与民社等亲袁政党达成了合并协议，于1912年5月组成共和党。

统一共和党 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三政团合并而成，1912年4月11日在南京成立。蔡锷、张凤翔、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为总务干事，殷汝骊、张树森、彭允彝、袁家晋、陈陶怡为常务干事，吴景濂、景耀月、刘彦等20人为干事。统一共和党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

① 《时报》1912年2月13日。

② 《时报》1912年2月21日，《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

③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79页。

④ 《销弭党争书二》，《太炎最近文录》。

⑤ 《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7日。

⑥ 《国民公报》1912年5月7日。

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并订有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国统一、注重民生，采取社会政策、普及文化，融和国内民族、注重外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等12条政纲。^①

统一共和党内虽有不少同盟会员，但多是辛亥革命后迅速蜕化、与同盟会离心者。如总务干事、原为同盟会员的张凤翔就称：“同盟会以革命为宗旨，我即为同盟会员，现在革命目的已达，破坏之后急宜建设，故我注意于统一共和党。”^②该党实际上是个官僚政客集团。同其它的政治上右倾的政党政团一样，统一共和党也强调“国权”、“稳健”。该党领袖人物蔡锷说，统一共和党要采取“最有利于国计民生、最稳健之政策，”“务以国家为前提，……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故吾党主义，勿徒鹜共和之虚名，长国民凌轹无秩序之风，反令国家衰弱也。”^③

统一共和党因其中多政、军界人物，成立后发展较快。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成为仅次于共和党、同盟会的第三大党，占有26席。特别是东三省的参议员，几乎尽为统一共和党，因而吴景濂也“隐然有为党魁之景象。”^④谷钟秀、殷汝骊等人也成为党内的要人物。在临时参议院中，统一共和党以“第三党”自诩，宣称于共和党、同盟会之间“无所偏持”，“奔走于折中政纲之下而取调和之态度”，^⑤实际上却以第三党地位为奇货，以其自身的利益为依违，扩张势力。1912年5月，临时参议院选举议长，统一共和党与共和党提携，使吴景濂谋得了议长的席位。在陆征祥内阁风潮中，统一共和党先是附合共和党，企图能在新内阁中得占一、二总长，不料袁世凯与共和党食言自肥，统一共和党又转

《申报》1912年2月29日。

《秦风日报》1912年6月25日。

② 《蔡锷集》，第237页。

《申报》1912年6月22日。

⑤ 《平民日报》1912年9月1日。

向同盟会，与同盟会一起否定了陆内阁的第一次提名。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使统一共和党成为舆论之的，备受指斥，遂开始谋求与同盟会合并，1912年8月组成了国民党。

共和建设讨论会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林长民、孙洪伊、汤化龙等原宪友会成员发起的政团，1912年4月13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由汤化龙任主任干事 孙洪伊、谢远涵、刘崇佑、林长民、肖湘等均为重要人物。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立宪派分子及与立宪关系密切的旧官僚，由于成立较晚，跨党者颇多，汤化龙即有六党籍。该会奉梁启超为精神领袖，从发起成立到成立后的活动及政见的提出，许多方面都得到梁启超的指导。

共和建设讨论会不认为自己是政党，因而未发布政纲，只宣称“不入政界，专以指导国民为务。”^①但它在成立的同时，发布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详细地阐述了它的政见。共和建设讨论会提出中国的立国目标应是巩固、统一、经济强盛的“世界国家”，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施行“保育政策”，即政府对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干涉，“借国家政治之力，将国民打成一片。”“以范畴斯民”。而这个强固有力之政府必须是政党内阁。^②这一立国方针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按照欧美资本主义模式巩固和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愿望，提出了一些针对中国国情的很有见地的主张，但是却没有看到共和政权并没有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基本事实，这样，建设强固有力之政府的主张在实际上就成了加强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立宪派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必然要站在同盟会的对立面。但与民社等政团中的立宪派不同，共和建设讨论会主张直接联袁。该会的重要成员张嘉森说：“今后中分天下者，袁、孙二党而已。……目前舍择二派而提携之，别无他法。此二

^② 参见共和建设讨论会第一次发布：《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

者比较的适于建设之业者，实在北方”，因而“下手之方在联袁而已。”他们以为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可以将党势扩张于全国，然后再对袁取而代之；数年之后，虽欲不听命于我，安可得焉。”^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幻想。为了与同盟会对抗，共和建设讨论会从成立之日起，就积极活动，企图将反对同盟会的党团并为一大党。它和国民党协会一起先后与国民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党进行过并党协商，但都未成功。于是，便决定在同盟会、共和党之外发起第三党。1912年10月，它终于联合国民党协会、共和促进会等小政团组成民主党。

第二节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一、同盟会中心内阁的成立与瓦解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就成为同盟会与袁世凯斗争的新焦点。

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已使孙中山设计的调袁出巢、加以钳制的措施失去效用。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将原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的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③很明显，孙中山企图以国务员负责、对法令有副署权来限制袁世凯。因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亦不得不就范。”^④

对孙中山的企图，袁世凯十分明了。但在孙中山尚未辞职、同盟会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军队，被革命大潮冲得七零八落的反动

②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00页。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09—110页。

④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势力还没有完全集结起来的情况下，他还难以表示异议。因此，他虚伪地表示拥护约法，而把重点放在组织内阁上，企图通过亲信把持内阁，使责任内阁有名无实，成为他操纵号令下的傀儡政府。于是，袁世凯提出由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之一，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881年回国后，任职天津税务衙门，因被派赶朝鲜办理税务，为当时任“驻朝总理通商事宜大臣”的袁世凯赏识。此后又任外务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南北议和中，出任袁世凯的议和代表。由于唐绍仪有这一番经历，被袁世凯认为是组织傀儡内阁的合适人选。

在国务总理人选问题上，“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提出同盟会员。总理通过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名单，请参议员投票。”^①与袁世凯尖锐对立，争持不下。最后由列席会议的立宪派旧官僚赵凤昌出面调停折中，建议由唐绍仪任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孙中山、黄兴等人考虑到唐绍仪毕竟受过西方民主制度的熏陶，与旧官僚有别，而且在南北议和中尚能持平，力促实现共和、和平统一，遂作出让步，表示同意。

3月25日，唐绍仪至南京组织内阁。对阁员人选。袁世凯也早有策划。在他首次提出的名单中，外交、内务、陆军等要害阁部均由其亲信掌握，海军一席虽提名革命党人蓝天蔚，“盖决料海军中人必出面反对，故借此以达排斥民党之目的耳。”^②只将司法、农林等二、三闲散阁部留给同盟会。^③这一提名遭到同盟会的抵制，特别是陆军总长一席，争执尤烈。不少同盟会员、革命军将领要求由黄兴担任。同盟会控制的临时参议院也以袁的提名与3月13日通过官制大纲不合而要求另议。为了缓和同盟会的反对情绪，袁世凯又放风说准备以黄兴任陆军总长，并称“一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6—197页。

② 《民权报》1912年4月20日。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17页。

切由唐绍仪面达。”但当黄兴表示任职须有筹款与用人之权后，袁世凯立即复电反对，仍坚持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并声称：“非段祺瑞掌陆军，世凯即辞总统之职。”北洋军警的“军界统一会”通电鼓噪，声称陆军总长一席非段莫属，黎元洪也通电表示：“现在共和成立，南北一家。……国务各员，但须择学识经验确有专长，无论新旧南北，皆当协力赞成，以靳成立。”^②为袁世凯张目助威。

在双方争持不下之际，立宪派按袁世凯的旨意再次出面调停。赵凤昌、张謇等人大肆活动，声称“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内乱外交，均极纷逼，倘再迟延，必致不测”，告诫同盟会，在陆军总长一席上，“北方亦有万难，”^③建议由段祺瑞任陆军总长，而把有名无实的参谋总长让予黄兴。在袁严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下，同盟会再次让步，同意段祺瑞出掌陆军。

3月29日，唐绍仪向参议院提出各部总长名单：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梁如浩。结果除梁如浩外全部通过。最后改由施肇基出任交通。3月30日，袁世凯正式公布阁员名单，同时公布了黄兴为参谋长的任命。同一日，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设宴招待唐绍仪，席间由黄兴、蔡元培作介绍人，唐绍仪宣誓加入同盟会。4月20日，唐绍仪、蔡元培、宋教仁等到达北京。次日，宣告内阁成立。

唐绍仪内阁中，计有同盟会员五人：唐绍仪、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王宠惠。另外，赵秉钧与刘冠雄也在内阁成立后不久挂名同盟会。在各部次长中，隶籍同盟会的有陆军次长蒋作宾、工商次长王正廷。秘书长魏宸组也是同盟会员。由于阁员中同盟会占多数，又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在实际上，

① 《民权报》1912年4月5日。

② 《中华中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19页。

③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83—1084页。

它却是一个由北洋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混合内阁。赵秉钧是袁世凯培植多年的心腹党羽，自称“于新知识毫无所得”，刘冠雄“本海军旧人，资格甚深，与项城夙有恩谊”，^②二人虽列名同盟会，却是不折不扣的袁党。段祺瑞是袁世凯得力的左膀右臂。熊希龄为立宪派，此前加入统一党，后又入共和党，与袁派基本上沆瀣一气。陆征祥、施肇基虽无党派，但也唯袁世凯之命是从。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同盟会根本没成为“中心”。

由于袁世凯的控制与操纵，唐内阁从成立时起就矛盾重重、危机不断。在用人上，内务、陆军、海军、财政等部争相任用北洋旧官僚，排斥由唐绍仪推荐或自南京带来的“民党”，许多重要职务，如外交次长、内务次长、财政次长、交通次长、海军次长、教育次长、司法次长等，都为旧官僚或立宪派把持。赵秉钧以“会议时关系本部之事甚少”为由，^③拒不参加国务会议。陆征祥在内阁成立后月余才蹒跚就职，而且也以不赴国务会议、不管部务为条件。^④刘冠雄自6月起借口营造私宅，不到部视事，施肇基以“疗疾”为名常驻天津。在国务会议中，段祺瑞等人极力反对同盟会阁员划清总统与内阁的权限、内阁一致行动的主张，宣称听命于袁世凯，持阁务“独立主义”，而且动辄以辞职相要挟。^⑤

袁世凯不仅从国务院内对部责任内阁加以破坏，还在立法上施展阴谋，对责任内阁的权限进行限制。5月28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法制局对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务院官制》及《各部官制通则》提出七点修正。通过修正，把责任内阁的权限大为压缩，把各部官员的任免权抓到了自己的手中。^⑥

① 《申报》1912年5月16日。

② 《远生遗著》卷2，第17页。

③ 《远生遗著》卷2，第8页。

④ 《申报》1912年6月15日。

⑤ 《远生遗著》卷2，第6页。

⑥ 参见《申报》1912年6月3日、6月25日、7月9日《要件》栏。

袁世凯的这些独裁措施，使他与唐绍仪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起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是视唐为其党羽，让唐作他的总管，正如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此政体之确定，外唐内梁（指梁士诒——引者），皆袁氏之左右手。”但唐绍仪自组阁后，思想倾向有所变化。同盟会的《民权报》曾说：“唐氏又为粤人，广东者，中国革命之产地也。唐又为美国之留学生，美国者，共和之先进国也。有此二因，而唐氏南来，又受革命之感化，此唐所以深表同情于革命也。”这一分析未必全面，但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及在南北议和和南下组阁中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无疑是他思想变化的重要因素。组阁时他曾赞同以黄兴任陆军总长，并为此致电袁世凯，要求同意。内阁建立后，他不肯事事对袁俯首听命。在裁军、任人、国务院权限等问题上与袁世凯意见相左，强调自己的“责任”。他认为“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革命党合作不可。”^③有人曾说，“共和以后之实权，实在唐手。唐所行之事，项城不敢不行，而项城所令者，则唐往往搁置。”^④虽言过其实，但也透露出袁、唐之间的矛盾斗争情况。对此，袁世凯当然不满，对唐绍仪的猜忌也日甚一日。二人的矛盾终于在借款问题上公开爆发，演成政治风潮。

还在南下组阁之初，为解决财政困难、筹措遣散南方军队的所需款项，唐绍仪曾抛开企图垄断对华借款权的帝国主义银行团，向比利时单独借款，引起了银行团的不满。唐绍仪返回北京后，银行团即提出抗议，要求唐绍仪取消比款，并向银行团“谢罪”。同时，银行团还施展卑劣手段，阻挠承借的华比银行在法国发行债券，使借款无法续付。^⑤由于财政问题已成燃眉之急，

《远生遗著》卷2，第5页。

② 《民权报》1912年6月27日。

③ 岑学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22页。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045页。

⑤ 《远生遗著》卷2，第2页。

在银行团及袁世凯的压力下，唐绍仪被迫同意取消借款，向银行团道歉，然后继续向银行团商洽借款。但是，帝国主义银行团却得寸进尺，提出中国必须同意每月开出预算，由外国顾问核准支用、用于遣散军队的支出须由外国武官会同监督，才能予以借款。这两项带有侮辱性的严酷条件，遭到同盟会和爱国舆论的强烈反对。鉴于此，唐绍仪拒绝了银行团的蛮横要求，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唐绍仪的作法，使袁世凯大为恼火。袁世凯不仅急需通过借款来加强他的北洋军阀势力，也急需通过借款来与帝国主义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因此他“直斥唐之举动的非国民之福，”改派熊希龄与银行团继续借款交涉。共和党、统一党也齐声鼓噪，“力攻唐总理。”^③5月20日，临时参议院举行会议讨论借款问题，共和党议员李国珍等人“痛责唐前后外交失败，几置民国于绝地，实辜负民望，不胜总理之任。”共和党、统一党的报纸也对唐绍仪“无日无丑诋痛骂，”^④企图推倒唐内阁，然后抬出张謇组阁。这一图谋，张謇本人有过透露。他说：“窃意此次共和党之对付少川，固因南京积忿，……日前黎宋卿有电促謇入都，而党中诸人亦有电来，……盖一恐以运动借款之名相加，一恐以组织内阁之事相拟。”^⑤

通过借款问题发动了对唐绍仪的围攻后，袁世凯又在王芝祥任职问题上公开破坏责任内阁副署制度，终于迫使唐绍仪辞职，逼垮了责任内阁。

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为调和南北，曾提议重新安排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都督的人选，以此作为同盟会让步的条件之一。根据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意见，唐绍仪拟由王芝祥任直隶都督，^⑥在革命党人的活动下，直隶省议会也作出了公举王芝祥为都督的决议。这一安排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表示“俟其北

^③ 《申报》1912年6月17日、5月29日、5月30日。

^④ 《张季直传记》，第209页。

^⑤ 《盛京时报》1912年4月12日。

上，即行委任。”但袁世凯的目的，只是以此诱使同盟会妥协，他根本不会允许在北洋腹地出现一个同盟会员都督。因此，当王芝祥于5月26日应召到京后，袁世凯便授意直隶五路军警通电反对，声称直督一职，非“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难资镇摄”^②。袁世凯装模作样地斥责直隶军警的通电“殊越军人之分际，”宣称“任免之权，应由中央主持，”^③但是却以此为由，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对此，唐绍仪十分不满，认为这是“无端失信”。表示决不副署这一非法任命。袁世凯置唐绍仪的反对于不顾，将未经副署的委任令强行发表。袁世凯对责任内阁制的公开蔑视和践踏使唐绍仪忍无可忍，遂于6月15日出走于天津。不久，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等人也辞职，“同盟会中心内阁”随之瓦解。

唐绍仪内阁的倒台，是袁世凯公开破坏《临时约法》造成的。但也不能不看到，这又是同盟会斗争不力、没能给予有力支持的必然结果。同盟会完全忽视了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使“同盟会中心内阁”缺少可靠的支持力量。临时政府北迁后，在南京还有十余万民军。黄兴辞参谋总长不就，被袁世凯任命为南京留守，“统率南方军队”。但袁世凯的目的，却是要利用黄兴的地位与名望来将这批令他日夜不安的武装力量遣散。为此，袁世凯一面制造革命党人拥兵自重、破坏统一的舆论，一面在财政上扼制黄兴，迫使黄兴辞职，放弃军权。对袁世凯的险恶用心，黄兴不仅没有觉察，反而认为“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能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在遣散绝大部分民军后，黄兴主动辞去了留守职务。在黄兴辞职、退居上海的第二天，袁世凯即逼走了唐绍仪，这决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在内阁

① 《民立报》1912年6月19日。

② 《太平洋报》1912年6月4日。

③ 《政府公报》1912年6月9日。

④ 《民立报》1912年5月15日。

问题上，同盟会态度不一，甚至同盟会阁员之间也意见分歧。由于唐绍仪与袁世凯曾有过特殊关系，此时虽加入同盟会，仍有不少同盟会员对其怀疑，认为唐是袁的走狗，采取了一些过激的作法。如同盟会激烈派掌握的《民权报》就不加分析地将唐绍仪与袁世凯等量齐观，认为“今日所谓总统及内阁总理与各部代理大臣，为往日中国之蠹贼者，什之八九”。^①甚至将唐绍仪与袁世凯、熊希龄、章炳麟同列为“国民之公敌”，称“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②同盟会阁员也没能团结一致。陈其美始终不赴任，宋教仁对唐绍仪的成见也很深，唐绍仪拒绝银行团的借款条件，宋教仁则“力陈理、势之不可行”，“主委曲求全”^③。在参议院中，同盟会也未能有力地回击共和党。统一党对唐内阁的攻击。在借款、直督等问题上，同盟会根本没有一致的党议，而是个自为战。这种涣散软弱是唐内阁瓦解的重要内因。

二、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思想与组党活动

唐绍仪内阁的倒台，对同盟会是一个重大刺激，加快了同盟会改组为“强大真正之政党”的步伐。这次改组活动，宋教仁是主要的倡导者和主持者。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2年3月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他被推举为政事部主任干事，负责研究政治问题，草创政见，实际上是这一阶段同盟会政治斗争的领导者和政治理论的设计者。“政党政治”思想是他的政治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改组活动的指导方针。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就认真地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西方的政党活动与政党理论都有着比较充分的了解。民国建立之后，与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宋教仁也认为“破

《民权报》1912年4月17日。

② 《民权报》1912年5月20日。

③ 《远逝遗著》卷2，第3页。

坏时期”已经结束，开始了“新的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应充分利用政党政治与“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进行斗争，巩固共和制度，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为此，他对政党与政党政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

宋教仁指出：“国家之所以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恒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纲维之。”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在国民全体，因而“国民合成心力普遍于全部，”“事实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也就有责任、有义务来维护共和制度。但是由于国民的思想、知识、能力不可能完全相同，不能人人直接参与，就必须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来承担义务“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这些国民中少数的优秀分子，“在法律上为组成议会与政府，代表全部国民，在政治上，则集合为政党，来领导全部国民。”囿于阶级、时代的限制，宋教仁还认识不到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但他意识到了政党是历史发展到“共和宪政”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意识到了政党由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所组成，应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还是抓住了政党的某些基本特征。

政纲是政党的必备要素之一，集中反映了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与意志。“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①宋教仁也强调政纲对于政党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要建设一个强健良善的政党，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纲领，要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这样，才可以使政党区别于其它的社会团体，有了正确的政纲，就会“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民利福之薪向。”^②宋教仁重视政见与政纲的制

① 《宋教仁集》第7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4页。

定，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到再次改组为国民党，重要的政见政纲不少出自宋教仁之手。

政党不仅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宋教仁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如何，取决于运用政治的中心势力。“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而在共和立宪的国家里，“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②强健而良善的政党是巩固和推进共和制度必不可少的力量，是扶危济倾的中流砥柱。他认为，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政党是“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代表民意与舆论的向背，对政治产生影响；第二，政党通过其活动，实际左右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议会与政府“不过藉法律俾其意思与行为为正式有效之器械，其真能发纵指示，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则仍为事实上之政党也。”^③这种政治中心的地位与作用，是其它社团无法取代的。

帝制的倾覆与民国的建立，为资产阶级政党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教仁认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见解，同他们奋斗。”^④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当然会使政党的斗争任务、斗争方式发生变化，从这一点来说，宋教仁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区分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把革命党与政党截然分开，只注意公开的合法斗争，忽视甚至完全排除了一定条件下非法斗争、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却不能不说是宋教仁政党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这种认识，并不是宋教仁所独具，包括孙中山在

《宋教仁集》，第748、230页。

②③ 《宋教仁集》第747、748—749页。

④ 《宋教仁集》第450页。

内的许多革命党人都认为，民国的建立，是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实现，革命的铁血主义、破坏手段已经不复需要了。满足于表面上的胜利，看不到政权已被封建势力所控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政治上软弱与不成熟的突出表现。相对而言 宋教仁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要比其它革命党人清醒一些。他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故今而欲察吾国今日为何种政体，未能遽断。” 宋教仁已觉察到，在袁世凯掌权的情况下，共和政体有向独裁专制发展的可能，为了防止这一恶果的出现，必须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因此他对政党政治进行了热情的宣传与详细阐发。

宋教仁指出，在共和制度的国家中，政党政治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民主政治形式。“政党政治虽非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轨者。”所谓政党政治，即是由两大政党以合法手段进行竞争 或“进而组织政府 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实现政见，或“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已处于监督地位。”^②这种党争，一方面是以政见政纲吸引国民，得到国民的支持，一方面通过政见政纲战胜敌党，从而取得议会多数，控制政权，贯彻己党的主义与政纲。通过这种“宪政轨道”上“相摩相荡”的党争，使政治日益向上，共和制度也就有了牢固的基础，同时、政党自身也在这种斗争中得到发展，“己党发达，”“反对党亦发达”。^③

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又是与责任内阁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责任内阁制 即“内阁实行负责 凡总统命令 不特欲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④但是，责任内阁

① 《宋教仁集》第459页。

② 《宋教仁集》第748页。

③④ 《宋教仁集》第421、489页。

必须由政党组织，既不能是几党联合的混合内阁，也不能是无党派的超然内阁，只能是“纯粹的政党内阁。”“盖必须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宋教仁所以坚持责任内阁制，是因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②但更深的含意则在于，宋教仁企图以政党组织责任内阁的方法来挽回革命党人已失去的权力，限制和架空袁世凯，进而使政权真正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是宋教仁“政党内阁论”的政治意义之所在。

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后对封建势力的继续抗争。宋教仁对这一思想的宣传对于民初民主潮流的发展，对于共和观念深入民心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也是一种揭露和打击。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与政权被封建势力窃夺政治现实没有为政党政治的实现提供充分条件，宋教仁又过份夸大了政党政治的作用，不了解政治斗争的复杂，结果，不但未能实现政党政治的理想，反而为此而惨遭毒手，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悲剧。

宋教仁认为，建立一个“强大真正之政党”是实现政党政治的前提。因此，在武昌起义后不久，他就积极主张将同盟会改组。1912年3月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但宋教仁对此并不满意。改组后的同盟会，虽然拉进了一批人马，但党势的扩张并不明显，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中，所占席位已落后于共和党。由于孙中山、黄兴等人对政治的冷淡，同盟会既未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又未提出系统的政争策略，涣散依然如故。同时，部分下层同盟会员愤于革命成果的丧失，在各地进行了一些新的反抗斗争，但由于得不到同盟会上层的领导，基本上流于暗杀、暴动等自发形式，不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反而遭到舆论的指摘。宋教仁认

①② 《宋教仁集》，第490、46页。

为，这种“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①鉴于这种状况，在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宋教仁再次提出改组主张，希望通过新的改组对同盟会加以整顿，以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

宋教仁的主张得到了张继、张耀曾、胡瑛、孙毓筠、魏宸组等同盟会重要人物的赞同。他们初步提出“以同盟会旧部作悬亲会，以为前清革命之纪念事业，即在会中易拣选人才，另行组织政党，以吸收新党员，扩张党势。”^②1912年7月14日，同盟会本部召开会议，宋教仁等人正式提议将同盟会改名为民主党，“淘汰会员，改良组织”，^③“为淘汰流品及融合新旧起见不能不有此一著。”这一提议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认为同盟会“经国中志士群策群力，数十年之辛苦经营，革命始达目的，”对此弃置不顾，“未免忘同盟之名义”。一些人甚至提出，“以性命拥护之，不能更易一字。”双方辩论激烈，“拍案争执，声震户外，至有言之愤极而泣下者。”^④由于多数反对，宋教仁等人的提议被否决。

但是，宋教仁等人并未因此而放弃改组主张。袁世凯在逼垮唐绍仪内阁后，又以武力威胁手段压迫参议院通过了陆征祥内阁。这一现实使宋教仁感到，必须“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才能抵制袁世凯，实行政党内阁的主张。不少同盟会会员也因政党内阁主张失败，“委建设共和于向来反对共和者之手，危险万分”^⑤而态度有所转圜，赞同改组。7月21日，同盟会本部再次开会，宋教仁、张耀曾、孙毓筠分别被选为总务、政事、理财部主任，这表明，改组的主张实际上已被多数人接受，改组活动也随之全面展开。

① 《宋教仁集》第390页。

② 《申报》1912年7月11日。

③ 《申报》1912年7月23日。

④⑤ 《远生遗著》卷2，第68页

⑥ 《申报》1912年7月29日

三、国民党的建立

在宋教仁等人的积极主持下，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党派，正式改组为国民党。

国民党的前身是1911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和研究会，次年3月改称国民公党。国民公党以岑春煊、伍廷芳、程德全为名誉总理，王人文为总理，温宗尧为协理，实际主持者是王、温二人。国民公党宣布的宗旨是：“组成健全政党，制造真确舆论，巩固民国基础。”^①又提出五点政纲：一、实行平民政治，二、整理地金，减轻苛税；三、尊重法律，拥护人权；四、调剂国用，休养民力；五、提倡国民外交。^②国民公党在宣言中解释说：“倘不组织健全之政党，主持正当之舆论，躯壳虽新，精神犹茶，欲错国于不倾之地，席民于不危之府，无异使蟹捕鼠。”又说：“发起国民公党，冀合五大民族，力扶元化，以国民为前提，事为民利，众共举之，事为民害，众共除之。”^③可以看出，国民公党的政治主张与共和党、国民协会等政党有所区别，没有强调几乎成为拥袁代名词的“以国家为前提。”其成员也有不少兼有同盟会籍，这是它与同盟会合并的基础。国民公党成立后，曾与同盟会呼应，通电反对以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向帝国主义银行团借款。在陆征祥内阁风潮中，它通电表示，超然内阁与混合内阁“均非正办”，要求同盟会阁员“各安其位，暂勿更张。”^④当然，国民公党与同盟会并非完全一致，这一点在合并过程中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

国民共进会是1911年11月由王宠惠、徐谦等人在天津发起

① 《时报》1912年4月21日。

② 《民立报》1912年5月17日。

③ 《申报》1912年4月19日。

④ 《申报》1912年6月24日。

的政团。1912年3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会长伍廷芳，副会长王宠惠实际主持会务的是徐谦、徐世英、王荃善诸人。国民共进会以“完成健全共和政体”为宗旨，以尊崇国家主义、反对政治复古、同化五大民族的政纲。^①该会成立后，支持建立共和，对袁凯有所抵制。曾提出北方各省都督应仿南方方法，实行民选，以防官僚政治复活。国民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发展并不大，仅有会员三百余人，但多为政界人物，“且以在法部者占多数。”^②王宠惠、徐谦即为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与次长。许世英为大理院院长。财政次长陈锦涛也是该会成员。由于在政界有一定实力，国民共进会积极谋求成一大党。唐绍仪内阁倒台后，王宠惠等人连带辞职，自建大党的计划受挫，遂开始寻求与其它大党合并。

共和实进会是1912年2月在北京成立的政团，重要的人物为晏起、董之云、许廉、夏仁澍等，以“监督政府，发表意见，铸造健全之舆论”^③为宗旨。该会成立后，虽在建都问题上附和过北洋势力的主张，但总的倾向是对袁世凯有所斗争。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后，共和实进会致函严词诘问，对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表示赞同责任内阁制。1912年6月，北京北洋军警非法拘捕《中央新闻》的总理与主笔，共和实进会通电抗议这种干涉言论自由、违反约法的行为。^④在唐绍仪内阁倒台后，它曾赞同超然内阁的主张。后见陆征祥“不孚众望”，又转而赞同政党内阁，支持同盟会。这是它能与同盟会联合组党的一个因素。

在同盟会酝酿改组的同时，统一共和党也在筹划合并组党。1912年5月以来，统一共和党为扩张党势，曾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公会等政团联络合并，但未成功。唐绍仪内阁倒台后，统一共和党又与国民公党商议合并，目的在于借助国民公党首领

《京津时报》1912年4月14日。

② 《申报》1912年8月23日。

③ 《共和实进会简章》，《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2期。

《民立报》1912年6月6日。

岑春煊、王人文、温宗尧等人的名望，在合并后“独立组织内阁。”国民公党在参议院中毫无势力，也希望利用合并挤进政权，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在陆征祥内阁风潮中，统一共和党曾与同盟会一致行动，否决了陆征祥内阁的第一次提名人选，又与同盟会一同受到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和共和党的攻击，共同的处境使“两党感情日渐密切。”^①因此，统一共和党就成了同盟会联合组党的主要对象，国民公党也随之参与合并活动。

8月初，双方的合并谈判正式开始。统一共和党虽然赞同合并，认为“为推翻现内阁计，除两党联合一致外殆无他策”，但并非与同盟会完全志同道合。其中以吴景濂为首的“北派党员”与同盟会更是“积不相能”，他们主张联合不过是“为目前抵制共和党计。”^②因此在谈判中提出了变更同盟会名义、废弃民生主义、改良内部组织的苛刻条件。^③国民公党也趁机提出取消男女平权一条。同盟会为求合并成功，“利用此策为正式国会竞争选举地步，”“皆一律服从。”^④8月8日，三党订立草约，并初步拟定新党规约。与此同时，国民共进会与共和实进会也加入合并。

8月25日，五党团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国民党成立。于前一日到北京的孙中山莅临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大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翔、贡桑诺尔布为理事，胡瑛、胡汉民、谭延闿、阎锡山等29人为参议，溥伦、徐绍桢、钮永建等七人为名誉参议。国民党本部设在北京，本部中设总务部（主任干事魏宸组、殷汝骊，分机要、文牒、地方、党籍、庶务五科）、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恒钧，设联络、视察两科）、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设考察、选举、讲演三科）、文事部（主任干事彭允彝、杨

^② 《申报》1912年8月18日

^③ 《民立报》1912年8月18日

^④ 《申报》1912年8月18日。

光潜、设编辑、出版、教育三科)、会计部(主任干事仇亮、陆定,设收入、支出、管理三科)、政务研究会(主任干事刘彦、张耀曾,设法制、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军事、社会、民政、边事十科)。各地设支部与分部。在上海、芜湖、保定、汉口、九江设交通部。^①

8月13日发表的《国民党宣言》称:“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故须其名曰国民党。”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具体政纲为五项:“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待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②较之改组前的同盟会,国民党的宗旨及其政纲的革命民主色彩和斗争精神有所减弱,取消了“男女平权”,将“实行民生主义”改成了“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平和。”为了壮大人马,同盟会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因此,同盟会的改组曾使某些共和党人产生了幻觉,认为宋教仁“专选优秀稳健一派而遗其暴烈分子,且欲牺牲其民生主义,以冀有完全之政党出现,此吾所深欢迎者也。”^③但是,仅据此即认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向立宪派政治立场靠拢,断定国民党是堕落的产物或毫无原则的政党则是错误的。

首先,改组后的国民党虽然人员较为庞杂,混进了不少官僚政客,但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为代表的民主派的核心与领导地位没有变。宋教仁是改组的主持者,孙、黄二人对改组积

① 《国民党本部职录》,《革命文献》第41辑,第73—78页。

② 《宋教仁集》第749—750页。

③ 《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0日。

极支持，“主持甚力，并愿取消总理制改为理事制，于将来清理党籍问题，黄克强君并愿完全负责任。”^①在改组初步议妥后，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各地支部，认为所定宗旨政纲“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表示“深为赞成”。^②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因致力于铁路计划而坚辞理事长一职，但对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斗争策略、选举方针仍十分热心，大力支持。^③

其次，改组后的国民党仍坚持了民主宪政的原则，强调民权与平民政治，维护共和制度。它公开宣称，中国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共和立宪国之中心势力”，^④取得议会多数组成政党内阁，以使民国名副其实。因此，说它是以争取议会多数为唯一职志的政党尚可，进而推行为无原则的政党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三，改组后的国民党，没有改变反袁的斗争方向。国民党坚持的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就是反袁夺权的政治纲领。宋教仁多次指出，政党内阁就是要使总统“无责任”。国民党的成立，也正是出于反对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斗争需要。在袁世凯利用共和党、统一党等党派为工具、逐步推行独裁政策的情况下，“进步派人士苟不相互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⑤国民党成立后，由于孙、黄入京与袁会谈的影响，曾一度与袁“提携”，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是与袁世凯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些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引起了袁世凯的恐

《盛京时报》1912年8月16日。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5页。

③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④ 《宋教仁集》，第748、749页。

⑤ 《民权报》1912年8月30日。

惧。

第四，国民党并非完全放弃了同盟会的斗争精神和纲领。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指出：“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在国民党的政纲中，“民生政策”虽比原来的民生主义语意模糊，但从其解释及宋教仁等人后来的阐述看，二者并没有重大的不同，“即国家社会的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②对取消“男女平权”一点，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解释说，这“本同盟会所主张之政纲，将来男女平权，亦必当然之事。惟现在当以国事为重，如国家不保，不但女子不能自由，男子亦不能自由。”^③因此，暂时“置为缓图”。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看，维护共和、抵制袁世凯的独裁专制显然是最急迫的任务，在改组中，宋教仁等人按斗争任务的轻重缓急处理政纲问题，突出民权主义，对民生主义加以变通，对男女平权采取暂缓的方法，来争取反袁力量的一致，不应加以苛责。

上述表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不是无原则的倒退，也不是向立宪派政治立场靠拢，而是仍然坚持了革命民主的立场，坚持与袁世凯斗争。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国民党仍是革命民主势力的中心旗帜。

当然，国民党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不仅表现在政纲趋于“稳健”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内部意见分歧、成员庞杂、组织基础的不稳上。国民党议员之间、议员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在不少问题上各执己见，步调不一。地域主义与小团体的色彩随处可见。国民党成立后不久，共和实进会就因理事中无该会人选，仅三人

《宋教仁集》，第456、486—487页。

② 《宋教仁集》第456页。

③ 《申报》1912年8月31日。

“ 备补参议 ”，在共和党的策动下宣布独立。^① 由于在组织发展上提倡新旧合作，不少官僚政客混迹其中。陈其美在总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曾说，国民党“ 分子复杂，薰获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复雨而翻云。”^② 这虽然反映的是二次革命中国民党的情况，但这种趋势却是在国民党成立之初就已存在。国民党自诩“ 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 民众信赖我们”，^③ 然而在实际活动上，却日益与民众疏远。更为致命的是，国民党全力注重于议会斗争，却忽视了在资产阶级没有完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议会斗争要有武装斗争为后盾。这些弱点决定了国民党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节 临时政府北迁后立宪政党的组合分化

一、共和党的组成与统一党的复出

临时政府北迁后，政党迭兴的势头并没有减弱。但与此前不同，这一时期政党政团的重新组合成为政党活动的突出特点，形成了“ 小党则化合为大，多党则并合为少”^④ 的政党合并潮流。在这股潮流中，率先合并而成的实力较大的政党是共和党。并入共和党的，除前述统一党、民社外，还有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三个小团体。

国民协进会是辛亥革命后北方“ 政党发生最早者。”^⑤ 参加者主要是立宪派，特别是原辛亥俱乐部的成员。发起人为的范源濂

《申报》 1912年9月29日

② 《致黄兴函》，《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2

③ 《宋教仁集》，第456页。

④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不忍》第1册。

⑤ 《盛京时报》，1913年1月10日。

蓝公武、籍宗寅等人。武昌起义后不久，蓝公武等人即认为立宪派东山再起的机会已经到来，“我辈今日所事，宜在组织政党，静以待变。”^①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他们便开始活动，准备以京津地区的立宪派为核心组织一大政党。3月18日在天津正式成立国民协进会。国民协进会领导机构是由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周大烈、蹇念益等18人组成的常务干事会，核心人物则是籍忠寅、周大烈、蹇念益。国民协进会发布的政纲是巩固共和政治、确定统一主义、发达社会实力。它从成立起，就站在袁世凯一边，以革命党人为政敌。还在酝酿发起时，蓝公武就曾致函梁启超，建议梁启超向袁世凯联络，并说“我辈若能得其襄助，南北均组织一政党，……必能得大多数之赞成，然后再联络各地方自治团体及军队，庶将来可以制军政府之跋扈，并可以为我辈选举之助也。”^②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为使临时政府尽快北迁，以巩固袁世凯的地位，国民协进会大造舆论，通电反对南京方面派兵护送国务总理唐绍仪北上，攻击南京临时参议院是“曲循私利，陷全国于无政府而不顾。”^③

国民党是由潘鸿鼎、潘昌煦、沈彭年、朱寿朋等人于1912年2月27日在上海发起的政党。宗旨为“于全国统一政治之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完全保护其固有之权利，以发扬共和精神。”^④同时还发布了六点政纲：一、养成共和精神；二、采取美国之共和制，根据杰克逊之学说，以国民民政为行政基础；三、外交以亲美为主义；四、尊重国民之权利、义务；五、制定完全之宪法；六、期望召开国会。^⑤该党的暂定章程表示，在未经正式成立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集合至500人以上时，即开正式成立

①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173页。

② 《时事新报》1912年5月6日。

③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171页。

④ 《亚细亚日报》1912年4月15日。

⑤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73页。

⑥ 宗方小太郎：《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第90页。

大会，公举党首及各职员，并在各地建立支部。^①但是直到并入共和党，国民党即未设立支部，也未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国民党与统一党关系密切，所以并入共和党“仅为自然之趋势而已。”^②

民国公会是1912年1月由浙江籍原资政院议员陈敬第及黄群、诸翔九等人在上海发起的政团。与民社、统一党相似，民国公会的成员基本上也是三部分人：立宪派、官僚政客、失意革命党人特别是光复会中的“稳健”分子。民国公会标示的政纲是：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建设健全之中央政府，应世界大势，以促民国之进步；成立健全之舆论，保证民国之民权继此永无障碍；扶殖国民经济之发展。^③政治倾向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南京临时政府。

五政团合并归一的动力主要来自立宪派。上海独立后，立宪派就开始积极活动，“结合同志，拟融洽各团为一大党，”认为“将来确能战胜他党以奠安吾国，在此一举。”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使立宪派声名狼藉，特别是梁启超等人的威信大为下降，缺乏号召力，组党活动不能不十分困难。立宪派认为，“无标识以号召联络，”是他们最失败之点。^④在难以独树一帜的情况下，立宪派决定与反同盟会的势力提携。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与黎元洪提携还是与袁世凯提携问题上，立宪派有过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今后中分天下者，袁、孙二党而矣，”主张联袁“以造成一大党”。^⑤也有人认为联黎比联袁更适宜，“一则彼素超然于各党之外，彼出则可调和各党派而泯其形迹，入党者必多。一则彼系军队要人，……有军队要人为党之中枢，则军队加者入必多。……一则此次革命本系军队为先锋，革党者皆陆续加入者也。且武昌为首先起义之地，黎为首先起义之人，彼任党

宗方小太郎：《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第90页。

② 《申报》1912年3月1日。

③ 《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

④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482页。

⑤ 丁文海、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0页。

魁，将来握政权名正言顺，一则黎之为人极长厚，而行得人心，……故黎任党魁，其党必大发达。”在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中，联黎主张占了上风。国民协进会成立时就决定“将来拟与民社联合，推黎为党魁。”^②1912年3月，国民协进会的籍忠寅、周大烈与民国公会的陈敬弟等人赴武汉，正式与民社商议合并组党，得到民社同意后，又与民社代表孙发绪、项骧一起东下上海联络。4月中旬起，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七政团开始商议合并不久，事宜。共和建设讨论会因与籍忠寅等人“精神不合”退出合并，国民共进会也以未推出理事为由要求“暂缓合并”^③最后只剩下了五政团。

1912年5月9日，共和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张园召开，大会宣布并通过了共和党规约及支、分部条例，选举了共和党的领导机关。黎元洪当选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当选为理事，又用分团推举的方法推出林长民、汤化龙、杨廷栋、吴景濂、籍忠寅、刘成禺、张伯烈等54人为干事。5月29日共和党在北京设立本部，本部设有总务、文牒、会计、庶务、交际、统计等科，^④在天津、汉口、上海设交通事务所。此外还设有政务讨论会，由参议院中的共和党议员组成，“对于议院各案先期开会预备，以便一致进行。”^⑤

共和党以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为政纲。^⑥在上述三项政纲中，共和党特别强调第一项，它解释说，所谓国家主义，即“一切政事都从全国统一着想，”“不准各省各自为政。”^⑦在当时的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599页。

② 《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第118页。

③④ 《申报》1912年5月10日、5月7日。

⑤ 《盛京时报》1912年1月10日。

⑥ 《申报》1912年5月5日。

⑦ 《盛京时报》1912年7月25日。

政治斗争中，国家主义就是反对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的同义语。梁启超在归国后的一次讲话中曾对共和党的这种政治立场加以总结，他说：“一年以来，国中有两大势力常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吾党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与之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微假借。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后之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之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故本党对于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常思所以制裁之，使不得逞。一面则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设立，在法律上当然认为国家机关，吾辈只当严重监督，而不必漫挟敌意与之相见。”正因为共和党视同盟会为“暴乱派”，是“第一敌”，共和党的成立及其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欢迎与大力支持。二者的关系，正如同盟会的激进分子戴天仇所揭露的那样：“袁氏欲利用共和党而固其位置，共和党亦欲利用袁氏而开其升官发财之路。”^②

共和党成立后，组织上确有较大发展。据统计，共和党在国内外的支部有34个，分部293个。^③在临时参议院中，隶属共和党的参议员有32人，^④超过了同盟会。在唐绍仪内阁中，财政总长熊希龄、教育次长范源濂、内务次长张元奇、财政次长应德闳等均为共和党员，虽然在人数上不及同盟会，但由于得到袁世凯的支持，成为同盟会的劲敌。在各省都督中，挂名共和党有的湖北黎元洪、直隶张锡銓、奉天赵尔巽、江苏程德全、吉林陈昭

① 《民国经世文编》政治三 第19--20页

《民权报》1912年6月27日。

③ 程为坤：《民初共和党的形成、组织及其派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④ 《申报》1912年5月18日。关于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共和党议员的数量，还有28人（《盛京时报》1912年5月12日）、40人（《天铎报》1912年5月14日、《时报》1912年5月25日）38人（宗方小太郎《支那に於ける政党结社》第210—222页）等不同统计。但无论如何，在临时参议院中，共和党人数超过了同盟会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常、山东周自齐等人。^①

共和党也十分注重舆论宣传，受共和党影响或控制的报刊达20余家、其中，《京津时报》、《庸言》、《神州日报》、《时事新报》都是共和党的主要喉舌。

合并后的共和党是立宪派、旧官僚政客、蜕化革命党人的混合体。这三种人的结合，固然有反对同盟会、支持袁世凯这一共同的政治倾向作为基础，但也不乏趋风赴势、以并党为谋取权势的手段的动机。这就决定了共和党不会是一个结合紧密、组织牢固的政党。共和党成立后不久，即出现分裂迹象，相继有许孝绶，朱德棠、易宗夔等人宣布脱党。但最严重的分裂，则是统一党的复出。

统一党并入共和党，“其中主张最力者 惟张季直一人。”^②章炳麟也赞同合并，“以排一党专制之势。”^③但在如何合并上，张、章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五政团中，统一党人数较多、声势较大，因此章炳麟认为“所谓五大政党合并者，只是荒唐夸诞之言，其中惟本党及民社为大，余皆不能独立之小团，”不能同等合并，应保持统一党的优势。而张謇急于通过合并壮大立宪派的阵容，不以章炳麟的意见为然，称其“惑于谬说。”^④在上海初议合并时，章炳麟提出了不变党名、不设理事长等苛刻条件，但统一党代表孟森、黄云鹏等人在谈判中“挠于群言，变更原议，”同意设理事长，改统一党名。对此章炳麟虽不满，但仍“姑就彼说。”^⑤

1912年5月初，章炳麟离沪赴京，行前要张謇“不可让步。”然而张謇置其意见于不顾，与各政团达成协议，各举四名基本干事。他还电致北京，“嘱在京各团于本月八日开成立会 沪

① 《申报》1912年8月5日。

② 《盛京时报》1912年5月12日。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0页。

④⑤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9页。

⑤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08页。

则九日开会。”对张謇的作法，章炳麟十分恼火，他认为各政团平均推举干事是“假合并之名，而无合并之实。俨然是一联邦政府，”表示“极端反对”，与张謇数次电商。^①由于他的反对，北京五政团的合并会议被迫展期，但上海的成立大会却如期召开。章炳麟认为，“上海的会议”只能为预备合并，不能为正式合并之会”，选举理事、干事之举也是“越分侵权，”不予承认。^②章炳麟对北京五政团提出四项条件：一、上海所举理事须得北京开会认可，理事长如不便驻党，则于其余四理事中举一人驻党内，筹措本党一切事宜，对党务负完全责任。二、合并后即行取消基本干事，另行组织，组织之法，半由公选，半由驻党理事选派，均应驻本部办事，不得徒拥虚名。三、合并之前各政团所负债务自行偿还，所余之款则应归于新党。四、各团体的机关报，应于合并后直接归本部管辖。^③从这四点可以看出，章炳麟的目的是一是否认上海成立会议的各项决议；一是将合并后的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章炳麟的四条件提出后，民社、国民协进会等团体置之不问，加紧拉拢在京统一党的部分成员“速与各团合并，以免后患。”^④“不俟统一党认可即设共和党筹办事务所于北京，又于《中国日报》登载广告，谓各团事务所同时消灭，各团所有分、部、支部事务概由共和党筹办事务所办理。”^⑤统一党中的立宪派，旧官僚张謇、熊希龄、程德全等人通电宣布“章太炎种种野蛮无理，”“不值章之言论。”^⑥统一党地方支部反对合并的电报也被张謇扣压。在这种情况下，章炳麟遂在报上刊出统一党“不与他党合并之理由”斥责立宪派、旧官僚之害“过于同盟会远矣”^⑦，同盟会之弊“不过暴乱”而老立宪党及官僚派则为巧言

① 《申报》1912年6月2日。

②③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90页。

④⑤ 《申报》1912年6月4日，6月2日。

⑥ 《盛京时报》1912年5月28日。

⑦ 《盛京时报》1912年5月29日。

令色足恭者。暴乱易灭、腐败难医。”^①5月17日，章炳麟在北京本部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与共和党分裂，统一党复行独立。并改理事制为总理制，由其摄行总理。

章炳麟宣布统一党复出，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反对同盟会、与立宪派、官僚派合作的政治立场。虽然他宣称“本党当以政纲十一条超然自举，不随乱流，行而当则各党皆吾友朋，行而不当各党皆吾敌对，履道坦坦，无故无新，”^②但从其后的活动看，统一党仍与同盟会为敌、与立宪派政党呼应。唐绍仪内阁辞职后，同盟会力主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张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章炳麟攻击同盟会的主张“在今日有百害而无一利”，提出“建无党总理”，甚至建议“取清时南方督抚著有才名者以充阁员之选。”^③与共和党唱和。由于政治倾向一致，统一党复出后不久，章炳麟又企图与共和党重修旧好。7月下旬，章炳麟赴武汉，请黎元洪担任统一党名誉总理，他也允任共和党理事，“交叉相倚，以为联合之图，”“为明年国会选总统计，……非统一党与共和党一致则同盟会一致选孙，势遂无敌。”^④1912年8月间，章炳麟“厌政党生活，宣告脱党，”^⑤却将统一党职员名册送至共和党，并通电统一党各支部，要求再与共和党合并。^⑥他的这一作法引起了统一党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统一党的参事、袁世凯的亲信王赓等人利用这种情绪，于9月2日召开统一党大会，宣布“不认可合并之事，”取消章炳麟致各支部的合并电，“谋独立之进行，”组织机构上也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废除了总理制，改回理事制，以王赓、王印川、汤化龙、张弧、朱清华五人为理事。^⑦此后，虽又给了章炳麟一个名誉理事的头衔，但已将章炳麟排除在统一党领导之外。在王赓、王印川等人的把持之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09页。

《时报》1912年6月15日。

④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08、609、650页。

⑤⑥ 《盛京时报》1913年1月11日，1912年9月6日。

⑦ 《申报》1912年9月8日。

下，统一党更加“奔走于一人”，^①成了纯粹的袁世凯的羽党。

二、围绕“超然内阁”的政党斗争

唐绍仪内阁倒台后，围绕第二次内阁的组成问题，各政党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形成了临时政府北迁后的第一次党争高潮。

唐绍仪的出走，无疑是对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揭露和抗争。在统治还不十分稳定、还需要同盟会装点门面的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来一番假惺惺的表演。他对唐绍仪的出走表示“极度焦灼”，派出梁士诒、段祺瑞等人虚情假意地“追踪劝挽”。但唐绍仪提出，要回京复任，“第一即非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不可。”^②袁世凯当然不会答应这一条件，他颠倒黑白，声称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是因为王芝祥“屡次力辞直督”，“余在理不能加以勉强，”而且“与唐总理商明。”^③同时开始筹组新内阁。1912年6月17日袁世凯任命无党无派、对袁“驯顺如羊”的陆征祥代理国务总理，共准备由陆组织第二届内阁。

推垮唐绍仪内阁，是袁世凯打击革命民主势力、推行独裁专则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公然践踏。同盟会在通告各支部唐绍仪出京原因的电文中说：“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经国务院副署。……副署之权勿〔而〕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④然而，同盟会却没有循此而得出正确的教训。它认为，唐内阁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内阁非由一党组成、政见不同，嫌疑猜忌，难以和衷共济，“故唐内阁之倒，则倒于党见混同。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

《民权报》1912年9月27日。

② 《申报》1912年6月25日。

③ 《申报》1912年6月28日。

④ 《民立报》1912年6月24日。

剧。”^①为了避免怪剧重演，就必须建立政党内阁。1912年6月20日，同盟会代表张耀曾、刘彦、熊成章、李肇甫面见袁世凯，正式申明了对同盟会对组织第二次内阁的政见：“此次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手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致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惟此次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②同盟会驻沪机关部致电北京本部，“主张组织完全政党内阁”，并提出“无论何党，惟须得国民多数之信用，吾党亦赞成之。若共和党愿出而组织内阁，同人拟代荐黎宋卿为总理。”^③

唐绍仪内阁的倒台已经说明，在革命党人不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无论是责任内阁还是政党内阁，都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同盟会把政党内阁作为对付袁世凯的唯一法宝，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同盟会还握有一定实力、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政治潮流仍在发展的情况下，政党内阁的提出仍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它表明了同盟会仍在坚持民主政治的方向，要把中国引向宪政轨道，为民初的民主宪政实验树起了一面旗帜；另一方面，它又是同盟会向袁世凯进行公开合法斗争的武器。宋教仁解释说，政党内阁就是“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地位。”^④很明显，同盟会企图以政党内阁来架空袁世凯，对袁世凯进行抵制。

在继任内阁问题上，共和党充分表现出了“政府党”的特色。6月19日，共和党参议员开会讨论，决定唐既蔑弃职守，自无颜回任之理。继任何人关系全局，默察大势，对内对外，同盟会员实不宜再为总理，而本党组织内阁之机现未成熟，应由大总统遴选

① 《民权报》1912年6月27日

② 《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③ 《申报》1912年6月28日。

④ 《宋教仁集》，第489页。

无党派者任为超然总理。但令对外有信用，对内无恶感，各党拥护之，既免互攻，自获安全，庶于临时期内不致别生波折。至于阁员组织，不妨各党协商。”^① 6月25日，共和党也派出丁世铎、杨廷栋、谷芝瑞、王家襄四人谒见袁世凯，表明共和党超然总理的主张，声称：“非超然总理外，实无善策。”^② 同盟会正式表明政党内阁的主张后，共和党本部通电宣称：“倘有不以国家为重，坚持政党内阁之议，是直为扶植党利之私，吾党决不承认。”^③

与此同时 追随袁世凯的统一党、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党政团也与共和党沆瀣一气，攻击同盟会的主张，鼓吹超然内阁或混合内阁。唐绍仪赴津后不久，统一党即发表公函，“宣告同盟会阁员罪状”：“唐绍仪滥款未清，逃脱避责，法律之所不宥，不容再与留任。宋、蔡则惟务党争，不为国计，非以同时辩职要挟，则以政党内阁饰词”，“亦应听其连罢。”^④ 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皆与共和党提携，”^⑤ 6月22日，两会通电反对唐绍仪再任总理，认为唐信用已失，难胜艰巨，要袁世凯举“才望兼著者”重新组阁。当袁世凯提名陆征祥后，国民协会赶紧通电拥护，称陆“既可维持现状，又可不起党争，是以各界深表同情，并说‘乃各党中仍有坚持用本党党员为总理者，无论党争所极危险滋多，且勉强赞成，不久又恐崩裂，民国初定，何堪迭遭危机。’”^⑥ 含沙射影，攻击同盟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一向以不入政界标榜，在继任内阁问题上摆出一副貌似公允的姿态，表示不赞成超然内阁，政党内阁也尚非其时，提出“准政党内阁”的主张。但据该会重要人物孙洪伊的解释，“所谓准政党内阁，即混

① 《时报》1912年6月22日。

③ 《申报》1912年7月1日。6月28日，

④ 《时报》1912年6月28日。

⑤ 《申报》1912年7月3日。

⑥ 《盛京时报》1912年7月2日。

合内阁。”实际上与共和党的超然内阁并无区别。

对继任内阁问题，统一共和党也发表了政见。6月23日，统一共和党与国民公党通电：“唐总理假陆总长代，论者或主超然，或主混合，皆非正办。”要求“诸卿各安其位，暂勿更张。”^②继同盟会、共和党之后，统一共和党也派出殷汝骊、刘兴甲、胡壁城、彭允彝四人谒见袁世凯，表示“本党向以调和为主旨，在参议院立于第三党之地位，于他党素无所偏倚，此次仍守向来之态度，将来总理何人，只要两党赞成，本党并无成见。”

“惟望大总统于现在同盟会阁员必须挽留，无令引退。”^③统一共和党表面“中立”但实际目的却在于利用第三党的地位于重新组阁中进入内阁。统一共和党曾酝酿推出蔡锷任总理，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而且考虑到“党势未张，骤得总理，不甚相宜”，又改为“要求得国务员二、三人。”^④由于统一共和党未公开反对政党内阁，其主张又“比较的亦略含排斥袁派之意，”^⑤因而被同盟会引为同道，“慨然允与提携。”然而为时不久，统一共和党又改变态度，赞同超然内阁。统一共和党态度变化的原因，一是袁世凯公开表示要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二是共和党引诱拉拢。对此《申报》曾作为披露：“……京外重要人物和黎副总统、程都督皆来电赞成超然之说，而袁总统亦有趋重超然主义倾向。闻某要人语吴景濂曰：同盟会主张决不能见诸事实。因用人必经总统提出，参议院仅有同意、不同意之权。院意虽用而总统不提出，终成画饼，不如赞成超然主义。而因统一共和党有多数议员之关系，要求出国员务之一、二人，今共和党为始倡超然者，与之相合，则同盟会无能为矣。吴乃意动。乃先商东三省人，渐露与同盟会相离之景象，而与共和党密使往来。”^⑥统一

① 《大公报》1912年8月14日。

② 《申报》1912年6月24日。

③ 《盛京时报》1912年7月2日。

④⑤ 《申报》1912年7月12日，6月28日。

⑥ 《申报》1912年7月12日。

共和党本为“复杂的官僚派”，^①并无固定的政见与原则，一切都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因此，当袁世凯公开表态，共和党又许以一、二阁员位置后，发如生许变化，就是很自然的了。

袁世凯拉出陆征祥组阁，目的即排斥同盟会的政党内阁。所以，当同盟会代表面见时，他立即表示反对同盟会的主张，称“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余之主义在得人，但问其人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②袁世凯以“不注重党派而专注重人才”为幌子，企图组织一个“超然总理混合内阁，”既以同盟会阁员为点缀，又利用亲袁政党阁员来牵制同盟会，他则从中任意操纵。

6月29日，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拟任陆征祥为总理进行表决。莅会的同盟会议员绝大多数遵从党议投票反对，但由于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占多数，遂使陆征祥得以通过。^③

对新内阁阁员的人选袁世凯的计划是“国务员中可一切任用旧人，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因为在控制了总理及内务、陆军等几个重要阁部后，留出几个闲曹给同盟会，不惟无害，反而能冲淡袁世凯及其党羽把持权力、专擅独裁的形象。所以，当宋教仁等人按同盟会决议辞职时，袁世凯“淳切挽留，”并虚伪地说“诸君如热心建设民国，不使民国陷于危亡之境者，诸君即不宜再存去志。”^④对袁世凯的这一阴谋，同盟会进行了坚决的抵制。7月1日，同盟会发布政见通电，再次强调“绝对主张政党内阁。”同时决议“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会员皆不得自由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先后一致。”^⑤宋教仁等人正式向袁世凯提出辞呈后，又致函陆征祥，声明从7

① 《大公报》1912年7月30日。

② 《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③ 《申报》1912年7月6日。

④ 《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⑤ 《盛京时报》1912年7月2日。

⑥ 《民立报》1912年7月3日。

月¹⁴日起不再赴部视事。由于同盟会的坚持，袁世凯只好批准宋教仁等人辩职，但他并未放弃拉同盟会员入阁的打算。7月¹³日，袁世凯初步拟定了新阁员人选，准备以同盟会籍的孙毓筠、胡瑛、沈秉堃分任教育、农林、工商总长。袁世凯所以选中这三个人，是因为这三人“入京以来，与袁君最愜，又其所持主义稳健，”属同盟会中的蜕变分子，同时这三人又是同盟会中的重要人物，“罗致同盟会中有力者于此，既足消释南北之嫌，使革命元勋各安其心，又可破同盟会束缚个人自由之党议，”^②分化打击同盟会。7月¹⁴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议决孙、胡、沈三人不得入阁，并派人告知袁世凯，切勿在参议院提出，又一次打破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

共和党是超然内阁的积极鼓吹者，对袁世凯组织混合阁员的图谋竭力支持。在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后，共和党召开会议，议决三项：维持新内阁、劝同盟会阁员就职、劝熊总长办事。^③对袁世凯拟定孙、胡、沈三人入阁，共和党心领神会，“党中重要人物，均见总统之提出孙、胡两人，实有一番敏活手腕，”“如此一张一弛，同盟会大局上实有消长盈虚之变迁，而于共和党自有极大之影响，颇欲赞成，以促总统之成功。”但共和党中原民社一派对胡瑛不满，为维护反同盟会阵线的一致，袁世凯又将胡瑛换为王人文。

统一共和党在陆征祥提名通过后，以为袁世凯与共和党必能兑现“一、二国务员”的许诺，因而对新阁员问题“主张一体通过之主义”，^④“并极不以同盟会坚持党议为然。”^⑤但数日后，态度又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忽而主张一体不通过主义。”原来在袁世凯拟定的六名新阁员中，统一共和党竟无一

《远生遗著》卷2，第66页。

③④ 《申报》1912年7月22日，7月1日。

⑤⑥ 《远生遗著》卷2，第66页。

《申报》1912年7月20日。

人，因此大为不满。7月15日，统一共和党召开研究会，“于所提六人指摘几无完肤。”统一共和党的实际领袖吴景濂以“国务院中要不可以无北人”为由，提出以北方籍的严修、王芝祥、于右任取代孙、胡、沈三人，袁世凯不予理会，统一共和党更为恼火，认为“共和党目中未必有统一共和党，至大总统亦仅知有同盟会与共和党”，遂决定对新内阁员的提名“全体反对，以显示本党之作用。”^②

7月18日陆征祥赴参议院要求通过六名新内阁员的提名。陆的发言“专为交际，不涉政事，”^③而且语言猥琐引起大哗。不仅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参议员，即是曾宣言“对于政府亦取十二分维持主义”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参议员也十分不满，认为“陆于政治上毫无知识，付以国事，实不放心”，决定改变方针，“全体不同意”。^④甚至部分共和党参议员也大失所望，“金谓百闻不如一见，甚有顿足槌胸、背地弹泪者。”^⑤对混合内阁，同盟会一直持反对态度，而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及部分共和党参议员态度的变化，造成了有利于同盟会的形势，所以在19日的表决中，六名新内阁员提名均被否决。此后，陆征祥也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为由，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参议院对陆征祥内阁提名的否决，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蹉跎乎由总理问题而益变而为总统问题。”^⑥共和建设讨论会及部分共和党参议员的‘倒戈’更是袁世凯始料不及。但他决不允许他精心设计的傀儡内阁因此而垮台，他表示，“无论如何，总不能改我此项宗旨。”袁世凯深知这些参议员致命弱点的所在，决心以强硬手段迫使参议院就范。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的北洋军警首先出马。7月21日，

① 《申报》1912年，7月22日。

②③④ 《申报》1912年7月23日、7月20日、7月27日。

⑤ 《盛京时报》1912年7月23日

⑥ 《申报》1912年7月28日、7月30日。

北京军警两界开会，通电指责参议院“谬执党见，陷国家于无政府险象，”“参议员身为人民代表而丧心若此，实为人民之公敌，共和之障碍，”表示“先为之警告。”^①次日，袁世凯又致电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他“委曲求全盖以无所不至，”所提六人均均为治国人才，“纵不能全予同意，亦何至无一可用之才，乃始则拒绝协商，继则全体否决。”^②进行露骨的煽动。于是，北洋集团的都督政客纷纷通电，詈骂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只知有党，不知有国，”^③攻击参议院“不足代表国民公意。”^④甚至威胁说：“议员不惜亡国，军人即不守法，誓必以铁血溅之。”^⑤

在这场对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的围剿中，共和党等亲袁政党又一次扮演了马前卒的角色。在陆内阁表决时，共和党参议员也有少数人投了否决票，但在7月19日、21日的两次通电中，共和党却称“因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议员全体不同意，致未通过，”“遂使民国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此后对于大局如何维持，不得不博求名论，用资指导。”^⑥配合袁世凯，进行反对同盟会的煽动。共和党参议员田骏丰、郭同等人联名通电，指责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使“内阁空虚、国本动摇。”^⑦统一党的表演更为恶劣，主张由大总统总揽政权，遇事不必拘牵约法，并攻击参议院不遗余力。谓非解散不足以救亡。”^⑧国民协会等政团也随声鼓噪，指责同盟会“不惜牺牲全国人民以殉党见，此种政党，实无组织政党内阁资格。”^⑨

共和建设讨论会对陆内阁“全体不同意”，并要求陆征祥辞职，但它的态度与同盟会并不一致。参议院否决陆内阁后，共和建设讨论会召开会议，议决：如陆征祥去职，对新总理论人不论

① 《盛时京报》1912年7月27日。

② ⑤ 《申报》1912年7月28日，7月31日、7月22日、7月26日。

⑥⑦ 《申报》1912年7月22日、7月24日、7月25日。

⑧ 《盛京时报》1912年7月27日。

⑨ 《申报》1912年7月25日、7月27日。

党；总理定后，所提阁员人选全部同意；议员不得入阁。这三点决议中，前两点即针对同盟会，“含有同盟会不可组织内阁之意在内，”第三点“则专为统一共和党而设，”用以防止统一共和党谋得国务员。^①即使这样的假骑墙态度，共和建设讨论会也没有维持多少时日。7月21日，它就与共和党一起致电参议院称：“陆总理为全国仰望之人，贵院承认于前，深符国民信任之意，”要求对下次提出的阁员“务表同意”。同时它还致电蔡锷，要蔡锷劝说统一共和党于下次阁员通过时不予反对。^②

在完成了对同盟会的“围剿”阵势后，袁世凯于7月23日提出了第二次阁员人选。为了保证不生变故，他再次抬出武力威胁这一惯用伎俩。7月25日，北京军警又一次开会，议决“如参议院此次再不通过，则请大总统解散。”^③同一天，北京军警要人还在安庆会馆摆下“鸿门宴”，“招待”参议员，要求参议员“化除党见，顾全大局，从速通过国务员，以免国家陷入无政府之地而召瓜分。”^④同时，由北洋军警炮制的一批写有“敬备炸弹十枚以伺诸君”^⑤的恐吓信、匿名传单也被寄到了参议院。

对袁世凯策动的这场围剿，同盟会进行了抵制。统一共和党由于朝三暮四而成众矢之的，备受责难，也不得不进行辩白和反击。针对共和党的通电，同盟会指出：“参议院议决多数，议员投票自由，一经确定，凛若民品。乃共和党恐中央竞争之不烈，而播扬全国，知一己主张之大误，而挑衅他人。”严正声明，同盟会议员的投票“取舍从违，唯知救国，何得假无政府之澜词妄相欺弊。”^⑥统一共和党也通电说：“同意与否，根据约法，议员有自主之权，……欲建巩固之国家，不可不有健全之政府。若苟且迁就，势必丧邦。”指斥共和党“已党不同意即置之不言，他

《申报》1912年7月25日，7月27日。

② 《时报》1912年7月23日。

③ 《远生遗著》卷2，第77页。

④⑤ 《盛京时报》1912年7月30日。

⑥ 《民权报》1912年7月25日。

党不同意即谓亡国，”完全是强词夺理。同盟会的报纸还对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及共和党与袁世凯狼狈勾结、为虎作伥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口谈共和，心怀君主，集权中央，引用私人，是谓大总统之皇帝相；招集群党，排斥异己，附膻如蚁，逐臭如蝇，是谓共和党之保皇相。”^②

但是，同盟会并不是一个意志统一、步调一致的政党。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对这场斗争表现冷淡。对政党内阁的主张及陆内阁人选，同盟会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盟会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公开反对政党内阁。共和党议员田骏丰等人发出的声讨参议院破坏政府的通电中，也有同盟会参议员列名。孙毓筠则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声言“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③同盟会的舆论机关也不一致。《民立报》始终以“委曲求全、维持大局”为宗旨，在陆内阁被否决后，主张“第二次内阁万不宜再见倾覆。”^④内部的涣散决定了同盟会不可能战胜袁世凯的阴谋。在武力威胁下，对混合内阁持反对态度的同盟会参议员开始动摇。在北京军警要人举行的议员“招待”会上，除了田桐等几个人仍表示坚持政党内阁外，其余皆唯唯喏喏附和随声。7月24日晚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开会商议如何对待第二次阁员提名问题。会上张耀曾发言指出，外间干涉之端已启，如果因此而对第二次阁员提名予以同意，有损参议院尊严，如否决，可能起绝大风潮，“今先问大众有无全体辞职之决心，如有则决计仍不同意，无则惟有全体同意，仍为无价值议员可也。”但无人回答。这时，忽然接到参谋部有“警告戒严之意”的电话，参议院的守卫长也向议长告假，“众益慌，遂决定全体同意。”^⑤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的参议员们终于在袁世凯的威胁

《申报》1912年7月24日。

② 《民权报》1912年7月27日。

③ 《申报》1912年7月24日。

《民立报》1912年7月23日。

⑤ 《申报》1912年8月3日。

下屈从妥协，以牺牲党见换取了个人地位利益的安全。

7月26日参议院第二次表决内阁人选。共和党参议员“因贯彻其有政府胜于无政府之说 故不论其才不才 只要具有四肢五官者一律同意。”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参议员也多数投赞成票 结果，袁世凯提出的新阁员除同盟会籍的蒋作宾外全部通过。在这场斗争中，袁世凯在共和党等亲袁政党的协助下，又一次战胜了同盟会。

第二次陆内阁通过后不久，统一共和党的谷钟秀等人又以陆征祥组织内阁迟之又久，杂凑成章、莅院演说政见全无、借军警之力胁迫参议院等理由对陆征祥提出弹劾，^②但这已是强弩之末，而且同盟会中不少人认为此时弹劾使参议院易召攻击，表示不赞成。袁世凯一方面运动共和党以不出席会议的方法使弹劾案不能开议；一方面“用重金收买议员”，阻止通过，最后终不了了之。^③此后 陆征祥藉口“不获信任”称病不出 袁世凯趁势拉出他的心腹赵秉钧代理总理，终于使国务院成了袁记内阁。

三、民主党的组建

民主党是1912年10月在上海合并组成的政党。并入民主党的有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民国新政社、共和俱进会等六个政团。

在这六个政团中，除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有一定规模和政治影响外，其余四个团体均为人数无多、影响些微的小政团。其中，共和促进会由立宪派分子杨度“受袁世凯旨意”于1912年1月底在北京发起，参加者主要是北京的新闻记者、资政院议员。其宣言书称：“革命事起，东南十余行省已在共和旗帜之下。欲求中国之保全，先求南北之统一，欲求南北之统

《盛京时报》1912年7月30日。

② 《申报》1912年7月30日。

《盛京时报》1912年8月2日。

一，先求北方之实行共和。”“度等前此主张君主立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非仅以保存君位为目的，乃以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勉图君位之保存，”因此“应时势之要求，鉴国民之心理，用敢发起斯会，勉尽匹夫之责。”该会成立时，南北和谈已达成妥协，为配合袁世凯的逼宫，共和促进会提出“速由内阁请旨，宣布共和，更不得再谋于败坏国事之各王公大臣。”^①该会成立后不久，杨度即赴青岛，实际上脱会，其它骨干人物，如周大烈、蹇念益等人加入国民协进会，会务实际上停顿。民国新政社是浙江的一个地方团体，成立于1912年1月23日，由“光复前曾密告民军”的浙江谘议局议长陈介石为社长，吕文起为副社会，办有《东甌日报》，准备从办报筹饷入手，“辅军政府之不逮。”^②共和统一会为1912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极小之政团，”^③它的首领是袁世凯的幕僚，直隶谘议局议员孙洪伊，共和俱进会为一地方政团，1912年4月成立于奉天，会长为孙百斛。

六政团的成员主要是立宪派，又都采取支持袁世凯、反对同盟会的政治态度，这是它们合并组党的基础。六政团中，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合并组党的主动力。它在成立后不久就主张将反同盟会的小团体合为一大党。共和党酝酿合并时，该会也曾积极参与，但因与张謇、籍忠寅、黄远庸等人“精神不合”，并且对民社“尤不敢信”而告吹。^④共和党成立之后，共和建设讨论会又与国民协进会一起，谋求与国民党、统一共和党合并，新党拟称国民党，并制定了巩固中央权力、维护国家统一等四项政纲。^⑤但在新党首领人选上发生争执，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进会以立宪派正统自居，提出以梁启超为新党总理，企图借梁的影响

《申报》1912年2月5日。

② 《申报》1912年2月6日

③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第55页。

④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31、638页。

扩大势力。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则力持以岑春煊为总理。^①双方争执激烈，不能妥协，合并遂告破裂。

这次合并失败后，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又开始谋求与共和党合并，新的合并动因在于，在围绕超然内阁问题而进行的党争中，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有联合一致的迹象，因而共和党“甚欲拿共和建设讨论会加入之，以增党势，”^②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因与共和党步武一致，“提携之处甚多，”也认为“对于共和党并非绝对主张不合。”^③反对同盟会的共同需要使它们旧议重提。共和党分外热心，甚至表示“共和党之名可改，其它条件皆可商量。”^④但这次合并仍未成功。合并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两会坚持合并后由梁启超任协理，而共和党只同意梁任理事，双方不能一致，但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会中人与共和党中的立宪派之间的历史积怨未能释然。孙洪伊曾说：“共和党中坚人物本多旧识，非请愿国会时曾共一团者，即前宪友会会员。当时于精神上隐分两派，事实上亦时有竞争。历史上之关系如此，万一不合而再分裂，则旧有基础全行丧失。”^⑤也有人认为共和党“内容太杂”，担心“泛然相许，势成孤立”，难占上风。

与共和党的合并计划破产后，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开始筹组独立于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的“第三党”，定名为民主党。为适应合并，共和建设讨论会于8月14日正式改组为政党。在筹组过程中，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等小政团先后加入。

1912年10月27日，民主党于上海张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党纲及党章，选举汤化龙为干事长，马良、陈昭常、谢远涵、蒲殿俊、李经羲、孙洪伊、向瑞昆等三十人为常务员。干事部设政务、文书、会计、交际、庶务五科，另设政务研究会作为议决政治方针的机关。民主党在筹组时曾拟议以梁启超为党魁，希图打

宗方小太郎：《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近代稗海》第12辑，第92页。

② 《盛京时报》1912年8月20日。

③ ⑥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38、649、638—639页。

出这面旗帜后，“从者如归市，”^②“则一极大之第三党必可造成。”^③但是这一如意算盘却被梁启超在国内的一些门徒所破坏。汤觉顿、徐佛苏等人致函梁启超，指出民主党“所以为此者，恃公为之帜，粤谚所谓树幡竿招鬼来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若据以党魁，不特未来者却步，已来者必引去。以其无实力而树同盟之敌，更树共和之敌，必不足以自存，”要梁启超坚持“超然”。^④梁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尽管民主党要人于合并前多次吁请梁启超回国，但梁终无所动，以致汤化龙“似有无限激愤者。”这一段芥蒂，也是后来梁启超回国后倡议共和、民主两党合并时，民主党表现狂傲，乃致梁启超大骂“民主鬼吾恨之刺骨”^⑤的一个原因。

民主党的党纲是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巩固政府、综合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⑥民主党特别强调它“无权利心”、“不争政权”、“对他党无歧视心”。^⑦“专注全力以普及政治知识，传播政治信条。”^⑧由民主党筹备事务所发布的《民主党缘起》称：“各国政党其以国利民福为目的也皆同。而具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有种种焉。力求自掌政权以实行所怀抱，此一种也。不汲汲于政权之竞争，而对于政府常尽严重监督之责，此又一种也。注全力以普及政治知识，传播政治信条，巩固国家之根基，为政体之保障，此又一种也。兹三法者，皆为自由政治国不可缺而效力亦相辅而相成。居我国今日而言，政党之第一义恐未能遽现于实也，第二义善矣，然监督之成绩亦恒视所积之实力为比例。若夫第三义，或多视为迂途，或虽知其不可已，而有所未遑也。吾党以为民国之存亡生死实系于此，而国中万不可无一部分人士尽瘁斯

②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3、646页。

④ 同上书，第641、643、648页。

⑤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8页。

⑥ 《盛京时报》1913年1月11日。

⑦ 《论民主党》，《民国经世文编》，政治三、第15页。

⑧ 《申报》1912年8月25日。

义死生以之。此所以思纠合同志 勉有所效也。” 民主党强调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希图通过传播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来巩固共和制度，表明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同其它立宪派政党一样 民主党看不到国体与政体的区别 错误地认为共和形式的实现就是民主制度的确立。在政权掌握在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袁世凯手中的情况下，企图靠普及政治教育来保障共和，显然是一种幻想。“建设坚固政府”也就成了加强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这种根本性的认识错误决定了民主党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必然认敌为友，认友为敌，成为袁世凯的同盟军。

民主党标榜不争政权，与它成立较晚，“其党员最少数”这一特点有关。但它并非对政权无凯觐之心。民主党酝酿合并时，党中重要人物刘曾佑就说过：“政党事业不外两种：一日竞争政权，一日指导国民。吾党纲则主目前不入政界，专以指导国民为务。是则妒嫉者无所用其妒，趋避者无所用其避。……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①正式国会选举前，民主党积极“预备政坛演说资料，并各交通处著手运动选举方法。”^②可见，民主党的不竞争政权不过是时机未熟、一时尚难以进入政界的托词。至于它的“主张最公平之言论”、对他党“无歧视之心”的表白，也完全是自欺欺人。民主党合并的一个重要动机就在于抵制以同盟会、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防一些无所属的政党、政团“转以资敌而折入同盟会。”^③民主党成立后，在重要的政争中都是与共和党相呼应。民初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因此预言：“俟一种机会到时，二党或能合并耳。”^④

民主党成立后，“多实地讨论，发挥政见，政治上活动甚

① 《盛京时报》1912年9月4日。

②③④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8、649、639页。

⑤ 《远生遗著》卷2，第151页。

少。”^①但在“俄蒙协定”风潮中却一鸣惊人。1912年11月，沙俄策动外蒙“独立”，与外蒙非法签订了“俄蒙协定”，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愤慨。鉴于民族危机严重，国民党率先与共和党中的左翼分子、原民社成员“研究对于国家前途所当进行之种种办法”，要求“合各政党之全力以协助政府。”并表示为一致对外，一切党见皆可牺牲。^②在国民党的倡议下，国民、共和、统一、民主四党组成政团联合会。但民主党不久又退出联合会，通电宣布政府因循延宕、坐误事机等十大罪状。民主党的这一举动颇有迷惑性，连国民党中某些人也因此认为对民主党“不能妄断为政府党或民党。”^③实际上，民主党的真正意图是给袁世凯一个劝告，要他在制定政策时，不必顾及国民党的反对。民主党列举的罪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六国借款为保全、侵略两派消长之机、政府不能利用国本不定启俄人侵略之野心。”在民主党看来，如果袁世凯不顾革命党人的反对，早早签署六国银行的借款合同就不会有俄蒙事件的发生。在十大罪状的最后民主党又画龙点睛：“夫政策之行，政府自应有主观。乃朝遭反对，夕即变更，……牺牲政策，在所不顾，……非至亡国不止。”用心已是昭然若揭。所以，当袁世凯“自应有主观”地把俄蒙事件归因于《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与总统有妨，使其“无以自由执行”时，^④民主党便鸣金收兵了。此后，民主党更是变本加厉，积极支持袁世凯。1913年5月，民主党终于与共和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了纯粹的政府党。

《盛京时报》1913年1月11日。

② 《申报》1912年11月17日。

③ 《革命文献》第41辑，第222页。

④ 《申报》1913年11月22日。

⑤ 《民立报》1912年11月22日。

第四节 国民党议会斗争的失败

一、孙中山、黄兴北上调和党见与“内阁政党”

“超然内阁”虽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是袁世凯策动北洋军警威胁参议员所激起的舆论风潮并没有随之平息。同盟会籍以及倾向同盟会的南方将领王芝祥、柏文蔚、章梓、陈之骥等十人致电袁世凯，指责北京将校研究所对参议院“宣言干涉”是“启军人压迫议会之端，为军人破坏民国之先导，”表示“同人忝握兵符，有保障民国之责任，……惟此动摇国本之言，出自军界，不容不先诘责，以遏乱萌。”^①同盟会《民权报》发表《兵力专制之大成功》一文指出：“唐内阁之倒，既为袁世凯逼之使倒，此次之内阁，又为袁世凯逼之使成。则今日之中国，虽名为共和，有立法机关之参议院，有执政机关之国务院，有全国国民公共遵行约法，而实则运用之能力、手腕、合集之于袁世凯一人。岂特陆征祥一人，为袁世凯之掌上人物哉！国务员也，参议员也，皆袁世凯之掌上物也，全国国民皆袁氏室中之陈设，园中之花草也。”^②这种情况使袁世凯认识到，用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来消除辛亥革命的成果尚非其时，还有必要运用欺骗、拉拢的手段来麻痹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缓和同盟会的反对。于是，他派人到上海殷切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北上共商国事，企图借孙、黄的威信与影响来稳固他的统治，瓦解同盟会的斗争力量。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政治上比较消沉。同当时大多数同盟会员一样，孙中山也认为共和制度的建立，就是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实现。他不赞同“中国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的看法，^③认为“现在无论政府、议会及各处政界、军界，皆有

① 《申报》1912年7月26日。

② 《民权报》1912年7月28日。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2页。

极有本领之人主持其间，尽足以奠安吾民国而有余。所以意见分歧、有才莫展者，皆为经济问题所窘，直接间接，遂生困难。”

“故我国之经济问题若不解决，甚难得一致进行之效果。”如果“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致日弄日纷、每况愈下不已。必先从根本上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①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解职后大力宣传社会革命的思想和他的雄心勃勃的实业计划，政治上则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小康局面，造成有利实业建设的环境。为此，他“竭力调和南北”，不赞同下层同盟会员发动的反袁斗争，主张政党间合作，新旧合作，以避免政局动荡。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孙中山对袁世凯的邀请欣然同意。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为使孙中山落入彀中，袁世凯精心安排了隆重的欢迎接待，“欢迎之礼，足以与袁世凯至京复位之日相颉颃。”^②当晚，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孙中山。25日、28日，又接连举行盛大宴会，遍邀国务员、总统府要员及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重要人物作陪。席间，袁世凯极力称颂孙中山“提倡革命，奔走数十年。现在共和告成，国基未固，凡置身政府诸人，自鄙人以次，均须和衷共济，维持大局，达到国利民福之目的。庶不负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之苦心。”并说：“中山先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最大之关键，鄙人曷胜欣慰，”^③在此后的会谈中，袁世凯也极力装出言听计从、毕恭毕敬的姿态，表示“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④对孙中山提出的各项主张无不点头称是。

孙中山北上的目的之一就是调和党见。他在到达北京的当天就宣布：“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2、404页。

② 《甲报》1912年8月25日。

③ 《申报》1912年8月29日。

同上，1912年9月4日。

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①袁世凯维妙维肖的表演，使孙中山马上落入他的圈套之中。在8月28日的宴会上，孙中山演说称：“现在共和政体虽已告成，而目前一切问题，悉待解决。端有政治经验之人，出任天下之事。袁大总统为吾国最有政治经验之人，对于军事上经验尤深。倘使袁大总统当国十年，讲求内政、办理外交，民国前途，庶几有豸。”^②“继之而来的会谈使孙中山迷途日远，认为袁世凯与他“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于是，孙中山又致电黄兴，称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自弟来此，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要求黄兴“千万来此一行。”^③在孙中山的催促下，黄兴于9月11日赶到北京。袁世凯对黄兴如法炮制，黄兴也坠入五里雾中，宣称“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④说袁世凯“热心维持民国，实为可与有为之英杰，……今日寄以建设民国之责，非他人所能及。”^⑤

由于轻信了袁世凯的谎言，在北京期间，孙、黄二人都十分热心地“疏通南北”、调和党见。在国民党举行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告诫国民党人：“今日之政体既变，同盟会诸君子昔日之心理，亦当随之而变。盖既无仇视共和之人，同盟会对会外人，尤当极力联络。”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要求国民党人“破除党界”，“即有他党反对，我党宜和平对付。”^⑥他特别强调，“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⑦黄兴也利用各种场合呼吁消除党争。在国民党本部会议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6页。

② 《申报》1912年9月4日。

③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12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0、407页。

⑤ 《民立报》1912年9月21日。

⑥ 《申报》1912年9月18日。

⑦⑧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8、413页。

上，他宣称：“来京目的，首在调和党见，自今以后，我同人当以健全之政党活动扶助政府。”他还派人向共和党联络，表示“此次来京，主张统一主义，并谋巩固中央政府。”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信任，孙中山宣布“十年不预政治，”黄兴也“自述不涉政界，并引孙中山为同调，词甚坚决可信。”^②

袁世凯亟亟邀孙中山和黄兴入京，除了利用孙、黄的威望来制造和衷共济的假象以麻痹革命党人外，还企图利用二人为其建立亲信内阁铺平道路。陆征祥自参议院酝酿对其弹劾后，一直称病不出，8月20日，又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对继任总理人选，袁世凯早已成竹在胸，准备提名他的亲信赵秉钧。但袁世凯也深知，如马上正式提出，必遭参议院否决。于是，他一面暂让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一面宣称总理问题须待孙、黄来京后解决。在此期间袁世凯故意制造改组内阁的空气。他派人劝说宋教仁出任总理，同时又放风说宋教仁“人甚聪明，惟国际间之信望尚觉欠缺。”^③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主张，拒绝了袁世凯的游说。孙、黄进京后，袁世凯先是假意地征求孙中山的意见，继之又动员黄兴。黄兴以致力实业谢绝。于是袁世凯又提出挂籍国民党的沈秉堃出任。袁世凯的本意“并非真欲沈为总理，不过总统所真欲任之人，不便直接说明，恐易招反对也。冀各党反对沈，然后折而任赵，于势较顺。”但是，忠厚老实的黄兴却信以为真，表示要疏通国民党通过。9月16日，国民党主任干事会讨论这一问题，宋教仁认为，“不当使性质不明了之党员出而尸补总理之任，”^④否则将损害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也有部分人认为，袁、孙、黄携手以巩固民国，“必有事实之征验，非徒为情意之委蛇，”希望黄兴出而组阁，并“求全体改组以纯粹之国民党组

①② 《申报》1912年9月13日、23日。

③ 《申报》1912年9月23日。

④ 《申报》1912年9月27日。

⑤ 《申报》1912年9月24日。

织之，方为圆满。”但黄兴不同意，他说：“牺牲一已不足成一问题，且与袁总统携手，初步不宜即用猛药以攻之，故此刻万不能为无益有损之牺牲，必由渐而进，图与总统水乳交融，方不致生种种之阻力。”由于联袁已成大势所趋，会议最后议决“取放任主义，”“谓不如即用赵秉钧为总理，俾得组成一纯粹的袁派内阁。”^②9月24日参议院以69票对3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当时的路透社电讯评论说：“今日会议无一大员诣院，足见政府已深信该院必能赞成以赵秉钧为国务总理。至于投票不过形式上之举耳，设在数星期前任赵为新国务总理，势必大起反对。”^③在黄兴的疏通下，袁世凯的阴谋如愿以偿。

黄兴对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是积极支持的。但是，“他以北洋军阀官僚人士——世界上一切人士——都是和他一样，只要列名于本党，就变成了本党的真实党员。”^④他真诚地相信经过他与孙中山这一番诚意的感化，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赵秉钧，都已与国民党“调和无间”，于是他向袁世凯建议，“利用一大党，为政府后援，”^⑤并要求袁世凯“令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进行”^⑥甚至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以此作为实现国民党内阁的终南捷径。对黄兴的这种“化男为女”的玄想，袁世凯当然不会反对，表示“极力扶助此举。”在确定了赵秉钧为总理人选后，黄兴几次与袁、赵商议“允担任赵、沈拟以沈秉堃为内务总长——引者注）得国民党之同意，”^⑦要求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赵秉钧内阁成立后，除教育总长范源濂、财政总长周学熙坚决不同意外，其它阁员均填写了加入国民党志愿书，黄兴的“政党内阁”宣告成功。

这种不伦不类的“政党内阁”的实现，使黄兴非常高兴。

③ 《申报》1912年9月28日、9月25日。

② 《民立报》1912年9月23日。

李剑农：《戊戌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68页。

⑤ ⑧ 《申报》1912年9月23日、9月21日、9月23日、10月1日。

10月4日，他在六国饭店设宴，“欢迎新加入本党的国务员诸君。”席间黄兴又发表演说：“何幸国务员全体加入本党，今日聚于一堂，实为人民与政府握手之始。……此后，政府对于本党之党纲必能贯彻执行，而本党对于政府之行动亦当竭力赞助。”^①孙中山也在上海发表讲话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袁总统既赞成吾党党纲及主义，则吾党当出全力赞助之也。”^②实际上，孙中山、黄兴的这些言论完全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不仅赵秉钧表示“不知政党为何物”，称“政党内阁之说，旁人力倡，与我无涉”，袁世凯也在国务员入国民党后向各地发出要电数十道，宣布“向以人才为前提，此次赵总理虽系国民党员，绝非政党内阁，其性质仍系混合内阁，幸勿误会。”^③当时著名记者黄远生就指出，这种“不驴不马”的内阁，“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④“其实袁系自是袁系，政党自是政党。彼能视无党不可入，何有于同盟与非同盟。”^⑤

孙中山、黄兴北上调和党见和组织“内阁政党”的活动，掩盖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尖锐矛盾，麻痹了国民党人，同时也为袁世凯解脱了困境。孙、黄入京前后，参议院因袁世凯与黎元洪勾结、擅杀武昌首义的著名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而起掀轩然大波。不仅同盟会人对袁世凯镇压“革命功首”的行为异常愤慨，因张振武为民社派人，共和党中也有不少人义愤填膺。在参议院中，同盟会与共和党竟能态度一致，谴责袁世凯，提出对国务院、段祺瑞的弹劾。但对这一斗争，孙中山却很不热心。他到京后即对报界表示：“据我观之，张、方不得谓之无罪。……民国草创时代，法律不完，中央政府即接电报，若无依据，以致惹起

① 《申报》1912年10月11日。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

③ 《申报》1912年9月29日。

④ 《盛京时报》1912年10月2日。

⑤ 《远生遗著》卷2，第163页。

反对。”这样，就把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屠杀轻描淡写为“法律手续不完备”。这无疑对正处于狼狈周章中的袁世凯起了解围作用。而参议院的弹劾也终于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下溃灭。袁世凯利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进一步施展阴谋，发表了“孙、黄、袁、黎八大政纲”，制造了南北一致拥护的假象，使其地位进一步巩固。由于孙中山、黄兴在国民党内具有领袖的实际地位，他们对袁世凯的公开称赞与支持，不能不对国民党产生重大影响，抑制了激进派的力量，扩大了稳健派的势力，实际上助长了国民党妥协倾向。当时就有舆论指出：“自孙、黄出京，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派官僚混入该党，堂堂之国民党几成官僚派盘踞之地。……对于政府不敢加一字之攻击 生龙活虎之党 变为冷静沉默之党矣。”^②虽然言过其实，但也反映了孙中山、黄兴北上后的国民党倾向。

二、国民党国会选举的胜利与宋案的发生

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正式国会应在10个月内召集，有关的组织法、选举法由临时参议院制定。1912年8月，参议院公布了《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条，确定正式国会为两院制，参议员由省议会选举，众议员由各省分区复选产生。此后，参议院又相继公布了选举细则、各省复选区划分、各省议会议员名额等相关法条。随着这些法条的次第公布，竞选便成为各党活动的中心内容。

国民党把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进而组织政党内阁作为根本党略 因而对国会选举十分重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要求全党“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③“此次选举 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划皆可施行。”^④通过竞选使国民党“在国会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8页。

② 《盛京时报》1912年1月11日。

③④ 《宋教仁集》，第456、447页。

里头获得半数以上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狂妄，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国民党本部组成后，马上制定了计划：一、派人到各省组党，成立各省支部；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的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四、及早组织政党责任内阁。^②为了更好地指导竞选，国民党本部特设了选举科。在选举临近时，又“分派党员（每省数人）分赴各省筹备当选，并携款项前往。”各省支部也分别派人到各复选区，“设法劝初选当事人入党，并剴切告以本党之政纲及其适合形势、地点。”^③国民党的报纸大造舆论，一方面介绍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一方面呼吁国民支持国民党。《民权报》发表社论指出：“正式国会云者，为全国国民之代表权所系，偶或不慎，则国事债蹶随之。斯国民对之不能不慎也。国民亦知民主政治之所谓国民行施其主权者，仅此选举一事，乃为直接行使其权。……故国民欲保持其主权，俾毋致放失，则首在选举代表之得人。……否则纯以滥竽充数，异时组成一奄奄无气之立法部，不特不能监督行政部，且恐转为行政部所制服而受其利用，则民权精神消灭净尽，而国民终自陷于灭亡之境矣。”^④国民党相信，“将来正式国会成立，国民党必须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⑤

对国会选举，其它政党同样不甘牛后，竭力以争。共和党通过它的舆论工具攻击国民党“政党内阁”的竞选主张“不合于共和之精神，”“一党执政，则一切大权皆掌于一党，而他党几全无动作之余地，”“温和派必全数被斥”，^⑥“故共和党之于选

《宋教仁集》第456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17页。

③ 《盛京时报》1912年11月5日。

④ 《民权报》1913年1月3日。

⑤ 《宋教仁集》，第458页。

⑥ 《时事新报》1912年1月5日1月7日。

举，一党之胜负，不啻即全国之存亡问题。”同时，它还要求党员全力以赴，不放弃选举权，不选他党分子，注意选举的策略性，对选举活动尽可能占先。^①统一党不仅在北京倾力活动，还派人赴津、沪筹备选举事宜，并要求各地支部“实力进行”。民主党成立较晚，然而于选举却一事早有筹谋。早在1912年7月，它的重要成员萧湘、李文熙就写信给被民主党奉为精神领袖的梁启超说：“国会选举期转瞬即至，吾党不可不早预备政坛演说资料，并各交通处著手运动选举方法，亦清择其纲要，汇帙见示，俾本部早日刊印，通告各地，扩张党势，必大有影响。”^②民主党正式成立后，就把选举能否取胜作为决定其“他日居如何位置”的重要因素，加紧准备，并且不顾它“不竞争政权，专注全力普及政治信条”的标榜，公开宣称如竞选胜利，“举国欢迎，则出而组织内阁。”^③

国会选举自1912年12月中旬开始。各党为战胜对手，首先竭力控制选举机关，利用行政力量操纵选举。国民党在广东占绝对优势，由于各县长是县选举的当然主持人与法定监督，所以在众议员初选时，国民党即要求各县长原为国民党者务必注册，不是党员者邀请入党，使得各县选举调查员、投票监督几乎完全由国民党员充任，^④复选监督也绝大多数是国民党人，结果众议员30人与参议员10人为国民党囊括。湖南国民党力量也较强，选举前夕，国民党本部又派党员仇鳌返湘，任主办全省选举事宜的民政司长，加强对选举的控制。在他的主持下，对各县县长进行了调整，任命国民党员为五区的复选监督，从而使省、县、区联为一气，众、参议员也多为国民党所得。^⑤湖北任选举总监督的是共和党干事夏寿康，因而负责选举的职务也多为共和党人把持，并以此排斥国民党。众议员选举中，原任湖北民政署司法科长的国民

《时事新报》1912年11月11日。

②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7页。

③ 《时报》1912年11月12日。

④ 《大共和报》1912年10月16日。

⑤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82页。

党人欧阳启勋当选，夏寿康与民主党串通，借口欧阳辞职批准日期与当选日期不符规定，宣布当选无效，另补民主党的张则川。参议员第一次选举中，国民党的韩玉辰与共和党的刘成禺均以得票足投票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当选，但共和党企图收买二、三次选票使韩玉辰落选，夏寿康便以第一次选举中选举人未离座写选票为由，宣告选举无效。国民党当然极力反对，又以妨害选举罪名向湖北高等审判厅控告夏寿康。后经人调解双方才作罢。^①这类现象在选举中绝不罕见。如在四川，各党也极力控制选举机关，“把本党有关系的人安排去办理各地选举事务。”^②在福建，选举参议员时，由于省临时议会议长、国民党人宋渊源的活动，10名参议员中国国民党占了7名。江西参议员选举时，内务司长程道存和都督李烈钧（均为国民党人）先后坐镇指挥，“两日内投票九次，选出十名，全为国民党。”^③华侨参议员的选举，“直由国民党一手经理，”遂使其它党派无一入选。^④有些省份各党力量不相上下，便采取主持选举的各员由各党均分的方法，以求平衡。

在选举中，各政党除了利用行政力量干涉、把持选举外，还竞相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各党纷纷在投票地点设立招待所，用免费食宿等方法对选举人拉拢。据时人回忆，广西桂林民主党在发送选票时，每一初选人附送一券，上写凭票供米粉若干碗。如有未用或未用尽者，可以按市价换取现金。复选时，民主党预先租赁酒楼、妓馆，然后派人在路口以欢迎为名，拦接复选人，不问何党，概拉入内。类似的方法，其它党也多采取。^⑤至于拉票、抢票、冒名顶替、重复投票等，更是司空见惯。湖北复选一区投票所未启门时，“司票诸员竟在门内私分选票，至于放枪。绅界有名之吕联乙、白复初……等十余人，各抢一、二千票外出，交

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② 唐宗尧：《四川省第一届省议会回忆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③④ 《申报》1912年3月5日。

⑤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470页。

其机关处填写。”^①也有的选区因选票为他党掠得，遂纠合已党多人将投票所打毁。^②还有的干脆以武力胁迫。“直隶沧州第四区复选之前一日，国民党因强迫投票，硬将民主党李宝书、赵熙二人提去，前呼后拥数十人，有三人持枪威赫。”^③四川共和党都督胡景伊为使同党当选，竟然以军警“封门威迫。”各地选举中群起殴斗、老拳相向之事颇不罕见。在选举中，以金钱收买选票也是各党普遍采取的方法。从初选到复选，乃至参议员选举，几乎都有贿选发生。江苏丹徒在初选时，有人“带铜元三十千，有投票一纸者，给铜元五枚，欲得沽酒钱者，只须更番易衣到场投票可也。”广东各选区“买选举票盛行，其价格由竞争程度高下不定，最廉则一票自一、二元至四、五元止，其最贵者涨至十元至二、三十元。”^④华侨的参议员选举“怪象百出，选举场变作买卖场，其有一票卖至十余次者，径以金钱多寡为先后被选次第。”^⑤湖北共和党挪用官钱局官票五十万串作贿选费用，至1914年尚未能销账，^⑥以致武昌街头出现这样的公启：“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⑦

在资产阶级政代议体中，党派竞选虽也不免有舞弊、贿选等丑闻，但大体上仍以宣传政见、驳难辩论以争取选民支持为主。但在民初国会党竞选中，各党派虽也有过演说政纲的活动（如国民党的宋教仁、民主党的汤化龙等人），但这并不是各党竞选活动的主流。所以如此，就政党来说，一是其成份庞杂，不少人本无政见，附会一党不过是谋个人私利，而国会选举自然被视为一个绝好机会，遂至运动选举，无所不用其极。二是各党政纲缺少吸引

③ 《时报》1913年1月19日，1月27日。

② 《申报》1912年12月10日，12月14日。

⑤ 《盛京时报》1913年1月8日。

⑥ 《申报》1913年3月5日。

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 《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⑧ 《民权报》1913年2月14日。

选民的内容，许多人不感兴趣。^①就选民来说，素质低下也是一个因素。封建帝制刚刚被推翻，许多人对选举还十分陌生，也无兴趣，弃权者为数不少。如上海参加众议员选举的只占登记选民人总数的 $1/4$ 。湖北“省垣居民不到者约五分之二。”^②有些地区的选举纯为应付，如陕西朝邑选举时，由选举事务所请各乡绅耆，决定何人当选，然后雇人将拟定的当选人按法定票数抄写若干票投入票柜中，便算选举告竣。^③这种情况也为各党的舞弊提供了机会。为了拉住选民，各党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否则无人投票。”此外，不法行为得不到惩处，也为舞弊弥祸推波助澜。虽公布有选举法，规定对违法事情得以起诉，但由于各地司法机关多为一党控制，难以秉公制裁，“无从惩罚，野心益张，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④

国会选举于1913年3月结束。选举结果，可以下列两表作为参考：^⑤（见312—313页）

关于各党在参众、两院的席位记载不一，上列两表仅取一说，而且肯定有不确之处。如四川参议员至少有5人为国民党员，但表中所列竟无一人。不过即使如此，也还大致反映了各党在国会中的地位与力量。就国民党来说，显然在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

国会选举的胜利，使国民党人心振奋。主持党务的宋教仁更是兴高彩烈。宋教仁自1912年10月南下返湘，一面布置国民党的选举工作，一面参加参议员的竞选。此后又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沿途他到处演说，“对于时政得失，尽情发挥，无所顾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05页。

② 《时报》1913年1月19日。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66页。

④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470页。

⑤ 《时报》1913年1月19日。

⑥ 本表据《盛京时报》年1913年4月23日、24日所载制成，并参考了1914年英文《中国年鉴》。其中参议院额定议员为274人，实际选举266人，中央学会3名空缺。

众议院议员党派表

省 区	国民党	共和党	统一党	民主党	跨 党	未 定	总 计
安 徽	9	2	2	0	14	0	27
浙 江	18	7	0	1	12	0	38
直 隶	22	16	0	1	7	0	46
奉 天	8	0	0	0	8	0	16
福 建	3	4	0	2	15	0	24
黑 龙 江	3	2	0	0	5	0	10
河 南	8	3	12	0	9	0	32
湖 南	22	3	0	0	2	0	27
湖 北	11	11	0	1	0	3	26
甘 肃	5	1	0	0	8	0	14
江 西	20	4	0	0	11	0	35
江 苏	11	13	0	4	12	0	40
吉 林	7	0	0	0	1	2	10
广 西	13	4	0	0	2	0	19
广 东	30	0	0	0	0	0	30
贵 州	0	11	0	0	2	0	13
山 西	15	1	0	3	9	0	28
山 东	9	15	0	1	8	0	33
陕 西	18	0	0	0	3	0	21
新 疆	0	7	0	0	3	0	10
四 川	13	5	0	1	14	2	35
云 南	18	3	0	0	1	0	22
蒙 古	6	9	4	2	0	6	27
西 藏	0	0	0	0	0	10	10
青 海	0	0	0	0	0	3	3
总 计	269	121	18	16	146	26	595

忌。” 他激烈地抨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指出：“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财政紊乱、民生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83页

参议院议员党派表

省 区	国民党	共产党	统一党	民主党	跨 党	未 定	总 计
安 徽	4	0	0	0	6	0	10
浙 江	5	3	0	0	2	0	10
直 隶	5	5	0	0	0	0	10
奉 天	4	0	0	3	3	0	10
福 建	7	2	0	1	0	0	10
黑 龙 江	5	1	0	1	3	0	10
河 南	5	1	4	0	0	0	10
湖 南	10	0	0	0	0	0	10
湖 北	5	5	0	0	0	0	10
甘 肃	5	3	0	0	2	0	10
江 西	10	0	0	0	0	0	10
江 苏	3	1	0	1	5	0	10
吉 林	8	0	1	0	1	0	10
广 西	9	1	0	0	0	0	10
广 东	10	0	0	0	0	0	10
贵 州	0	8	0	1	1	0	10
山 西	6	0	0	1	3	0	10
山 东	2	3	1	0	2	2	10
陕 西	8	0	0	0	2	0	10
新 疆	9	0	0	0	1	0	10
四 川	0	0	0	0	0	10	10
云 南	6	3	0	0	1	0	10
蒙 古	0	10	0	0	6	11	27
青 海	0	0	0	0	0	3	3
西 藏	0	0	0	0	0	10	10
华 侨	6	0	0	0	0	0	6
总 计	123	55	6	8	38	36	266

穷困、实业凋零，外交更不堪问。内政外交的种种险象“推原祸始，责有攸归”，“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①他积极宣传政党

① 《宋教仁集》，第457—458、459页，

内阁的主张，强调要由国民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要求国民党人“挟其坚忍不挠之力，以扶持国家于不坠，”^①一旦袁世凯撕毁约法、背叛民国就要“再起来革命。”^②国民党国会选举的胜利大局已定后，宋教仁草拟了《国民党之大政见》，作为国民党执政的施政纲领，又制定了一个“拥黎排袁”的秘密计划，准备以“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将袁世凯赶下台。^③

宋教仁的活动深为袁世凯忌恨。袁世凯十分清楚，“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④即通过合法斗争向他所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夺权。而宋教仁“拥黎排袁”的计划，更是“触袁氏之忌”。袁世凯曾企图以巨款收买宋教仁，也曾表示过借重宋教仁为国务总理，条件是放弃责任内阁的主张，但宋教仁不为所动，表现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家的气节。于是袁世凯决意除掉这个政敌。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赵秉钧、洪述祖等人以重金买通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布置了凶手。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22日凌晨不治身死。

宋案的发生，使全国震惊。国民党人的义愤填膺自不待言，其它党派中也有人对此种卑劣的暗杀行为十分愤慨，要求“严缉元凶，付之重典。”^⑤袁世凯得知宋教仁的死讯后假惺惺地表示：“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肇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并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忠魂。”^⑥3月23日、24日刺宋的凶手武士英及其共谋应桂馨缉获到案，并从应宅中搜出应与洪述祖、赵秉钧

① 《宋教仁集》，第459页。

② 同上书，第457页。

③ 参见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第173页。

④ 《赣宁之役资料散辑》，《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⑤ 《申报》1913年4月7日。

⑥ 《政府公报》1913年3月23日。

往来函电多通，证明宋案的主谋就是袁世凯本人和他的心腹赵秉钧。真相大白于天下。

4月25日，宋案证据全部公布。很多国民党人怒不可遏。他们激愤地指出：“夫袁、赵之杀宋，志不仅在于杀宋也，所以去平民政治与政党内阁之主张者，藉以放胆厉行专制，为变更国体之张本也。”围绕着宋案问题，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兵戎相见已不可避免。

三、二次革命前国民党组织的分化

宋教仁的遇害，使国民党的议会斗争失去了核心人物。然而，由于国民党占据着国会的多数席位，仍然是一支抵制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力量。对于国会，袁世凯并无兴趣，也下定了最后以武力镇压国民党的决心，但为了利用国会为其窃取正式大总统职务披上合法的外衣，他又不能不暂时容忍国民党的议会活动。于是他一方面利用共和党、民主党等亲袁政党作政治打手，对国民党围剿；一方面以种种卑劣手段对国民党分化瓦解，“务使温和、激烈两派鲜明旗帜，难以联袂，”^②无法与其抗衡。

早在国会选举结束后不久，袁世凯就派出爪牙亲信，分赴上海、武汉、南京、郑州等交通要冲之地“招待”入京的国会议员。议员入京后，袁世凯的收买、利诱活动也进一步加紧。当时北京外城的“八大胡同”成为袁世凯“接洽”议员的中心。三日小聚，五日大宴，声色犬马，接连不断。与此同时，袁世凯又用重金对国民党议员大加收买。据当时的报刊披露，被收买者必须实行三条：一、脱党者须登报声明；二、议宪法须俟袁之主张；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收买的价格自五千元至八千元不等。除了整体收买外，还有临时收买，投一票即有金钱若干，甚至不出席也

《宋案与借款平议》，《月民》1卷1号，1913年5月。

② 《盛京时报》1913年8月17日。

可得相当津贴。^①但是，最主要的方法，则是以提供巨额经费为诱饵，诱使国民党人另立山头，分道扬镳。在袁世凯的诱惑下，国民党中的变节分子、志行薄弱者纷纷脱党，另组政团。

率先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政团是孙毓筠“主张”的国事维持会。孙毓筠是同盟会中的重要人物，武昌起义后曾任过安徽都督，此后投靠袁世凯，成为变节分子。在陆征祥“超然内阁”的风潮中，他违反同盟会的决议，公开通电反对同盟会“政党内阁”的主张，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被袁世凯提名为陆征祥内阁的阁员人选。由于同盟会坚决反对，孙毓筠未能入阁，因此而心怀怏怏。这样，他自然成为袁世凯分裂国民党的得力工具。正如当时日本《朝日新闻》所揭露的那样，袁世凯希望“割取孙毓筠氏一派，于国民党碎其一角，以期制众议院内之多数。”^②

1913年2月17日，孙毓筠、王芝祥、王人文、杨曾蔚、于右任、章士钊等人在北京正式发起“国事维持会”。该会宣称“以维持大局、俾国家得抵于和平统一”为宗旨，具体纲领有三项：一、维持立法与行政之冲突；二、维持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冲突；三、维持政党与政党之冲突。^③国事维持会要求会员在言论行动上“不得挟持私见，有所偏倚。”^④但在实际上，它却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正式国会召集前夕，国民党激进派分子戴天仇、何海鸣等人为了防止国会遭袁世凯的武力压迫，曾在上海发起欢迎国会团，要求国会自择地点开会。国事维持会指责此举是“全国分裂兆端，”攻击不遗余力。它与共和党、民主党相唱和，鼓吹“欲建强固有力之国家，非先建强固有力之政府不可，”^⑤“议会专制较官僚政治更毒。”^⑥它攻击国民党“政党政治”

① 《盛京时报》1913年4月18日。

② 《盛京时报》1913年4月27日。

③ 《申报》1913年2月25日。

④ 《申报》1913年2月15日。

⑤ 《盛京时报》1913年2月27日。

⑥ 《申报》1913年3月11日。

的主张是“以一党权利为前提，而置国家大局于不顾”，认为国民党对袁世凯的抵制斗争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①对宋案及善后大借款问题，国事维持会也通电为袁世凯帮腔，宣称宋案“纯系法律问题，”除静候法律解决外别无他法。“借款为时势之必须而手〔续〕之不完则由临时参议院之放弃职权不能专责政府”；“不应借口违法推翻成议。”^②当时就有舆论认为，国事维持会“虽籍国民党人所组织，而事实上多赞助中央者，”是袁世凯的“游击之师。”国事维持会对于分化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起了不小的作用，“其间颇罗致国民党入此，国民党员之人数渐减，此实有力焉。”^③

继国事维持会之后，又有政友会从国民党中分裂而出。政友会由山西籍国民党议员景耀月发起，1913年5月6日成立。政友会以景耀月为会长，于右任、彭占元为副会长，宗旨为“巩固共和、统一政见。”^④并公布政纲七项：巩固共和国体、发展国民经济、力谋教育普及、完成国内交通、增厚边防军备、经营拓植事业、维持国际平和。^⑤6月初孙毓筠操纵的另一小团体民宪党并入政友会，“拟将全会会员为傀儡，自侧面援助袁总统。”^⑥合并后的政友会选举景耀月、孙毓筠为理事，并将政纲改为两项：一、巩固共和、发展国力、实行世界的国家主义；二、依据政纲应时与事之要求发表政见，以期实行。^⑦政友会得到了袁世凯的重金资助，据时人回忆，袁世凯一次就付给50万元。^⑧政友会成立后，积极支持袁世凯，它一方面从组织上瓦解国民党（该会成员原隶属国民党者占五分之三，多为山西、陕西、甘肃等北方

① 《盛京时报》1913年2月27日。

《盛京时报》1913年5月22日。

③ 《申报》1913年4月26日

《申报》1913年5月9日。

⑤ 《申报》1913年5月23日。

⑥ 《盛京时报》1913年7月11日。

《盛京时报》1913年8月12日。

⑧ 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省份的国民党议员)；一方面在舆论上围攻国民党。1913年7月初国民党众议员邹鲁弹劾政府失职违法，政友会表示反对，认为“此时弹劾政府，后继内阁一时不能组成，中国将变为无政府状态，其危险实不堪设想。”^①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后，政友会与进步党一起“请政府速以兵力剿平乱事。”^②

这一时期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的还有相友会、超然议员社、癸丑同志会、集益社等政团。

相友会由刘揆一发起，1913年5月8日正式成立。刘揆一是老同盟会员，武昌起义后渐与同盟会离异。陆征祥内阁第二次通过时，工商总长人选蒋作宾遭国会否决，袁世凯即以刘揆一补充。由于同盟会反对混合内阁，不赞成同盟会员入阁，刘揆一遂声明脱离同盟会。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将赵秉钧等人拉入党内，形成非驴非马的“政党内阁”。后刘揆一又宣布“自然复党”。宋案发生后，他以南北调停人自居，曾至上海调停，受到冷遇，遂集合20余名国民党议员组成相友会。相友会以刘揆一会长，陈黻宸为副会长，主要成员有辛汉、张国溶、孙钟、黄赞元等人。在成立大会上，刘揆一发表演说：“首诋政府，次评社会，末并痛诋各党相争之大非，”宣称相友会要“调合党见，俾各融洽，共支此危局。”^③但是在重大问题上，相友会无不与亲袁政党同调，而与国民党对立。

超然议员社由郭人漳、夏同和、彭介石、张树森等人发起，1913年5月18日成立。超然议员社不设社长，全体社员俱为事务员，设总务、文牒、交际三科。由每科同人轮流任主任。^④同上几个政团一样，超然议员社也极力标榜它的“公正”与调和立场，宣称“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⑤要“专以国家为前提，纯属良心之感召，力戒意气之争，誓祛权利之

《盛京时报》1913年7月11日。

② 《申报》1913年7月26日。

③ 《申报》1913年5月9日。

④ 《申报》1913年5月26日。

⑤ 《申报》1913年5月26日。

念。对于政见，不作极端主张，对于党争，毫无左袒倾向。”^①超然议员社成立后，即以该社团体的名义通告各政党，宣告社员脱离与各党关系“退处超然地位。”但在实际上，超然议员社一点也不超然。二次革命爆发后，它与进步党相呼应，通电攻击讨袁军“倒行逆施”，“假讨袁之名，行叛国之实。”^②认为“此种乱党，当然以武力解决。”^③1913年8月参议院选举议长时，国民党提出以王正廷为候选人，超然议员社表示“誓不投国民党之票。”^④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指使亲信梁士诒等人组织“公民党”鼓吹先举总统，超然议员社与公民党沆瀣一气，呼应唱和。^⑤超然议员社所以不能“超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费用由总统府直接付与。”^⑥

癸丑同志会由国民党籍众议员陈家鼎发起，1913年6月15日成立，以刘公为会长，张我华、王湘为副会长，设政务、交际、文事、评议、总务诸部，主要干部有胡祖舜、胡鄂公、马小进、韩玉辰、高旭等人，另设参事54人。^⑦癸丑同志会也宣称要“力矫两党之弊，而以主张正义、发挥真实民意为指导”，“以维护共和为国家统一之道。”^⑧这些标榜与上述政团语调相似，但是癸丑同志会在政治上与袁世凯有一定保留，有别于上述几个政团。据发起人陈家鼎说，所以成立该会，“亦即因研究宋案、取消借款两端而起，决不能使政府有不法行为，亡国政策。”^⑨二次革命爆发后，该会的文事部副部长韩玉辰、副会长张我华、评

① 《申报》1913年5月26日。

② 《申报》1913年8月25日。

③ 《申报》1913年7月26日。

《申报》1913年9月2日。

⑤ 《申报》1913年9月19日。

⑥ 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⑦ 《盛京时报》1913年6月21日。

⑧ 《癸丑同志会宣言书》转引自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上，第287页。

⑨ 《盛京时报》1913年5月17日。

议部部长高旭等人联合部分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提出建议案，“谓南中称兵虽系法外行动而其实为政府违法失职所激成。与其兵连祸结，不如请袁退位，由黎代理。”因而又有人称其为“国民党之别动队。”但尽管如此，癸丑同志会的成立仍是一种分裂活动，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

集益社又称集益会，前身为同声社，由广东国民党参议员朱兆萃、黄锡銓、周廷励等人于国会开会之初发起。后又与广西国民党众议员林绳武、陈发檀、龚政等人组织的小团体相合，改名集益社。^③集益社公布的政纲是：拥护国家之统一、实现稳健主义、催订宪法，并订有社则十八条。^④二次革命爆发后，在袁世凯的劝诱与威压下，国民党中的不少“稳健”分子加入集益社，社员曾达五、六十人。集益社通过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与袁世凯联系，经费也由梁士诒提供，当时就有人称它为梁士诒的“私党”。

除上述政团外，郭人漳的大公俱乐部、司徒颖、黄霄九、马小进等人的潜社、黄荣成的政友联合会等，也都是由国民党中分化出的政团。这一时期，进步党、宪政公会、两院议员同志会等亲袁政党政团也大力开展时国民党议员的招降活动，乘国民党人心动摇之机，“皆拾得无数党员。”^⑤

国民党的分化瓦解，除了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之外，也有自身的因素。宋教仁被暗杀后，北京国民党本部群龙无首，国民党要人多集于上海，而且意见不一，已无法在行动和意志上统一国民党。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国民党维系统一的基础十分脆弱。合并入国民党的各政党、政团的历史、构成、政治倾向并不一致，虽合为一党而隐分派别。在组织发展上，国民党为了扩张党势，

《申报》1913年8月1日。

②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第71页。

③ 《盛京时报》1913年8月17日

《申报》1913年8月16日。

⑤ 《申报》1913年8月18日。

不惜降格以求，大批政客官僚跻身其中。这些人入党脱党、拥袁反袁，完全从个人的地位与权势出发。成分的复杂为袁世凯的分化瓦解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邹鲁曾感叹：“国民党与非国民党争，国民党决胜；国民党与袁总统争，国民党恐不胜；国民党与袁总统争犹可胜，国民党与金钱争则万难胜。”^①可谓破的之言。在二次革命爆发在即之时，国民党的队伍却如此四分五裂，已经注定了败北的命运。

四、国民党议会斗争的失败

宋案的枪声，打破了国民党议会斗争的幻梦，也警醒了不少国民党人。宋案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匆匆回国，3月25日到达上海，随即召开了有各省国民党要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宋案的对待方法。血的教训使孙中山决心重举武装反袁的旗帜。他认为，宋案“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②由于袁世凯窃取了中央大权，重兵在握，武装反袁必须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而宋案激起的全国人民对北洋势力的愤慨，“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机会一纵即逝，后悔终噬莫及。”^③但是，黄兴等人却不赞成孙中山的意见，认为国民党南方的军事准备不充分，袁世凯的真面目还未充分暴露，起兵讨袁信心不足，主张听候法律解决。二人“争持甚烈。”^④这样，在如何解决宋案上，国民党的首脑人物中出现了分歧，存在着武力倒袁和法律倒袁两种主张。

孙中山武力倒袁的主张在国民党中有相当的基础。国民党中的激烈派支持孙中山的意见。江西国民党支部为宋教仁遇刺发表宣言说：“吾党健儿为驱逐共和魔魅，保障民国前途计，当发挥吾党固有之侠烈精神，出最后之手腕，鞭巨石以入海，遏长江使断

邹鲁：《澄庐文选》，第42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18页。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流。” 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的追悼宋教仁的大会上，有人激愤地表示，袁世凯政府“为专制政府，为假共和。并申言此等政府之行为乃是强盗政府。又言此等政府乃是杀人机关。吾人须预备对付之方法。对付不了，则推倒之，不胜则继之以血战。”^② 激烈派分子戴天仇著文历数革命党人一再妥协退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一误不堪再误，”“民贼一日不去，大局一日不宁。”《民权报》刊登社论，号召“为保全民国战，为发挥民权战，为诛锄奸人战，为征伐叛逆战。经此一战，此辈阴谋不轨、残暴不仁、顽梗无耻、巨猾神奸、反对公理、无恶不作之民贼，皆可一举覆之，纯粹之平民政治，可由之而发现。”^④ 湖南部分国民党人致电都督谭延闿，要求他“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誓以铁血与国逆相见。”^⑤ 浙江的一些国民党人也要求都督朱瑞与袁世凯政府断绝关系。在握有兵权的国民党人中，江西都督李烈钧和安徽都督柏文蔚都赞同武力倒袁，并做了一定的军事准备。

但是，法律倒袁的主张在国民党内有着更大的市场。如果说黄兴坚持法律倒袁是因为感到力量不充、信心不足的话，那么多数国民党人则是仍然迷信徒具形式、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国会和被袁世凯多次践踏的“法律”。当宋案证据公布，真相已经大白的时候，国民党中的稳健派仍认为“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⑥ 国民党湖南都督谭延闿原为立宪派，根本打算与袁世凯兵戎相见；广东都督

《民立报》1913年4月7日。

② 《民立报》1913年4月14日。

③ 《民权报》1913年4月16日。

④ 《民权报》1913年4月27日。

⑤ 《中华民报》1913年5月3日。

⑥ 《民立报》1913年5月3日。

胡汉民因内部不稳，也对武装讨袁迟疑踌躇。多数国民党人受南北议和以来日益浓郁的妥协空气的影响，还难以适应与袁世凯突然绝裂的战略变化，也有些人认为自武昌起义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社会心理厌战求安，担心“轻心发难”得不到人民的支持。^①国民党国会议员更是法律倒袁的积极拥护者。4月8日，国会正式开幕，袁世凯派人代表他致词，表示尊重国会和约法。这种虚伪的表白增加了国民党议员对以合法斗争解决宋案的迷惑。与此同时，袁世凯还赶紧给议员下发每月的公费洋二百元。在这样一服“可贵之和平剂”^②的作用下，国民党议员们更是端坐议坛、主张法律解决了。由于法律倒袁的呼声压倒了武力倒袁的主张，孙中山两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反袁的计划，都一筹莫展，未有任何实质性结果。

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时候，袁世凯却加快了武力镇压国民党人的准备。为了筹措内战经费，他不顾帝国主义银行团提出的苛刻条件，不经国会议决，于4月26日将谈判经年、屡次中辍的善后大借款合同迅速签署。这一非法行为，使国民党因宋案而激发的反袁情绪更形激烈。黄兴通电指出：“借款必由参议院议决，载在约法，”“非先得国会之承诺，政府不得自由募集分文，”大借款完全是非法的。他严正质问袁世凯：“临时政府将次告终，国势未安，百政莫举。掌财政者，全无计划昭示国人，骤须巨款，用途安在？此小之表示政府之不诚，大之人民得坐政府以破坏约法、蹂躏国会之罪。”^③孙中山为反对大借款，先赴上海汇丰银行，要求电阻银行团签字，继而又致电欧洲各国政府、议会，呼吁各国干涉，“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供给北京政府。”^④5月5日，江西、湖南、广东、安徽四

《民立报》1913年6月1日。

② 《申报》1913年4月15日。

③ 《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

④ 《中华民报》1913年5月23日。

省国民党都督联名通电、痛斥袁世凯非法行为，并指出，袁世凯同意银行团监督财政、盐务等苛刻条件，必致“财政先亡，国本随亡，陷民国为埃及之续。以前清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民国之政府。海内外烈士前仆后继，躬冒万死，缔造民国，而政府甘以断送于借款之下，凡有血气，孰不发指眦裂！况宋案证据宣布，词连政府，有以巨金资助凶手之语，全国汹汹，方虞震动。今复不经院议违法借款，人心一失。窃恐虽有大力，无以善其后。”这封通电言词激烈，不啻一篇讨袁檄文。

由于善后借款未经国会通过，国会成为国民党人反对善后借款的中心场所。担任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国民党人张继和王正廷在得知借款即将成立的消息后，赶至袁世凯住处，准备表明反对理由，袁世凯辞而未见，二人又率部分国民党议员到汇丰银行，准备阻止签字，也未成功。4月27日，张、王二人以参议院正、副院长身份发表通电，指出大借款“不交国会通过，蹂躏立法机关，”“丧失主权，祸国殃民，”表示要“抵死力争，誓不承认。”^②4月28日参议院开会讨论大借款问题。国民党参议员汤漪、居正等人首先提出质询案，认为“此等绝大财政，民国存亡所关，而条件内容秘不宣示，人心惶惑，”要求政府于次日出席答复。但在29日，国务院只送来一纸咨文，声称借款条件已为原参议院议决，此次签押合同与前大略相同，俟众议院议长选出，两院正式构成后再行出席报告，根本没把参议院的质询放在眼中。这种轻蔑的态度使国民党议员更为愤慨，他们纷纷表示：“政府借款签押异常紧急，几有刻不容缓之势。其何以如此紧急，此中大有可疑。本院若不急加干涉，危险殊不可测。”^③正试议决大借款“违法签字，当然无效。”^④5月5日，众议院也在国民党议员的力持下通过决议：“政府违法签约借款，咨调查

① 《民立报》1913年5月5日。

② 《申报》1913年5月3日，5月4日。

③④ 《民立报》1913年5月1日，5月5日。

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①

对国民党人反对非法大借款的鼓噪，袁世凯毫不惊慌。从宋案后国民党的涣散软弱、步伐纷乱中，他早已窥出国民党的弱点所在。5月8日，他咨文国会，声称借款“系按照前参议院表决之案，始行定义，正可证明政府之尊重议会，”“值兹财政艰窘，国际债权催逼更甚，借款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定。此次合同签订，在势无可取消。”^②同时，他又下令对国民党四都督严加申斥，指责四都督反对借款的通电是捏词耸听，淆乱人心，“若惟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者。”^③当然，袁世凯也没有忘记他的拿手招术，在他们的授意下，以黎元洪领衔，十七省都督发表通电，列举“六危”，声称若否认借款，就会立见亡国大祸，就会政府土崩、国会星散，因而国会反对借款是“逞一时之快论，为万世之罪人。”^④在国会内部，袁世凯一面加紧分化国民党议员，一面指使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于5月29日合组成进步党，抵制国民党。于是，国事维持会等从国民党中分化出去的小团体纷纷主张“隐忍迁就”，亲袁政党议员也以围攻哄闹、避不出席等方法使国民党议员的提案搁浅。

有帝国主义借款输血打气，有亲袁政党摇旗呐喊，袁世凯的火焰十分嚣张。5月3日，他连发两道命令，称国民党对宋案与大借款“不问是非，不顾虚实，竟将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一笔抹倒，凭个人之成见，强举世以盲从，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倾复政府、扰乱大局之私愿。”他还借西方通讯社“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的报道借题发挥说：“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

① 《民立报》1913年5月1日。

②③ 《政府公报》1913年5月9日，5月10日。

④ 《民立报》1913年6月1日。

暴安良，执法不贷。”这两道命令发出后，即有评论认为“不管警告党人设谋叛乱，则政府将以武力对付也。”^②北洋都督、将领也纷纷通电，公开辱骂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殄行，甘为戎首。”^③与此同时，袁世凯加紧了镇压国民党人的军事部署，任命段祺瑞代理总理，5月上旬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5月中旬，部分北洋军即开至湖北武穴、兴国、田家镇一线，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并准备“相机直捣九江或南昌。”^④

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国民党更为分歧紊乱，非但武力倒袁的呼声日渐微弱，连对大借款的主张也变成了“非反对大借款，实反对政府借款之手续。”^⑤在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虽提出了几个有气无力的建议案，弹劾案，但在进步党的阻挠下，无一不不了了之，而且调门也越来越低，以至近于乞求：“为今之计，惟有政府迅将合同提交议院，本党亦无不力予维持，俾底于成。”^⑥当时的报刊就指出，国民党的这种作法，是“但求借款案有一下台办法，则眼前即暂束手。”^⑦在妥协声浪中，黄兴也不得不表示“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国会通过，始终如一。”^⑧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国民党人企图靠让步来换取袁世凯停止进兵，联络一些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立宪派，旧官僚一起进行南北调和，一时间穿梭走马、函电交驰。他们或以南方允诺和平解决为条件，要求袁世凯同意赵秉钧、洪述祖出庭、借款由国会通过、政府不干涉宪法的制定^⑨或保证国民党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对宋案的追查至洪述祖即止，要求袁世凯不撤换国民党

① 《政府公报》1913年5月4日。

② 《申报》1913年5月7日。

③ 《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17日。

④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97页。

⑤⑥ 《盛京时报》1913年5月15日，6月21日。

⑦ 《申报》1913年5月22日。

⑧ 《民立报》1913年5月14日。

⑨ 《时报》1913年5月7日。

都督。^①但袁世凯已决心镇压国民党，根本不为所动。他蛮横地表示：“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今日非调和南问北题，及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

②袁世凯已做好了开战的准备，当然不会接受这些调和。

国民党人的步步退让，只能使袁世凯更为骄横。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14日与30日又以调任的名义将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免去。在山穷水尽，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国民党被迫应战。7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又一次召开会议，才决定兴师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誓师，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二次革命的爆发使北京的国民党本部和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在江西独立前，张继、白逾桓等少数国民党议员已离京南下。7月16日，张继在上海通电，痛斥袁世凯对国会的摧残践踏，号召“为保持立法尊严及言论自由计，应请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纠元凶而伸国法。”^③倾向国民党的省议会联合会也呼吁“两院全体议员克日南迁，择地开议，俾伸国法而维大局。”^④设使国会南迁，即便是国民党议员全都南下，在政治上都将是对袁世凯的一大打击，但是，这一号召却未得到响应。多数国民党议员仍迷信仅凭议会就可以战胜袁世凯，因而仍稳坐议场。为了表白不为“法外行为”，“以示国民党不袒护之意，”有人竟提议将黄兴等人的党籍除去，“布告全国。”^⑤7月19日，国民党议员开会，虽然也认为“此次南中发乱，推其原因，皆政府违法所致，”但仍重弹宋案法律解决、借

《张謇存稿》，第40页。

《民立报》1913年6月2日。

③ 《盛京时报》1913年7月26日。

④ 《民立报》1913年7月20日。

⑤ 《申报》1913年7月26日、7月28日。

款须由国会追认的老调。^①这自然于袁世凯丝毫无损。此后，国民党议员又提出了袁氏退位案、弹劾政府失职违法案，也都毫无结果。

对于袁世凯来说，在军事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暂时容忍国民党稳健派议员留在国会中不惟无害，还可以为他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合法”作一点点缀：“国会多数足以代表之。”^②为了使国民党议员起到这种作用，他一方面宣布“只问顺逆，不问党派”，^③声称要认真保护国会，一方面向国民党议员施加压力迫其就范。7月25日，北京检察厅传见国民党理事吴景濂，“谓贵党如自认与乱党有关系，则本厅惟有执行职权，下令取缔。否则应开大会将黄兴辈正式除名，以示不袒庇之意。”^④8月4日，国民党本部即通告：“黄、陈、李、柏纯系个人行动，除名非大会不能决定，惟限迫谨遵令除名。”^⑤8月7日，又宣言在法律范围内，作政治行动。但是，随着南方讨袁军的失利，国民党议员已是噤若寒蝉，连政治活动也不敢进行了。

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不仅实际上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就是南方的军事斗争也十分涣散。继江西之后，又有江苏、安徽、上海、广东、潮南、福建、四川等地宣布独立，但国民党既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也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机构，内部分歧、矛盾重重。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人在政治上没有建树，举不出一面鲜明的、能吸引群众的旗帜，所以很快归于失败。不到两个月，各地的讨袁军都被打垮，孙中山、黄兴等人被迫再次亡命日本。

二次革命的失败，表明了国民党议会道路的破产。国民党人错误地认为，靠一纸《临时约法》就可以保障民主共和制度，仅凭议会斗争就可以置袁世凯于死地，从而取得政权。他们不懂

① 《盛京时报》1913年7月22日。

② 《时报》1913年7月30日。

③ 《申报》1913年7月26日、7月28日。

得，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都必须有一支革命军队，议会斗争必须有军事斗争为后盾才可能有力量。国民党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他们以为只要把西方的国会形式、政党政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革命就已大功告成，忘记了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封建势力的根基并未动摇。不清除封建地基，共和制度不过是沙上建塔、空中楼阁。二次革命的失败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节 政党政治的彻底破产

一、进步党的组成

正式国会召开后不久，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即合并为进步党。

三党合并，梁启超起了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仍抱着君主立宪的主张不放，提出所谓的“虚君共和”制。但革命的迅速发展使他的这一主张刚出笼就失去了市场，共和民主成了不可阻遏的洪流。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积极谋求与袁世凯结盟，“以造成一大党”，来对抗同盟会。为此，梁启超于1912年2月致书袁世凯，提醒他“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大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要“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办法就是“求之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者”建立一个政党。这个建议颇为袁世凯欣赏，回信称“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①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梁启超在日本一方面指挥国内的信徒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积极联络，准备将立宪派的政党政团合为一大党，一方面疏通活动各方，为其回国作铺垫。前项活动终因立宪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1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620页。

派之间的门户成见过深未能成功，后项活动却大有进展。云南都督蔡锷、副总统黎元洪先后通电欢迎梁启超回国，在汪精卫的疏通下，同盟会要人张继、刘揆一也致电表示：“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袁世凯也电邀梁启超回国。^①于是，梁启超自日本神户动身，10月8日抵达天津。

梁启超回到国内后，立即开始筹组共和党与即将成立的民主党的合并，10月中、下旬，他往来于京、津之间，与袁世凯密谈，与两党要人接触，出席各省的欢迎会，十分活跃。在民主党举行的欢迎会上，梁启超演说称：“当日法国大革命之时，亦分急进，渐进两派。急进派以人而分三派，渐进派亦复分为两派。急进派之相互残杀，故无论矣，即渐进派之两派亦不肯联合，为急进派所利用，挑拨离间，使之时相水火，以杀其势。及国会选举后，急进派乃一一收拾之，使渐进派中两派重要之人皆登断头之台，……此其故岂不可深长思乎？”^②这番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梁启超急于合并立宪派政党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对抗他所谓的急进派国民党。

梁启超的活动对于急欲利用共和党、民主党等立宪派为主体的政党来对付国民党的袁世凯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梁启超一到天津，袁世凯即“约早入京”，梁启超入京后，“京中行馆，一切由总统府供张，”“致敬尽礼。”袁世凯不仅对梁启超“月饷三千”赠住宅一座而且应允合党后提供经费20万元。^③在梁启超的活动下，共和、民主两党很快谈妥合并，决定以黎元洪为新党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为干事。对此，梁启超志满意得地说：“共和、民主两党大约两旬后联合成立。两党员皆有‘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之意，选举胜利可期。然自兹以往，当无日不与大敌相见于马上，吾则必须身先士卒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4页。

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词》《民国经世文编》政治三。

③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3页。

也。”^①

但是，两党合并没有象梁启超想象的那样顺利实现，而是波折迭起。一方面两党中立宪派之间的历史积怨还难以立即消释，一方面国会选举在即，两党都企图利用选举扩张党势，以争取在合并中占有优势，因而对合并热情减低。特别是民主党更形消极，甚至公开否认合并，称合并“皆无稽之谈。……民主党自有历史之根据及独立之精神，以艰苦卓绝为天下倡，岂能因一人之进退而变其初志。梁启超因不满民主党并党的消极，于1913年2月加入共和党——引者注。”^②1913年3月国会选举揭晓后，面对国民党取得多数席位的形势，合并问题被再次提出，而且在梁启超的主张下，又吸收了统一党，由两党变为三党。这次协议的结果，决定以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为协理，并初步拟定了四点政纲。但是这次合并又未能如愿以偿。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与梁启超均受到国民党的怀疑。^③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担心由他任党魁不利三党合并，而且“恐孤注一掷、轻于尝试”，就以“政党素非其志”为由，表示要“舍名取实，不居总理地位。”^④同时三党中部分人也以国民党正在激愤之中，认为要慎重对待党首问题，于是又将总理改袁为黎。但民主党在合并后的干部人选上又提出异议，原订汤化龙为政务部长，孙武为党务部长，民主党由于与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仍存芥蒂，不愿汤与孙并列，主张改为理事制，这一节外生枝使合并再次搁浅。

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后，马上形成了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一方，国民党为一方的两军对垒局面。国民党由于占有多数席位，咄咄逼人，在4月12日两院讨论议长选举细则的预备会上，“遽出其多数之武器，”^⑤占了上风，使三党大受刺激，认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2页。

② 《盛京时报》1913年3月8日，4月9日。

④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4页。

⑤ 《政界最近之潮流》，《震旦》第3期，1913年4月。

为“三党分立，实非所以制胜于议会。”^①袁世凯也因宋案真相日益暴露，急需三党合并为一，作为抵制国民党的政治打手，要求加紧合并。于是，三党合并的步伐大为加快。4月16日，三党举行“恳亲会”，梁启超在会上发表演讲说称：“三党在国会中联合尚居少数，此种现象极为危险，外界之原因姑不论，内部之团结亦未能巩固。故院内之失败，第一乃由三党分立之故。……三党所持主义足以救国，几为天下公言，而何以危败之象日有所闻，此实由三党之联合近于联军也”，因此必须“乘此机会急谋合并。”^②会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磋商，由孙武、丁世铎、林长民、王赓代表三党正式签订了并党协议。在磋商中，民主党又提出了以汤化龙为众议院议长，增加蒲殿俊为理事等新条件，统一党也趁机提出王印川为理事。对此，共和党中部分人十分不满，梁启超也“愤极民主党诸人之所为，”甚至表示要“不复与闻党事”，^③但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为保持反急进派队伍的统—，最后也作了让步。5月15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会议，讨论了章程及成立大会筹备事宜，28日，选举新党本部职员，5月29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宣告进步党成立。

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另设名誉理事20余名，多为各省都督。本部设北京，分政务、党务两部，分别由林长民、丁世铎任部长。进步党成立后，各地原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的支分部分也合并为一。三党的舆论机关，如《天民报》、《天铎报》、《大共和日报》、《庸言》、《时事新报》等，也自然成为进步党的宣传喉舌。

进步党的政纲是：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进步党认

① 《申报》1913年4月23日。

② 《盛京时报》1913年4月24日。

③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9页。

为，“吾国政治之所以不上轨道者，自有其故。其一，腐败官僚不能上政治轨道者也，其二，人民中少数暴徒不能上政治轨道者也。……是以吾人一方面当设法排除暴徒，而一方面尤当设法排除腐败官僚。”在“暴徒”与腐败官僚之间，进步党认为前者是“祸国最烈之派，”必须“注全力以与抗，”对后者则“不得不暂时稍微假借。”进步党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政争策略，是基于这样两点认识：第一，在进步党看来，革命后最易产生“暴民政治”，一旦发生，就会使国家元气大伤，秩序破坏，而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情况下，“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当此存亡续绝之交，有政府终胜无政府。”^②第二，进步党认为，帝制被推翻、民国建立，“则国体、政体已立，人民有自由发表意思之机关，政府有不如人民之意者，人民尽可从轨道上监督，何须定行推翻”^③，而应当“勉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④进步党只看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却没有看到袁世凯为代表的“腐败官僚”的统治是民族危机的国内根源，只看到了共和形式，却忘记了政权并未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而得出了十分错误的判断。所以，尽管进步党也主张政党政治、责任内阁，也对袁世凯操纵内阁不满，甚至表示要对袁世凯进行监督，“匡救其恶”，^⑤但这种错误的政争策略却使它不能不成为袁世凯打击民主力量、推行独裁专制的工具。当时就有报章指出，进步党所主张的“国家主义”“素为袁总统之政见，屡为报界露布，夫人知之矣。换言之，即所谓总统得有特权，任意任命内阁员，不须议会协赞，以组织强有力之政府是也。”^⑥

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后，党势确有扩张。特别是在众议院内，

《盛京时报》1913年6月4日。

② 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庸言》第1卷，第10号。

③ 《盛京时报》1913年4月23日

④ 同②

⑤⑥ 《盛京时报》1913年6月4日、4月2日。

几与国民党相埒。但是，进步党却未如梁启超等人预想的那样巩固。还在筹备合并中，民主党的李庆芳等人即以“三党合并不能如愿相偿”为由，单立门户，发起组织了两院议员同志会。合并后，原统党中也有人认为“统一党为王某所卖，秘密签押，”酝酿复活统一党。^①不过，较大的危机则是部分共和党员的重新“独立”。

在三党合并中，民主党频频推翻成议，增加条件，引起了共和党中部分人的不满。特别是共和党湖北支部及湖北的议员张伯烈、郑万瞻、胡祖舜等人尤为反感。进步党宣言及章程公布后，民主党又提出增加蒲殿俊为理事，张伯烈等人强烈反对，认为“四川共和党之地盘，其实力在胡景伊、尹昌衡二君。如蒲殿俊为理事，四川党务恐不免动摇。”但是，共和党本部仍于5月27日开会议决同意民主党的条件。于是，张伯烈、郑万瞻、胡祖舜等十一人发表通告，宣布不承认合并，并提出三点理由：一、民主党违约，有小党吸收大党、少数吸收多数的野心；二、共和党最后讨论合并的会议出席者仅五十余人，不足半数，不能表决。强行通过并党决议是“政党专制，蔑视党员。”三、黎元洪及共和党鄂支部先后致电北京本部，请照原定条件合并，但本部匿电不宣。^②不久，张伯烈等人又发布第二次宣言，宣称重新独立的共和党处“第三党”地位，既不做“无意识之推翻政府派”，也不做“无良心之拥护政府派”，“对于社会，仍为和平稳健之主张，对于国会，则为两派极端之中立。”并表示“不赞成进步党非与进步党政纲上有所参商也。”^③

部分共和党人的重新独立，并非宗旨的改变，而是分脏不均的结果。在政治倾向方面，新共和党与进步党一样，支持袁世凯，抵制国民党，因而也同样为袁世凯赏识。党费除了由袁世凯

《盛京时报》1913年4月19日，7月18日。

②③ 《盛京时报》1913年6月17日，7月1日。

拨发外，黎元洪、胡景伊等人也月有供给，“特别阔绰。”据民初众议员韩玉辰的回忆，新共和党“别无党纲，拥袁到底，在两院活动中比进步党尤为卖力，弄得进步党首领汤、梁诸人啼笑皆非。”^①

进步党成立之日，正值国民党因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与袁世凯矛盾日趋尖锐之时，不仅南方国民党人秘密酝酿军事倒袁，而且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渐形激烈。进步党视“暴烈派”为第一大敌，自然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在进步党成立大会上，孙武就曾宣称：“万一吾德不足以感人，竟启二次之扰乱，则惟有择其能受吾忠告者而赞同之。”^②进步党心中的“能受吾忠告者”当然是袁世凯。进步党成立前夕，宋案证据全部公布，真相已大白于天下，然而进步党仍认为宋案“纯为法律问题”，主张“法律解决”，并指责国民党“籍口攻击，殊属非是”。^③在大借款问题上，进步党竭力为袁世凯的非法行为辩解。大借款违法签约后，任参议院正、副院长的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发表通电，指出借款违法，而进步党议员蓝公武等人却要求参议院“应即通电全国，声明此电系张、王二人之私电，与本院无关”。^④此后，进步党一面大造借款乃前参议院已经通过、不为违法的舆论，一面用哄闹、缺席等方法阻止国会通过国民党议员提出的否认借款合法的议案。^⑤

二次革命中，进步党更是积极拥袁、为虎作伥。进步党对袁世凯早在5月初就派兵南下、准备以武力镇压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事实视而不见，却多次在国会中“质问”政府“优容赣督”，“任其横行，坐视不究”，要袁世凯“按律惩究，以肃法纪、定国基”。^⑥江西独立后，进步党召开会议，“表决此种举动为破

① 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② 《盛京时报》1913年6月6日。

③⑤ 《申报》1913年6月19日，5月21日。

④ 《民国国会之活历史》，《震旦》第4期，1913年5月。

⑥ 《申报》1913年6月6日。

坏国家之乱党，应以国家之力设法平复”，^①并通电全国：“中央政府为全国所公立，临时大总统为人民所公举，叛徒之反抗，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抗我中华民国。……务乞群公、海内君子，明别是非，先事图维以镇人心，有效逆者当共殛之。”^②进步党众议员汪荣宝、王敬芳等人还提出“咨请政府征伐叛徒建议案”，称国民党的军事反袁是“潜窃土地，私自名号”，“背叛民国，为四万万人民之公敌”，要求袁世凯“以最严厉之方法为适当之处分”。^③

在配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进步党还积极为袁世凯窃取正式大总统职位而出谋划策。二次革命爆发后，部分国民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离京南下。7月23日，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北洋军警在公余俱乐部捕走议员数人，引起了在京国民党议员的恐慌，不少人也准备离京出走，这一事件发生后，梁启超两次致函袁世凯，告诫他“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唯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或用命令，或谕两院议长，使宣明此意，以释谣诼”。^④对梁启超的建议，袁世凯心领神会，很快就将被捕议员释放，并表示“只问顺逆，不问党派，虽在戒严，不得乱捕”。这一招术确有效果。“国民党平和派仍主集会，不离京”。^⑤与此同时进步党又“极力设法”，“或吸收以入本党，或别设小团以容纳之”，^⑥对国民党进行分化。事实表明，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进步党为其笼络人心、争取舆论支持、瓦解国民党议员，立

① 《时报》1913年7月26日。

② 《时报》1913年7月23日。

③ 《申报》1911年7月25日。

④ 丁文、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5—674页。

⑤ 《申报》1913年7月28日

了“大功”，起到了袁世凯无法起到的作用。

二、二次革命后的政党形势与公民党的建立

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势力空前膨胀，除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数省外，其它各省几乎完全被北洋军阀控制。袁世凯的下一步计划，是如何操纵亲袁政党与国会，将他选为正式大总统，以建立纯粹的独裁统治。

由于进步党在二次革命中为袁世凯摇旗呐喊，当然为袁世凯所属望。但是，进步党与袁世凯的联盟并不牢固，围绕熊希龄内阁问题，二者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宋案与大借款发生后，由于舆论的攻击指摘，赵秉钧内阁已无法维持。对这个袁系内阁的垮台，袁世凯十二分的不情愿，但连进步党议员也对赵内阁不满，他又不得不同意改组。对赵内阁的改组，进步党认为必要，而且宣称“政党内阁为世界各国常轨，凡为政党者，其目的即在掌握政权，组织政府。……本党既为政党之一，当有掌握政权之雄心。”^①虽然进步党又表示，组织政党内阁“须以时势为转移，”但政党内阁终究是袁世凯最不愿听的一个曲牌。在新内阁的总理人选上，袁世凯“对于国民党固不愿意，对于进步党亦不赞成，”^②企图将老官僚徐世昌拉出来担任。这个打算遭到国民党议员和进步党议员的同声反对。于是袁世凯只好提名进步党的名誉理事熊希龄。^③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

在阁员人选上，进步党也与袁世凯存在着矛盾。熊希龄入主内阁，被进步党视为扩张党势、实行政见的一大机会。进步党主张新内阁“以本党人物为核心，至少拟占四、五阁员。”^④梁

① 《盛京时报》1913年6月20日。

② 《远生遗著》卷3，第114页。

③ 熊希龄时任热河都统，进步党成立前，他以军职不得入党为由，宣布脱离共和党。进步党成立后，被举为名誉理事，仍被视为党中的重要人物。

④ 《盛京时报》1913年8月11日。

启超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并表示自己亦可入阁任财政总长，以支持。熊希龄也夸下海口，要组织“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然而袁世凯提名熊希龄，不过是“以党杀党，可减少反响，”^②继续利用进步党为其效力，而不是要建立一个进步党的政党内阁。袁世凯口头上表示：“对于此次延揽阁员，概不过问”，^③可是在熊希龄尚未到京时，他就拟好了名单，重要阁部均由北洋派把持，留给熊希龄位置“第一流人才”的仍是教育、农商、司法等几个冷板凳。进步党对此十分不满，报怨“要部据于官僚之手，”“而将此闲部位置彼（指熊希龄——引者注）意中人。”^④于是梁启超以去国过久、不谙国情拒绝入阁，张謇、汪大燮“皆牵连不出，”杨度干脆以“帮忙不忙闲”坚辞，^⑤内阁人选迟迟不决。直到9月初，在熊希龄的坚持下，袁世凯才同意财政一席由熊希龄兼任，原拟任财政的周自齐改任交通，将原拟任交通的杨士琦撤下。即使这样，进步党也不过入阁四人。^⑥

熊希龄内阁正式成立后，进步党与袁世凯的矛盾又有所发展。熊希龄上台伊始，就打出责任内阁的旗号。8月28日，他在招待两院议员的茶话会上演说：“临时政府弊窦端在？总统府、国务院及议院脉络不清，政府违背法律，不负责任，内阁漠视责任。国务颓废，邦基不固，焉有建设可觐。鄙人承乏内阁，首以责任为前提。”^⑦他“勉成责任内阁人员，当不顾利害，积极负责任。”^⑧在用人方面，熊希龄“颇全权自握，不肯假借。”^⑨

① 《远生遗著》卷3，第198页。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191页。

③ 《申报》1913年9月8日。

④ 《远生遗著》卷3，第191页。

⑤ 《申报》1913年9月8日。

⑥ 他们是：总理兼财政熊希龄、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农商张謇

⑦ 《盛京时报》1913年9月2日。

⑧ 《熊希龄集》第502页。

⑨ 《时事新报》1914年1月15日。

甚至“试行拒绝副署。”^①这正是袁世凯最为忌恨之处，此外，熊内阁成立后提出的司法独立、整顿财政，将交通部划归财政部、军民分治、地方自治、裁减军费、实行减政主义等主张也无一不是对袁世凯独裁政策的触犯，自然为袁世凯不容，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和怀疑。

进步党与袁世凯关系的变化，促成了进步党与国民党关系的缓和。二次革命中，留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虽然信誓旦旦，“在法律范围内作政治活动。”但仍未逃脱袁世凯的打击镇压。至1913年8月底，先后有十余名国民党议员被捕，其中有二人惨遭杀害。袁世凯的摧残迫害，使国民党一蹶不振，“稳健分子籍端脱党者踵趾相继，”^②党势急剧衰落。这种情况迫使国民党开始谋求与进步党提携。在内阁改组问题上，国民党最初提议由进步党汤化龙任总理，“自居在野党帮助地位。”国民党议员居正、张耀曾等人先后与汤化龙、丁世铎等进步党要人商谈，但汤化龙担心“作宋遯初第二”未敢应承。袁世凯提名熊希龄，原以为熊定会被国民党否决，然后乘势提出徐世昌，但国民党认为，熊希龄虽不是理想人选，“总较之军人内阁差胜也”，^③表示赞同。

7月31日两院竟以598票对2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熊希龄的提名，使袁世凯大感意外。进步党方面，也因袁世凯过多干预国会。乱捕议员而不满。国民党议员被捕后，汤化龙等人面见袁世凯进行质问，进步党议员郑江灏在参议院中指斥政府违法逮捕。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过去那种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关系日渐松弛。两党的注意力开始由政治事件上的对立，转向共同立法，而且多有协商。

早在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就已在策划如何谋夺正式大总统

① 《论熊内阁之失败》，《正谊》第1卷第3号，1914年3月。

② 《申报》，1913年8月18日。

③ 陈九韶：《众议院十二年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远生遗著》卷3，第171页

的职位。他知道无人能与他竞争，便极力主张国会开幕后即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1913年3月下旬，筹办国会事务局按袁的旨意制定了“正式总统选举手续法”，并确定“于国会开会为选举正式大总统时期。”^②只是由于临时参议院的反对，袁世凯才悻悻作罢。^③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亲袁政党附和先举总统的主张，他们认为制定宪法非短时间完成，在此期间，总统地位飘摇不定，外人疑惑、军民恐惧，有莫大危险。多数国民党议员坚持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因为总统的地位与权力由宪法确定，宪法不定而选举总统是本末倒置。^④由于国民党持论严正，又居国会多数地位，所以国会开幕后，先举总统的论调有所收敛。进步党成立后，在梁启超的主持下也发布政见，赞同先定宪法、后举总统。于是，国会于6月30日选出60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宪法的制定。但不久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对国民党横加摧残，加之国民党与进步党在集权与分权问题上意见分歧，宪法的起草时续时辍，进展迟缓。自8月12日起，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讨论宪法草案中有关总统的部分。最后议定由两院议员组成国民议会或国民公会，选举正式总统；须有总员3/4以上出席，得票为出席人数2/3以上者当选；总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总统任命国务总理须经众议院同意；总统得参议院到会议员2/3以上同意时可解散众议院。

对宪法草案的这些规定。袁世凯十分不满。他认为总统不得连任及任命国务总理须得国会同意两点“均为国民党之所发动，其意似在限制现总统之活动。”^④但他也知道，只要当上正式总统，这些限制对他来说就会毫无作用，当务之急是如何尽早登上

② 《申报》1913年3月24日、3月25日

③ 《远生遗著》卷3，第92页。

④ 《时报》1913年10月11日。

正式总统的宝座。于是，他暂时隐忍不发，加紧策划先举总统的阴谋。

在袁世凯的唆使下，黎元洪率十四省都督首先出马，致电国会，要求“即从选举总统入手，”“一气呵成，国本既定，人心遂安。”^①接着，黎元洪又致电梁启超、汤化龙等进步党首脑，提出“战祸虽纾，乱源未弭，揆察现状，似须先举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②一些议员也趋炎附势，提出先举总统的建议案。进步党虽与袁世凯矛盾渐露，但又不敢走得太远，在内外压力之下，又转为赞同先举总统，并派人与国民党协商，表示如国民党也同意先举总统，进步党可赞同由国民党议员张耀曾提出的议员保障法案。^③国民党方面，二次革命失败后，“暴乱分子淘汰殆尽，”^④队伍更为涣散，已无力与袁世凯抗衡。一些人认为正式总统非袁莫属，已是大势所趋，如果反对，“无论是否有效，先蒙此不韪之名，殊属非计。”^⑤也有些人“虽想起来反对，又恐怕袁世凯断行非常手段，解散国会，”^⑥企图靠进一步妥协来维持国会的生存，于是也表示同意先举总统。由于进步、国民两党的一致，其它小的政团也都纷纷表示赞成。9月5日，国会通过了选举总统案，总统选举法也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完成。

先举总统已成定局，但袁世凯仍不放心。不仅进步党与国民党日益接近，而且新共和党也出现了不听驾驭的迹象。在9月5日众议院讨论总统选举时，新共和党的骨干分子张伯烈激烈反对先举总统，认为总统选举“关系宪法，应俟宪法定后再行选举，”并且列举“现政府之种种不法举动，根本上已非法治国

① 《黎副总统政书》卷25，第11页。

② 《黎副总统政书》卷27，第16页。

③④ 《申报》，1913年9月7日，8月18日。

⑤ 《申报》，1913年9月19日。

⑥ 潘树藩：《中华民国宪法史》，第34页。

家，即选出正式总统亦无如外人何。”^①在各党均同意先举总统的情况下，众议院表决时仍有 126 票反对。为了确保不生变故，袁世凯又指使他的亲信梁士诒另组公民党，作为他的选举工具。

公民党于 1913 年 9 月 7 日成立。成员主要是平素与梁士诒接近的一些小政团，如原从民主党分化出去的两院议员同志会、从国民党中分化出去的潜社、集益社等，还有一些是以高价收买的议员。梁士诒把持的交通部职员也多加入其中。公民党成立时，北京的北洋军警要人段祺瑞、姜桂题、段芝贵、江朝宗等都到会以示支持。公民党名义上的首领是李庆芳，实际的党魁是梁士诒与叶恭绰，骨干人物有权量、梅光远、康士铎、王荫棠、汪其砥等。在宣言与规约中，公民党标榜“以国家权力实行统一，增进人民福利，”^②鼓吹必须先行选举正式总统，否则政策不易施行，国家将有极大危险。^③公民党成立后就决定以先举正式总统为“第一步政策，”^④为袁世凯充当政治打手。9 月 19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公布了总统选举法草案，提交国会讨论。公民党认为，总统须以 3/4 以上出席、得票满 2/3 以上当选与任期五年、不得连任两条“定法过严，故均反对之。”^⑤它主张总统若不连任，任期最短也须在十年以上，^⑥若连任，则至短也应六年，并遍发号外，“曰宪法起草委员会所订之草案某条不利于总统，”力主加以审查。^⑦在竭力为袁世凯摇旗呐喊的同时，公民党还大力收买国会议员，凡加入公民党者，每月津贴二百元。9 月底，公民党总部又通电各省，请一致拥护袁世凯为正式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各省都督自然纷纷呼应，进步党，政友会等也随声附和。于是，宪法起草委员会被迫将原选举规定改为总统须得选举人 2/3

《申报》1913 年 9 月 11 日。

② 《公民党规约》，《北京档案史料》，1988 年第 4 期。

③ 《时报》1913 年 9 月 11 日。

④⑤ 《申报》1913 年 9 月 19 日。

⑥ 《盛京时报》1913 年 9 月 25 日。

《远生遗著》卷 3，第 194 页。

多数出席、得票满投票人数 $3/4$ 当选，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1913年10月4日，国会通过了修改后的总统选举法。袁世凯急于要在10月10日前当上正式总统，国会遂定于10月6日正式选举。在选举前，进步党、公民党、新共和党、政友会等政党均正式表示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① 国民党则议决“本党党员应以个人之信仰，自由投票。”^② 虽然如此，袁世凯仍不放心。10月6日选举时，他派出大批北洋军警以“保护”为名对议员武装监视，又派出便衣军警多人与公民党收买的乞丐数千人，自称“公民团”，将议场层层包围，声称非将所属望之大总统选出，不许议员离开议场一步。这种行为反倒激怒了议员，两轮投票袁世凯均未够当选票数。至第三轮投票时，天色已暮，议员们饥肠辘辘，又无路可出，而“公民团”愈加气势汹汹，遂不再消极抵制，袁世凯以 507 票“当选”。

对于袁世凯来说，攫取了正式大总统职务后，国会已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将国会一脚踢开。

三、国会解散，政党政治的彻底破产

袁世凯将正式总统的桂冠捞到手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致电祝贺，表示“承认”。有帝国主义撑腰，袁世凯更为有恃无恐。他认为国会已由他篡权的垫脚石变成了进一步独裁的绊脚石，决意将国会彻底摧毁。于是，他首先利用宪法问题向国会开刀。

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宪法草案于10月中旬脱稿。因主要在北京天坛开会，故称“天坛宪草”。在草案的制定过程中。虽然袁世凯多次施加压力，委员会内部也在集权与分权问题上多有争执，但“天坛宪草”仍然坚持了责任内阁制，规定总统任命国务员须经国会同意，须在参议院多数同意时方可解散众议院。这两点被袁世凯视为对他进行钳制的重要内容，十分恼火。10月16

① 《申报》1913年10月7日。

② 《盛京时报》1913年10月3日。

日，他借“增修约法”的名义咨文国会，认为临时约法关于总统权限的规定“使行政首长之职责不完，则事实上总统政务之统一无望，”“若再适用于正式总统，则困难将益甚，”要求将临时约法中有关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宣战媾和、缔约须经参议院同意的限制取消；在国会闭会期间，总统可以颁布与法律同等效力的“教令”；在有“紧急之需”时，总统可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①很明显，这是袁世凯借题发挥，向“天坛宪草”发难。当时的舆论就指出：“说者谓两院对此项修正案必以宪法即将付议，约法无修正之必要为言，搁置不理。在大总统非不知两院必出于此，不过聊以表示对将来宪法之意见耳。”^②两天后，袁世凯再次咨文国会，指责国会于选举前对总统选举法的公布是违反了约法“一切法律由总统公布”的规定，声称“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断无不经大总统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③他企图以法律公布权来对抗“天坛宪草”，“彼不满意之宪法，即可以不肯公布。”^④

对袁世凯“增修约法”的要求，国会以“近于画蛇添足”而拒绝，公布权问题，国会也因宪法草案尚未开议，置之不理。但是，袁世凯的专横与咄咄逼人的态度，却引起了部分国会议员的警觉与忧虑，为了使制宪免遭摧残，他们企图以组织新党、打破原有的政党分野的方法来“刷新局面”。于是在总统选举后，又出现了大中党、民宪党两个政党。

大中党由宪政公会、政德会、相友会、超然社及集益社中未加入公民党的部分成员组成，1913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大中党以理事5人、总务员25人组成总务员会作为最高机关，骨干人物有

①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3日。

② 《申报》1913年10月18日。

③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1日。

④ 《时报》1913年10月26日。

陈黻宸、黄锡銓、朱兆萃、林绳武、郭宝慈、叶显扬、张国溶、德色赖托布、扎西土噶等。大中党以“采取国家主义，运政治于立宪轨道，以巩固共和、保持统一”为宗旨，^①宣称于国民、进步两党之间，“持不偏不倚的精神。”^②

民宪党的发起人是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张耀曾、汤漪、谷钟秀、孙润宇、杨永泰、张治祥、曹玉德、钟才宏与进步党议员丁世铎、汪彭年、李国珍、刘崇佑、蓝公武、解树强等人。他们在制宪中虽然“处互相对党之地位，”但由于面临袁世凯对制宪的破坏威胁，“议论常见一致，遂致互相提携，”^③共同组织于10月下旬发起筹建民宪党。民宪党在宣言中说：“吾党自身由群策群力相集合，以贯彻民主精神、励行立宪政治为指归。对于国家负忠诚之义务，有摇撼吾民主国体者，必竭尽全力以维持之、保护之。对于政治，先之以培养国力，继之以发扬国光。政府而遵循宪政常轨也，吾党引之为良朋；政府而逸出宪政常规也，吾党认之为公敌。不为阿谀，亦不事攻击，以公平之态度，为完密之监督。”^④民宪党虽然把“拥护宪政”作为宗旨，抵制袁世凯对制宪的破坏，但它并不比国民党有更多的斗争精神。据众议员韩玉辰回忆，民宪党认为，对袁世凯的专横，“如国民党过于牵制，徒使其绝足而驰，逸出常轨；如进步党一意迎合，又易使其骄纵自恣，甚至动摇国本，俱非国家之福，”因而要“用其长而弃其短。”^⑤民宪党幻想靠一纸宪法的约束与国会的监督，再加上“不事攻击”、“与旧党断绝关系”的表白，^⑥就能使袁世凯野心收敛，不逾宪政常轨，这表明，它不可能有力地与袁世凯斗争。

对国会中政党的新化合，袁世凯根本不予理会。他认为这些

①② 《盛京时报》1913年10月18日，10月26日。

③ 《盛京时报》1913年10月23日。

④ 《申报》1913年10月22日。

⑤ 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⑥ 《盛京时报》1913年10月22日。

政党无论如何腾挪变化，都逃不出他的掌握。因此，他继续向国会进攻。10月24日，他派出八人为“政府委员”，要求列席宪起草委员会，“陈述意见，”遭到拒绝。于是，袁世凯又一次祭起他的屡试不爽的“法宝”。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与民政长，痛骂“天坛宪草”关于总统权限的规定“直是推翻行政权，国会专制已甚，”“即国民党第三次革命文字，”是国民党“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明证，要求各省都督们“各抒谏论。”^②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各省都督群起狂吠，或威胁国会按袁世凯的旨意修改宪草，或主张解散国民党、驱逐国民党议员，或叫嚣解散国会。“不特赞助总统之通电，且于总统通电之意外更为推波助澜，”^③掀起一阵腥风恶浪。北京的北洋军警还“以印刷物分送各报馆 略谓此次宪法含有第三次革命之性质 某党人欲行其扰乱政策，……使中国为亡国宪法之试验场。”^④

面对袁世凯的猖狂进攻，国会中的各政党惊慌失措。国民党在张耀曾、谷钟秀等中坚人物脱党后，更加溃不成军，只能有气无力地表示：“对于袁总统之主张，则不可轻易赞成。”进步党再次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主张“折衷，”允许总统有无条件解散众议院之权，保留国会对国务员的同意权。大中党本来就是由被袁世凯从国民党内分化出去的一批人所组成，自然附和进步党的主张。^⑤民宪党虽然还能说出“无论何人即不得紊乱宪法根本精神，虽有何等威力，而一点不可更改”这样的话，但也是战战兢兢，不敢公开指斥袁世凯胁迫国会的非法行为。^⑥公民党则不失御用党本色，“格外起劲”^⑦地鼓吹将宪草“根底改正”，“总理同意权及国会委员会设置由宪法草案删除，而总统有公布其效力与法律同之命令之权及全无条件解散众议院之权。”^⑧

③④ 《申报》1913年10月27日，11月2日。

《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5日。

⑤⑥ 《申报》1913年11月2日。11月4日。

⑦ 《远生遗著》卷3，第194页。

⑧ 《申报》1913年11月2日。

但是，袁世凯要推翻的已不仅仅是“天坛宪草”了。11月4日，袁世凯以京师戒严处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往来密电数十通为由，下令封闭国民党本部，并令各省于三日内封闭国民党支部，解散国民党，同时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当天下午，北洋军警即将国民党本部查封，又前往国民党议员住宅，勒令交出议员证书与证章。次日又包围国会，按图索骥，继续收缴，不仅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全部被没收，即是已经脱党或加入他党的也在劫难逃。同日，民宪党总部也遭搜查。

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的非法行为是踢开国会的先声。由于被收缴证书、证章的议员达 430 余人，超过国会半数，国会已无法开会。这时，进步党才大梦初醒，感到了袁世凯的用意所在。11月6日，进步党召开会议，“到者咸抱悲感惋惜之情。”会议最后议决三项：一、维持国会；二、调查国民党议员脱党证据，要求对二次革命前已脱党或二次革命中声明反对“南方乱事”及以加入他党确有证据者恢复议员资格；三、防止株连。^②11月11日，进步党又联络新共和党、大中党、公民党等政党协商，各党均同意进步党的三点意见，并决定由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面见袁世凯提出。在两议长面见袁世凯时，袁口称要维持国会，却对提出的方法“置而不答。”此后，两议长又赴国务院，也遭冷遇。于是，王、汤两议长被迫于11月14日宣布停发国会议事日程。

袁世凯对国会的摧残终于使进步党中的不少人认识到“政府取消国民党议员，是分明解散国会，不过不居其名而取其实。”表示“决不令其终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③在进步党的活动下，参、众两院议员分别向政府提出质问，斥责袁世凯“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权限。”他们愤慨地指出，

《申报》1913年11月12日。

② 《盛京时报》1913年11月13日。

③ 《申报》1913年11月18日。

追缴议员证章证书，“直至命令取消议员，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此不能不怀疑者”。并质问袁世凯：“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①11月30日，进步党再次开会议决：“对于国会问题，主张绝对维持，”在国会问题未根本解决前，议员断不辞职，亦不离京，以保持国会尊严。^②

但是，各党议员中也有一部分人仍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们认为“此次国会问题发生，其最大之恶因即在宪法草案，”而维持国会“非空言所能见信于政府”，^③企图以修正宪法草案、对袁世凯再作让步来换取国会的苟延残喘。12月3日进步党的牟琳、王乃昌、郑江灏，新共和党的郭同、肖晋荣，民宪党的汪彭年、大中党的陈黻宸及无所属议员共30余人发起成立了宪法期成会，宣称“专以研究宪法为职，不分党界，不分意见，殊途同归，以观宪法之成。宪法一日不成，则本会一日不散。”^④12月5日，宪法期成会开会讨论宪法问题，最后表决国会仍取两院制；行政仍取内阁制；总统得参议院过半数同意即可解散众议院，不必经国会同意即可任免国务员；不设国会委员会。^⑤然而，这些重大的让步并未象他们期望的那样“见信于政府”，使袁世凯回心转意。在绝望之中，宪法期成会开始转变态度。他们发布宣言说：“立宪国家所以维持于不敝者，亦曰宪法而已，惟是国家之有宪法，不在有宪法之形式，而在有宪法之精神。精神维何？国民之信仰心是也。……然则必如何而使国民生信仰心乎？亦曰由民意而制定之宪法是也。……故吾人第一宗旨认定：民国宪法非民选机关不能制定。违反此意而产生出宪法，皆吾人不能承认者。君主立宪国皆不能一日无国会，共和国更无论矣。现在之国

③ 《申报》1913年11月23日，11月30日。

② 《盛京时报》1913年12月3日。

④ 《申报》1913年12月8日。

⑤ 《盛京时报》1913年12月10日。

会虽经政局之波折以致停搁，设使亘长时间无此机关以代表民意，在国民之眼光视之，将认为专制之复活。……故吾人第二宗旨认定：代表民意之国会亟宜从速发生。凡延宕迁徐以愚给吾民者，当视为破坏国家之具。”^①严酷的现实终于使宪法期成会放弃了对袁世凯的幻想。

袁世凯的目的是彻底推翻国会，但他还要给自己找一点“合法”根据。11月26日，他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以此来取代国会，冒充民意机关。12月15日，政治会议在袁世凯的一手导演下开幕。这个御用工具的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封建军阀、封建余孽和几个卖身投靠的进步党人。它的使命就是解散国会，炮制一个袁记约法。在国会实际停会后，那些善于揣摩袁世凯心理的各省军阀政客也纷纷通电要求明令解散国会，遣散残余议员。于是袁世凯趁势向政治会议提出十九省都督、民政长要求解散国会案。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即以政治会议“决议”为名，下令将残存的议员资遣回籍。不久，袁世凯又下令解散了各省议会。这样，作为辛亥革命成果、象征着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国会便被袁世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政党所热切向往的政党政治也随之破产。

^① 《申报》1913年1月11日

第六章 中华革命党的建立及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末路

第一节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及其在护国战争中的活动

一、国会解散后的政局与政党

1913年9月12日，以熊希龄为总理，以进步党为基干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登台执政。在袁世凯独裁专制的活动中，进步党及其内阁，亦步亦趋，助纣为虐，帮助袁世凯镇压国民党、解散国会、停办地方自治、解散省议会，并把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在熊希龄组阁的5个月中，进步党人十分得意，熊内阁的灵魂梁启超更踌躇满志，以为既然协助袁世凯实现其专制独裁野心，就能与袁世凯合作到底，大干一场，施展其多年来的改良主义理想。但是，他所设计的使中国走上“宪政”道路，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整理财政金融等改良主义蓝图，与袁世凯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熊内阁协助他副署完了一系列的命令后，袁世凯便欲一脚把它踢开了。1914年初，袁世凯及其私党多方制肘，打击熊希龄的威信。熊希龄想让其同乡湖南籍进步党人蔡锷出任湖南都督，以防北洋势力入湘。袁世凯强烈反对，竟派其党羽汤芑铭督湘，这使熊的面子十分难堪。司法总长梁启超“于司法界之黑暗，久不满意，此次入阁，即抱改良宗旨”。但“袁氏颇欲尽废新立法院，恢复旧

制”，因此，“彼辈当时只图不失项城之欢而已”。^①然而，就连“不失项城之欢”的一点改革亦不能见容于袁世凯，“遂贻旧派人口实，攻击甚烈。”^②梁启超的同门刘复礼见此情景，曾写信劝梁从速自拔，“为国猛醒”，^③许多同人“亦以先生之出处为念”。^④但梁启超是不愿丢掉这一职位放弃权势的。

财政困难是熊内阁更形棘手的问题。梁启超一上台对整顿财政和税收，计划最为详细，但结果却无一可行，以致财政混乱，国库空虚，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借外债维持。“请款之文，告急之电，沓来纷至，积案如山，”使熊希龄穷于应付，一筹莫展。1913年底，早为熊内阁的裁军废省方案气愤的海、陆军部及各省的将军们合伙掀起一个向内阁索要军饷的高潮，熊希龄、梁启超求助于交通系的周自齐、朱启钤，希望他们帮助度过难关。但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士诒的控制下，不仅冷眼旁观，且公然拒绝垫付，使熊内阁窘态百出。

内阁负责制是孙中山在辞临时大总统时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而定制的，企图用内阁负责制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但事与愿违，袁世凯决心废弃内阁负责制，由总统一人独揽大权，遂授意北洋旧部倪嗣冲、冯国璋等人通电倡议修改约法，改行总统制。各省都督群起攻击内阁制，使熊内阁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1914年2月9日，熊希龄首先提出辞呈，并向袁世凯表示：“上无以副钧座殊常之遇，下无以慰国民望治之情、内疚神明，外慚清议。”“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准予辞职，另简贤能。”^⑤2月18日，梁启超也提出辞去司法总长的呈文，2月12日、20日，袁世凯先后批准他们辞职。进步党执政五阅月，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之后，它的“第一流人才”熊希龄、梁启超、汪大燮等相继去

^{①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86—687页。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91—692页。

^④ 同 第690页。

^⑤ 《政府公报》，1914年2月10日。

职。进步党内阁随即垮台。

熊、梁辞职后，袁世凯曾一再派梁士诒、杨士琦等北洋派旧官僚拜访进步党要人，表示虽将改行总统制，但仍希望进步党继续与之合作，为国效力。梁启超又被袁委任为币制局总裁。上任之初，梁提出了一套币制改革的理论和计划，但在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下，他的这一套改革方案没有一个能够实行。他深感心灰意冷，眼见币制局形同虚设，自己不能有所作为，1914年底辞去该职。从此，梁启超及其进步党怀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袁世凯政府。

从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14年底，袁世凯用了3年时间以各种阴谋手段，把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全部破坏。以袁记《新约法》代替了《临时约法》；“参议院”代替了“国会”、“国务卿”代替了“内阁”“终身大总统”代替了“临时大总统”，又通过“废督改制”控制了地方军政大权。至此，民主共和制的各种形式全化乌有，在“总统府”之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军阀专制独裁的机构，并用各种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这时的中国，只剩下一块“民国”的空招牌。

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于11月4日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并以“乱国残民，于斯为极”的罪名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对国民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国内，如广东的陈景华、陈仲宾同时被戮于龙济光之手；江西籍议员徐秀钧被杀于南昌；广东籍议员伍持汉被扑杀于天津；前重庆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亦被杀于天津。^①一时间，党员为避祸苟全，纷纷脱党，有的发表声明虽曾入党，“足也未至党门一步”^②有的匿名隐居，不问国事。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被“勒令”表明态度，声明：“遵政

① 《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71页。

② 《时报》，1913年9月18日。

府命令办理”^①或被袁氏收买，或投入共和、进步两党。国内的国民党人经袁世凯一打一拉，摧残殆尽。

1913年8月18日，孙中山避居日本东京，此后，多数国民党人纷纷逃亡日本，集合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主要有：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谢持、田桐、徐苏中、夏重民、王统一、蒋介石、……等等。这批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到日本后，日本政府采取“保护”和“监视”的方法，虽允许他们留寓日本，但对他们的活动则采取严加“监视”和不予支持的政策。寄人篱下，两手空空，生活极端困难，思想更为混乱，以至“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20年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②正如孙中山指出的那样：民国成立以来，同盟会以五党合并组织国民党，“可谓民国第一产儿。乃袁氏以武力铲除国会，宪制荡然，政治不容人民置喙，本党早已失其作用，袁氏即不迫令解散，亦已名存实亡”^③这时的国民党完全丧失了领导革命的能力。但孙中山仍以“国势之颠危，民生之困顿，共和之前途”为念。他决心“重整旗鼓，组织干部，集合同志，”^④继续再战。他致函海外的国民党人，说：“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海枯石烂，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⑤孙中山深信：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必不能久”。决心“以去乱根之袁氏。”^⑥当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暴露后，孙中山毅然以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告示》、《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破坏民国，涂炭生民的种种罪行；强烈发出“誓死戮此民

① 《爱国白话报》1913年7月31日

② 《孙中山选集》第3卷，第112页。

③ 《孙中山选集》第3卷，第147页。

④⑤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3页，第74页，

⑥ 同上，第90页。

贼，以拯吾民”^①的呼声。他强调指出这次反袁斗争的目的“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②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完全的共和国，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第三次革命。”^③这次革命不以去袁为毕事，倒袁之后，尤需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这个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孙中山总结第一次、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鉴于国民党涣散瓦解的教训，乃决心重新组党，以肩起领导第三次革命的重担。

二、中华革命党的建立与国民党的分裂

孙中山亡命日本后，积极致力于“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④

但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用什么思想来指导建党？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党内的民主和专制、自由和服从、领袖和党员的关系，是决定党的性质和战斗力的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好党内的这些关系，又是关系领袖的权威和党员的权力地位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和以黄兴为代表的部分原国民党重要骨干，围绕对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孙中山建立新党的组织原则，进行了热烈尖锐的争论，争论结果，两派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并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

1914年6月15日，孙中山在《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中说：“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如路人”。^⑤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样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91页。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79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的党，不能视为革命党。表示“这个党我不要了”^①，要重新组党。在同一封信里他又说：“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问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得一员之用，无取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此不同者。”^②孙中山认为服从命令是革命党最必要的条件，而且要求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魁”一个人的命令。不仅如此，还要求加入新党者必须在誓约上印上指模。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这种具体作法却立即引起了党内一部分主要干部的反。陈其美在给黄兴的信中说：“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③邵元冲说的更具体：“在中华革命党的誓约内，总理还规定一定要把‘附从孙先生，’的字样写明，把自己的指模印上。这两点当时就有许多同志反对，例如黄克强，他就不愿意这样写。他说：如果在誓约内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是等于附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来革命了；如果在誓约内印上指模，这是等于犯罪的人写供状一样。前者是不平等，后者是太侮辱人了，所以这两件事不愿意做到的。”当时，对这两件事反对最力的就是黄兴，他表示：“加入中华革命党要打指姆印，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④

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致函黄兴，对黄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表示理解。他强调说：“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24集，第1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③ 《黄兴集》第404页。

④ 《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49—50页。

⑤ 《近代史资料》总40号，1974年第3期，第41页。

一，中国尚有救药也”。^①6月2日，黄兴复函孙中山，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又说“弟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弟并未私有所标帜以与先生异。”^②孙中山与黄兴关于中华革命党组织原则的矛盾与分歧，虽多次函件往来，但仍各执己见，始终未能调和与统一。这样，就使孙、黄无法合作，形成了孙、黄分家，出现了所谓“孙文派”与“黄兴派”。辛亥革命时出任各省都督的五人中，除胡汉民、陈其美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新党外，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三人当时都支持黄兴意见，先后离开日本流亡南洋等地，这就使国民党公开分裂了。

这样，孙中山不顾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力排众议，积极进行组党工作。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自主持了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五人的入党仪式，这些人成为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批党员。孙中山鉴于国民党涣散瓦解的教训，决心“正本清源”，“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③恢复同盟会时期的革命精神。为此，他制定了严格的建党原则。他说：“惩前毖后，故有中华革命党之改组，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以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④并强调指出：“此次组织革命党事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凡入党各员无论其前隶于何党，无论其党籍之新旧，必须其宣誓服从，毫无疑义而后可。”^⑤严酷的历史事实使孙中山的建党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一改同盟会时期的组织原则，而把“统一”和“服从”作为建党的基本原则。孙中山认为，只有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队伍；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7—89页。

② 《黄兴集》第35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05、128页。

防止“混杂分子及卑劣分子”混入党内，以假乱真，才能“合集此纯粹分子组织纯粹之革命党”。^①

孙中山曾经多次强调指出：“二次革命失败，文睹袁氏有帝制自为之意，首组中华革命党，谋推翻专制，而葆共和，”^②他还说：“务期达到吾党之纯粹革命目的，即民权、民生主义是也。”^③很显然，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的目的是以完成第三次革命任务为出发点的。

在孙中山至诚精神的感召下，绝大多数同志对他越来越表示理解，他们逐渐认识到：“革命无领导，怕牺牲，不服从领袖，是断难成功的”。^④经过暂短的彷徨后，坚定了对孙中山的信任，重新回到孙中山的周围，纷纷履行入党手续，“踊跃加入。”^⑤继第一批入党同志以后，又有陈其美、戴季陶、邓铿、夏重民等200余人，在东京先后入党。1914年4月18日，孙中山先后致函邓泽如、李源水、陈新政等同志，告知建立中华革命党的工作基本就绪并阐述建党宗旨及其各地改组应注意事项，委托邓泽如等在南洋各埠“本此宗旨，设各埠支部，以张党势。”^⑥同时，孙中山还派谢英伯、冯自由、林森等前往美国，设立筹饷事务所，由林森任会长，规定“凡入中华革命党者须纳入会费10元，此外酌捐，计所收款项已有数万元，捐款者固属踊跃。”^⑦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闻风倾慕，纷纷集合于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之下，至1914年4月，入党者“先后已得四、五百人。”^⑧孙中山当时十分欣慰地说：“以前同志中重要分子，均隶党籍，因不待言。又获得多数锐进新同志，声势益形膨大。前此传闻吾党分崩之象，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128页。

② 《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54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8页。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4页。

⑤⑥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2，83，92—93页。

⑦ 《黄兴集》，第386页。

⑧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页。

悉已消灭。……是国事虽未如愿，党务将告大成，兹可额首也。”^①

为了扩大舆论阵地，5月10月于日本东京创办了《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任总编，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夏声为编辑。据第一卷第2号“布告”称：“本报为纯民党之代表言论机关，研究民国政治上改革之重大问题。”各期内容皆以讨袁为宗旨，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媚外卖国，鼓吹“三次革命”。《民国》杂志社不但是中华革命党的宣传机关，也是该党活动的集会场所。5月14日，孙中山建议组织“筹备委员会”，委任陈其美、邓家彦、胡汉民、柏文蔚、周应时、刘承烈、居正、杨庶堪、张肇基、凌钺、张百麟、田桐等为筹备委员。16日，在《民国》杂志社举行筹备委员第一次会议，就中华革命党成立等问题进行讨论。6月15日，孙中山和陈其美等人讨论中华革命党总部的成立、组织机构、干部选举、党员大会等问题。同时，向旧金山、新加坡、夏威夷、槟榔屿等地邮寄《中华革命党总章》。^②

6月16日，孙中山亲自来到《民国》杂志社，和陈其美、田桐、胡汉民、周应时、刘承烈、居正等，协商中华革命党干部人选。决定设总理、协理、各部长，共同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但因黄兴尚未入党，虚位以待，并初步商定了各部部长名单。^③

6月21日下午1时，在《民国》杂志社召开了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党员约有40多人。孙中山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上由陈其美代表总理孙中山，对中华革命党总章逐条详细说明，并给到会党员介绍了初选中当选的各部部长，与会党员对上述问题也各自发表了意见，这是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公开向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页。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119号。1914年6月15日。《中国革命党问题》。

③ 同上，乙秘第1152号，《孙文动静》，1914年6月17日。

党员传达党的总章及其与党员见面的会议。①经过不到一年的酝酿、筹备，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基本成熟。

1914年7月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到会党员205人，其中知名者有：王统、徐苏中、徐忍茹、田桐、苏无涯。夏重民、陈扬镛、阎崇义、陆惠生、夏之麒、刘恢宇、徐郎西、张百麟、蔡锐霆、王介凡、胡仰、安健、凌铎、陈阶、潘敬贤、周应时、雷霆、唐天成、金佐治（廖仲恺）、陈其美、叶夏声、居正、熊尚文等。出席的不仅有党员，还有一些党外人士。田桐、夏重民、徐苏中、周应时、王统负责接待。③时成立大会开始，首先党务部长居正说明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的理由和大会宗旨。②接着，孙中山当众入盟，宣誓就任总理，其《誓约》如下：

立誓人孙文 为救中国危亡 拯民生困苦 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 统率同志 再举革命 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 并创制五权宪法 使政治修明 民生乐利 措国基于巩固 维世界之和平 特谨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尽忠职守；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 至死不渝 如有二心 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

孙文（指模）

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

誓毕，孙中山作了近一个半小时的演说，号召革命党人在“发起第三次革命时，我同志不问平素属何团体，志同道合之士都必须协作一致，诚心诚意，取同一步调，以国家百年大计为重，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213号，《关于中国革命党之事》，《中国革命党问题》，第12卷，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 乙秘第1320号《中国革命党员聚会一事补报》及1318号。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6—97页。

努力奋争。” 他的演说情词动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

大会公布了《中华革命党总章》，^②《总章》共39条，包括中华革命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两部分内容。

《总章》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主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本党进行程序分作三时期：（1）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2）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3）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总章》还规定党员义务与权利：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前进党者，为首义党员；革命成功之日，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与被选举权利。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

根据《总章》15—18条之规定，本部由总理、协理及五部组成，并由总理委任各部正、副部长如下：^③

总	理	孙中山	协	理	虚位
总	务	部长	陈其美	副	部长 谢持
党	务	部长	居 正	副	部长 冯自由
军	务	部长	许崇智	副	部长 周应时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320号，《中国革命党员聚会一事补报》。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102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16—417页。

政治部长 胡汉民 副部长 杨树堪

财政部长 张人杰 副部长 廖仲恺

《总章》26条规定：党员有赞助总理及各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任，故设协赞会，分为四院，与本部并列为五，备为五权宪法之张本：（一）立法院；（二）司法院；（三）监察院；（四）考试院。协赞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由总理委任，各院院长由党员选举，对会长负责。协赞会系革命时期所设，若政府成立时，当取消会长，四院各成独立机关，与行政部平行，成为五权并立。是谓五权宪法之意。

《总章》还规定：支部为各地之自治团体，得自行议立章程，请本部批准，并推荐支部长，请本部总理委任。支部长得便宜行事，委派人员在其附近地方设立分部，而直接统辖之。根据这条，党务部提请本部：（一）指定各地主盟人；（二）令各地组织筹备处；（三）推选支部长。计先后成立委任各支部约如下：

国内：

地名	主盟人	筹备处长	支部长
江西	周道万	周道万	徐苏中
湖北	田桐	刘英	田桐
湖南	陈家鼐	陈家鼐	覃振
安徽	范光启	张汇滔	谭维洋
浙江	陈其美	戴季陶	戴季陶
广东	何天炯	谢良牧	何天炯
广西			苏无涯
江苏	周应时		吴藻华
四川	谢持	杨树堪	龙光
云南	邓泰中	黄嘉良	杨益谦

贵 州	张士麒		凌 霄
河 南	凌 钺		凌 钺
陕 西	焦易堂	徐朗西	宋元恺
山 西			阎崇义
山 东		邱不振	刘 光
东三省		徐东园	刘大同
福 建	许崇智	万黄裳	黄展云
甘 肃			张宗海
奉 天		诸 愚	
吉 林		徐东园	
黑龙江		乔 根	

国外：美洲总支部部长 林森 冯自由；加拿大总支部总干事陈树人；安南总支部总干事 陈箇民。

以上三部的总支部长，总干事长均由本部直接委任。此外，檀香山、菲律宾、澳洲、南洋、暹罗、缅甸等各地总支部长，亦先后成立委任。^①

9月1日，中华革命党发布成立通告，将该党的成立及其宗旨布达海内外，要求国内外所有国民党“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均以履行总章第7条之手续书写誓约者，认为本党党员”。同时，号召全体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②总部成立后，陆续颁布了79次委任令，先后委任了832名各级干部。^③在总部直接指导下，国内18省建立了支部，孙中山亲自委任了各省支部长；建立了39个支部和45个分支部。全党共发展一万余名党员。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建立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党。他说：“中华革命党唯一之宗旨，是以革命精神图主义之实现。”^④在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16—48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3页。

③ 《革命文献》第45辑，第159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5页。

党的名称上加“革命”二字，其要义就在于：“使一班同志知道凡是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很明显的表示他是革命的党员。如果不愿意挂革命党党员招牌的人，尽管不入党好了”。建设一个革命的党是孙中山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孙中山在创建中华革命时，在组织上强调集中统一。一个政党保持组织上的集中统一，是革命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在长期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党能统一，则革命之事业已成功过半矣。不能统一，即使成功，等于第一次，其结果亦必如今日矣。”他把党的统一视为革命胜利的保证，这是孙中山建党思想的一大进步。

孙中山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强调革命纪律的重要性，坚持“正本清源”的原则。1914年8月23日，中华革命党正式发出《约束党员通告》。向全体党员提出“党员规则四条”：（一）不得以个人自由行动，加入他之团体或集会；（二）不得受外界之摇动，有违背本党之行为；（三）不得以个人名义，发表违反党义之言论；（四）不得以违反党义之言论行动，煽惑本党同志。^③这些规定对于加强党内纪律，保证党的纯洁性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强调“正本清源”，淘汰官僚政客，伪革命党，更显示了孙中山建立真正革命党的决心，也使孙中山的建党思想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中华革命党的纲领，反映了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情认识不清。在他认为，推翻清王朝，民族革命即已完成；所以，党纲只提“以实现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这就放掉了中华民族最大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而把中华革命党的斗争仅仅局限于“反袁”。反袁的目的也只是恢复辛亥时期的旧国会、旧约法那种不彻底的共和制而已。民权主义在党纲里并没有新的阐发。

① 《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4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2页。

至于民生主义，党纲中也没有什么发展，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而在没有解决农民从封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获得土地的情况下，不仅资本主义无法发展，就连反封建的任务也不可能彻底完成。所以，中华革命党的纲领较之同盟会的纲领，有明显的退步。中华革命党的纲领对旧三民主义没有补充任何新内容，自然不能获得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些在纲领上的失误，乃是第三次革命半途而废的主要原因。

组织原则绝对服从“党魁”，旨在防止党员各行其是，保证“党魁”的领导权威，以利团结和统一行动。但是，这样做就改变了同盟会时期的民主选举原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会党的封建宗法家长制。黄兴对这种“近似专制”的做法不满而与孙中山分手。其他一些国民党骨干，如李烈钧、陈炯明、李根源、熊克武等人分别远走欧美或南洋，自行活动。这样，不仅使中华革命党染上了宗派主义色彩，而且造成了自我封闭的狭小圈子，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

组织路线依靠少数党员，严重脱离群众。中华革命党明文规定：党员按入党先后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等。三种党员分别有不同的权利。这在无形中造成党内的特殊阶级，不能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此外，党章中又规定在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妨碍了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甚至造成隔阂与误会。孙中山还反复强调“秘密结党”的形式，就更使中华革命党在群众中愈形孤立。

由于中华革命党的宗派性和排他性，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它虽然在反袁斗争中旗帜鲜明，斗争勇敢，付出重大牺牲，但没有成为反袁联合战线的核心力量。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也因之让给进步党，中华革命党亦只是起了配角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部分对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存

在严重分歧的国民党人，认为时局紧张，便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世界形势及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应付的对策，这给他们组织政治小团体提供了机遇。1914年8月由李根源等人倡议以研讨欧事为名，发起组织政治小团体。关于团体名称，经过反复磋商多数人认为应遵循：（一）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二）该团体应便利联合同志；（三）该团体应避免袁氏之嫌等三点原则采取“缓进”方针，“假借世运”^①取名“欧事研究会”。

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黄派军人”即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和追随黄兴的“官僚党员”。这两部分中以“黄派军人”为骨干，其中如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钮永健、李书城、程潜、李根源、但懋辛等。二次革命时，他们在各省讨袁军中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在反袁战争中直接带兵与袁氏北军交战。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觉得在袁世凯的势力下面，要再举革命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所以都主张要过了5年10年再来筹备革命的事业”。^②这部分人经过这次挫败，灰心丧气，感到革命无望。因此，对孙中山重整旗鼓，继续武装讨袁的所谓“激进”主张不以为然。他们跟随黄兴南征北讨，无论从感情上或关系上都比较接近黄兴。在孙黄的分歧中，他们在思想上都赞同黄兴的主张。

第二部分的所谓“官僚党员”，即清末的立宪派、民初统一共和党的成员，其中如谷钟秀、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欧阳振声、张耀曾以及杨永泰、韩玉辰等人。这些人在宋案前分别任参、众两院议员，宋案发生后，他们留恋议员的职位，反对武力讨袁。他们主张制成完备宪法，依据法律以限制袁世凯的专制。当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时，他们“更欲据宪法起草委员会孤军奋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3页。

③ 《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50页。

斗，以期最后之法律胜利”^①。这是国民党内部的所谓“稳健派”。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也遭到了袁世凯的通缉，被迫亡命日本。

国民党黄派军人和稳健派党员，在政治上都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孙中山改建中华革命党，黄派军人因与孙中山的政见分歧，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稳健派党员因官僚政客之出身，被淘汰于中华革命党之外。因此，由于各自的原因而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两派，便以研讨欧战为名，迅速地结合起来。

欧事研究会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也没有最高领导人。因它的成员多是黄兴的部下和追随者，故黄兴是欧事研究会成员心目中所拥戴的领袖。欧事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章士钊说：“凡集合同志，谋定后动，或余草拟对外文字，而来与余衡量局势，斟酌词句”，“执该会牛耳，指挥一切者”“非他人，乃李印泉也”^②。

欧事研究会成立后，李根源、殷汝骊、程潜等联名致函在美国的黄兴，告知欧事研究会的成立经过，请黄兴等人加入。黄兴认为欧事研究会的宗旨符合自己的一贯主张，便欣然表示赞同，并复函云：“知公等设立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时之良策，主旨宏大，规划周详，其着手办法，尤能祛除党见，取人材集中主义，毋任钦仰。又承决议弟为本会会员，责任所在，弟何敢推辩”。^③在此函发出后的第九天，在《复谭人凤等书》中又进一步表示：“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现在所谓革命党，其弊在不能统一。公等著意在此，将来救国目的必可达到”并嘱意欧事诸公“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望公等以大度处事，以调各方面为主。著著踏实进行，或至袁贼坐困之时，可能收群策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57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4页。

③ 《黄兴集》第388—389页。

之益。不则各自为阵，不相关联，事必无济也”。这说明黄兴的思想对欧事研究会起指导的作用。

欧事研究会没有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只有一份该会发起人于1914年8月13日起草的“协议条件”，其要点如下：（一）力图人材集中，不分党派；（二）对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三）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用种种方法，总期取其同情为究竟。^②“协议条件”基本上反映了欧事研究会力图联合各派，以“缓进”的方针坚持反袁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它在国事危难之际，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在这方面和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主要是在斗争策略问题上。他们主张“乘欧乱吾人可谋革命之预备”，“蓄远势毋矬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的方针。^③显然是对中华革命党“激进”方针的否定。“缓进”方针看起来似乎“稳健”可靠，不偏不倚，但实质上则是缺乏革命勇气，甚至是取消革命的悲观论调。^④“激进”方针虽然含有军事上冒险盲动的因素，但却表现了中华革命党敢于革命的英雄胆略。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总之，欧事研究在政治上虽然坚持反袁的政治目的，在民主革命的大方向上与中华革命党基本上一致，但亦不能排除“与孙对抗”的性质。“中华水利促成社”的成立及其活动足资证明。

“中华水利促成社”，是欧事研究会成员在南洋成立的派别小团体。1914年末，李烈钧由欧洲抵南洋，不久，他联合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宋渊源、周震麟、熊克武、龚振鹏、冷遹、耿毅、林虎等人，成立了“中华水利促进社”。对外以“发展国内水利建设^⑤”为旗号，实则“筹备大款，然后举事”^⑥为目的。

① 《黄兴集》第389—390页。

② 《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4页。

③ 《复谭人凤等书》、《复李根源等书》，《黄兴集》第390页、389页。

④ 参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50页。

⑤ 《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77页。

⑥ 《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3页。

该社成立后，柏文蔚、宋渊源等人四处奔走，分赴南洋各埠进行募款。但因南洋华侨信仰孙中山者多，中华水利促成社“筹款所得数目有限”，柏文蔚等人奔走半年，只得“中国钱十二万数千元”。^①

中华水利促成社在南洋的筹款活动，“对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筹款工作，则已大起障碍作用”^②为此，中华革命党南洋负责人邓泽如等人找陈炯明等协商，希望陈炯明、李烈钧等服从孙中山的主张，以便共同革命。但陈炯明、李烈钧却搪塞说：“对先生十爱戴，断无不服从之理，惜乎总章不善，易惹国人反对，未敢妄从。总之，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先生，施展救民政策”。^③陈、李借辞推托，拒绝与中华革命党合作。

中华水利促成社在南洋的宣传和筹款，“与中山先生领导下之中华革命党相对立，从事派系分裂之政治活动”。这种派别活动，严重地打击了侨胞的反袁爱国热情。他们感到反袁失败，革命党内部又极不统一，革命尚有何望？因此，“不愿出钱出力”。^④更为严重的是，各色各样的投机分子以及袁氏党徒亦混迹革命党，“私立名义，出外筹款”，^⑤“藉敛华侨之金钱，捣毁吾党之信用，挑拨华侨对于吾党之恶感。”^⑥孙中山为此，立即着手制定筹款“奖励章程”，“以归统一”。又令党务部长以中华革命党本部名义发出通告：“凡非有本党总理委任，而自行借名某处设统筹部而来筹款者，谋概行谢绝。……勿俾到处招摇，以伪乱真”。^⑦为了抵消“水利社”一派的破坏，邓泽如、邓仲元联电东京本部，“请中山先生从速增派一些得力人员来南洋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1页。

② 《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77页。

③ 《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4页。

④ 《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77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8页。

⑥ 《华侨与中国革命》第235页。

《孙中山全集》第3卷，138—139页。

进行活动”。^①不久，孙中山即派出许崇智、宋振、叶夏声、何天炯、郑鹤年、黄展云等“党中要人”分赴南洋各埠“联络同志，扩张党务”。^②从而扭转了当时的困难局面。

欧事研究会这种不顾大局、不利团结的行为，无论主观如何，客观上不仅加剧了革命党内部矛盾的消极作用，更进而帮助了革命的敌人。

三、护国战争中的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以“三次革命”即反袁斗争为目标，在国内外从舆论和武装斗争两方面积极开展反袁活动。

舆论机关以海外的《民国》杂志和稍后创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为阵地，在揭露袁世凯，动员海内外同胞参加反袁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杂志1914年5月10日创刊于日本东京，不定期，每期出大32开本百余页一册。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成为该党的机关刊物。

《民国》杂志社社务由如下人员组成：发行人居正，总编辑胡汉民，编辑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邵元冲、邹鲁、田桐、苏曼殊、叶夏声。该刊的宗旨主要是反袁。《发刊词》首揭袁氏“弁髦宪法，蹂躏人权，袭民主之名，行帝制之实”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同“帝制独夫”进行斗争。^③该刊的编辑们就是主要撰稿人，他们发表的评论文章，都揭露了袁世凯独裁专制媚外卖国的罪行，驳斥了袁党分子把参加反袁斗争的革命党诬为“暴民”的无耻澜言，主张维护民主共和的成果，给“帝制元凶”以坚决的武力制裁。同时，针对革命党内部一部分人存在的消极情绪，激励党员“发挥其能力，斩除其惰性，遇艰险而益厉，更丧败而益

^① 《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78页。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2页。

^③ 《民国》，第1卷。

前”。^①《民国》杂志还辟有“译述”和“文艺”两栏目，刊载苏曼殊的连载小说《天涯红泪记》，周庾鹄翻译的《大私归士》等外国文学作品，通过文艺吸引读者。

中华革命党在国外各支部机关刊物还有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少年中国晨报》，由李是男、黄芸苏任主编；《民主》月刊，由谢英伯、冯自由、孙科任主编；在纽约出版的《民气报》，由谢英伯、赵鼎新任主编；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出版的《新民国晨报》，由胡汉贤、夏重民任主编；在多伦多出版的《醒华周报》；在古巴出版的《民生报》；在秘鲁出版的《民醒报》；在檀香山出版的《自由新报》、《大声杂志》；在新加坡出版的《国民日报》等，这些报刊基本上都在中华革命党的控制下，成为反袁的舆论阵地。

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创办的报刊，主要有：《民国日报》，《公民日报》和在香港出版的《现象报》等。

《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创刊于上海法租界，由陈其美负责筹备和领导，报纸的日常经理和编辑事务由邵力子、叶楚傖负责，协助撰稿的有朱执信、戴季陶、沈玄庐等人。《民国日报》以讨袁为主旨，几乎天天发表社论，无一不抨击袁世凯，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公民日报》1915年秋创刊于天津租界，刘揆一任社长，刘铸生、张静庐任编辑，是中华革命党在华北地区唯一言论和通讯联络机关，“内容完全是反对袁政府的”。^②《现象报》创刊于1915年10月，是中华革命党在港澳地区的唯一宣传喉舌。经理罗翼群，发行人梁智亭，总编辑邓寄芳，撰述人陈云峰、梁楚三、邹呼伸、梁早如、黄伯淑等。这个报纸日出八开八版，除报导“国内外时事外，并有时评及各种小品、小说、诗歌等栏”，每日销二三千份。该报通过梁早如、黄伯淑利用西报和香港电报局的特殊关系，所刊电讯较当地的

《民国》第1卷，

② 张静庐：《旧大公报被封之迷》，《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其它报纸为快。袁世凯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事件发生后，该报即先于当地各大报发号外加以报导，故当时颇能吸引读者，取得较大销路”^①。

由于种种原因，中华革命党的舆论宣传往往还比不上进步党方面的报纸，在反袁的宣传上，未能起到领导作用。但也必须看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特别是袁世凯将帝制活动由后台推向前台时，是孙中山首先发表《讨袁檄文》，声讨袁世凯，同时又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武装反袁的斗争。

中华革命党的武装反袁斗争是和筹建中华革命党同步进行的。孙中山指出：“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②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也规定，本党“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③孙中山把武装反袁放在第三次革命的首位，并把它作为全党的行动纲领在党章中规定下来，使之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

1914年初孙中山就和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讨派人回国开展武装反袁的军事计划。1月，派陈其美、戴季陶赴大连，联络东北各省反袁力量进行武装讨袁。陈其美抵大连后，与匿居大连的革命党人吴大洲、薄子明、刘大同、孙祥夫、刘艺舟、刘纯一、宁武、王庆肇、王殿松及沈缙云等革命党人联络，在大连设立机关，集结力量，运动军队，准备时机成熟，“关外一动，南京继之，而江北、山东同时并起”。^④不久，陈其美等人的活动被袁世凯侦悉，被迫离开大连。3月，孙祥夫、刘艺舟、马明远等在大连、长春、公主岭等地设立机关，密谋武装讨袁，被特务侦悉，马明远遇难，起义失败。继东北之后，6月，朱执信在广东吴川、电白、信宜组织起义，被龙济光镇压，朱执信出亡。同月，革命党人凌霄奉孙中山之命赴湖南阻截袁世凯调拨给贵州护军使

《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81—8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④ 《近代中国》第22期，第42页。

刘显世的军械，并准备就地起义，事泄失败，凌霄死里逃生。

1914年6月，李国柱在湖南郴县发动的武装讨袁，以“中华民国民主孙”的旗帜宣布起义。义军突起，袁军措手不及，义军很快占领县城，然后“突袭耒阳、永兴，图攻衡阳，声势颇盛”。^①继李之后，雷瀛又奉孙中山之命回湘策动武装讨袁。经过半年的准备，组成了以雷英为司令、雷瀛为参谋长的湖南讨袁军。7月1日，在桂阳县起义，占领县城，后在转战中与袁军遭遇，寡不敌众而失败，雷瀛、雷英分别出亡香港和日本。

在组织武装反袁斗争的同时，孙中山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和武装斗争的军事问题，在1914年初开始编写《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从9月20日至12月16日，用了3个月时间，召集陈其美、许崇智、胡汉民、廖仲恺、戴传贤、田桐、谢持、杨树堪、居正、王统等重要骨干分子，先后开了十七次会议，专门就《革命方略》逐章逐节进行讨论和修改。^②

《方略》对革命军的宗旨、攻取、响应、反正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指出：“推翻专制政府，建立完全民国，启发人民生业，巩固国家主权”，^③是中华革命军的最高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华革命党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军，全力进行武装讨袁。《方略》充分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建军思想。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孙中山认为：“此际稍有识者，莫不以革命为救国之唯一法门，又属革命之绝好机会”。^④决定乘机会全力进行武装反袁。

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陈其美、戴季陶、周应时等党内干部的积极支持，并经会议研究决定：改变最初在东北建立革命根基的方针，仍然转注于东南各省。同时，派“邓铿图粤、夏之麒图

① 《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② 《中华革命党议事录》、《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22—32页。

③ 《中华革命党议事录》、《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1页。

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策划决定”^①。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决定在上海设立总指挥部，由蒋介石和陆惠生负责；同时，从海外抽调大批党员派遣回国，从 8 月起，相继有 300 多名党员从日本返回国内，分赴各省筹备起义。

8 月 17 日，中华革命党党员哈在田在南通发动武装起义。7 月，中华革命党党员邱丕振在东北组成关外讨袁军总司令部。9 月，讨袁军联络绿林数百人，在通江口发动起义。失败。9 月 8 日，本溪革命党人联合绿林，树起讨袁军旗帜，进攻县衙。在广东方面，有邓铿、朱执信分东北、西南两路起义。在江苏徐州方面，有革命党人韩恢在宿迁、颍口一带起义。

孙中山利用欧战爆发之机，在国内重新组织力量发动武装反袁斗争，从时间上看，比云南起义早了近二年。这些反袁武装斗争，遍及全国各地，尽管都先后失败，却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及其在各地的瓜分，推动了反袁斗争的发展，为护国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1915 年 4 月 9 日，中华革命党发布《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揭露袁世凯企图借日本之助复辟帝制与平息“内乱”，为实现此种目的，袁氏必将承认“二十一条”。因此，“党人于此际，除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外，再无可以容喙之余地”。^②中华革命党为全国的反袁斗争指明了方向。告国人书发布一个月，5 月 9 日袁世凯果不出革命党人所料，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顿时，举国哗然，海内外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爱国浪潮。孙中山指出，这股浪潮“较满清末年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③

在举国沸腾的形势下，为在全国各省组织反袁力量，掀起全

① 《革命文献》第 48 辑，第 177 页。

② 《革命文献》第 48 辑，第 11 页。

③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 49 页。

国反袁高潮，孙中山于1915年7月，先后委任了各省的军事长官，负责各省的军事发动工作，主要有：浙江夏尔珣，江苏周应时，福建黄国华，广东邓铿，云南黄毅生，湖南林德轩，四川卢师谛，湖北蔡济民，安徽张汇滔，江西夏之麒，贵州安健，广西刘崛他们奉孙中山之命，分赴各省组织武装反袁力量，制定具体的讨袁计划，积极开展讨袁斗争。

1915年8月23日，帝制御用工具“筹安会”出笼，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9月1日，孙中山亲自领导中华革命党在东京集会，声讨袁世凯，反对复辟帝制。18日，中华革命党立即发表第十六号通告，指出：“千钧一发，时不我与，惟我内外诸同胞速图之”，^①发出了讨袁战斗号召。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为了在全国掀起武装讨袁高潮，加强军事方面的组织与领导，建立一支中华革命党自己的军队，孙中山于1915年夏召开了由本部各部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委任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为四军总司令，分别于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设立司令部，负责筹建军队。孙中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军事领袖身上，希望他们到各省发动会党，联络绿林，收买退伍军人组织一支自己的军队，作为反袁斗争的主要力量。

孙中山在积极进行武力讨袁时深感因财力不足而造成的极大困难，曾派人分赴各地筹款。随着国内反袁武装斗争规模的不断扩大，需款尤殷。1915年9月，孙中山再次派出党内主要干部陈其美、胡汉民、许崇智、杨树堪、宋振、郑鹤年、邓铿等人，“分赴南洋各属，筹募起义军饷”。^②海外各支部不断以巨款支援国内斗争，许多爱国华侨积极认捐，热情支持国内讨袁斗争。中华革命党在兵力、财力两方面双管齐下，全力以赴，积极进行

① 《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45页。

②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1—5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5页。

武力讨袁，以期“一举即达吾党素志”。^①

为了卓有成效地开展武装讨袁斗争，孙中山专门把陈其美从上海召回东京，与负责军事的干部居正、许崇智、周应时等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军事计划。会议决定积极策动云贵起事，联络西南各省，以“先从西南造我根据”。^②

早在1915年秋，孙中山曾委任杨益谦为云南支部长，黄毅生为司令长官，回滇建立支部，组织讨袁。之后，又有杜去恨、蔡济旺等人入滇秘密建立机关，运动学生及滇军，准备发动起义，后因事泄而失败。1915年夏，孙中山又委派中华革命党的领导干部吕志伊“由日回滇，秘密运动军队”，策划讨袁。^③

贵州方面主要有张百麟、安健、席正铭、凌霄等人在这里以运动军队为主。计划一旦时机成熟，黔军各路同时发动，以“牵制黔贼，使不寇川、滇，俾以揭晓后，再以兵力为黔军声援”^④。

除云、贵之外，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斗争，在其他各省也相继展开。1915年5月，革命党人金鼎隆在东北开原县集众五百余人起事，活动于南满铁路沿线。6月，前绍兴府都督王金发在浙江发动起义讨袁，被扑杀。7月，广东革命党人钟明光在广州谋炸龙济光未果被扑杀。10月，陕西革命党人在三原、泾阳等地起事，攻占县城。同月，朱执信、邓铿发动革命军于惠州、佛山等地起义，均遭失败。11月，上海革命党人王晓峰、王铭山炸毙袁世凯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同月，居正在青岛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部，他联络吴大洲、薄子明、邓天乙、尤超凡等部，并招募乡团、退伍士兵、学生及警察等拥有数千余人，组成东北军，筹备讨袁。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3页。

③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第1058页。

④ 《革命文献》第47辑，第308页。

与此同时，海外各支部也纷纷组织军事团体，积极作回国参加武装讨袁的准备。美洲支部组织了“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以培养“美洲民党热血健儿”；并组成了“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以党中习军事者为教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参加讨袁。同时还组织了“中国民智航空社”，在革命青年中培养飞行人员。海外支部和爱国华侨，在人力物力支援反袁斗争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孙中山曾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枕，诚不可多得也”。^①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鼓舞和激发了国内人民的反袁斗争意志，推动了各地的武装起义，发挥了倒袁的先锋作用。因此，它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中华革命党进行的武装反袁斗争，实际上并没有去组织自己的军队，反袁的主要方式是采取局部暴动。这些军事行动，只不过运动军队，联络绿林，收买退伍军人等的建立起来的临时的小股武装，以此组织暴动或进行暗杀。走的仍然是辛亥前不发动人民群众、单纯军事冒险的老路，最后都相继失败。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26日，护国军在昆明成立，出师讨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在护国军出师北伐的同时，中华革命党也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讨袁斗争，与护国军遥相呼应，形成了各党派的大联合，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袁高潮。

护国战争爆发后，孙中山指出：“云南已率先宣布独立，其他省正迅速响应，一如第一次革命推翻满清统治时之情景”。^②面对这种一呼百诺的形势，他认为“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③这反映了孙中山力图使中华革命党在整个运动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使之成为一支具有举足

① 《革命文献》第5辑，第15页。

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35、220页。

轻重的势力，以便掌握运动的主动权，使革命后的成果不至被反动派所窃取。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在军事策略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云、贵独立之后，中华革命党人在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均准备发动起事。但孙中山主张首先“决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以便“与云、贵打成一片”。这样，“南方局势，已足自活，沿江各省，自然动摇”。

为实现上述军事计划，广东中华革命军在司令长官宋执信领导下，于1916年初先后发动两次以进取省城广州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同时，孙中山还派邓铿由日返粤“襄助执信，经营粤事”^①

朱执信率领中华革命军两次攻取省城广州未能成功，但给袁氏爪牙龙济光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朱执信在《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中指出：“计中华革命军在广东人数万七千余人，自石湖以降……大小数十战”，而“石湖一役，歼其团长，激战数日，俾以全力防北江、西江。继以决死之队攻肇肇和，虽其事不成，而龙济光益严于防守”。“龙氏在广东有兵五万人，仅以三千往滇者，中华革命军牵制之也”。^②

护国军进入四川后，四川籍中华革命党人也纷纷回省，运动军队，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1916年2月中旬，谢兆鸾集合民军千余人在合州首揭义旗，成立中华民国革命军四川第一支队，活动于长江沿岸的万县、云阳等川东一带地方。3月初，由王维纲和刘伯承等人，运动涪州警备队和哥老会在涪州新庙子起义，成立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活动于长寿、丰都、涪陵等川东南地区。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长官卢师绅与龚天福、杨海清等人组成四川中华护国军第三支队，于马尾坝起义。上述各支起义队伍联合成立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部，以石青阳为司令官，并发表以中华“革命军之宗旨”为内容的告国人书。四川中华革命党人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37页。

② 《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57页。

所领导的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在四川的代理人陈宦，阻止了袁氏北军的南进，对蔡锷护国军在四川战场的胜利，予以极大的支持。

在湘鄂两省，云南起义后，中华革命党人杨王鹏、邹永成等人由日返湘，运动军队组织武力讨袁，2月21日，杨率革命党数十人，袭击汤芑铭的将军府等军警要害机关，结果，杨王鹏等20余人惨遭杀害。中华革命军湖北司令长官蔡济民与刘英等革命党人，经过长期运动，策划了一起南湖马、炮队起义，仍然失败。

在袁世凯盘据的北方，孙中山“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军事进行事宜”。①3月，居正等人组成北军司令部，编成以刘廷汉、朱霁青为司令的两个本队和以薄子明、马德龙等人为司令的6个支队，在山东积极进行讨袁斗争。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人数较多，势力强大，“与袁军相持数月”，“使袁氏不得不割其大部分兵力以自防，而南军因之益振，其功尤著”。②

此外，长江下游的江、浙、皖、赣四省的讨袁活动在陈其美主持下更为活跃。尤其上海是国内革命党人讨袁活动的中心，被袁氏视为眼中钉，尤为忌恨，遂于5月18日，派刺客于上海将陈其美刺死。

以上事实说明，中华革命党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中，与护国军一样是一支重要的反袁力量。它发动的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这就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袁世凯的武装力量，为护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迫使龙济光、陈树藩、陈宦、汤芑铭不得不离袁“独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47页。

《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46、58页。

立”。这就从政治上瓦解了袁世凯集团，最终导致袁氏帝制的覆灭。

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及其中华革命军的武装反袁活动是整个护国战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朱执信所说：

“中华革命军实先护国军而起，而以甚大之好影响与护国军者也”。只是由于中华革命军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支集中的有威慑力的力量，所以不象护国军那样有声有色，因之没有在护国战争中占据主要地位。

第二节 进步党人从拥袁到反袁与护国战争的策动

一、进步党人拥袁立场的转变

在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形势下，进步党的政治立场发生了从拥袁到反袁的根本转变。

进步党人原为拥袁派，企图在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下，改良政治，而袁则利用进步党的势力以加强自己的统治。为此，进步党一成立，就得到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不惜拔出巨款，充作进步党的活动经费，而进步党也就仰承袁的鼻息，助袁为虐，起了极坏的作用。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和“善后大借款”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对。但进步党人却无视全国舆论，多方为袁世凯辩护。1913年6月15日由进步党的实际领导人梁启超主持召开进步党的特别大会。梁在会上说“宋案纯为法律问题，提出了“宋案由法庭解决”的主张，图谋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缩小为法律范围内的问题。还说什么“大借款并非总统违法。”在孙

① 《近代史资料》总第61号，第56—57页。

中山领导发动讨袁战争的“二次革命”时，握有实权的进步党人汤化龙发表声明，宣布它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梁启超发表文章，攻击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是“破坏行为”，是“头脑简单，办事盲动”的幼稚行为。他的门生，进步党名誉理事蔡锷，则公然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并在10月奉调入京，担任了一系列的职务，表示要“帮助袁世凯度过这一难关”。②

“宋案”和“大借款”的阴谋败露后，赵秉钧内阁已难以为继，袁世凯利用进步党打击国民党，提出由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出来组阁。进步党认为这是不可失掉的良机，梁启超对此次组阁最为热心。最后组成了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也称为“进步党内阁”。但是，北洋军阀实际上控制了内政、外交及军事大权，并未能满足梁启超妄图“左右天下”的希望。“人才内阁”组成后，梁启超为其制定了内政、外交、军事、实业、行政、法律、教育等方面的施政纲领，追求宪法、国会、责任内阁、司法独立。但袁世凯对此根本不感兴趣，竟于1913年11月14日下令并经熊希龄副署解散国民党，取消该党的国会议员，停止了国会活动。12月由袁世凯操纵成立了政治会议，“反对司法制度最烈”，司法改革宣告失败。1914年2月12日袁最后把熊希龄的“人才内阁”赶下了台，解散了各省议会。接着，梁启超也以“一介书生，未谙从政”为由坚决辞去了司法总长的职务。是年5月，袁公开宣布废除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1915年8月，袁世凯指使亲信，公开上演复辟帝制丑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共和制与封建专制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样，进步党人图谋在袁的独裁统治下，实现立宪政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乃决定和袁世凯分道扬镳。

《政界之现状》续《远生遗著》第3卷，第147页。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6页。

进步党人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是经历一个发展过程的，进步党人从1914年开始，即对袁解散国会一事持有异议。1月8日蔡锷在政治会议茶话会上指出“处置国会一事只能按当时各都督原电所云‘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不能越其范围”^①。意即不能解散国会。

进步党人对1914年5月公布的赋予总统以封建君主般权力的新约法表示不满。他们指出，它“比较临时约法，纰谬尤甚”，“是假总统政治之名而行独裁政治之实。”^②他们着重批判新约法中关于总统职权的规定，认定它是“约法最大恶劣之点”。^③

进步党人对袁世凯刻意起用旧封建官僚，尊孔复古的行径十分不满。指责“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今皆柄握政权。”^④批驳袁的复古行径，指出“改革之道，不在礼教，而在科学”，^⑤“纵古制可复，而中国之人心未必可复”^⑥说明袁的复古活动是违背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的。

进步党人针锋相对地抵制解散政党的阴谋，汤化龙明确指出：“政党之结合，原由多数人之组织，不能因一、二人意见，遂将政党取消”，并郑重表示，“官可不作，党不可不办”。^⑦

1915年初，梁启超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总结两年来进步党人政治活动的情况时，流露出对袁世凯的严重不满与不和。他说：“其间不自揣，亦颇有所规划，思效铅刀之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形相阂。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而反乎此者，又恒觉与心有所未安”，这时，他已感到依附袁世凯并不能贯彻自己的理想，因而深知“将来之奇剧难

《八号政治会议之茶话会》、《时报》，1914年1月3日。

③ 汪虞炎：《中华民国约法摘疑》，《中华杂志》第1卷第6号。

彭热忱《论中国今日人才之消乏》，《商报》第12期。

⑤ 蓝公武：《辟今日复古之谬》《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

⑥ 黄尊三：《法治与复古》，《中华杂志》第1卷第7期。

⑦ 《申报》，1915年3月6日。

于同演。① 7月20日，梁发表《复古思潮平议》一文，反对取消国会。他说：“民国初元之政，诚不足以饜人望也，然岂必其政之本体绝对不适用于中国？母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为今后所万不可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张补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由，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不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以求政党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②

是年1月，袁克定宴请梁启超，透露了变更国体，求其赞同之意。梁力陈变更国体、恢复帝制的“内部及外部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③遂不欢而散。但此时，梁仍未最后下定反袁的决心，只是“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而不“思所以制裁之，惩治之”。梁在离京南下以前，致书袁世凯，劝他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复辟帝制活动。信中历数袁对共和制度，曾“明誓数四，口血未干”，如违背誓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我大总统何若以千金之躯，为众之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要他“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的劝进”。并警告袁世凯“若今以民国元首之望，而不能辍陈桥之谋，即将来虽以帝国之威，又岂必能弭渔阳之变”，“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淘汰”，要求袁世凯“放弃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④但袁对此劝阻却虚与委蛇，信誓旦旦地保证，绝无帝制自为之意。但不久，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8月14日，由他一手操办的筹安会公开出笼，预定在1916年元旦登基。于是，梁、蔡力图阻止的帝制复辟终于发生了。从此，进步党人积极走上了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道路。

民国三年《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梁谱》第435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72页。

③ 《盾鼻集》第143页。

民国四年《上大总统书》、《梁谱》第453—454页。

在筹安会成立的第 7 天，亦即 8 月 21 日梁启超就连夜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者》一文，交由汤觉顿带往北京在报上发表。同时，还有梁《与英报记者谈话》和汪凤：《致筹安会书》、佛苏《对筹安会之意见书》在京沪各报刊载，痛斥复辟帝制的谬论。

梁痛斥了袁世凯口称拥护共和，实在复辟帝制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尖锐指出，今“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主谋者，天下之怪事，盖莫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①他驳斥了古德诺鼓吹复辟帝制的谬论，指出辛亥革命以后，再欲复辟帝制是不可能的。而古德诺等人所谓改变国体即可实行君主立宪完全是骗人的。揭露袁世凯执政以来，“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代替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今又要废弃共和恢复帝制，“使国民彷徨迷惑，莫适所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警告袁“仍行专制，吾恐天下遂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如仍“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貽国家以无穷”之祸，“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②他还号召人们，不要置身事外，“自宽纵其蠹贼”，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决不为“枭雄所利用”。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一文在 1915 年 8 月 20 日出版的《大中华》杂志发表后，其他各报竞相转载，震动中外，“传诵一时”。从而揭开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的序幕。

梁的文章发表后，进步党人起而响应，口诛笔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进步党理事汤化龙发出通电，斥责“袁的脑筋为旧思想所弥布，非时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谢国人，千夫所

① 《异哉所谓国体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9 册。

② 《异哉所谓国体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9 册。

指，必至无病而死”。^①进步党新加坡交通处发出“呈北京总检查厅文”，声讨筹安会复辟帝制的活动，指出，“当此国是久定，中外正望治之忱，乃欲拂此安行利任之素位，而为倒行逆施的穷途，导以君主迷梦，陷我国家忧危，其谁保之？其谁任之？此按国情则不合，揆之民意则不然者也”。^②他们指控筹安会“于共和确定之后，研究国体即为紊乱国宪之尤，”即“违反现行之刑律”。因而要求检察厅“立逮杨度等治以相当之罪，并咨内务部转行警厅 勒令筹安会即日解散 不准诡名复设 庶遏乱政而维治安”。^③孙洪伊致电袁世凯，警告袁恢复帝制绝没有好下场，“我公欲效石敬瑭、刘豫故事，暂窃帝号，聊以自娱，亦不可得，更恐拿破仑之大业未成，而大院君之覆辙已蹈。国家将亡，公亦无幸”。^④他还于1915年1月10日发表《泣告北方同乡父老兄弟书》，尖锐地揭露袁世凯祸国殃民，复辟帝制的罪行，指出袁自“就职以来，专横跋扈，蹂躏法律，紊乱财政，压抑人民，割丧土地”，“改朝窃号”，“夺四万万人之国家而私诸一家一姓”断卖国家以博取皇帝，实“刘豫、张邦昌之不若。”^⑤号召人们起来“申讨国贼……誓将侄皇帝侄皇孙驱除于域外，而为四万万同胞还自由之神，二万万中国成不朽之业。”^⑥

进步党安致远等137人联名发出致进步党各省支部分电，痛斥“袁氏肇叛，帝制自谋”；“甘心卖国，便彼此图”，提出：“吾党四年以来拥护袁氏断送国家，应速忏悔，声罪自讨，以补前过，岂宜希荣苟合，摇惑人心，媚兹一人，负罪万世”？紧接着他们又发出致各支部分书，历述袁世凯为恢复帝制，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支持，从而即将把中国变为日本保护

《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18页。

②③ 《新加坡进步党交通处呈北京总检查厅文》、《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4日。

④ 孙洪伊：《致袁世凯电》，《中华新报》1915年11月12日。

⑤⑥ 孙洪伊，《泣告北方父老同乡书》《中华新报》1915年12月10日。

《进步党员安致远等致各省支部分电》，《中华新报》1915年12月11日。

国之罪行。申明：“彼既有牺牲国家之决心，我即不可无保存国家之决心。保国家之心于何表示之？则共起而消灭帝政耳”，号召国民“及时兴起”，“存亡之秋，间不容发。”^①

进步党人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罪行的声讨，为反袁护国战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二、进步党人策划护国战争及各党派反袁斗争的大联合

在筹安会发表宣言以后，1915年8月15日，蔡锷以受杨度之托，劝梁启超停止反对帝制为名去天津汤觉顿寓处和梁启超共商对策，决定：由梁启超撰文，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堂堂正正以反对之。”^②由蔡锷亲自回云南联络旧部，发动军事讨袁。为避免蔡因梁发表文章而遭袁迫害，表面上佯为政见不合之举，实在暗中积极进行活动。

此后，梁启超、蔡锷、戴戡以及进步党活动分子又多次在京密商，策划反袁，议定首先在云南发动，“云南于袁氏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1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③从此，积极部署力量，进行护国战争的准备工作。在8至10月间，蔡锷通过各种关系，推荐一些心腹之人去贵州、云南、四川任职，以策应军事起义；又秘密派人赴滇，了解云南将领对袁称帝的动向；复派人分别去广东、广西、湖南联络。9月末，又密电黄兴，通报袁世凯密谋称帝及策划云南起事的情况，并征询意见。在作完上述部署之后，11月，蔡即以治病为名，巧妙地避开了袁的监视，去了天津，并在梁启超的安排下转赴日本。

《进步党员安致远等致各支部书》，《中华新报》1915年12月12日。

②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89—90页。

③ 《国体战争躬历谈》、《专集》三，《盾鼻集》，第144页。

与此同时，11月18日，梁启超致函在云南、贵州担任重要职务的籍亮侗、陈幼苏、刘希陶、熊铁崖等进步党人，详细阐明了武装反袁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吾党风昔持论畏戾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修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斫丧一分，吾辈持以聪明才力，助人养痍，于心何安，于义何取”。他还剖析了袁世凯外强中干的反动本质，指出袁“志满意得，骄盈之气为众所弃”，袁之营垒也“人各有心”。袁的“倒行逆施”、“殆近死期”。因而要求他们不为“牛后”，积极领导和投入反袁斗争。

梁、蔡之所以选择云南为起事之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他们认为首先在中原起事，如果失败，“先损声威”对己不利，而西南云贵导省，则进可攻之，退可守之。（二）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已控制了四川、两湖、广东及江苏等省，但对地处偏远的云南，还未派北洋军阀嫡系部队驻扎，没有直接控制这个地区。（三）云南都督唐继尧加入过同盟会，后又成为进步党的名誉理事，和孙中山、黄兴、蔡锷、李烈钧等人都有一定的关系。因之，利于各方反袁力量聚集云南，共同起事。（四）云南两师一旅中的军官，多为蔡锷的旧部，颇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士兵素质较好，装备精良，“冠于全国”。因而，滇军可以作为武装反袁的强大军事基础。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日益嚣张之时，封建主义、地主买办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在保卫民主共和制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最早举起反袁旗帜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即把工作重点放到武装讨袁方面。1915年末，孙中山发表第一次《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决心“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并号召“爱国之士共图之。”它也是孙中山号召各派反袁力量联合行动的宣言书。同时，孙中山先后派吕志伊等人去滇，策动云南起义。

黄兴提出：“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①为了加强与反袁各派的联系，他在日本、马关设立办事处，传递昆明、东京、美国之间的信息。他还为蔡锷去滇致函云南都督唐继尧，向他解释，蔡“只借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②从而解除了唐怕蔡去滇影响他的地位的疑虑，欣然同意蔡锷来滇，对唐、蔡联合发动云南起义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黄兴还敦促在新加坡活动的欧事研究会成员李烈钧回国等起兵讨袁。1915年11月初，李遂电熊克武等“约去香港一同去昆明”。他们到达香港后，遂与在香港的蔡锷等人会合，相率赴滇举事。

黄兴和孙中山重新携手反袁。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黄兴深感危机，特派其子黄一欧致函孙中山说，三次革命发难时机已经到来，如有所命，极愿效力，表示了从新合作的愿望。孙中山亦表赞同。欧事研究会成员也逐渐向孙中山靠拢，不少重要骨干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派往云南，策动起义，其他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也纷纷回国投入反袁武装斗争。

这样，就形成了资产阶级各党派反袁斗争的大联合。各派之间没有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行动也有很大差别。这个大联合的共同目标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同的行动是搞舆论宣传，进行武装斗争，或秘密联系，或互为声援。正如当时黄兴所说：“兹幸袁逆狡谋已露，忧时爱国之士皆其心志，并其智力，奔走于一途，此诚国家之福”。^③梁启超也说：“盖以次各派皆经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

①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5页。

② 《黄兴致国内友人书》，（1915年12月18日），《黄兴集》第413页。

③ 《黄兴致国内友人书》，（1915年12月18日），《黄兴集》第413页。

派有然，此佳朕也”。^①

在反袁复辟的斗争中，以孙中山发动的最早，态度也最坚决。但中华革命党的势力单薄，在国内只发动了一些小规模武装起义，影响不大；以黄兴为代表的欧事研究会散处美国及南洋各地，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时，还曾提出“联袁对外”、“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国内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风暴开始后，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反袁工作，但黄兴迟迟没有回国，且把不少力量投入在南洋“筹款”方面。这样，反袁护国斗争领导权就自然地落到了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进步党身上。他们利用反袁斗争的联合战线，从政治上、军事上发动了对袁世凯的全面进攻。

三、进步党反袁护国的军事斗争

1915年12月初，蔡锷到达东京，在欧事研究会成员的周密布置下，又秘密地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12月19日在唐继尧派出的卫队保护下，安抵昆明。蔡的入滇，受到了云南人民的极大的欢迎。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样，“锷经越入滇，注意颇属周到，不欲以色相示人。乃此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栈、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平静”。^②这大大地增强了蔡锷的反袁信心。他甫抵昆明，立即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一面致电在上海的梁启超，请示方略，并向贵州的刘显世、川军二师师长刘存厚和四川将军陈宦的参谋雷飙等通报情况，授以机宜。当天晚上，唐继尧在五华山都督府召集军、政、师（厅）、团级以上将领会议，欢迎蔡锷、李烈钧等来滇，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起义方略及组织领导问题。与会成员有各个方面的代表：进步党人唐继尧（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为进

《从军日记》（专集）、《盾鼻集》第124页。

② 《蔡松坡集》，第379页。

步党名誉理事)。蔡锷、任何澄、戴戡、陈廷策、籍忠寅、王伯群等；欧事研究会李烈钧、但懋辛、熊克武；同盟会员罗佩金、黄毓城等；国民党员张子贞、顾品珍、赵又新、杨杰、唐继尧、李友勋、赵世铭等；中华革命党的董鸿勋，还有一些其他人士参加，近50人，实为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大联合的大会。大会通过了梁启超起草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等重要文件。会议决定组成护国军，设三个总司令：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公推唐留守主持一切。决定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而以四川为战略进攻重点。

1916年元旦，正当袁世凯改元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接受北京朝贺之时，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并发出了《护国军政府讨袁檄文》，尖锐地揭露了袁世凯自窃国以来，扼杀国会，背弃约法，私立外约，出卖主权，叛国称帝，欺世盗名等一系列罪状，宣布了护国军政府的五条政治纲领：（一）“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二）“改选中央政府，由军政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三）“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四）“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五）“要求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①

梁启超决心反袁护国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首先安排人在北京侦察袁世凯的动向，并和蔡锷、唐继尧等函电往来，及时地将北京各方面的情况通报给他们。他在军事、政治思想、外交及财政方面作了具体的策划和指导。

在军事行动上，梁启超认定必须把主攻目标指向四川，全力

^①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7月。

收复三川，自是滇军第一责任”，“必以主力注蜀而已”。他还提出了正确对待四川各派系的原则，即必须慎重处理，区别对待。

“蜀中党派繁多，意见久积，调停固应殊非易易，万不可轻心以掉，必赖主军之帅德量机智兼备，乃能收六辔在手，一坐不惊之效”。提出对“川军宜结合，北军宜诛讨”，但“北军若成穷寇之势，似宜资遣”。他指出，必须努力扩充滇军，增强军事实力，“补充兵之训练编制，计当为滇政府目前第一大业”。对官兵之训练，“不能专注重于技术，而尤当注重“爱国观念”的精神教育，使广大官兵明确反袁之政治目的。

在政治上，梁启超郑重指出，要认真对袁世凯的镇压与拉拢，亦即“威压与术取兼用的两种手法，”特别要注意其术取之法，勿中其离间滇人之计。为此，他要求护国军增强团结，坚定必胜的信心，不必“视他方之态度为欣戚”。梁启超还利用坐镇南京的北洋军阀大将冯国璋与袁世凯的矛盾，将籍忠寅从云南调到南京将军署，以争取冯，从而在实际上，把他组织到反袁护国的阵营里，这对稳定东南局面，最大限度地孤立袁世凯，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财政上，梁启超为筹措军款不遗余力。梁建议将中国银行云南分行改为国行，“扩充富滇资本”，采取“强劝巨室投资”办法“富滇银行”集得此资即以公债形式全部贷与军政府”^①；建议军政府“暂以避患为辞”，护送洋务署之洋人出境，盐务交给护国军管理，并派其女婿去南洋筹款，还与岑春萱联系，请其在海外筹款。

上述的策划，对护国运动的发动和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护国军在昆明较场誓师后，即兴兵讨袁，首先由蔡锷指挥的第一军兵分东、西两路向四川、贵州进攻。袁世凯也在1月5日命令曹錕率两路北洋军“征讨”护国军，护国战争全面开始。

《梁启超与蔡锷第三书》，由云尤：《护国史稿》第22页。

护国战争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1916年1月至2月22日，为护国战争的第一阶段。护国军出师以后进展迅速，两路军占领四川叙府，东路军一部进抵贵阳，迫使贵州护军使宣布独立，川军一师也宣布起义，并进至泸州对岸与北洋军阀隔江相持。继之，护国军又乘胜开辟第二、三战线，并攻占了綦江和湘西芷江等地。护国战争的节节胜利，使袁世凯被迫宣布帝制活动“从缓办理”。

从2月23日起到3月22日止，为护国战争的第二阶段。

进军神速的护国军，至2月中旬，由于弹药缺乏，军无粮响，战斗力大为降低，北洋军乘机反攻，3月上旬，北洋军先后占领叙府、纳溪、綦江一带，并挺进滇北。同时，龙觐光也率粤军攻入滇边剥隘，第六师占领麻阳。从而使战局发生不利于护国军的重大变化。然而，这时北洋军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3月15日广西陆荣廷在柳州宣布独立，截断了广东征滇军的后路，迫使龙觐光缴械投降，粉碎了袁世凯从东南部进攻，以消灭护国军西南大本营的阴谋，严重地瓦解了北洋军的士气，增强了护国军的胜利信心。进入四川的护国军乘机反攻，夺回了失去的阵地，给北洋军以重大打击，使其伤亡惨重，全线崩溃。

从3月下旬到6月6日袁世凯死去为止，是护国战争第三阶段，护国战争从局部停战转入全面进攻。北洋军全部崩溃以后，袁世凯又故伎重演，重新使用辛亥革命时期“南北议和”的手段，玩弄和谈阴谋，妄图以此消灭和瓦解各省护国军势力。3月下旬和4月初，袁利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先后通电各省，“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护国军也因兵员粮弹缺乏，而虚与委蛇，同意在“一、二月内停止战争”。但袁在议和期间，故态复萌，继续出卖国家主权，大借外债，充当战费，因而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许多省份纷纷起兵讨袁，广东龙济光在内有民军突起，外在广西陆荣廷的逼迫下，4月6日宣布独立以自保。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举岑春煊为都

司令，统一领导广西的军事行动，接着浙江也宣告独立。

为了把独立各省的反袁力量进一步联合起来，与北洋军阀政府抗衡，在梁启超的策划下，5月8日，滇、黔、桂、粤四省于广东肇庆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华民国军务院，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

军务院成立前后，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对袁世凯展开政治攻势。第一、二号宣言严正声明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失”宣布依法“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5月9日，军务院通告各国公使、领事：“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就地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由军务院办理”。^①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同时，军务院还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展开全面进攻，全国掀起了反袁斗争的高潮。陕西、四川和湖南也先后宣布独立。

在全国反袁斗争高潮形势下，袁世凯众叛亲离，无可奈何地“径令取消帝制”，“并将拥戴书”焚毁。3月22日，由徐世昌副署，正式宣布取消帝制，护国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袁世凯也因忧惧而死。

护国战争是在进步党，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全国反袁斗争的推动下，联合以黄兴为代表的欧事研究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等共同发动的，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起了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

护国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迅速地推翻了洪宪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恢复了《临时约法》与共和制度，维护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使中国近代史的发展，避免了一次大曲折、大倒退。

^① 《盾鼻集、电报第三》，第26页。

护国战争的胜利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护国军提出了一个鲜明政治口号——护国，亦即维护孙中山手创的共和国，反对袁世凯窃国、卖国、复辟帝制，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因而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是人心的向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建立了一个广泛地反袁斗争统一战线，实现了反袁各个派别，一切反袁力量的大联合，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反袁力量，包括暂时的和动摇的势力，因而才出现了“筹饷出兵，各尽所能，解衣推食，争先恐后”的生动局面。最后，护国军有可靠的根据地，并有实力，扩而大之，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处于举足轻重地位。

当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在这一斗争中，同样存在着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所要打倒的只是袁世凯个人，并不是整个北洋军阀，认为“今日之事，惟袁氏一人实为戎首，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袁氏朝退，兵祸夕解”，^②梁启超多次宣布“袁朝倒梁夕退，此志如山，不能动摇”。^③因而在袁世凯突然死去以后，便认为护国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决定早日收场，致使中国仍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

第三节 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一、护法运动的发动及其失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声中病死，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职务，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由于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的坚决斗争和西南各省的强烈要求，北京政府被迫同意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9月14日，由进步党人和西南军

《蔡锷致唐继尧电》《护国运动资料汇编》（下），第542页

② 《盾鼻集公文第一》，第27页。

③ 梁启超：《致张佩严书》，1916年6月19日《盾鼻集》第61页。

阎建立的军务院宣布撤销。独立各省也宣布取消独立。

袁世凯的败亡，使帝制与全国人民的矛盾得到了解决，政局又暂时归于统一。但是，袁世凯施行独裁统治乃至帝制自为所依赖的反动社会基础和思想，并没有遭到触动和清算。由于政权仍被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控制，约法和国会虽然恢复，仍然有随时被毁弃、践踏的危险。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看到这种危险。他在写给美洲同志的信中说：“袁逆自毙。黄陂依法继任，恢复约法，重集国会，弟即宣布罢兵，以示前之革命，志在护法，而非为利。黎能守法，则目的已达，应令各路军队，一律止战。一方结合在野同志，取监督政府主义，一方筹措工商事业，以图国利民福。”他甚至认为：“共和形式已具，纵非革命党执政，仍不必有所顾虑。要之，既曰共和，则凡赞成共和者皆可执政，吾人只排斥反对共和者。现执政者既为赞成共和之人，纵使非倡发共和制度之主张，或输入共和思想者，仍当望之信之，使展其所能。”^②按照这种想法，中华革命党宣布：“今约法恢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③

事实很快粉碎了孙中山的善良愿望。段祺瑞执政后不久，就与总统黎元洪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形成“府院之争”。黎元洪得到了英、美的支持，段祺瑞以日本为后台。1916年8月1日国会重开后，国会议员也围绕“府院之争”形成两大派别，即以原进步党人为主体的研究系政团和以原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商榷系政团。研究系拥段反黎、投靠北洋势力，商榷系拥黎反段，代表一般资产阶级和南方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商榷系议员为抵制段祺瑞的独裁专断和北洋督军的跋扈，主张将省制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扩大国会权限，研究系议员则反对将省制列入宪法，主张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1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2页。

③ 《民国日报》1916年7月28日。

缩小国会权限，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段祺瑞和北洋督军的需要。由于原国民党人议员居国会多数，研究系的主张遭到抵制，北洋军阀便由后台跳到前台，公开出面干涉国会，攻击国民党人。在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头目的怂恿挑动下，北洋督军先后四次在徐州开会，组成“各省区联合会”（即“督军团”），公然宣称国会“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如宪法有“必不可行之处，当共抒正论。”^②与此同时，北洋督军们还多次通电，攻击国民党人议员是“暴徒”，要求将参加二次革命的议员罢免，反对原为国民党人的唐绍仪、张耀曾等人入阁。北洋督军的猖狂嚣张，完全是段祺瑞操纵利用的结果。当时的报章就曾指出，段祺瑞“别树一帜、三悍将于外，使国会无日不以发生危险之机，以挟持国会，俾国会不得不昵以就已。”^③事实说明，护国战争后得以恢复的国会仍然是徒具形式，约法也仍然是一纸空文。

“府院之争”的激化，终于导致了国会的再一次倾覆。1917年2月，段祺瑞在日本的唆使下提出对德绝交，进而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企图以参战为名取得日本借款，扩大皖系势力。美国担心日本趁机扩大在华势力，捞到好处，便指使黎元洪抵制。3月初，在段祺瑞的主持下，内阁通过对德绝交案，黎元洪拒不盖印，段祺瑞以辞职相要挟，黎元洪害怕酿成激变，又表示同意。国会也在皖系军阀的压力及研究系议员的鼓噪下通过。但当段祺瑞进一步提出对德参战案时，却遭到了朝野的一片反对，不惟黎元洪心有不甘，即是国会中不少赞同对德绝交的议员也认为对德国问题应绝交为止，反对参战。段祺瑞为使参战案通过，一面召集北洋督军进京，以督军团名义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一面祖述袁世凯故伎，于国会5月10日审查参战案时派出大

李剑农：《戊戌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58页。

② 《中华新报》1916年9月29日。

③ 《民国日报》1916年9月4日。

批军警，伪装成“公民请愿团”，包围会场，对议员大打出手。这一事件激起了议员的愤慨，一致决定暂不讨论参战案。原为国民党人的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也辞去阁员职务。黎元洪感到有机可乘，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情况下于5月23日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不甘此挫折，退居天津，策动皖系督军宣布“独立”，准备武力倒黎。黎元洪没有军事依靠，只好同意由张勋入京调停。6月7日，张勋到达天津，会晤段祺瑞后，即以武力胁迫黎元洪于12日下令解散国会。7月1日，又在北京拉出废帝溥仪，宣布清室“复辟”。张勋的这一闹剧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见倒黎和解散国会的目的已达，又摇身一变，宣布“讨逆”。7月12日，“讨逆军”入京，复辟闹剧收场。

张勋复辟垮台后，冯国璋代理了大总统职位，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再次控制了北京政府，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加紧推行独裁政策，拒不恢复约法和国会，并与研究系政客勾结，准备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进行国会选举，建立一个由他一手操纵的傀儡国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缔造的约法与国会再次被北洋军阀抛弃，五色旗上又被踏上了肮脏的一脚。

面对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孙中山再次挺身而出，举起了护法的旗帜。早在段祺瑞策动皖系督军“独立”、威胁要解散国会时，孙中山即致电黎元洪及参众议员，指出“此但威吓行为，断不可长其骄气。”要议员们“与宪法共死生，勿惶遽奔散，稍存让步，以保民国代表之尊严。”^①皖系军阀为达到摧毁国会的目的，一面扬言要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一面放风“拥护总统，解散国会”。孙中山深刻地揭露了这种阴谋。指出，皖系军阀“以保全总统饵黄陂，以解散国会威民党，”“不知国会一散，去中坚而存守府，叛党得挟元首以令全国，反客为主，其祸更甚于反侧跳梁，”“主座守府，叛人秉政，则

共和遗民必无噍类。”他认为，约法是共和的根本，“国会为民国之命脉”，因此，“应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惟一之任务。”^②

皖系军阀借张勋之手摧残民国，而又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的丑恶表演，使孙中山对封建军阀本质的认识有了提高。他指出：“今日之患，非患真复辟者之众，正患伪共和者之多”^③“共和政体，向为旧派人物所反对。若倪嗣冲、段芝贵等为反对共和之人，亦为反对复辟之人；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身淆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④护法与毁法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真正护法就要打倒这些假共和者。由于北京政权已完全落入段祺瑞这些假共和者之手，而南方则是孙中山长期从事革命的地方，西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都曾有过反袁护国的经历，又都因为担心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而附和护法，所以孙中山主张在南方“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⑤1917年7月4日，孙中山致电国会议员，号召他们“全体南上，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纲纪。”^⑥并派人北上接迎。6日，孙中山离沪赴粤，19日到达广州。不久，部分国会议员和海军第一舰队也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来到广州。

8月25日，孙中山主持南下广州的国会议员召开非常国会，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与《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决议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次日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18日，孙中山发表护法通电：“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

②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2、103页。

③④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4、113页。

⑤⑥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110页。

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文虽不敏，于拥护约法，维持国会，实具牺牲之精神，则除依照《军政府组织大纲》，非至约法完全恢复、国会职权完全行使时，断不废止。”^①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护法军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护法战争打响。

护法战争的开始有力地鼓舞各地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力量，推动了护法高潮的到来。川、鄂、陕、皖、浙、鲁等省都有护法力量的响应，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独立军、自主军等名目的反段武装十分活跃，给了北洋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在正面战场湖南，护法军三路进击，与北军鏖战。护法运动的发展加速了北洋皖系与直系的分裂，被段祺瑞派往湖南作战的北洋第八师和第十二师属冯国璋的直系，始而消极怠战，进而停战退兵。护法军于11月轻取长沙，次年1月，又攻占岳阳。

护法战争虽初战告捷，但与护国战争相比，却有着更大的弱点。护法主张的提出，表明孙中山仍然在真诚地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然而，由于封建军阀的践踏蹂躏，资产阶级共和的旗帜已成了一块斑驳陆离的五色布，在人们心目中已消失了神圣性，约法和国会也已不能唤起民众的热情。这就使护法比护国还要脱离群众。在护法运动中，孙中山既未恢复中华革命党的活动，也未对宗派林立、涣散分化的旧国民党进行任何整顿，这又使护法运动实际上处于没有革命政党领导的局面。在非常国会中，同属于旧国民党的政学系、益友社、民友社分化更为严重，政学系已成为直系军阀和西南军阀的政治同盟军。益友社以温和、稳健标榜，朝秦暮楚，实际上是政治投机集团。只有民友社支持孙中山，但人少势孤。影响不大。军事上，孙中山也没有建立起一支真正拥护共和的革命武装，甚至于护国战争中的中华革命军这样的武装也未掌握。他所依靠利用的西南军阀附和护法，一是企图借此自

保，以免被段祺瑞“统一”，一是企图趁机扩大势力与地盘，本来就与孙中山同床异梦，因此对孙中山处处刁难、排挤。根本不理睬孙中山的布署与指挥。护法军攻占岳阳后，武汉空虚，护法军如乘胜进击，武汉唾手可得，但桂系军阀却暗中与直系联络，按兵不动，不仅丧失了这一战机，反而使北军卷土重来，又夺回岳阳、长沙，继而又擅自与直系停战议和。1918年5月，西南军阀勾结政学系议员操纵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虽然仍将孙中山举为七总裁之一，实际是剥夺了他的领导职务。孙中山愤而辞职，离粤赴沪。严酷的事实使孙中山终于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护法军政府完全落入陆荣廷等西南军阀的控制之下，至此，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完全失败了。

二、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中华革命党的改组酝酿，早在护国战争结束后就已经开始。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垮台和共和政体的恢复，使斗争局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建立的革命政权被反动势力篡夺的历史教训，曾把革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并统称为革命时期，在宪政实施之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②这种设想是以中华革命党领导反袁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夺取政权为前提的。但是，反袁护国运动的进行和最后结局，与孙中山的设想有重大的不同，这样，革命程序的实施和革命党掌握“一切军国庶政”的计划失去了可能性，而国会的恢复，又使类似民初那样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局面得以再现。这一变化使孙中山不得不考虑党略问题，以使革命党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1916年国会重开后，孙中山认为：“共和国运用宪法，非有政党万不为功，决不能以散漫之议员活动之也。”中华革命党是秘密的革命团体，在孙中山看来，与普通的政党不同，同时，原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多数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直接在国会中标出中华革命党的名义，有诸多不便。但是，新的斗争又急需新的结合，“今日巩固共和，端赖吾党。故百凡事业，须从党务入手。”^②孙中山决定改组中华革命党。为此，他一面派居正、胡汉民、马君武等人赴北京，在国会中活动，进行组织，一面“编订党纲及重订章程”，着手改组的准备工作。按孙中山的设想，新党要坚持中华革命党的原则和斗争精神，准备采用“中国国民党”或“中华国民党”的名称，以与民初由五政团合并的国民党相区别，表明新党是由中华革命党递嬗而来。^③但是，由于张勋复辟和护法运动的发生，改组工作不得不暂时中辍。

护法运动的失败，给了孙中山又一个沉痛的教训。他认识到，无论是皖系、直系，还是桂系、滇系，都是“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④依靠军阀决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制度。在新的失败面前，孙中山没有气馁心灰，“救国主旨，未尝或息。”他深信：“吾党实系于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是断不能以蹶蹶而磨灭其壮志，犹之操舟逆流，须策群力以相撑柱。……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⑤孙中山决心通过中华革命党的改组来建立一个能肩负救亡重任的革命党，重振国民革命。

多年来革命事业屡遭失败的严酷现实使孙中山感觉到，组织一个真正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首先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8页。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48、321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66—500页。

“吾党同志向多见道不真，故虽锐意于进取，而无笃守主张之勇气继之，每至中途而徬徨，因之失其所守。”为了“除祛其谬误，以立其信仰之基”，^①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在从事改组活动的同时还加紧著述，撰写了《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详细地论述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阐明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知与行的关系，描绘了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号召革命党人克服消极情绪，坚定革命信心。

在孙中山从事改组活动的时间里，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继发生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爱国运动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两个事件都深刻地影响了孙中山，推动了他的改组工作。十月革命发生后，尽管孙中山还不明了这一革命的性质，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坚强的战斗力和取得的巨大胜利，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把布尔什维克党引以为同志。1918年夏，他致电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②五四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人民的新觉醒，也看到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更加坚定了他通过组织革命政党来“重振革命”的信念。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就在上海的一次演说中指出：“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效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③

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同时发布了通告和规约，宣布废止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印章、图记均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原有的中华革命党总支部、分支部、支部按新规约进行组织。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采用总理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0页。

制，由孙中山担任总理，“代表本党，综揽党务。”在上海设立总部，总部分总务、党务、财政三部，由居正、谢持、廖仲凯分别担任各部部长。地方设总支部、支部和分部。

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①把民族主义重新确立为党的纲领，是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人对民族问题认识的一个重要进步，改变了原来那种把推翻满洲贵族专制统治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的片面认识。孙中山明确指出：“民族主义非推翻满族主权便了，须使各民族都平等。”^②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他还指出：“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的恶因。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③因此，孙中山提出要取消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废除军阀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这样才能避免“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孙中山的这些言论表明，中国国民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已与同盟会时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着重要的不同，已经包含了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某些内容。在民权主义方面，孙中山批评了民初在革命党人中颇为普遍的以为民国的建立就是民权主义已达的错误认识。他说：“民国元年那一班革命党人，以为把满清政府推倒，就算革命成功了。这就是没有根本解决的觉悟。所以闹成今日这样田地，其实革命仅作了一半功夫，还没有大成功。”^④孙中山多次强调：“当前中国仅仅在名义上是一个共和国，政权仍掌握在封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7页。

② 同上书，第46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94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7、148页。

建军阀手里，人民是没有自由的。”因此，就必须进行“根本解决”，“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②这个新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③人民施行直接民权；“有普遍选举、立法、免官之权。”这才是民权主义的实现。^④在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再次强调要“防止少数人之垄断土地、资本二者，”^⑤“行资产国有制。”^⑥由上述可见，中国国民党的纲领并不是对同盟会纲领的简单重复，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和丰富。

中国国民党的建立，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坚持民主革命道路、奋斗不息的重要标志。1920年5月孙中山在上海党的本部发表演说称：“我们的责任，以后就在造成一个真中华民国。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所以我们要格外留意，将根本好好培植。”^⑦但是，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并没有如孙中山期望的那样，成为能承担民主革命重任的有战斗力的政党。它的纲领虽比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时期都有进步，但仍然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党内成分复杂、涣散严重的情况也没有因改组而好转。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内五四运动的发生，已使中国革命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后日益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三民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先进思想。五四运动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取代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及其政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63年第1期，转引自广东孙中山研究会主编《孙中山研究》第1辑，第25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7、148页。

③ 《孙中山选集》第5卷，第132、193页。

⑤⑥⑦ 《孙中山选集》第5卷，第163、460、262—263页。

中国国民党没能适应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因而被历史抛在了后面，成了时代的落伍者。

三、中国国民党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

在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变化。1917年11月，北京政府成立了“临时参议院”，次年2月，公布了“国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为了控制国会多数，使国会成为自己任意操纵的工具，段祺瑞授意皖系政客、官僚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刘恩格等人于1918年3月成立了安福俱乐部，以种种卑劣手段将新国会的选举几乎全部包揽。与此同时，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的矛盾也在日益发展。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冯国璋则提出和平统一，并指使湖南前线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1918年6月，直系悍将吴佩孚在湖南与西南军阀订立停战协定，8月，吴佩孚又通电全国，主张和平。直皖矛盾公开化。9月，皖系操纵安福国会将徐世昌选为大总统，把冯国璋赶下了台，双方矛盾更形激烈。1920年7月，直系与皖系终于兵戎相见。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虽然身处孑然无助的逆境之中，但仍坚持救国的理想，认为“吾党责任仍丝毫未灭，吾诸同志仍宜努力奋斗。”^①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决定重新发起武装夺权的斗争。从当时南方的形势看，护法军政府已完全被桂系军阀陆荣廷控制，广东也基本为桂系盘踞。因此，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桂系势力，在广东建立根据地，进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出师北上，力争中原。”^②直皖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即命党人陈炯明、邓铿率粤军自闽南分三路回师广东，驱逐桂系。1920年10月，粤军进入广州，很快又底定广东全境。

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在上海的旧国会议员也纷纷南下。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中国国民党对章程进行了修订，除了重

^{①②}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1、161页。

申三民主义的宗旨外，还规定“以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新的党章还恢复了中华革命党时期关于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和在宪政实现前，“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负完全责任”的规定。^①1912年1月，中国国民党本部在广州特设办事处，2月，又设立广东支部，以加强对革命的领导。这些措施使党务工作迅速开展，“民众及兵士纷纷加入。”^②1921年4月，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召开两院联合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职，发布对内对外宣言。宣言声明，广东革命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政府，以维护民主政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为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革命政府由伍廷芳任外交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

中国国民党在广东建立政权后，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惊恐。北洋军阀加紧与桂系军阀勾结，企图消灭广东的革命力量。退回广西的陆荣廷宣布取消独立，充任北京政府任命的广西边防督办。在北洋军阀的支持下，桂系又出兵广东高州、雷州及郁南、封州等地，妄图卷土重来。为了彻底肃清桂系势力，巩固后方，以利出师北伐，1921年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粤军总司令，率军分三路进攻广西。援桂粤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占领南宁、桂林等地。桂系军队除部分阵前倒戈和被收编外，其余全部被歼，陆荣廷、黄荣新、陈炳焜等人只身由越南逃走。

平定广西后，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8月，非常国会通过了出师北伐的决议案。11月，孙中山亲自率军北上，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取道湖南，彻底扫除北洋军阀势力。但是，北伐的计划却遭到了陈炯明的抵制。陈炯明在回粤、援桂两次战役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01—402页。

②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第112页

中势力得以坐大，渐生野心，企图割据两广，已成为新军阀。桂林大本营建立后，孙中山决定由陈炯明主持两广和接济北伐所需的饷械。但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指示阳奉阴违，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湖南地方军阀赵恒惕暗通声息，阻挠北伐。当孙中山下令调集广东兵力准备开拔时，陈炯明不仅抗拒命令，而且将在桂粤军抽调回粤，对北伐掣肘时，对北伐的供给也以各种借口拖延。1922年3月，拥护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车站遭到枪击，不治而死。局面变得更为复杂。

鉴于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决定改道江西北伐。1922年4月，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等职，将大本营移到韶关，自己坐镇广州，以胡汉民代理大本营事务。5月，北伐军进入江西，连克赣南诸县，并攻占重镇赣州。陈炯明被免职后，前往惠州，托名养病，暗中加紧策划武装叛乱，在他的授意下，粤军总指挥叶举将大批粤军调入广州。6月16日，陈炯明公然发动叛乱，发炮猛烈轰击座落在观音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在卫队护卫下仓促出走，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斗争。北伐军在得到广州国民党总部的急电后，迅速回师讨贼，但在韶关一带失利，不得不撤向湖南、赣南一带。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持斗争达两个月之久，终因孤立无援，又一次离粤赴沪。

这次突如其来的惨重失败使中国国民党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中。祸起肘腋，也使孙中山极度苦闷徬徨。但是，“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晚年的伟大跃进，中国国民党也因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四节 近代政党政团在新、旧国会和约法之争中的派系化合

一、研究系的出台与政治上的失意

研究系是1916年8月国会重开后形成的以原进步党人为主体的政治派别，其政团名称为宪法研究会。

护国战争中，进步党人与国民党人曾一度实现反袁的大联合，但在袁世凯败亡、北京政府宣布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后，这一联合便迅速瓦解，形成了新的对峙与斗争。这种对峙与斗争主要表现在重开后的国会之中，

护国战争结束后，鉴于舆论对民元、民二的党争多有诟病，进步党的要人梁启超、汤化龙先后发表“不党宣言”，宣称“现当国基再造之始，一切建设问题，当合全国优秀人士以协议一致解决之，若树党相峙，实有百害而无一利，”要求“从前党帜一律消除”。但在实际上，进步党却积极组织力量，秣马砺兵，准备建立“坚固无形之党，”来控制即将重开的国会。在国会恢复的前后，梁启超几次要求进步党人组党，“左提北洋系，右挈某党一部稳健分子，摧灭流氓草寇两派。”^③所谓某党，即指国民党，所谓流氓草寇，即指以孙洪伊为首的已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离异的部分进步党议员和田桐、马君武等中华革命党议员。

1916年8月1日国会正式开会，进步党议员随即开始组织活动，他们表示：“目前虽暂不标政党名义，然必须有一名目，方足招致同人，”“大都主张速将机关成立，惟党名固不可标举。”^④

① 《盛京时报》1916年6月27日。

② 《申报》1916年7月1日。

③ 《致熊铁崖、刘希陶电》（1916年8月21日）《护国之役文电稿》。

④ 《申报》1916年8月23日。

8月22日，汤化龙、刘崇佐召集进步党议员 90 余人在安庆会馆开会，决定建立宪法案研究会。31 日，举行正式成立会。发布了《宣言》，宣称要“以自由精神按国情、察外势、据学理以研究宪法案，以期成良宪为宗旨，”表示要不挟偏见，不偏理想、不囿历史、不局内情从事制宪活动。^①与此同时，以王家襄、陈国祥、蓝公武、林长民、籍宗寅等进步党骨干为首 180 余人则于 9 月 2 日成立了宪法研究同志会，也宣称要“祛党见以集众思，”“研究宪法，举其所得以供国会参考。”^②9月12日，宪法案研究会与宪法研究同志会又宣布合并为宪法研究会，“研究宪法及其它重要政务。”^③两会的合并，固然是因为两会中人“先天本是一气”，^④但根本的原因则是与前此三天成立的国民党议员的政团宪法商榷会相抗衡。合并后的宪法研究会在国会中拥有议员 200 人左右，^⑤其机关报为《时事新报》和《晨钟报》。

宪法研究会成立不久，就在省制入宪问题上与原国民党议员政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国会的宪法审议会自 9 月下旬起开始审议《天坛宪草》，10 月，开始讨论地方制度问题。宪法商榷会等原国民党议员政团主张将省制列入宪法之中，省长民选，认为这样可以划清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中央与地方可分负国家的责任，养成人民自治的习惯。研究系强烈反对省制入宪，在 10 月 20 日的审议会上，汤化龙、郭仪等研究系议员提出，“如果主张将省制加入宪法，于此时必招出外间之政治上之恶潮，不但省制加入宪法一层不成问题，并要累及宪法之前途。”^⑥会外，宪法研究会还发布了《省制另定宣言》，认为省制入宪有驰于极端、偏于急

① 《晨钟报》1916 年 9 月 2 日，

② 《申报》1916 年 9 月 4 日。

③ 《晨钟报》1916 年 9 月 15 日。

④ 《申报》1916 年 9 月 17 日

⑤ 《盛京时报》1917 年 1 月 18 日。

⑥ 《申报》1919 年 10 月 14 日。

就、徒生枝节、强争胶粘、欲速不达、窒碍益多等六大弊端。^① 双方争持激烈，虽经中立政团多次协商调停，仍无法妥协。在 12 月 8 日就省制入宪进行投票表决时，研究系议员与属商榷系的益友社议员竟然大打出手，使议会成了武场。事后，研究系公开通电各省督军，指斥益友社，并以不出席宪法审议会进行抵制。^②

研究系反对省制入宪和省长民选，是与北洋军阀相呼应的。商榷系提出省制入宪的提案后，不仅段祺瑞控制的国务院称省制入宪“有百弊而无一利”，^③ 北洋督军们也纷纷反对。在国会讨论省制问题之前，就有十六省督军联名通电，反对国会在制宪时“以不适合国情之条文草率加入 致酿异变。”^④ 10 月 29 日，张勋、倪嗣冲又通电声称，省制入宪特别是省长民选，是“举地方行政悉陷于党争之旋涡，邦域于以分崩，中央失其统驭，危亡之兆，此为历阶。”^⑤ 因此，研究系与商榷系的这一斗争，实质是拥护还是反对北洋军阀集权独裁的斗争，正如当时的舆论所指出的那样：“以最浅近者言之，省制加入宪法问题，凡欲扩张民权者义不当不赞成，而欲扩张官权者又势所不欲赞成。”^⑥

在 1917 年春围绕对德外交出现的政潮中，研究系也追随于段祺瑞之后，充当了北洋军阀的政治工具。研究系不仅“绝对主张对德绝交，”而且“绝对主张对德宣战”。^⑦ 梁启超多次发表谈话，要求“各方面此时均应牺牲意见，一致翊赞政府。”^⑧ 在《外交方针质言》等文章中，他大谈参战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对外之关系，遂廓然开一新局。”^⑨ 研究系还正式发

① 《晨钟报》1916 年 10 月 30 日。

② 《盛京时报》1916 年 12 月 13 日。

③ 《大公报》1916 年 10 月 29 日。

④ 《晨钟报》1916 年 10 月 17 日。

⑤ 《申报》1916 年 10 月 4 日。

⑥ 《民国日报》1916 年 10 月 26 日。

⑦ 《晨钟报》1917 年 5 月 7 日。

⑧⑨ 《大公报》1917 年 2 月 14 日，5 月 13 日。

布了《对德外交宣言》，并在国会中发起“外交后援会”，“一致赞成政府外交方针之必要”，为段祺瑞的对德方针大造舆论。研究系力主参战，固然是看到了德国败象已露，企图在外交上投机以邀时誉，壮大自己的声势，但主要目的则是以此来压制自己的政治敌手。梁启超就曾对段祺瑞表示，对德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部分活动余地。”^②

段祺瑞摧残国会的活动也得到了研究系的紧密配合。皖系军人政客策动的“公民请愿团”围攻国会的事件发生后，国会中“各派同愤，虽赞成政府者亦多声言必反对。”^③研究系却顽固坚持拥段立场。“公民请愿团”的闹剧刚一收场，研究系即表示“对德宣战，则吾国在地球上之国际地位问题，且即为目前之国家存亡问题。吾辈本有主张，亦不应因一时愤激有所变动。”^④梁启超极力为段祺瑞剖白：“以段总理之明，此等无意识之举动，事前当不预闻。”要求国会“认定题目，勿将外交内政并为一谈 籍此为快心任性之资料”将宣战案“速予通过。”他还居心叵测地告诫“反对段总理个人者，尤宜放松一步，勿越逼越紧，激出事端。”^⑤但在实际上，研究系却惟恐事端不速。5月18日，研究系以“现在政潮剧烈，感情激盈，轻率议宪异常危险”为由宣布停止出席宪法会议。^⑥这个通告对于已决心踢开国会的督军团来说，不啻是指明了向国会发难的口实所在。次日，督军团即通电指斥宪法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条款是“暴民专制”，“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⑦紧接着又具呈黎元洪，要求将国会

《大公报》1917年5月7日。

《致段祺瑞函》（1917年3月7日）转引自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第57页

③ 《民国日报》1917年5月12日。

《晨钟报》1917年5月12日。

⑤ 《大公报》1917年5月13日。

⑥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0日。

⑦ 《大公报》1917年5月20日。

“即刻解散”。研究系也于同时发布了“对宪法之意见书”，诬称宪法修正案有五大弊端，“足以召国家永乱。”^②这种鼓动于前、呼应于后的活动表明，研究系是段祺瑞摧残国会的同谋。

参战风波使府院矛盾迅速激化。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依恃美国公使和国会中商榷系政团的支持，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段出走天津，策动皖系督军独立。张勋复辟后，段又利用全国人民对复辟的强烈反对誓师讨逆再度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大权。段祺瑞的这些活动，都有研究系的谋划奔走。为抵制黎元洪对段祺瑞的罢免研究系议员先是在国会中提出质问，声言“政府违背约法发布命令，逾越宪政正轨，”^③继之又纷纷辞职南下，使国会无法开会。北洋八省督军宣布独立后，研究系发表通电，攻击商榷系政团“以政权之渴热，借国会为武器，府院之争，国会之争，操纵挑拨，几无宁日。”“...乃至至今将帅称兵，万方抗命，元首受蔽，不能自保，国会自杀，万无可救。”^④公开为北洋军阀摧残约法与国会的罪行辩护。研究系要人齐集天津，参与“讨逆”戎机，梁启超、汤化龙任段祺瑞的“聘任参赞”，“军中文告皆出其手。”^⑤研究系主办的《晨钟报》也由京迁津，而且满篇“我军”如何如何，俨然有段氏机关报的气概。

张勋复辟垮台后，段祺瑞再度出任国务总理。由于翊赞有功，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范源濂等研究系要角被拉入内阁，分任财政、内务、司法和教育。外交总长汪大燮虽非研究系，但曾属进步党，与研究系也算是较有渊源，内务与财政两次长也由研究系把持。这是研究系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认为“此次内阁，

① 《民国日报》，1917年5月22日

② 《晨钟报》，1917年5月21日。

③ 《晨钟报》，1917年5月27日。

④ 《大公报》，1917年6月3日。

⑤ 华党明《进步党和研究系》，《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虽非完全政党内阁，然已可谓为极近于政党内阁。”梁、汤等人在向研究系大会报告入阁情形时说：“今兹入阁，实为吾辈政策有实现之希望。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今后之进退，一视吾辈之政策能否实现为断。”汤化龙表示：“树政党政治之楷模，为今日吾人重大之责任。”^①研究系的“政策”就是利用皖系军阀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建立一党内阁，把持政权。为此，研究系以“国会业已解散，宪法亦已中止，已与旧民国灭亡无异”^②为由，反对恢复旧国会，建议段祺瑞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选举法和组织法，然后召集新国会，从而彻底排除原国民党人。研究系还决议恢复旧进步党，“实行大进步党主义之结合”，争取国会多数席位。^③梁启超则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计划，准备大大施展一番。

然而研究系很快发现，一党内阁不过是一场一厢情愿的幻梦。研究系虽为皖系摇旗呐喊，效力颇多，却不为皖系信任。段祺瑞重握北京政府大权后，便与交通系紧密勾结，将研究系冷落一旁。皖系与交通系官僚政客则对研究系排斥打击。还在梁、汤入阁之初，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靳云鹏即向段表示：“政客最无气节，而研究系尤甚。今日因小节可取，一经引诸肘腋，他日必为彼所利用。如公而不为彼所利用者，则不难叛公而去。”^④对梁启超出长财政一席，徐树铮、曹汝霖等人尤为不满，“急欲去之使交通财政打成一片，将中国之命脉握之手中。”^⑤因而与研究系明争暗斗。梁启超上任后不久，即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千万日元的善后续借款合同，准备用于币制改革。梁主张“此次一千万之借款，决计专用为维持中交两行票价之用，决不挪于别种

《晨钟报》，1917年7月27日。

《盛京时报》，1917年8月1日。

③ 《民国日报》，1917年8月17日。

⑤ 《民国日报》，1917年7月30日、9月7日。

用途。”^①而徐树铮等人则企图以此为“南方用兵之费”，对梁的主张大为恼火，“谓其掣肘”。^②皖系与交通系“授意各省，不分军政民政，一概向财部要钱”，^③“并以种种之牵制，使财政棘手”，^④梁启超穷于应付，焦头烂额，币制改革终成纸上谈兵。对于梁、汤主掌的财政、内务两部的用人行政，皖系与交通系也大加干涉，策动北洋督军通电指斥梁、汤“用人失当，不合舆情。”^⑤与此同时，皖系的舆论机关也开始攻击研究系，研究系决议恢复旧进步党后，皖系的喉舌《公言报》即著文称：

欲立足于现政治者，必须首先承认吾之理想为绝对的与现政治不相容。苟自愿捐弃其平昔之理想而能专依乎事实一方，慢慢谋其籍手者，则可进而参预今之政治。此时若犹有所谓党纲党见，党之政策，党之意思存于其间，其结果必至全办不到，而内失感于当局，外受责备于本党，即彼反对之敌，亦将以矛攻盾，抚掌笑于其旁。”^⑥对于皖系与交通系的活动，研究系也进行过反击。1917年8月，曹汝霖、章宗祥与日本政客西原龟三共同筹划，设立中日汇业银行，经理日本对华借款的汇兑。梁启超以其有发行纸币权，足以紊乱金融，有损中国主权而“大出反对”，^⑦使该行成立一度搁浅。

研究系入阁之初，曾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表示支持。汤化龙对日本共同社记者谈话说：“若南方派极力反对，诉之武力，不得已惟有用兵而已。”^⑧随着与皖系关系的恶化，研究系也改变了拥段的態度，主张“优容异派，调和以诚，共趋治道。”^⑨对于

① 《大公报》1917年9月4日。

② 《盛京时报》1917年9月9日。

③⑤ 《盛京时报》1917年10月5日。

《民国日报》1917年9月7日。

⑥ 《公言报》1917年8月30日。

⑦ 《盛京时报》1917年8月1日，《大公报》1917年8月26日。

⑧ 《大公报》1917年7月27日。

⑨ 《晨钟报》1917年12月4日。

段祺瑞以参战为名，出卖利权向日本大量借款的行动，研究系也颇为不满。梁启超“于书面及口头屡屡告其友人，谓目下政府所为之事彼不负责任，并向人保证，彼已洗净其身。”^①研究系拥段态度的反复，使其处境更为难堪：“激烈派不吾谅，以吾党之预见而疑为阴谋；武力派复不吾谅，以吾党之旁观而喧为畏葸。”^②徐树铮甚至“大骂梁、汤，谓为反覆小人，谓其利用北洋派打国民系，得意以后乃欲自树一帜。”^③在这种情况下，梁、汤等人遂表示：“与其尸位备员，不如去之。”^④1917年11月，段祺瑞因川湘战事失败而被迫辞职，研究系阁员也随之辞职。

研究系下野后，汤化龙、林长民赴日、美考察，1918年9月1日，汤在加拿大温哥华遇刺，梁启超宣言不过问政治，致力于文化学术研究。由于失去了核心，研究系此后便日衰一日。1918年8月安福国会召开，由于安福系的倾排，研究系只获得20余席位，在新国会中已成为无足轻重的小派别。政治上，研究系反段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公开抨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举不贲之债，增不律之兵，至于倾国破产而不恤，”^⑤并与直系和南方护法力量中的政学系结纳，主张南北停议和。^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安福国会亦为直系解散。1922年6月黎元洪任大总统，下令恢复旧国会，研究系议员又分为若干小的团体，宪法研究会名义虽存，但不惟没有发展，连旧日气象也未能恢复。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贿选总统，研究系议员除个别有气节者外，多接受贿赂，甘为“猪仔”。1924年国会重遭解散，研究系也随之消失。

① 《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8日。

② 《晨钟报》日1918年3月20日。

③ 《盛京时报》1917年9月9日。

④ 《晨钟报》1918年4月30日。

⑤ 《晨钟报》1918年8月15日。

⑥ 《1919年南北议和资料》、《近代史资料》专刊第1号，第280页。

二、商榷系的组合与分裂

护国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国民党人并未认识到代表世凯而起的段祺瑞政权仍然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军阀政权。相反，他们普遍认为“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应该“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①而国会的恢复，又使得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幻想再度出现。因此，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一样，也秣马砺兵，组织力量，力图控制国会。在上海举行的国会议员谈话会上黄兴表示：“凡今日有新思想之同人俱结合一致，成一真正民党之大团体，以与腐败官僚相抵抗，非是则国基万无巩固之一日也。”^②孙中山也指出：“共和国运用宪法非有政党万不为功，决不能以散漫之议员活动之也。”^③

1917年8月国会开幕，国民党议员即开始了结合活动，至9月初已形成了两个政团。（一）石驸马大街张宅。国会开会后，国民党议员张继认为：“今日之国会自宜暂持不党主义以示广大，便于接近他派，可期合力造成中华民国。惟一盘散沙，若无统一办法，将来议事进行必多阻碍”，^④遂于其寓所召集国民党议员开会谋划，渐成一派。对外仅标张宅而无正式名称。核心人员有张继、谷钟秀、吴景濂、王正廷、张耀曾等。成员主要是国民党议员中的稳健派。（二）丙辰俱乐部。由居正、马君武、田桐、白逾桓、高旭等人发起，9月6日成立。成员主要是中华革命党议员及国民党的激烈派分子，宣称以“使国家趋于法制轨道”为宗旨，^⑤“以纯然在野的关系研究将来之宪法及一切政治问题。”此外，从进步党中分化出来的孙洪伊、丁世铎、温世霖

① 《民国日报》1916年7月28日。

② 《中华新报》1916年7月29日。

③ 《申报》1916年7月15日。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8页。

④⑤ 《民国时报》1916年8月24日，10月6日。

《盛京时报》1916年9月8日

也在此时组织了韬园，与上述两政团接近，成员中也有部分国民党人。

国会召开后，拟于9月下旬召开宪法会议，审查民二国会制订的《天坛宪草》。为贯彻自己的宪法主张，进步党议员先后组织了宪法案研究会、宪法研究同志会等团体，在宪法会议中出现两军对垒的局面已势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议员又开始谋求新的组合。9月初，国民党议员200余人在张宅开会，张耀曾、诸辅成等人提出：“目下任何一派议员不能占两院多数，且无论任何两派议员之结合，亦不能占绝对多数，故宜广为结纳，”

“设一讨论宪法之团体。”这一倡议得到了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的赞同。9月9日，张宅、丙辰俱乐部、韬园三派议员380余人在北海公园集会，决定“联合组一大党”，^②定名宪法商榷会，“以交换意见，促宪法之速成为宗旨。”^③

宪法商榷会成立后，很快与由原进步党议员组合而成的研究系产生了矛盾与斗争。

1916年10月，国会的宪法审议会开始讨论地方制度问题。在此之前，商榷系议员白逾桓、吕志伊、杨铭源等人已提出省制加入宪法的修正案，主张在宪法中规定地方制度，省长应由省议会选举，再由总统任命。省议会可对省长弹劾，由参议院审查后咨大总统执行。省长可咨总统解散省议会，但须经参议院同意。省议会与省长的争执呈请总统交参议院裁决。^④在商榷系议员的坚持下，省制入宪问题被列入了宪法审议会的议程。在审议中，商榷系议员又进一步指出，欧美共和制度国家，其宪法中无不有关于地方制度之条款，中国以共和立国，自应效法欧美，以省制入宪，实行省长民选，才可奠定地方自治之基础。^⑤但是，商榷系

《民国日报》1916年9月11日，

② 《申报》1916年9月11日。

③ 《盛京时报》1916年9月17日。

④ 《申报》1916年10月1日。

⑤ 《民国时报》1916年10月21日、10月23日。

的这一主张遭到了研究系的强烈反对。研究系认为，中国地方制度本不确定，倘偏于急就，订入宪法，一但发生变动，则根本动摇。而且省长民选必为各省督军反对，强事胶粘易惹起政潮。因此应于宪法制定后，再以制宪之手续制定省制。^①双方争持激烈。10月底至12月初，宪法审议会就省制应否入宪及省长应否民选数次投票，均因研究系的反对而未果。在12月8日的投票中，商榷系议员与研究系议员竟然互相殴斗，打作一团。

商榷系省制入宪主张的核心是强调地方自治，加强省议会与国会的权力，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实质是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在护国战争中，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势力得以发展，并与国民党人关系较为密切，商榷系也企图通过省制入宪和省长民选来加强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地位，使国民党人有所托庇和发展。商榷系议员曾指出：“二次革命之发端，即为争省长民选。……此次西南起义，人人均抱一联邦主义，以推倒袁氏，恢复共和。今之主张省制加入宪法，省长民选，犹是贯彻始旨。盖中国久为一官僚政治，非从根本上改革不可。”^②由于反映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商榷系的主张也得到了不少省议会的支持。

宪法商榷会虽然集合了两院中多数原国民党议员和部分原进步党议员，在国会中占有优势地位，但本身并非组织严密的政团，而只是几个政团的松散联盟。商榷会建立后，加入其中的丙辰俱乐部、韬园等团体并未取消，1916年10月19日，张宅又正式标出益友社名义。^③而且，“商榷会之议案，对于会员之出席国会时，不发生拘束力，仍由会员自由发表意见。”^④在省制入宪问题的斗争中，商榷系各政团虽都赞同省制订入宪法，在国会中也有所配合，但从未以商榷会的名义提出政见，对省制问题的主张

① 《晨钟报》1916年10月30日

② 《申报》1916年11月1日。

③ 《大公报》1916年10月21日。

《民国时报》1916年10月21日。

④⑥⑧ < ÑúÈĜ̃j̃: 1617 Äê, ÔÂ4 ÈĖ̃, 3 ÔÂ9 ÈĖ̃, 2 ÔÂ ÈĖ̃

布对德方针后即开会议决：“对于政府之对德外交一致赞助。”^①益友社表示“与德绝交，一致赞同”，但对德宣战“须俟协约国有确实保障条件后始同意。”^②3月10日和11日，众参两院分别讨论段祺瑞提出的对德绝交案，会前两政团均发出通告，要求各自所属议员出席投票赞成。^③由于益友社与政学会的支持，段的对德绝交案得以在国会通过。

对德绝交宣布后，宣战问题又成为国会中争持的中心。此时国会内外反对参战的舆论日益强烈。在对德绝交前，孙中山就致电国会，反对参战主张，^④对德绝交后，又致函民友会，要求阻止参战案的通过。^⑤伍廷芳、陈锦涛等社会名流，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商会团体也通电表示不赞成加入战团。受这种形势的影响，原商榷系各政团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益友社认为对德问题应绝交而止，反对宣战；政学会中也有不少人因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对战局影响难以逆料及“政府前日所希望之条件尚未十分进步”^⑥而对应否宣战怀疑，经几次激烈争论后，该会终于“以数人之差”否决了参战主张。^⑦

益友社与政学会态度的变化，使国会中反对参战的主张占了优势。总统黎元洪凭借原商榷系议员的支持和美国公使的撑腰，也对参战持反对态度。段祺瑞为了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对德宣战，于4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督军会议，以督军团的淫威施加压力，当这一伎俩未能奏效后，便于5月10日国会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参战案时策动所谓的“公民请愿团”围攻国会、殴打议员，上演了一场丑剧。这一事件激起了原商榷系议员的强烈愤慨，一

《民国日报》1917年2月16日。

② 《民国时报》，1917年3月12日。所谓保障条件，系指段祺瑞向协约国提出的如中国对德宣战，协约国应允许中国的加关税和缓付庚子赔款两项条件。

③ 《民国日报》1917年3月13日。

④ 《中华新报》1917年3月9日。

⑤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 页

《民国日报》 年 月 6日。

⑦ 《中华新报》1917年5月11日、12日。

致表示：“政府非自行引退或严惩所谓公民团之首要，则国会决不再开常会。”^①5月19日，在原商榷系议员的动议下，众议院通过决议，缓议参战案，先行改组内阁。政学会阁员张耀曾、谷钟秀也辞去了阁员职务。

段祺瑞在阴谋败露后，便彻底撕下伪装，决心踢开国会。在段的指使下，督军团向黎元洪具呈，以宪法会议通过的宪法条文不善、将导致“暴民专制”为借口，要求解散国会。研究系也于同时声明指斥宪法有种种弊端，并以不出席宪法会议为抵制。5月23日，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段退居天津，策动皖系督军武力倒黎。黎元洪无力应付，只好请张勋入京调停。结果引狼入室，导致了国会的再度解散和复辟的发生。

在这一段险风恶浪中，原商榷系政团的表现各不相同。民友会在倪嗣冲等皖系督军宣布“独立”后发表宣言指出，公民团事件及督军团干涉国会、干涉宪法，完全是段祺瑞一手策划，因而免去段的总理职务完全合法。北洋督军据地兴兵，非法解散国会、推翻约法、变更国体，“皆为叛逆”，“只应声罪致讨，决无宽假余地。”表示“万不能因武力压迫而有丝毫屈挠以长叛徒之焰。”^②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后，民友社成员几乎尽数参加，成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益友社与政学会则被军阀的武力威胁所吓倒。益友社发表的宣言表示，要“下以最后之决心于二读会未决各问题更容纳他派之意思。”^③所谓他派之意思，说穿了就是按照北洋督军的意思来确定宪法，以换取国会的生存。政学会对段祺瑞摧残国会、破坏约法的罪行不敢置诸一词，却貌似公正地宣称：“回溯一载以来之恶因，……无论何方，悉应承担一部分之责任。当首蠲私臆，互自内省。”^④这表明，这些政团比民

《民国日报》1917年5月18日。

② 《盛京时报》1917年6月20日。

③ 《民国日报》1917年6月11日。

《大公报》1917年7月7日。

初的国民党更为软弱，更少革命性。益友社与政学社议员在后来的护法运动中与西南军阀勾结，堕落为纯粹的政客集团，是有其必然性的。

三、政学系的形成及其活动

如前所述，1916年国会重开后，国民党议员于9月9日组成了宪法商榷会。商榷会中包含有韬园、丙辰俱乐部、益友社（前身为张宅）三个政团。益友社由国民党议员中的稳健派组成，内部又隐分为以张继、王正廷、谷钟秀为首的三个小派别。

商榷系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对段祺瑞的集权独裁及研究系的拥趸活动有所抵制，深为段祺瑞所不满。段祺瑞挑动北洋督军对国会施加压力。在段的怂恿下，张勋、倪嗣冲等北洋督军于1916年9月召开徐州会议，公开宣称：“公府阁员均以国会为武器，今非铲除其武器，政局不得安宁。”^①北洋督军对国会的干涉威胁引起了商榷系议员的不安。以孙洪伊为首的韬园派议员提出将直系首领冯国璋选为副总统，联冯制段。益友社中张继、吴景濂一派也认为冯国璋“坐镇东南，共和复活，厥功甚钜。即以目前现状观之，皖徐之鼓动而实力仅止于开会，冯氏威望维持之力居多，”附和韬园的主张。但谷钟秀、张耀曾一派对此不满。在益友社开会讨论时，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会后，谷、张一派即以张继、吴景濂等人“受人利用”、“不守党纪”为由，决定另行组织。^②

1916年11月20日，谷钟秀、张耀曾等人在江西会馆召开大会，宣布政学会成立。到会者250余人，讨论通过了会章。会章规定政学会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最高机构为会员总会，设主席、副主席及包括正副主席在内的15人组成的干事会，

① 《大公报》1917年1月14日。

② 《民国日报》1916年10月4日。

③ 李根源：《我与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85页。

另设财务、内务、外交、军事等科调查会。^①大会确定四项主义作为宣言的内容；（一）对于政权取恬静主义；（二）对于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三）对于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四）对于各政团取亲善联络主义。^②政学会成立后，推举张耀曾为主席，谷钟秀、纽永建为副主席，^③以《中华新报》为舆论机关，在国会中约有 120 个席位。^④

政学系是商榷系政团中的右翼力量，在省制入宪、对德外交方针、公民团事件及国会解散等政潮中，它比商榷系的其它政团更易于妥协，越来越背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倾向与军阀势力勾结，已如前述。在此后的护法运动中，政学系的这一特点更为明显。

1917年6月国会因被张勋解散，多数国会议员南下津、沪。张勋复辟失败后，重掌政权的段祺瑞拒不恢复国会，孙中山坚决反对段祺瑞对约法与国会的蹂躏，发起护法运动。原为商榷系的民友社、丙辰俱乐部、益友社及从益友社中分立的政余俱乐部议员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赴广东参加护法斗争，而政学会议员却有相当数量滞留京津。1917年8月初，京津政学会发表宣言，宣称护法与毁法的斗争“是非何尝之有”，“本会对于今兹时局任何方面之行为动作绝对不参预，”“对于政治上活动非至正式国会选举时绝对不着手进行。”^⑤政学会以中立标榜，提出“有条件的恢复旧国会”企图调和南北。所谓“有条件的恢复旧国会”即“召集旧国会，专议宪法及修改国会组织法，两事既毕即宣告团会。”^⑥但此时段祺瑞已决意重造一为已所用的傀儡国会，而且已有研究系供其驱使，无须政学会为之奔走，对政学会的调和

① 《民国日报》1916年11月23日。

② 《申报》，1916年11月24日。

③ 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8页。

④ 《民国日报》1917年5月7日。

⑤⑥ 《民国日报》1917年8月7日，7月21日。

根本不放在眼中。在作调人无望后，政学会议员才有部分加入非常国会的活动。但谷钟秀与张耀曾仍然“仆仆于不南不北之风尘中，”不肯赴粤。

南下后的政学系很快就与西南军阀特别是陆荣廷勾结在一起，将老牌政客岑春煊奉为首脑。政学系与岑、陆的勾结，既有政治的因素，又有历史的渊源。西南军阀为自身的利益附和护法，并非真正拥护共和。陆荣廷“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②“其它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③因此，西南军阀在护法的同时又与直系军阀暗通声息，准备妥协。政学系的态度与西南军阀一致，“对于恢复国会亦认为不妥，不甚主张恢复，惟口中不敢明言耳”。^④谷钟秀等人也与直系督军李纯、陈光远结托联络，鼓吹“有条件议和。”在护国战争时期，政学系要人多任职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如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冷遹为参议厅长，杨永泰为财政局长，钮永建与谷钟秀任驻沪军事代表和政治代表，而抚军长则是唐继尧，副抚军是岑春煊，陆荣廷、陈炳焜等均任抚军。^⑤政学系也一直以陆荣廷为依托。1917年4月陆入京，张耀曾在政学会欢迎会上致词说：“政学会同人与陆公关系最切，而崇拜陆公者亦最久也。政学会同人中，或与陆公起义之前身共患难，或于起义之后亲效奔走，以故陆公之人格事业知之最真，敬之最笃。”^⑥有这样一层关系，政学系更是与陆、岑等人一拍即合。

在非常国会中，政学系人数不多，但由于有西南军阀的撑腰，却十分嚣张，处处以军政府的反对派自居。对孙中山组织军

《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4日。

②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页。

③ 《马风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

《晨钟报》，1918年3月23日。

⑤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第585页。

⑥ 《民国日报》1917年4月10日。

政府，他们认为时机尚早，“不敢曲从”。对孙中山任大元帅。他们认为“中山为民国元勋，共和先导，其对西南应持之态度，宜遇事推功而不与争功，尽力匡扶而不为牵制，庶易于收拾人心，保持其元老之地位。”甚至对非常国会本身也加以非难：“盖人数即不足法定之额，则机关之意思无从表示，若强为表示，亦不生法律之效果……。我日以护法为标榜，以非法责人，乃自蹈于轶法之行为。”^①

在非常国会中，政学系是西南军阀打击孙中山的工具；在非常国会之外，政学系则是西南军阀排斥孙中山的策士。护法军政府成立后，陆荣廷、唐继尧“虚以委蛇”，拒不就任元帅之职，暗中却积极策划另立机关，与军政府分庭抗礼，于1918年1月15日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西南联合会议。20日，又公布了《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联合会议名义上是“为拥护约法、保障国会，征讨祸首、戡定内乱，巩固统一之基础，敦促宪法之成立”^②而组织，但从其条例来看，则俨然为与军政府抗衡的另一政府。政学系是这一阴谋的积极策划者和参与者。岑春煊居于幕后，派人游说、密函疏通，“极力促成。”^③汤漪等人则在非常国会中大力鼓吹：“西南各省同为自主之主体，同为独立之政府，地位处于平等，责任期于同负，固无别设军政府之必要，”^④“欲谋统一大计，西南义军应设联合大会，俾团结各方实力，为一致之主张。”^⑤联合会议的条例即是他的手笔。^⑥据当时报章的揭露，政学系所以亟亟于此，是因为“其时陆巡阅使尚养痍于武鸣，未肯出而领袖群雄、主持大计，故欲藉此会议以催促之”。^⑦

西南联合会议出笼后，遭到了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坚决抵制和揭露。各省代表及滇军部分将士一致反对。被推为外交总代

《晨钟报》1918年4月16日。

② 《民国日报》1918年1月8日。

③ 《马风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

④⑤ 《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日、11月25日、1918年1月26日。

⑦ 《晨钟报》1918年4月16日。

表的伍廷芳和军事总代表之一的程璧光也拒不就职。联合会议只好草草收场。但政学系并不甘心，紧接着又策划了改组军政府的阴谋。在联合会议实际流产后，政学系又提出“将联合会与军政府并合，改为联合政府。”“所据之理由，谓军政府无实力以统一西南各省，故不得不藉此转圜，以期一致进行。”^①1918年2月，钮永建致电西南各省，大谈设立统一机关为时势所趋、“万难搁置，似未便再行拘泥”的老调。^②汤漪为此专门起草了“联合政府组织草案”，并附有说明：“军政府有政府之名而亡其实，联合会议有政府之实而名不符。……兹为统一护法主要势力，将军政府与联合会议合并为一机关。”^③在政学系的鼓动下，2月2日，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在海珠邀集军政府、非常国会、广东督军署及各省代表开会，“以军政府及护法联合会双方组织为问题，议定双方合并改为联合政府。”^④会后，在汤漪的“联合政府组织草案”基础上拟定了《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中心内容是将军政府原来的单独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取消大元帅一职，设政务总裁若干人组织政务委员会，总裁地位平等、责任相同。护法各军仍旧派出代表组成联合会议统筹作战计划，其议决事件由政务委员会执行。^⑤唐继尧、刘显世、程潜等人纷纷致电赞成，甚至计划要孙中山“历聘友邦，以敦睦谊。”

孙中山坚决反对改组军政府，多次通电号召尊重国会、拥护约法。为了揭露政学系与西南军阀的阴谋，孙拟于4月11日“邀集议员诸君茶话，说明意见。”^⑦但非常国会中的多数派益友社议员在政学系的拉拢利诱下，已与政学系沆瀣一气，竟抢在孙中山的茶话会前一日召开会议。会上，政学系议员李述膺、李自芳、与益友社议员诸辅成、邓元等43人提出改组军政府组织案，

②③ 《民国日报》1918年2月26日、2月27日、4月12日。

④ 《大公报》1918年2月18日。

⑤ 《革命文献》第4辑，第394页。《民国日报》，1918年4月19日。

⑥ 《民国日报》1918年4月26日。

⑦ 《民国日报》1918年4月28日。

获多数赞成，遂付审查会审查。在次日的茶话会上，孙中山严正指出：“军政府视国会如君父，国会之决议，军政府无不服从。顾如昨日所提议之改组军政府，为军政府本身之存亡问题，而国会事先绝未征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平？且以法律而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夫今欲行多头制。又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明规定本大纲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完全行使职权时废止，无修改之明文，今日何以自解？”^①“改组即是使护法根本动摇。”^②在5月4日的国会非常会议上，民友社议员有人表示改组是“造法违法”，也有人提议将改组案“候至正式国会成立再行提议。”^③但政学系议员却诡辩说，原军政府组织大纲制度不良，非修正不可，政务会议是战时内阁的变通，不是多头政治，“黎大总统辞职问题尚未依法解决，今日诚无设元首之必要。”任何法律均可修正。^④5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改组案的二读会，这时孙中山为抗议政学系与西南军阀的阴谋已通电辞去大元帅职，辞职书由居正在会上宣读。民友社议员秦广礼、吴宗慈等人以孙中山辞职“则西南护法无人”提议缓开二读会，先讨论孙中山辞职案，并通电各省挽留，而政学系议员却蛮横表示：“今日之二读会万难变更也，”^⑤并以退席要挟。在会下，政学系也竭力对孙中山进行攻击污蔑，谓“孙中山为西南统一之梗，长、岳之败，尤为中山独负之罪。”^⑥由于政学系及桂系的运动，非常国会竟于5月18日通过了军政府组织法。20日又选举政务总裁七人，随后，陆、唐等人又将岑春煊推为主席总裁。21日，孙中山愤而离粤赴沪。政学系的阴谋终于得逞，护法运动也因之断送。

《革命文献》第4辑，第23页。

② 《民国日报》1918年4月28日。

③④ 《晨钟报》1918年5月16日、17日。

⑤ 《晨钟报》1918年5月17日。

⑥ 《民国日报》1918年6月19日。

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为陆荣廷和政学系把持，政学系要人均担任了重要职务，李根源任参谋长、章士钊任秘书厅长、王有兰为总务厅长、冷遁为内务次长、文群为财务次长、汤漪、彭允彝等为军政府参议、金兆棧、李述膺等为军府秘书。杨永泰虽未入军政府，却谋得了广东财政厅厅长一职，不久又出任了广东省长^①。在1919年的南北和议中，南方的11名代表中，政学系就占了5名。

然而，政学系的这一好景并未能维持多少时日。在南北和议的反反复复中，政学系与桂系企图以牺牲旧国会来谋求与北方妥协的活动，引起了旧国会中不少议员的不满。原来倾向政学系的中间派议员渐与政学系离异。1918年9月，旧国会在广州召开正式会议，继续审议宪法，政学系议员即与益友社、民友社议员发生尖锐矛盾。政学系唯恐宪法制成为南北妥协造成障碍，便以各种手段进行抵制，乃至拒不出席会议，致使宪法会议不得不宣告停开。政学系在旧国会中自然也失去了控制力。1920年3月，李根源与李烈钧发生了争夺对驻粤滇军控制权的斗争，李根源失败，政学系又少了一个武力凭借。此时的军政府也摇摇欲坠，孙中山和唐绍仪已分别于1919年8月和10月宣布辞军政府总裁之职。二李争兵后，伍廷芳也离开广东。军政府只剩三总裁。1920年6月2日，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合宣言，以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宣布军政府政令无效。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孙中山决计发动第二次护法斗争，命令党人陈炯明率驻闽粤军回粤，驱逐桂系。1920年10月，陈炯明率军进入广州，桂系势力退回广西，军政府也于10月24日宣布解散。政学系树倒猢猻散，纷纷离粤赴京、沪。1922年直奉战争后，直系将徐世昌赶下台，拉出黎元洪复位，旧国会再度恢复。政学会先是组织了几个小政团，政治上拥黎反直。1923年3月又重整旗鼓，召开成立大会，但不过是昙花一现。是年6月，直系首领曹锟将黎元洪驱逐，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84—85页。

政学系议员因拥黎的关系也多离京，星流云散。自此，政学系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交通系的形成及其归宿

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政治派别，但它与同期的其它政党、政团不同，它既无正式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机构，也无宗旨、政纲，更没发表过什么具体的政见。它人数无多，没有在政坛上进行过多少直接的政治表演，但对这一阶段的政争与政潮演进却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交通系的形成是与清末铁路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自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帝国主义就展开了对中国路权的争夺，投资筑路。清政府为“自强求富”，也开始借款筑路。到1911年清亡为止，中国已有铁路9600多公里，其中由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为3700多公里，中国借款兴建、赎回自办和自筑的为5900多公里。由于管理路政的需要，清政府于1905年设立了铁路督办大臣一职，次年又设立了邮传部，并专设了铁路总局，由梁士诒任局长，叶恭绰佐理局务。清末的轮、路、邮、电四政中，以铁路的收益最为丰厚，因而梁士诒也获得了“财神”的称号，权势日渐炙手。1907年，梁又奏请设立了交通银行，经理四政收入及铁路借款，梁的权力又大为扩张。到1911年，由铁路总局管辖的铁路已有京汉、沪宁、京奉、京张等十一条。梁士诒利用他对路政和交通银行的把持，大批位置亲信，并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形成了以他和叶恭绰、朱启钤、龙建章、关赓麟、赵庆华、关冕等人为核心的一股势力，这便是交通系的滥觞。

在清末，交通系虽“月以八十万归北洋”^①而得到袁世凯的垂青，与北洋势力勾结到了一起，但它在政坛上发挥影响、直至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还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① 《叶遐庵先生年谱》第24页。

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重新起用袁世凯，梁士诒也成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积极参与者，他不仅“居中筹划一切”^①而且直接参加了北洋势力的逼宫活动。正因为梁士诒为袁世凯篡权立了大功，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长。1912年5月，梁士诒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叶恭绰为副经理。交通系的权势急剧扩张，不仅将交通部门的实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财政部门也入其彀中。1912—1916年，梁士诒两度代理财政部务，周自齐也两次出任财政总长，朱启钤则连任三届内阁的内务总长。

交通系是袁世凯统治的主要财政支柱。梁士诒所把持的交通银行享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的特权，而且资本雄厚，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因此袁世凯对梁士诒“恒以财政事相属。”^②交通系也竭力为袁世凯效力。1913年善后大借款后，梁士诒代理财政部务，发行国内公债2500万余元，提出国币条例，统一国内币制，将全国铁路统归交通部管理。这些活动为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加强和稳固提供了财政基础。在政治上，交通系也不甘寂寞。1913年9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梁士诒、叶恭绰等人发起公民党。公民党的成员除了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小政团外，主要是交通系政客，交通部的职员几乎全数加入。公民党完全是袁世凯的御用党，它的全部活动就是使袁世凯尽早被“选”为正式大总统。这个目的一达到，公民党也就无形解散了。

交通系把持财政、插手外交，权势日益膨胀，甚至各省军政要人进京活动也要走梁士诒的门径。引起了袁世凯手下另一批官僚政客的不满，也使袁世凯对交通系渐生疑忌。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继而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并解散国会后，便开始削弱交通系的权力。1914年5月，袁世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取消了总统府秘书长一职。将由朱启钤兼任的交

①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卷上，第100页。

② 同上，第132页。

通总长一席畀诸梁敦彦，不久又将周自齐由财政总长改任农商总长，在梁敦彦的压力下，叶恭绰也辞去了交通次长职务。交通系其它被免职或改任者达数十名。1915年6月，袁世凯又指使亲信发动铁路大参案，直接牵涉到叶恭绰、赵庆华、关冕钧、张弧等交通系要人。以周学熙、杨士琦为首的一批皖系政客趁机“摩垒大呼”，对交通系大加攻击，遂使交通系“岌岌乎有旗靡辙乱之势。”^①

为了挽回颓势，重振旗鼓，交通系变换方针。一方面，鉴于英、美在华势力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削弱而日本在华势力增强，交通系由亲英美转向亲日；一方面极力迎合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需要，“动之以万世一系之利，许之以运动收买之资。”^② 1915年9月，梁士诒策动发起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从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手中抢过了拥戴的旗子，向参议院请愿，演出了一幕丑剧。袁世凯帝制活动的花销，也“皆挪诸交通银行。……现银不足，更滥发纸币以应之。”^③ 正因为交通系为袁世凯称帝竭尽全力，所以又东山再起，重为袁所任用倚重。周自齐与叶恭绰官复原职，朱启钤任大典筹备处处长，梁士诒则准备出任“洪宪朝”的第一任宰辅。

袁世凯帝制的垮台，给了交通系一个沉重的打击。护国战争发动后，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4月22日，由段祺瑞组阁，交通总长一席委诸亲日派分子曹汝霖，这是新交通系的发端。6月，袁世凯死去，南北重新统一，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逃到香港，这就为曹汝霖把持交通部门大权，造成新交通系的势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曹汝霖一到任即大量裁撤属于梁、叶一派的人员，任用自己的亲信，“自树一种新地盘。”^④ 虽然南北统一后的内

② 《民国日报》，1917年4月20日。

③ 《民国日报》，1917年8月2日。

④ 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64页。

阁中，曹未长交通，但他于1916年底出任交通银行经理，仍握有实权。1917年7月张勋复辟垮台后，段祺瑞再度组阁，曹汝霖也再度出掌交通部，直至五四运动后才被迫下台，其间还一度兼任财政总长。在他的经营下，很快形成了以他和陆宗舆、章宗祥、曾毓隽、丁士源、吴乃昌为首的官僚政客集团，时人称之为新交通系。而原来的梁士诒、叶恭绰一伙，则被称之为旧交通系。

新交通系是亲日势力。曹汝霖上台后，积极鼓动皖系军阀段祺瑞采取“近交”、“善邻”政策，投靠日本来统一中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在华势力有所减弱，日本的在华势力迅速扩张，皖系段祺瑞政府也决心以日本为靠山来加强其独裁统治，武力统一南方护法省份。所以新交通系与皖系一拍即合。皖系政府以出卖中国各种利权来换取日本的支持和借款，而新交通系的首脑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则“为中日两国政府之居间人，……切借款无不经其手。”^①1917年8月，曹汝霖、章宗祥与日本政客西原龟三共同筹划，设立了中日合资的汇业银行，经营中日借款的汇兑。1917年至1918年间，由西原龟三积极活动、新交通系经办的日本政府对段祺瑞政府的公开和秘密借款就达1亿4千5百万日元之多，而段祺瑞政府则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的满蒙五路、吉、黑两省的金矿、森林抵押给日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允许日本派出军官为段祺瑞训练军队。1918年3月和5月，由新交通系牵线，段祺瑞政府又与日本政府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取得了在满蒙、山东的驻兵权。上述表明，新交通系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和工具，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卖国贼。

新交通系不仅以财政支持和日皖勾结的居间人而被段祺瑞依为左膀右臂，在国内的政潮中，新交通系也直接出马，作段祺瑞

^①《晨钟报》1918年7月18日。

的与党。1917年11月，段祺瑞因其武力统一政策遭到直系督军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人的反对而被迫辞职，曹汝霖、陆宗舆等人与皖系督军一起，向直系首领、代总统冯国璋施加压力，同时又邀请西原龟三迅速来华，以表示对段的支持并劝告段祺瑞复出。^①在这种压力下，直系只好让步，段祺瑞再次出任总理。新交通系还与皖系的御用党安福俱乐部勾结，以大量金钱供其贿选新国会议员，同时扩充自己的势力，“以活动于立法机关，”使新国会几为安福系包办。新交通系也得到了六、七十个席位。^②之后，新交通系议员与安福系议员又将徐世昌选为大总统，将冯国璋排挤出北京政府。

旧交通系在梁士诒等人失势后，并没有迅速瓦解。由于经营多年，盘根错节，又与英美有较深的渊源，新交通系上台后，一时还无法将旧交通系势力完全清除。新旧交通系明争暗斗，颇形激烈。叶恭绰以交通次长之职，对曹汝霖、陆宗舆的活动多方掣肘甚至拆台，而曹、陆对叶恭绰也是极力排挤与打击，“自西原龟三来华与曹、陆共任借款，关于财政部者，吴鼎昌皆曾参与，关于交通部者，叶恭绰不得与闻。”^③“凡一公事，总长准者次长必驳，总长驳者次长必准，及之次长之所准驳者，总长亦反其道而行之。”^④1917年底，曹与西原议定以日款修筑浙江至福建的铁路。此次借款为十足借款，而叶恭绰在合同中并不注明折扣与佣金问题，亦未标明“机要”，因而曹未审阅即送日本，^⑤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不满，曹只好“停止造路”。^⑥

为了挽回权势，东山再起，旧交通系的残余人马一方面向皖系拉关系，一方面也积极投靠日本，与新交通系争宠。段祺瑞在天津组织讨逆军时，梁士诒曾垫资100万元，作讨逆军总司令处的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272页。

② 《晨钟报》1918年9月12日。

③ 《晨钟报》1918年9月11日，9月18日。

⑤ 当时不标明“机要”的文件，交通总长并不审批。

⑥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205页。

临时经费。^①1917年11月，梁士诒又去日本访问，与日本一些对西原把持中日借款大权不满的财阀建立了联系。在旧交通系的活动和日本财阀的影响下，1918年2月，冯国璋下令取消了对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铃等人的通缉。由于旧交通系在亲日上已与新交通系无别，皖系也对旧交通系予以重视。1918年6月，梁士诒又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8月安福国会开幕，他被选为参议院院长，朱启铃为副议长，不久周自齐被委诸币制局总裁，叶恭绰任实业专使，梁、叶还将安福国会中的旧交通系议员50余人组成一个政团“侨园”。^②这一时期旧交通系颇有中兴的气象，但实际上不过是回光返照。旧交通系的骨干人物，如周作民、胡筠、钱信云等人，早已集于新交通系的麾下，交通部门的实权也不在梁、叶等人的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政局的变化，导致了新旧交通系的没落。美、英等国对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竭力扶植皖系、企图独霸中国的行为早已衔恨在心，在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就曾主张组成新的银行团。实行统一对华借款，反对日本以借款支持皖系进行国内战争。^③大战结束后，英、美、法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停止对皖系的单方面支持，采取与其一致的对华政策，同时加紧扶植直系和西南军阀，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对抗。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1918年9月，日本内阁换马，新上台的原敬内阁反对原内阁的对华方针，主张在对华侵略上与英美协调一致，并决定暂停对华借款，对已成立的借款中的政治借款行即停止，经济借款中性质不明、难以偿还或目的在于挪为他用者也一律停止。^④这样，新交通系作为皖系取得日本借款的“居间人”的特

《民国日报》1917年8月4日。

② 《晨钟报》1918年8月12日。

③ 《申报》1918年10月20日。

④ 《申报》1918年11月13日。

殊地位便不复存在。曹汝霖也被迫辞去了交通银行经理的职务。而且，由于卖国罪行罄竹难书，曹、陆与章宗祥为国人切齿痛恨，在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激起的五四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将三人免职，新交通系实际上于此便寿终正寝。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直系与奉系联合控制了北京政府。日本政府大力扶植奉系军阀，因而旧交通系的周自齐与叶恭绰又出任财政总长与交通总长。直系无力排除亲日势力，也就勉强接受。1921年12月，在日本的支使下，奉系又拉出梁士诒组阁，以周自齐长交通，旧交通系的另一干将张弧长财政，企图再建亲日政权。直系在英、美的支持下，以梁士诒指使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对山东问题向日本退让的罪名向梁士诒攻击。梁士诒虽于1922年2月辞职，但直、奉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尖锐。4月终于演成一场恶战，奉军败北，直系独掌了北京政府大权。随即下令通缉梁士诒、叶恭绰等人，于是旧交通系也在政坛上匿迹消声了。

五、安福系与安福国会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国会问题成了各方注意的中心问题。旧国会中反段力量占据多数，在对德外交上与段多次对抗，段祺瑞当然不愿其恢复。但国会又是共和制度的象征，段以维护共和而讨伐张勋，又以“再造共和”自诩，又不能不要国会。于是，段祺瑞接受了研究系的献策，决定先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然后依据新法召集新国会。这样，既可排除反对力量，又可便于操纵控驭，一举两得。

1917年9月，北京政府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命令。11月正式在北京开会。临时参议院议员均为各省军政长官推选，而各省督军、省长多属北洋派人物，所推选的人自然唯段祺瑞之命是从。所以很快即按段的旨意修订了国会组织法与选举法，1918年2月由冯国璋正式公布。随后，北京政府又设立了筹备国会事务局，

开始筹备新国会的选举。皖系官僚政客认为：“国会行将成立，我北洋派在国会中不可不占最有势力地位。盖此次之国会，关于大总统及副总统之选举及宪法之制定，均为极重大之事件，且不可不将此议案通过于国务会议。故此次在国会占优胜地步一举，关系于北洋派之命运至为重要。”^①由于研究系与皖系已离异，直系与皖系也矛盾日深，皖系急于直接操纵即将来到的国会选举，以便控制国会多数，倾排异己，进一步巩固皖系对政权的把持。因此他们提出：“现政府对于此事不可不与以最大之援助，”“组织一绝大有力之政党。”^①

早在1917年秋、冬间，皖系政客王揖唐、光云锦、臧荫松、刘恩格等人就经常于北京西城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宅聚会。随着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国会选举的筹备，梁宅便成为皖系官僚政客活动的一个据点。操纵选举以及“组织大政党并关于此种运动，均在此数椽屋内密商一切。”^②1918年3月7日，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刘恩格等人在梁宅开会，决定成立安福俱乐部，以3月8日为正式成立日。所以取安福俱乐部名义，据安福系成员刘振生回忆，是因为梁宅地处安福胡同，“安国福民，名词很好，”^③遂定是名。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人马日渐增多，遂于太平湖设立分部，组织机构也日渐完备。总部下设干事部、评议会与政务研究会，分别由王揖唐、田应璜、李盛铎负责。干事部下又分交际、会计、文牒、庶务、游艺诸课，其中的重要人物有曾毓隽、王郅隆、刘恩格、乌泽声、克希克图等人。^④安福俱乐部虽以政党自命，却一无党纲，二无宗旨，也未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见或主义，“只以三数军人政客，欲增长一部分势力，慷慨解囊，制造多数议

《盛京时报》1918年4月12日。

② 《民国日报》1918年4月12日。

③ 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109页

④ 刘冰天：《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120页。

员，谋运用新国会之便利，以逞其雄踞政权之野心。”组织上也只有本部，“而各省不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一党员。”^①完全是一个为谋求派系私利和个人权势而苟合的官僚政客集团，毫无政党精神可言。名义上，安福俱乐部以王揖唐为首脑，而真正操纵其活动的，则是段祺瑞的亲信兼门生、号称“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款项支配、政治运用，悉听其指挥。”^②尽管皖系并非尽为安福系中人，但安福系确为皖系的政治骨干力量。

安福系为把持国会选举而纠合，所以在国会选举开始后，即“分遣党徒驰赴各省，极力运动，实行垄断选举之计划。”^③据当时报章的披露，安福系“先令各省代表将有当选资格者开具履历呈之某大政客，再行转呈某大司令，审查无异，批一可字。”^④“这里的某大政客，即指王揖唐，某大司令，即指徐树铮。选举中，安福系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丑闻层出不穷。用于贿选的经费达数百万元，票价自二百元至上千元不等，因而被当时的舆论称为“收买选举票之大商家。”^⑤徐树铮亲自坐镇指划，拟定人选，电令各地的党羽以行政力量干涉，务令当选。^⑥至于伪造选民册、冒名投票、涂改选票，伪造选票等舞弊情形，更是比比皆是。不仅原国民党人悉被摒除，就是曾为皖系盟友的研究系也遭到抵制和排挤。通过“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⑦安福系几乎垄断了新国会的席位。在参、众两院470余名议席中，安福系占了330余名。其余则为交通系、宪法讨论会系和研究系。由于新国会几为安福系包办，所以被时人称为安福国会。1918年8月12日安福国会开幕后，王揖唐、刘恩格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交通系

《安福祸国记》，《近代稗海》第4辑，第241页。

② 《晨钟报》1918年9月17日。

③④ 《民国日报》1918年5月9日。

⑤ 《晨钟报》1918年6月21日。

⑥ 《徐树铮电稿》第195、203、205—206、192页。

《申报》1918年7月1日。

的梁士诒、朱启钤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其后梁、朱辞职，又补选李盛铎与田应璜。这样，国会的首脑也完全为安福系包揽。

安福国会召开后的第一件要政是总统选举问题。这时皖、直两系在和、战问题上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直系首领、代理总统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进行抵制，使段对西南护法势力的军事进攻一再失败，皖系决意利用安福国会将冯赶下台，选出皖系的领袖或为皖系所用的人来担任总统。为了不至进一步激化直皖矛盾，皖系抬出北洋派元老徐世昌为候选人，并决定在倒冯后，段也辞去总理职务。但就在这时，时局却突然发生了变化。1918年8月，直系悍将吴佩孚等前敌将领发出主和通电，要求先行解决时局问题，反对选举总统，直系的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通电附和，使皖系合法倒冯的计划面临夭折的危险。皖系为确保不生变故，决定加速组织总统选举。于是安福系议员纷纷出面，充当倒冯的先锋。8月27日安福系众议员60人提出《两院从速会合定期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选举案》，29日，安福系参议员也提出《迅速组织总统选举会案》。与此同时，安福系还在本部召开会议，决定以9月4日为选举日，并投票“预选”徐世昌为总统候选人。在安福系议员的活动下，两个提案及选举时间均获通过，9月4日终于将徐世昌选为大总统。在副总统选举问题上，安福系还继续施展阴谋，企图以南下督战为条件，将直系的曹錕选为副总统，借以分化直系，继续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但由于直系和旧交通系及研究系的反对，最后未能实现。

徐世昌上台后，虽然在不少政务上听命于安福系，但又不甘心完全为安福系操纵，暗中倾向直系，赞同南北议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英、美等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影响，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有所改变，表示要与英、美一致行动。国内反战呼声日

益高涨，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团体纷纷成立。在这种形势下，徐世昌的主和倾向越来越明显。段祺瑞辞职后，徐世昌以同样具有主和倾向的钱能训代理总理。10月23日、24日徐连发两道表示和意的命令，11月16日又正式发布停战令。安福系极力破坏北京政府的和平方针，扬言将在国会中否决钱内阁，否则必须选举曹锟为副总统。继而又威胁要对钱内阁提出弹劾。只是由于列强驻京使团的出面干涉，安福系才勉强同意与西南议和，召开和平会议，但又向徐世昌与钱能训提出维持总统的绝对地位、不得修正或废止安福系立命安身的现行国会组织法与选举法、宪法须斟酌并容纳地方意见等条件，^①作为同意钱内阁的交换和议和的原则。

1919年2月南北议和开始后，安福系与皖系极力破坏和议的进展，在陕西停战、裁撤段祺瑞掌握的国防军、停止支取参战借款等问题上，安福系与皖系多方掣肘，横生梗阻，使和议数次中断。4月，南北代表开始商讨国会问题，双方意见虽有差异，但都倾向于以宪法解决国会问题，承认旧国会二读通过的宪法条款有效，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通过三读，宪法完成后新旧国会同时解散。安福系对此大为光火，立即对和会发起猛烈攻击，指斥北方议和代表朱启钤“企图瓜分政权”、“为不公正之主张。”对南京制宪、新旧国会同时取消或按旧法重新召集国会之议“绝对不能赞成。”^②安福系拼力活动，又是谒见徐世昌，又是质询钱能训，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以贯彻其保存新国会的主张。安福系议员330余人还联名通电，声称“国会系国家立法机关，断非行政委任人员所能议及。倘若越权擅议，则紊乱国宪，摇动国本，必有尸其责者。”^③在安福系的压力之下，钱能训内阁也不敢坚持原来的主张，声言维持新国会，不赞成以旧法召集新国会或在南京召开旧国会。^④安福系的阻挠与破坏，使和议为之顿挫。

① 《晨报》，1918年12月10日。

②③④ 《申报》1919年4月14日、4月20日。

南方代表见和议无望，也转变态度，提出八项强硬条件，其中包括宣布黎元洪于1917年6月13日发布的解散国会命令无效一项，北方表示万难接受、议和终于破裂。

南北和议破裂后，安福系更为跋扈，钱能训内阁在安福系的攻击下终于倒台。徐世昌拟以其亲信周树模继任，也由安福系的反对而成画饼，不得以而由龚心湛兼代。然而时仅三阅月，龚又为安福系排挤去职。继龚而出的靳云鹏本为皖系中人，但与徐树铮矛盾很深，此时又与直系、奉系靠近，力主与南方议和，因而也遭到安福系的全力倾排，以至于哀叹“一步不能发展，一人不能任用，一事不能顺手办理。”^①与此同时，安福系还极力扩张本派与皖系的势力。1919年6月，在安福系的鼓动要挟下，北京政府向众院提交《西北筹边使官制案》，这一官职完全是为徐树铮而设，“徐树铮野心，本欲以蒙古为根据地，养精蓄锐，以待天下之变。故筹边使官制，总揽军民要政，规模宏大。”因野心过于明显，此案提出后，直系大起反对，奉系亦因徐树铮有以西北为基础染指东北的企图而唆使东三省议员抵制。但安福系议员“合力拥护，一日连开三读会，迅速通过，不容外人置喙。”^②徐出任后，掌握边防军三师四混成旅的兵力，不仅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一切大权归其所有，即是有关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等地事务也可插手。此时的安福系，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但是，在嚣张气焰下面，安福系却面临严重的危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皖系因多年卖国祸国成为舆论攻击的中心，作为皖系羽党的安福系自然也难以置身局外。新交通系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被免职，对安福系更是一大打击。但最大的危机则是直、皖交恶的进一步激化。直系吴佩孚在1918年4月与西南停战并通电主和后，又于8月与西南订立了军事同盟，将其军队北撤。至1920年3月，以直系为核心的直奉八省同盟正式形成。 4

① 《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6日。

② 《安福祸国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40页。

月，八省联盟在保定会议，决定以安福系开刀，向皖系发难。^⑥ 6月，吴佩孚通电指斥安福系“毒痼四海，腥闻于天，”声言安福当道则国难难平，卖国党不除则不能长治久安。^⑦ 同时又提出解散安福系、将徐树铮、王揖唐及安福系三总长免职。^⑧ 皖系与安福系则挟持徐世昌，下令将曹、吴免职。直、皖双方都积极动员军队，终于于7月14日打响。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而告结束。随着皖系的败北，安福系这个与皖系一起殃民祸国、狼狈为奸的官僚政客集团也到了末日。直系控制北京政府后，即明令惩办徐树铮等安福系十大祸首。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7日，又通缉安福系重要分子。以安福系为骨干的安福国会也不得不于8月30日宣布闭会。

第五节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与旧民主主义革命

一、资产阶级政党的登台与历史的进步

政党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阶级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大工业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及其斗争充分展开，在这种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和政治发展，开始组织政党，以统一阶级的力量和行动。这是欧美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般情形。但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而且还是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探求如何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国独立富强的产物。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产生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自19世

① 《晨报》，1962年6月22日。

② 《吴佩孚正传》第1编，第28页。

纪60年代起西学便大量被引进中国，政党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词汇开始形诸报章书牘。尽管他们对西方政党与政党政治的认识还很朦胧，但已隐约地感觉到政党、政党政治与西方的富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认为西方政党竞争“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剂于平。”^①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危难的进一步加深，把维新派推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企图以君主立宪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因而对西方的政党与政党政治进行了广泛的介绍。他们指出，立宪政治与政党活动“犹如鸟有双翼”，^②政党“可以使暴政绝而不行，民情无微而弗达。”^③慑于封建专制淫威的压力，维新派没能直接揭橥政党的旗帜，而是大力宣传和组织学会，从而出现了一个学会林立的壮观局面，这些学会或以救亡图存相号召，或以保国保种为宗旨，可以看出明显是受了近代政党观念的影响。其中的个别学会，如保国会、南学会，已经具有了政党的某些特征。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为目标、政党自然成为他们斗争的利器。革命派认为，为了“革独裁专制之乱政，脱压抑羁绊之巨祸，享平等自由之幸福，操代议监政之实权”，就必须“结成一公党为彼野蛮政府之劲敌，”^④革命派建立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已是政党的雏形。1905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胜利，为政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环境。民国的建立使民主潮流势如洪水，各种名目的政党、政团应运而生，“集会结社，犹如疯狂，

①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66页。

② 《时务报》总第1145页。

③ 《清议报》第78号。

④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35页。

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 中国资产阶级普遍认为建立政党，实行政党政治，是维护共和、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道路，成为独立昌盛之国的必然途径，“欲巩固国家，莫如发达政党。”^①“巩固共和”成为各政党宗旨政纲不可或缺的内容。

上述过程表明，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是民主革命推动的结果，并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而发展。同时，它又是作为救亡图存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作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组织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出现，是近代历史的重大进步。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也促进了民主革命和救亡图存的斗争。资产阶级政党一产生，就成了时代的中心。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②辛亥革命所以是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在于它采取了政党的组织方式和领导方式，以党纲的形式提出了一条较为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政党揭露了民族危机的深重，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卖国罪行，号召推翻这个卖国的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它们把各种反清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胜利。立宪政党虽然不赞成暴力革命，但它们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启蒙宣传和在国内发动的具有一定群众性的立宪运动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革命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政党，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政党的进步作用依然在继续。随着民

① 《善哉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1期。

② 《远生遗著》卷2，第9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国的建立，政党热潮兴起。纷纭而生的民初政党尽管有病态，畸形，甚至个别者只是政客的集合，但是从主流看，仍是资产阶级政党，它们的活动是辛亥革命后高涨的民主政治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推动着这一潮流的发展。各政党以国会为舞台，进行了场有声有色的民主宪政的试验，而“最足以表示立宪国之特征者，则莫如政党之竞争蓬蓬勃勃。”各政党发抒政见，批评时政，畅所欲言，政党政治第一次由理想变为实践。出现了一段较为民主的政治生活。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促进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解体，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政党也对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当然，在这一方面，政党的表现并不相同。革命政党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临时参议院和国会中，它们运用掌握的权力，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进行了抵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中央，也存在于地方，所谓“无省不党，无党不争”^②不仅是政党之间的竞争，也包括以革命政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政党与地方封建军阀、封建势力的斗争。在地方议会中，各党议员以民选代表的身份抵制当地都督的跋扈，监督地方财政，十分活跃。民元、民二年间，直隶、河南、湖北、吉林、甘肃等省议会中，都发生过这种斗争，以至袁世凯不得不承认：“近来各省议会掣肘行政。已成习惯。”^③当共和制度遭到摧残时，革命政党奋起抗争，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反袁护国斗争、护法运动。这些斗争虽然大都失败，但对封建军阀的专制独裁仍然有所遏制。革命党人屡仆屡起的斗争精神也鼓舞了人民群众，提高了群众的民主觉悟。立宪政党的道路曲折一些。辛亥革命后，立宪政党很多时候与革命政党相对立，与北洋

《消极的政局观》、《民谊》第8号。

② 《筹备国会事務局致江西都督电》，《政府公报》第172号。

③ 顾敦鏊《中国议会史》，第188页。

军阀站在一起，它们企图借军阀之力来与革命政党竞争，发展党势，最后使封建军阀也“听命于我”，“左右天下”。^①但当它们感到幻想破灭，连它们立命安身的共和制度也受到根本威胁时，立宪政党也有所斗争，进步党于之袁世凯，研究系之于段祺瑞都是这种情况。总体上来看，立宪政党的这种斗争是从属性的，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资产阶级政党基本上同仇敌忾，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这些事实清楚地显示出，从辛亥革命胜利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领导和推动民主革命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资产阶级政党。

二、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的异同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从踏上历史舞台起，就形成了两支队伍：革命政党和立宪政党。如果说在初期两种政党的界限还不十分清晰的话，那么在1905年后则泾渭日益分明，甚至曾成为尖锐对立的两个营垒。在此后十余年的政治历史中，几乎每一阶段都有两个营垒冲突与联结留下的深刻痕迹。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两军对垒的情况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殊的发展道路决定的。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洋务派的倡导和新式企业丰厚利润的刺激下，开始有人投资于新式企业，从而产生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些入当中，一部分来自官僚、地主、大商人或买办，他们由于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密切，经济力量发展较快。但这种密切的联系又使他们政治上有较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不满，主张加以改革，以便能参与政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但他们又反对暴力革命，惟恐革命带来“暴乱”，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这部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0、601页。

分人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立宪政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另一部分人则是中小商人、小官吏和手工作坊主。他们经济力量脆弱，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少，没有得力的靠山，因而发展缓慢。他们较痛切地感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强烈，妥协性较小，他们希望通过革命为自己的发展打开一条宽阔的道路。这部分人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革命政党是他们的政治发言人。

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各自不同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分野。

坚持以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革命政党基本的一贯的主张，也是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的本质区别。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推翻清政府的口号和纲领，同盟会成立时，不仅将革命要求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而且确定了组织国民军的计划，拟定了军政府的宣言。革命党人认为，要救亡图存，避免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要建立一个富强独立的中国，就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政党彻底认清了清统治者的反动本性，对它不抱幻想，下决心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革命政党一方面与立宪政党展开思想交锋，驳斥了反对革命、鼓吹改良的种种谬论，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一方面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前仆后继，屡仆屡起，终于迎来了武昌起义成功，反清革命的总爆发。革命政党的活动“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革命政党斗争坚决，方向正确，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主导力量。

立宪政党则不同。它们反对以革命手段来推翻清统治。它们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712页。

认为中国人民素质落后，没有共和的能力，因而革命不但只能带来“内乱”，还会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瓜分，是亡国之道。它们不愿与腐朽的清统治者断然决裂，幻想清统治者能够认清大势，翻然觉悟，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就这一斗争目标来说，立宪政党与革命政党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为民主共和也好，君主立宪也好，都属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具有数千年君主专制历史的中国，如果不彻底否定君主制，势必会给封建势力留下极大的藏身之地。而且，冥顽不灵的清统治者，也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把权力拱手交给资产阶级。同时，中国人民群众也不允许那怕是形式上让这样一人“洋人的朝廷”再维持下去。因此，立宪政党的主张两头碰壁，不存在现实性。这是立宪政党主张必然失败的原因。与革命政党相比，立宪政党显得过于怯懦，缺乏作为新兴阶级代表应该具有的勇气和历史主动性，集中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它们为抵制革命而进行的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弭革命的作用。

但是，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又都是近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党代表，这就决定了它在对峙中有同一，在斗争中有联结。

首先，二者的斗争锋芒是同一的，都是对准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政党主张武装斗争，建立共和制度，立宪政党设想无血破坏，实行君主立宪，这样两种方案有现实与不现实的不同，有反封建的较彻底与不彻底的差别，但是在目标上又是一致的，说到底还是两种模式的对立，而不是两个阶级的对立。它们都认为，腐朽的清封建专制制度决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予以改变。因而它们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

其次，在反帝爱国方面，二者也具有同一性。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都是在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下开始各自的政治活动的。革命党人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份，这

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造成这种瓜分险境的正是清政府的卖国投降，因此救亡就必须革命，推翻清统治。立宪党人也指出，中国的路权、财权、练兵权、用人权无不为列强把持，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已使中国各地分别成了各国的“囊中之物”，人民成为“俎上之肉。”^②列强如此猖獗，是因为专制制度黑暗闭塞，“政府孤立上，人民漠视于下”，因而国力不厚，难以抵御外侮。^③图存的方法就是要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二者甚至在反帝方面的弱点也十分相似，都对帝国主义缺乏本质的认识，不敢正面提出坚决的反帝主张。在收回利权为主旨的爱国运动中，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更是互相配合，共同斗争。

第三、二者活动的客观作用又具有同一性。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的对峙对各自的力量发展有过牵制和削弱，但更多的时候是二者分道扬镳，平行发展。这种平行发展的政党活动具有相同的客观作用。立宪政党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因而反对革命，但它们为开民智而进行的启蒙宣传却为革命思潮的形成提供了精神素材。革命政党反对改良，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造成了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而这种形势又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宣布“仿行宪政”，企图对革命釜底抽薪，从而为立宪政党发动立宪运动提供了契机。立宪政党发动的立宪运动当然含有消弭革命的动机，但运动的结果却揭露了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动员和教育了群众，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裂，客观上促进了革命危机的成熟。在这种平行发展中，双方的力量都有了迅速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又是清统治垮台的必要条件。当革命风暴来临时，多数立宪党人转向了革命一边，二者终于殊途同归。当然，认为二者活动的客观作用具有同一性不等于二者不分轩輊。必须充分肯定，革命政党是推

陈天华：《警世钟》。

② 《清议报全编》第4卷，第17页。

③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七日。

翻清统治的主力军。所起的作用是直接的和最大的，看到同一性时不能忘记这一差别。

辛亥革命后，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之间这种即对立又同一、既斗争又联结的情况大体依旧。武昌起义后的政党化合，尽管名目繁多，令人目迷五色，但基本上仍是武昌起义前两种政党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发展，仍可视作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两类。二者的对立主要是围绕拥袁（段）还是反袁（段）展开的，但是复杂化了。一方面，两个营垒固然依稀可辨，成分上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鱼龙混杂；一方面 窃夺了革命政权的北洋军阀是以总统（总理）而不是以君主的名义、以民国而不是以帝国的形式进行统治。这使得革命政党的斗争变得更为困难，与立宪政党对峙的界线也变得模糊不清。斗争仍在继续，战斗力却越来越弱，党争日益激烈，影响力却越来越小。对于立宪政党来说，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性越来越弱，妥协性越来越强，只要民国的招牌还在，它们就甘心于从北洋军阀那里分到的一杯残羹，因而与革命政党同一与联结减少了，对立与斗争增加了，以至在很多时候成了北洋军阀打击革命政党、推行专制独裁的工具。

但是，又不能因此而把立宪政党等同于北洋军阀的御用党。以民元、民二的党争为例，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等立宪政党虽然在许许多多事情上袒袁，与同盟会、国民党对立，但它们仍以政党政治、议会民主为目标，要把中国引向宪政的轨道。它们的袒袁 不过是借袁之力削弱自己的政争对手 而不是支持袁世凯建立独裁政权，更不是把同盟会或国民党置于死地。然而，革命政党的败亡之日，就是立宪政党的失势之时，这是它们的所始料不及的。对此进步党人后来曾总结说：“二次革命，温和者多以一朝之愤相诮。平心而论，大盗当国，国人起而讨之，迟早所不克免。……一方效死疆场，一方声言讨伐，水火之尺既深，同根之谊不顾。大盗之刳刃主人而盗之物也，乐有他方以为之掩饰凶

残。殆之既聚甲之一方而歼之，乙之一方亦终不免焉。”^①立宪政党仍属资产阶级政党，这与革命政党是同一的。有这种同一，才有反袁护国运动中各党派的大联合。此外，在反帝爱国方面，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也有较大的同一性，在民元反对“俄蒙协定”，民四反对“二十一条”、民五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的斗争中，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都表现出了一致性。

辛亥革命后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之间对立又同一、斗争又联结的关系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客观作用上却与辛亥革命中不可同日而语。除了个别情况外，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基本上是个失败的纪录。个种原因多方多面，但重要的一点是，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的另一种同一——妥协软弱大为增强了，涣散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二者无论是斗争还是联结，都已无法对政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资产阶级政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依靠它们自己已经无法找到转机。当然，历史并不因此而止步，它终必冲破旧的格局，迈向峰迴路转的新的征程。

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未竟的历史使命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这是历史事实。但是，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又没能完成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历史任务。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这使它们难以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表现为政治上的软弱与妥协。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之中，作为资产阶级政党阶级基础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极不充分，不仅力量弱小，而且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先天基因使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缺乏坚定的斗争意志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即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政治代表的革命政党也不能避免。同盟会倡导民族主义，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目标

^① 《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

和纲领，对帝国主义扼杀革命的行动不仅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企图以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接受这份可耻的遗产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同盟会宣传民生主义，却又认为“平均地权”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①而且在民国肇建之时就将民生主义束之高阁。同盟会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实行民权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为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是，在取得了建立政权的初步胜利后，却没有勇气利用掌握的国家机器推进革命，而是对反动势力步步退让，直至以政权作交易，换得一个有名无实的共和，犯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②使民权主义也基本落空。在民国建立后，革命政党担心与反动势力决裂，竭力避免被人视为“暴烈派”，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把政党斗争、议会斗争作为惟一的斗争手段，看不到在封建军阀控制政权的情况下，政党斗争与议会斗争必须有军事力量的支持。离开了武装斗争的后盾，议会斗争与政党斗争就失去了根据，失去了胜利的可能性。这正是软弱性的突出表征。立宪政党比革命政党有更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辛亥革命中，立宪政党反对以暴力推翻清统治，辛亥革命后，又急于恢复被革命打乱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因而积极鼓吹“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坚固政府”，并企图借封建军阀的势力来发展党势。它们虽然主观上也想把中国纳入宪政的轨道，但客观上却成了封建军阀的政治盟友，有些甚至沦为封建军阀的附庸。资产阶级政党也曾为维护共和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它们提不出正确的纲领，不敢发动群众，满足于廉价的胜利，这些斗争都没能解决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根本问题。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妥协与斗争的失败，淡薄了政党和共和制度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脱离阶级、脱离群众是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另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政党是阶级的组织，资产阶级政党只有反映本阶级的要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37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5页。

求、愿望、争取本阶级的支持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有强大的力量。在近代中国，农民群众是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因此，资产阶级政党还必须发动农民，才能战胜封建势力，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然而正是这一方面，近代资产阶级政党表现出了严重的弱点。

担心革命会引起下层群众暴动而产生“内乱”，一直是立宪政党反对以武力推翻清统治的主要理由。在立宪政党看来，中国下层社会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无论革命还是立宪，都不能以下层群众为基本力量。革命政党虽然表示革命“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但也只把下层群众作为一种借用力量而非依靠力量。所谓“秩序的革命”，^①所谓“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求其短”的言论，^②正反映了革命党人脱离群众，不敢依靠群众的心理。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还能在各自所代表的阶层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发动的话，那么在辛亥革命后，它们就基本上游离于阶级、阶层之外，至于一般社会群众，就更不在政党的视野之内了。在国会中，各政党几乎没有提出几个有关发展实业的议案。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选举法，不仅使一般群众被排除在外，连商民也“报丧失公权之戚。”^③多数政党政团没有地方组织，“所谓某党某会者，仅在此咫尺之参议院中，稍露党派之色泽。”^④即是设有地方支、分部的几个较大的政党，活动的重心也主要在社会上层，“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绅之类的人。”^⑤所谓政党活动不过是少数党魁的活动。民初的著名记者黄远庸曾说：“政党最大责任，又在于国民的运动。今吾不知吾国政党所恃以为最后之战胜之利器安在，又不知其自信所负最大之责任已否尽力。号召平水线以上之人，众者数万，寡亦数千百，而宣言，而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67页。

② 田黄：《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2号。

③ 《民立报》1912年10月28日。

《远生遗著》卷2，第101页。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05页。

开会，而选举理事，则其政党亦既成立矣。而发表政见焉，讲求政略焉，驰骋于议场，发揭于报纸，而大政党之名洋洋盈耳矣。究竟于吾沉沉古国复杂隐密之社会，有何种之影响，于吾沉吟憔悴、坐待奴亡、呼吁不闻，救死不暇之中下级人民有何等相关之休戚。”语虽尖酸刻薄，却也大体如实。正因为政党脱离阶级，脱离了群众，政党的成败利钝，“吾多数国民视之，犹风马牛不相及”。^②当封建军阀践踏国会，毁弃约法，摧残政党时，“一般人民群众都站在一边，不闻不问。”^③资产阶级政党孤立无援，必然失败。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歧与分裂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局限性。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远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分五花八门，个体生产为特征的封建经济普遍存在，资本主义新文化虽已输入和传播，但封建思想文化却又有牢固的地位和广阔的市场。产生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的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必然具有思想涣散、组织分散的种种弊端。政党自一产生起就兵分两路，革命政党与立宪政党之间，合作暂而少，对峙却久而频。从政党问世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其间虽多有化名，但多党林立的局面却始终未能改观。政党间互相攻讦，纷争不已，民国建立后尤为严重。其中固然有政治倾向的不同，却也不乏意气相争的成分，往往是“甲说乙必反对，乙说甲必反对。”甚至为了削弱对手，不惜依附于封建军阀，结果“为政府操纵，而坐享渔人之利。”^④也招致了党争误国的恶名，为时人诟病，损害了政党的形象。

党与党之间如此，各党内部也如此。派系繁多，成分庞杂，思想分歧，行动不一。同盟会从成立到改组，从未在思想与组织

① 《远生遗著》卷2，第100页。

② 《远生遗著》卷2，第101页。

③ 《民国制宪史概观》，《复兴月刊》第1卷、第6期。

④ 《时报》1913年2月10日。

上真正达到过统一。组织上 共进会成立、光复会复出、中部总部建立 风潮迭起；思想上 三民主义、二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 斑驳陆离。武昌起义后 这种倾向更是恶性发展。立宪政党内部分歧重重。辛亥革命中即有海外派与国内派的区别，国内派也“于精神上隐分两派 事实上亦有竞争。”^① 共和党甫经成立，统一党即另立山头，进步党合并不久，新共和党又独树一帜。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歧与分裂严重地削弱了政党斗争的力量，使得政党非但不能成为它们自己所期望的“政治之中心势力，”^② 反而为封建军阀所操纵。到了后期，政党的分歧与分裂更为严重，党派日见零碎，小党林立，党员极少，不但政党精神几无所存，连名称都变得荒诞不经，近乎于“狐群狗党”了。^③

历史曾经把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交给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但历史又证明，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没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这一历史过程 他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巢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 软弱得很 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④ 在中国，彻底铲除封建主义，取得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和完成，这是历史的结论。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238 页。

② 《宋教仁集》，第 749 页，

③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 160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40 页。

第七章 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和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

第一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严重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和束缚，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法、德、意、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相火拼，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就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空隙。

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放松，突出地表现在对华输出商品的锐减上。1913年各国来华船只吨数为2449万吨，1916年就减为1858万余吨，1918年再减为1343.5万吨。同时各国对华输出总额也显著下降，1913年为58600万两（海关两），1915年降到47700万两。从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来看，战时的对华输出货物总值均大为减少。其对华输出货值指数如果以1913年为100，到1918年时，英国降低到51%，法国降低到29.6%，德国可以说完全停止了对华贸易。由于各国输华商品的减少，市场上许多依赖进口的商品供应不足，价格上涨，因而刺激了国内工商业者的投资，使中国民族工业乘机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在

战争期间，过去依赖帝国主义输入某些工业品的国家已不能从那里得到充分的商品供给，这就为中国的一些轻工业品进入世界市场造成了客观条件。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发展，被称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企业和投资总额的大幅度增加。自19世纪下半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到1911年的40年中，资本总额共约1.3亿元，从1912—1919年的8年间，新增加的资本即达1.3亿元。厂矿数目，1895—1913年的19年间，共创办了583个；而从1914—1919年的6年中，新创办的厂矿即有397个。这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空前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部门来看，主要在轻工业方面，其中纺织工业发展的最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国棉纱、棉布进口数量锐减，国内价格猛涨，民族资本家争相投资于纺织业。纺织工业的厂数由1913年231家增加到1920年475家；资本总额由32547000元增加到82750000元^①。1914—1922年间，新设纱厂49家，布厂5家，纱锭由1913年的484192枚，增加到1922年的1506634枚，增长了311.1%；布机由2016台增加到了6767台，增长了335.6%。^②

中国的面粉工业，在大战期间发展也是很快的。战前全国面粉工厂有90家，其中民族资本创办的只有47家。1920年和1921年间新开设的面粉厂高达123家，其中由民族资本经营的有105家。由于世界市场面粉需要量的增加，中国由面粉入超国一跃而为出超国。1914年面粉入超2096386两（海关两），而1915年就出超383230两，1918年出超2007317两，1920年出超高达3449250两。

此外，缫丝、火柴、烟草、榨油、制糖、造纸、染料等轻工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1辑，第55、56页。

②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第134—135页。

业也都有较大的发展。全国缫丝厂，1911年仅有260家，1917年增加到460余家。大战期间，在苏、杭、沪、湖等地新设了许多丝绸厂，并开始用机器生产。

中国民族工业虽然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还是有限的，而且有很大的软弱性。

第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中国的重工业在大战期虽有所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远不及轻工业，而且大部重工业仍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在原煤生产方面，机器开采的煤产量由1913年的767万多吨，增加到1919年的1280多万吨，但其中75.6%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而且大的煤矿也多半为帝国主义所控制。生铁的生产，由1913年的7.7万吨，增加到1919年的23.7万多吨，但机械冶铁业全为帝国主义所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创办了许多机器厂。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厂由1914年的91家，增加到1924年的284家。但由于规模很小，设备落后，大都以修配为主要业务，无力生产成套设备。水泥工业，在大战期间也有发展，新创办了一些水泥公司，如上海水泥公司、中国水泥公司，太湖水泥公司等，但产量甚微，远不能满足国内需要。

第二，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规模小，资金不足，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难以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经营的工矿企业及其对中国的商品倾销抗衡。据统计，1919年冀、鲁、苏、浙、粤357家较大的工厂，资本总额为1.4亿元，平均每厂为31万元左右。而1895—1913年外资在华设立的136家较大企业，平均每家有资本302万元，两者差距很大。即使是中国民族工业比较发达的纺织工业，直到1915年时，才有少数工厂开始使用电力，号称华北的最大的机器厂之一的山东华丰机器厂，1918年开工时只有一部机床和二部小钻及其他的一些小工具。

第三，中国的民族资本仍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民族资本家由军阀、官僚、买办转化而来的“一身二任”。因

而，中国资本家往往在获取高额利润后，又转向农村购买土地、进行封建的地租剥削。

总之，在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比较迅速的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还很小，且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这样，一方面使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壮大了，另一方面并没有摆脱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依赖和联系，仍处于一个软弱的阶段。因此，这个阶级及其政党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正在成长和壮大的工人阶级身上。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工人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早期官僚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兴建而产生壮大起来的。因而，中国工人阶级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就更广大一些。

早在 19 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即在中国一些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创办了造船厂、轮船公司、缫丝厂、砖茶厂、印刷厂等。在这些外国企业中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主要是海员和航业工人。从 60 年代起，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创办军事工业以及采矿、炼铁、纺织工业。80 年代，中国又有一批商人、官僚地主投资于新式企业，创办了不少的纺织、缫丝、面粉等轻工业和煤矿、金属矿等重工业，在这些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工人。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特权，修铁路，开矿山，设银行，办工厂，扩大了经济侵略的范围。中国的民族资本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办工业逐渐增多，在这些中外企业中产生了一大批工人。从 1840 年到 1894 年甲午战争前的 50 多年中间，中国产业工人近 10 万人，从甲午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20 年间，工人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据当时

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在中国自营企业的工人总数为 656700 人，加上海员、铁路工人以及外资在华企业的工人，中国产业工人的总数已达 100 多万人。随着中国民族工业及大战期间美、日在华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数目有了较大的增加。到 1919 年时，中国产业工人已发展到近 200 万人，计：中国工厂工人 702488 人，帝国主义在华工厂工人 32 万人。邮政工人 23154 人，电政工人 10741 人，铁路工人 14299 人，海员 1150000 人，总计为 1946364 人。^①在数年之内，中国产业工人增加了 1 倍，成为中国社会中一支强大的阶级力量。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崭新的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最进步的阶级。它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许多特出的优点”。^②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三种剥削和压迫，是中国社会中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受本国的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外，还要受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这种压迫和剥削的残酷性，在世界上是少见的。

在中国的近代厂矿企业中，较为普遍地实行包工制或把头制。大小包工把头成为资本家的爪牙，掌握着工人的招雇、解雇和发放工资的大权。他们通过这些权力，不仅任意克扣工人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而且进行人身的凌辱。此外，在许多纱厂和工厂中还实行着更为残酷的包身制。被包身的女工，不但工资全部被包工头占有，而且连人身也都由包工头支配，遭受各种蹂躏；还有“学徒制”、“养成工制”。他们遭受更加残酷的剥削，在学徒期间根本没有工资，许多工厂实行搜身制，甚至用禁闭、罚款等

《党史资料》1953年第6期。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7页。

方式压制工人。

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极差，但工资却异常低廉。据统计，1912年以后，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地长达12—15小时，有的长达17—18小时。许多工厂设备简陋，没有劳动保护和各种安全设备，因而工人死伤事故层出不穷。如抚顺煤矿在1915年发生了3440次事故，死伤了3737人，它在1917年的一次瓦斯爆炸中就死了921人。本溪湖铁矿1918年发生540次事故，死伤2128人。工人没有劳动保险，公伤死亡没有补偿制度。例如开滦煤矿工人因公致死者，资方仅发给恤金20元了事，但是死一匹马还赔偿损失60元，因而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说。

中国工人的工资非常低，一般工人每日平均为2角左右，女工比男工更低，以劳动繁重的开滦煤矿工人为例，井上头等工人每日0.25元，二等工人0.22元，三等工人0.20元，井下头等工人0.35元，二等工人0.30元，三等工人0.25元。无锡丝厂的工人每日工资为0.08—0.35元，纺纱厂0.10—0.35元，织布厂0.08—0.26元。中国工人的工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只相当于美国同类工人最低工资的1/15，相当于日本工人工资的1/4。据1920年《星期评论》的调查，这样少得可怜的工资都维持不了夫妻二人的生计。

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民主自由，遭受残酷的压迫，工人根本没有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的权利。北洋军阀政府公然规定不准工人组织工会，禁止总同盟罢工，违者便要遭到严厉的镇压。

第二 中国工人阶级高度集中 从地区看，中国工人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武汉、广州等几个少数大城市。1919年上海一地即有50万工人，武汉40万工人，天津30万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2以上。从企业部门看，中国工人阶级又都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纺织等部门，其中约有80万矿山工人，30万码头搬运工人，20万铁路邮电工人，15万

海员。中国工人还有 1/2 以上集中在 500 人以上的工厂中。这种高度集中的状态，就使中国工人阶级在战斗中便于组织起来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多半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的农民有天然的联系，在斗争中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使它成为中国最先进、最革命、最有战斗力的阶级。一旦得到先进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就必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在它产生后，就不断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随着本阶级的成长壮大，工人的斗争日益发展。早在 1958 年，香港 2 万多市政工人和搬运工人，进行了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城的斗争，并在罢工后回到广州。1906 年 12 月，安源煤矿 6000 多工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发动的武装起义。1911 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响应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清廷的“铁路国有化”运动，湖南长沙、株州 1 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湖北宜昌数千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打死清军 20 余人。同年，上海晋昌、长锦、伦华、协和 4 个纺织厂 2000 多名工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增加工时的罢工斗争。1913 年汉阳兵工厂工人反对厂方以贬值的纸币发给工资而举行罢工。从 1912—1919 年 5 月，有记载的罢工就有 130 余次，超过了辛亥革命前 50 年间的罢工总数。其中比较大的罢工有：1914 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 3 个轮船公司海员的罢工，1915 年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同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各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1916 年，天津法租界工人反对法国扩大租界，强占老西开举行的罢工，得到了天津市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终于迫使法帝国主义放弃了霸占老西开地区的野心。在罢工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性得到了提高，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重大作用。

但是，“五四”以前的中国初期工人运动还是自发性质的罢

工的规模比较小，而且大多数是经济斗争，即使有一些政治性的罢工斗争，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的，还处于自在阶级的状态。他们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统一工会的领导，而是依靠一些如哥老会、老君会、帮口、行会等封建落后的团体进行斗争。这些组织既不能给工人阶级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更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中国工人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本阶级的革命政党来领导。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发展，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新型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出现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了一个艰辛历程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文字记载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1899年4月，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同学》一文。该文说：“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喀偲，主资本者也”。接着资产阶级改派梁启超于1902年的《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的一文中，附带提到过“麦喀士（即马克思）称之为‘日耳曼国（即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1902—1907年期间，国内出版的论述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有30种左右，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第一国际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曾大谈

① 《万国公报》第123卷。

社会主义，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孙中山赞佩马克思“孤心苦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如‘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之所本”。^①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虽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一些片断的介绍，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缺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传播开来。

但在1915年以后，中国的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工人阶级队伍成长壮大，从而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十月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世界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鼓舞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使处于黑暗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而且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引起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大变化，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十月革命后，正在寻求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学习西方转而学习俄国，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1918年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三篇有名的论文。他正确地区分了十月革命与法国18世纪的革命是“性质自异”“非可同日而语”的伟大革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之上之革命”。他正确地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

世界意义，指出“十月革命已使世界历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由今以后，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凯歌声。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还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布尔什维的基本观点，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其目的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此时在报刊上还连续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摘译本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传记材料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俄国、工人运动和世界革命的文章也先后在一些报刊上发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就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爆发了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它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很快地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是由于：

第一，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工人阶级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大罢工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从而造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坚实阶级基础。

第二，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工人阶级表现出来巨大的力量，推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向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团体的道路，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第三，五四运动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环顾全球，只有列宁创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而中国人民很自然地把中国的反帝运动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了，这就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思潮的活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成立。首先组织起来的专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是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同年冬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建立的新民学会，是最早研究新思想而发展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讨论建党等问题的社团，在长江中游有较大的影响。在天津，周恩来于1919年9月组织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开展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讨论。在武汉，恽代英创办了“利群书社”、“共存社”。在济南，王烬美组织了“励新学会”。在广东阮啸仙组织了“新学生社”等团体。此外，各地也纷纷酝酿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第二，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不断扩大，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报刊大量涌现，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五四运动后，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有200多种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其中《新青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还居于领先地位，它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里先后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文章达130多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此外，《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日报》、《湘江评论》、《星期评论》、也都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园地。1920年夏，在上海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主义大旗，从各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有影响的著作，也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列宁的《俄国政党与无产阶级的任务》，译载于1919年9月《解放与改造》杂志上。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全译本及节译本也先后出版。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阶级斗争》、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

克思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介绍马克思的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和中国读者见面。从1920年5月到1921年7月，共出版了十几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而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陈望道、张太雷、李汉俊等，在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五四运动以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李大钊仍然是走在最前面，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之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内容涉及方面之广，是同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少见的。从1919年5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达122篇之多。李大钊在《新青年》六卷五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论文，在中国第一个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学说。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当然这篇文章还不很精确和完备，甚至还有某些错误，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上还是正确的。后来他又陆续发表《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革命和中国史上的若干问题；他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批判。

陈独秀从1920年初夏起，发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谈政治》等一系列的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指出：“工人劳动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每日所得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他还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

理论。他说：“劳动者和资本家战争的时候，……不能不采用革命的手段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以后主编的《湘江评论》及其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等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主张用民众的大联合对抗反动统治阶级的联合势力。

周恩来在1920年1月因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而被捕。他把监狱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在狱中给难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传，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学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出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一批思想界的先驱进行的。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董必武、恽代英、赵世炎、彭湃、瞿秋白、李达、杨匏安、李汉俊、陈潭秋、向警予、张太雷、黄日葵等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李大钊将十月革命的胜利看成世界人类历史的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359—1360页。

纪元。他指出，在这新纪元的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阀主义，也都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①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状况，从而认识到“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②，是“世界大势所趋”。^③五四运动以后，许多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而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接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主张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陈独秀于1919年12月，在《〈新青年〉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920年9月他在《谈政治》这篇著名论文中，深刻地揭露了强权政治压迫广大群众的反动实质，提出了建立劳动阶级专政的任务。明确宣布：“我们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说：“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代替封建政治一样，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中国也难以独异的”。^⑤他批评社会民主党“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命”，而“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结果不但主义

李大钊：《新纪元》。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161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159页。

④ 《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⑤ 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20日。

不能实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这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代替虎噬人的方法。”^① 蔡和森于1920年夏给毛泽东的信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方法：阶级一战争一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主编的《湘江评论》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分析了十月革命引起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形势，指出各国人民要求得到解放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必须用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来推翻强权阶级的统治。他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大联合”。“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乐观和胜利的信心。他在文章的结尾部分预言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三）初步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争取自身解放的榜样，空前地显示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威力，表明了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逐步地认识到要真正变革中国社会，就必须学习世界革命的群众斗争方法，依靠和发动群众去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李大钊把十月革命看做“是劳工阶级的胜利。”他强调指出，人民群众的真正解放，绝不能靠任何“权威的恩典”，也不能向统治阶级去“央求”，要靠“自己解放自己”，^②“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斗争，^③“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④他还看到了

①：《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②③④ 李大钊：《真正的解放》《李大钊选集》第226页。

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 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 他们若是不解放 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不解放 他们的黑暗 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 他们生活中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他认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教育和发动农民群众，“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黑暗”^②的道理。据此，李大钊提出了要改造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工人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主张，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总结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经验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看成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认定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乏这种大联合。他说：“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发总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八剑拔弩张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③。

陈独秀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中，提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这是因为“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 才能把我们的货物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人的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④。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由于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有了较正确的认识，促使他们投身到工人中去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

②③ 《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 149 页。

③ 《湘江评论》第 4 号。

④ 《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1920 年 5 月 1 日。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准备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五四运动的爆发，六三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

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这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化，民族矛盾空前深重的结果。它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所致。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美等同盟国失败和英、美、法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各战胜国之间围绕着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新的角逐。1919年1月27个战胜国的代表在法国巴黎举行所谓“和平会议”，实际是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中国也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即放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同时，还提出废除1919年5月5日本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取的德国原在山东的各项权益。但是，由于英、美、法等国家均在中国拥有各种特权和利益，因此，对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竟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借口而拒绝讨论。山东问题虽经讨论，但不仅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反而决定德国原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转给日本。对此，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不仅不据理力争，反而准备签字承认。

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震惊了中国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使他们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北洋军阀政府反动的卖国真面目。5月4日，北京十几所高等学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

岛”等口号，并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任外交次长）、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輿（时任币制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愤怒的学生冲进了曹宅，痛打了藏在曹宅内的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反动政府军警赶来，逮捕学生32人。5月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举行罢课，进行爱国宣传和营救被捕同学。6月，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由北京学生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其他地区学生的热烈响应。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南京、杭州、开封、南昌、成都等大、中城市的学生，都纷纷集会，游行和罢课，发表宣言，通电进行声援，斗争迅速扩大到全国。

北洋军阀政府，对这一爱国运动采取了高压的政策，于6月3日、4日连续逮捕大批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愤慨，中国工人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了战斗，举行了六三政治大罢工。从此，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斗争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局面。运动的主力由学生群众转变为工人阶级，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6月5日，日本在上海经营的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同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码头工人和沪宁、抗甬两条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6日，一些机器厂、铁厂和电车工人相继罢工。从7日开始，海员、铁路和汽车工人陆续罢工。10日罢工斗争达到高潮，沪杭、沪宁、淞沪铁路工人和全体海员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使上海和外地的水陆交通完全断绝，各行停业，全市陷于瘫痪。

从6月5日—10日，全市罢工的工厂企业有50多个，各业工人有6、7万人。罢工工人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开展各种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的六三政治大罢工，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的战斗力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彻底性和坚决性。它有新的特点：首先，这次罢工提出的完全是政治要求。其目的是拯救濒

临危亡的国家和民族，“不要我们国家变成朝鲜第二”^① 也就是要“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② 他们的口号是“万众一心，罢工救国”。其次，这次罢工，工人阶级不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出现的。而是做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坚决冲破了中外反动派的破坏和资本家的阻挠。当“三罢”不久，资本家在反动政府的拉拢下，酝酿开市时，工人们即表示，“即令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绝不因此而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③ 最后，这次罢工，工人初步打破了行业和地区之间的界限，进行跨行业和地区的联合罢工，表明了工人开始抛弃了行帮、行会观念，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工人罢工斗争和学生积极推动联络下，从 6 月 5 日开始，上海商人举行罢市，各校学生亦于 5 日一律罢课。

在上海三罢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南京、上海、武汉、苏州、镇江、扬州、安庆、厦门、天津、长辛庄、唐山、济南、广州等 150 多个的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陆续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的高潮。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给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以巨大的威胁。6 月 7 日，北京总商会向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说：“市面恐慌，岌岌可危。”^④ 同日，天津总商会的急电说：“危机已现，迫切万分。”^⑤ 10 日，天津总商会再次发出急电，警告反动政府当局，指出：“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⑥

在全国人民强大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政治大罢工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 6 月 7 日释放全都被捕学生，11 日下令

① 《字林西报》1919 年 6 月 11 日。

② 《新闻报》1919 年 6 月 7 日。

③ 《新闻报》1919 年 6 月 8 日。

④ ⑥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418 页。

免去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运动中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成了五四运动的胜利。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进一步推动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

一、马克思主义同改良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要冲破封建军阀、一切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另一方面还要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反对胡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场斗争。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这次论战就已开始酝酿。“五四”前夕，李大钊在《废娼问题》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中就提出了中国问题必须“根本解决”的主张，胡适则先后发表了《不朽》、《实验主义》等文，贩卖实用主义哲学，宣传主观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抗。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感到“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而于1916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向马克思主义挑战，于是展开了“问题与主

义”的争论。胡适的文章发表后，蓝公武首先发表《问题与主义》开始反击。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了胡适的谬论。继之，胡适连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是年末，又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顽固地坚持改良主张。1920年1月，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表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两种世界观的对立，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论的两种对立。这次争论主要问题：

一是在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胡适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名，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说空谈主义不但没有用处，而且还很危险，诬蔑马克思主义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性，一方面，无形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大势力，成为两大对垒的阵营”，“演成许多本来不应有的悲剧”。^①

针对胡适的反动观点，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社会上多数人没有一个共同的理想，社会问题是永远没有解决希望的。他还阐述了主义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认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家阶级”在我国“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逐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阶级。”^②从而强调了中国必须用马克思作指导的必要性。

二是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否要从“根本上解决”，实行社会革

① 《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

②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

命。胡适贩卖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反对革命，鼓吹“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事是慢慢做到的，不是一下子做到的，是零碎做到的，不是一举成功的”。^②攻击主张对中国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国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因而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③他还强调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否则，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学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④

这次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揭示了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的这条规律，对扩大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具有重要意义。

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研究系分子关于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论战

研究系在1918年安福系的排挤下失势后，梁启超宣称不再过问政治，从事于文化学术研究，随着一些人以研究为名，纷纷出国考察，他也于同年冬游历了英、法、比等几个欧洲国家。1920年3月回国后写了《欧游心影录》，贩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在国内创办讲学社，聘请外国学者来华讲演。同年9月，该社和北京大学联合聘请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演。罗从1920年9月—1921年7月前后的10个月中，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进行一系列的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教育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

② KS：《怎样去研究社会改造问题》、《新辟》，第1卷第1号。

③④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

之效用》、《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社会主义学等》他反对十月革命，宣扬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向中国人民反复说教：“现今所急需要的，是道德的进步，人们一定当讲恕道，学容忍，不然，全世界人人吃苦，人人受罪，一切的文明便从此要灭了”。他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借用外国资本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宣扬改良主义的教育万能论，而对五四伟大爱国运动加以诋毁。说什么“根本永久解决的办法，自然惟教育是赖。但‘教育’是个略有几个含糊的字，名副其实的教育，决不是如现在现实教职员罢课所表示的政治状态之下所可求得的”。

罗素的反动讲演，受到了研究系分子的喝彩，成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演回到上海后，于1920年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散布和发挥罗素的反动理论和主张。12月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公开向马克思宣战，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杂志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对张的谬论予以支持和发展，由此，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论战。张东荪、梁启超等研究系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论，主要是：

（一）以研究社会主义之名，行反对社会主义之实，宣扬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研究系分子以“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以所谓的特殊国情为由，一方面高唱“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①。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②“人民贫之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待”，因而“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

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

②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

就是开发实业”。^①“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②在开发实业的大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工厂必日增一日乃是不可抗的，这是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亦是如此，不愿意也是如此，乃是一个自然的趋势”。^③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必须把实际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必须把理想看得重些，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切近的目的看得重些。而我们须把较远的未来看得轻些。更换言之，我们要创造新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把他推的很远”。^④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只能作为一种理想，一种理论去研究，而不能实行，而目前的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

（二）力主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研究系分子首先否认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阶级对立、斗争。他们说：“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故中国之今日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的地位为第一义。”^⑤但是，他们在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觉察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必出现“劳资两阶级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家剩余利益之恶现象”，^⑥因而，引起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为了缓和与防止阶级斗争，研究系分子提出了调和劳资矛盾的改良主义对策。对资本家采取“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采用“政府立法”，“社会的监督”手段；“奖诱警告资本家，唤起其觉悟，使常顾及劳动者的利益，以缓和劳资两级之距离”，以便“在现行

① 《东荪先生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新青年》第8卷，第4号《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② 《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新青年》第8卷，第4号《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③④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

⑤ 梁启超：《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

⑥⑦ 梁启超：《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

经济制度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同时，还提出“提倡协社，使尽量分取生产事业，以移入公众之手。”对工人则主张，在工厂设补习学校，提高文化，“用社会主义立法手段规定劳动法规、劳动保险，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以解决“贫富问题”。^②

（三）反对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研究系分子无视日益壮大并已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存在的实际，认为“中国是劳动阶级不存在的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③张东荪说：在中国，“工人与商人都未成为有力的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经验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农民在他们看来是“大抵蠢然一物，较原始人所差无几”。因此断定中国不会有“劳农革命”的发生，如果“极力鼓吹劳农主义，亦不过引起伪劳动革命”，^④“党的组织若不在阶级自觉萌芽之初，则除了静待以外无法发展”，“党是代表阶级的，若他的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⑤

研究系分子，“研究”社会主义的结论是：“最好是从容的彻底的研究，不必急于确定”；中国共产党不能成立。须静待工人的“阶级自觉”。

研究系分子散布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成立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论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正在进行的筹建共产党的活动，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为了澄清是非，以李达、陈

梁启超：《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

蓝公武：《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改造》第3卷，第6号。

③ 同。

④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

⑤ 同。

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研究系分子宣扬的反动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当张东荪的《由内地旅行而得的又一教训》发表的第二天，李达、陈望道即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张东荪现原形》、《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等文对张东荪的言论进行批评，时在广东的陈独秀，也连续发表致罗素和张东荪的公开信，批驳他们的反动言论。此间，张东荪等人也连续撰写和发表公开信，进行辩论。针对这种情况，为便于开展讨论，陈独秀迅速将以上的各种言论汇集起来，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上，开辟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从而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新青年》和《共产党》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张、梁等研究分子的言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驳斥研究系分子关于在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论证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指出，社会主义者和研究系分子的分歧，“不在于应否增加富力发展实业的问题”关键在于“只在于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①“资本主义生产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②“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一切生产机关，概归最少数资本阶级所私有，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均为劳银的奴隶，完全受资本阶级所支配。……劳动者制造出来的剩余生产尽归资本家，自己仅能得些小工资过活，还不能瞻养一家’。资本家掠夺工人的‘剩余价值’，再加上‘由生产过剩造成经济恐慌’使‘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④因此，用资本主义改变不了中国的贫穷落后状况。同时他们也强调指出，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

《力子先生再评张东荪的‘又一教训’》，《新青年》第8卷，第4号。

《陈独秀复张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8卷第1号。

③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

④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1号。

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资本国的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指出：“外国资本家在我国政治上处处占利益，交通运输他们都得到优越地位。本国的资本家处处反形劣于他们，照此说来，怎么可以和他们竞争”。因而“要使中国民族得到自由平等，那么，非把资本国（指帝国主义）打倒是永无希望。”^②据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断定，“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于社会主义”。^③

（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批判了研究系分子宣扬的调和劳资阶级矛盾的改良主义主张。指出：“只主张借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因为，“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还是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呻吟于资本家的掠夺之下 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④至于对资本主义采取“矫正态度”，设法使资本家“有深切著名之觉悟”更是“一句空话”。因为资本家“一定唯利是图。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主义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不思反抗，况且谁可以矫正资本家？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⑤因此，研

①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

② 何孟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法》《曙光》第 2 卷 2 号。

③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评论之评论》第 1 卷第 2 页。

④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

⑤⑥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

究系分子提出的“温情主义的主张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所谓“要对劳动者灌输知识，助长组织，而先从疾病保险入手以促成真正的工会”等办法，“并不算是革命的手段，实不过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罢了”。^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明确提出采取“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实行革命，“即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式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②

（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批驳了研究系分子无视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反对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谬论。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③他们质问研究系分子，“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就中国来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是没组织罢了”。^④由于“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斗争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的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的主人翁了。”^⑤因而“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⑥最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坚定地宣告：要“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共产主义团体，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

②③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

④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页。

⑤ 《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

⑥ 《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

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①

这次论战，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存在着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在当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的缺点，但它对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中国革命的开展，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在小资产阶级大量存在的国度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它在19世纪初流行于法国、西班牙、俄国等国家，20世纪初传入中国。

1905年，在《民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开始评介无政府主义。5月出版的第2卷第2号的《东方杂志》上便登载过《论俄国立宪之风潮及无政府主义》，《民报》第16号刊载过《巴枯宁传》第11号和第17号刊载过《虚无党史》等。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先出现在国外。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是1907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的李石曾、吴稚晖，在北京创办《天义报》的刘师培。他们通过刊物与活动，宣扬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

在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师复，被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1912年他在广州组织了“晦鸣学社”，“以为传播无政府主义之机关”。^②同时还组织“心社”，提出了12条戒约，规定社员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1914年，他又在上海建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发表《宣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质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

② 《驳江亢虎》，《师复文存》第228页，革新书店1927年版。

言书》，提出了“灭除资本主义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以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以“反对强权为要义”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并且具体提出了所谓“十三无理想”，宣扬“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①在他的影响下，南北的无政府主义者先后组织过“无政府共产传播社”、“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同志会”、“群社”、“实社”、“平社”、“近化社”、“奋斗社”等无政府主义组织，并创办大量刊物。在北京有《奋斗》、《北大》、《学生周刊》、《社会运动》；上海有《自由》、《革命》；广州有《民风》；福建有《闽星》；山西有《革命潮》；四川有《半月刊》等。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有70多种。此外，在五四后出现的数百种刊物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介绍和宣扬过无政府主义，即使是《新青年》也不例外。无政府主义思潮，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互助进化论”，在小资产阶级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

1915年3月，刘师复病死后，黄凌霜和区声白是他的主要继承人，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正统派代表，影响较大，区声白为广东人。他们组织“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恶毒谩骂布尔什维克是“杀人放火的强盗”。^②他著有《无政府革命方略》一书，并经常在一些无政府的刊物上发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反对一切“强权政治”，主张“绝对自由”，说什么“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以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去做，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③黄为北大学生，是北大无政府主义团体的骨干分子。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师复文存》第53—54页。

② 儿真节译：《论我国过激党》一文按语，《进化》第1卷第2号。

③ 《新青年》第9卷第4号。

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在唯物史观方面，该文虽然不得不承认这是马克思的最大创造，为学问界开一新纪元，但又把它和进化论混为一谈，说“马氏在他的哲学序中，说明社会机体进化之原理，和达氏所发明的生物机体进化论的论据，很是相近”。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是他攻击的主要点，并强调“批评这种主张的人，以无政府党为最多。”他说：“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从历史观上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现在教育、国教、和保护领土种种大权，都在政府掌握之中。若更举土地、矿山、铁道、银行、保险等等给了他，谁保国家的专制，不较现在还要利害，我们的首领，谁保他们不变了拿破伦、袁世凯呢？且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又要设立什么工农兵，这不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吗？”他还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指责，说什么“按个人劳动的多寡，来给报酬。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不能生活……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最后，黄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无政府主张。他说“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由单纯以趋于复杂，以办理社会所需的事，去除一切强权，而以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他们所主张的劳动原则，就是‘各尽所能，四个大字。无政府党和马克思派争论的焦点，就在这个了’”。

黄凌霜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并没有立即遭到反击。这是因为，当时坚信并能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还为数不多，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对它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而且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遭到实用主义的进攻，他们必须首先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论战。因而，无政府主义在没遭到抵制和反击的情况下，“五四”以后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进攻。1920年2月，易家钺、朱谦之等人公开地打起了反布尔什维克旗号，在《奋

斗》上发表文章，公然宣布“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行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不对，就无异说布尔什维克的不对”^①。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以《民声》、《奋斗》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书信，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它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筹建无产阶级政党和开展工人运动的严重障碍。

为此，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拉开了反击无政府主义的帷幕。同年11月《共产党》月刊出版。在第1号到第5号的各期带有社论性质的“短言”中，尖锐地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同时还发表了一些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较为深刻较有影响的论文，如李达的《社会主义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无懈（周佛海）的《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及《怎样夺取政权》，施存统的《我们怎样干社会革命》。此外，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发表的《自由与秩序》和蔡和森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文，都对无政府主义及其反动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1920年末，陈独秀在广州政法学校讲演，再次批评无政府主义。区声白在听讲后立即写信表示异议，继续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专栏，将这些信件予以公开报载。与此同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通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进行了一次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

（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 and 国家的谬论，阐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

^① AD(易家钺):《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奋斗》(北京)第2号，1920年2月24日。

必要性。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①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说布尔什维克‘事事用强权……这是摧残个人 这就非人道’^②。因而提出“凡一切政权和权力一概否定之”。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者，就不见得可恶了”。^③ 因此，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反对资产阶级强权是对的，而反对无产阶级强权就是错误的。因为，“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渴望将财产私有，工银等劳动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状况除去”。^④ 但“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尽，非一时的暴动所能成功的，至少非有较长期的压制不可，而要行比较长期的压制，非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不可。”^⑤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公开宣布，坚持无产阶级强权，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最后目的，而是要最后消灭阶级和阶级专政。指出“我们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⑥ “在此时期内若有人主张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杀害劳动阶级；若是劳动阶级肯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劳动阶级自杀”。

（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绝对自由”强调了组织、

^② 《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奋斗》第2号。

^③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④ 《夺取政权》，《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⑤ 《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纪律的重要性。主张个人绝对思想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才反对一切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极端自由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参加，自由退出”。^②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所谓“绝对自由”，“决不是科学的”，^③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荒谬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因为“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个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体有各团体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没有的事，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可以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④因此“联合无论大小，都要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才能够维持比较长久一点，若常常固执个人和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也不适宜大规模的生产事业”。^⑤共产主的分子还指出，要纪律，就是为了保证大多数人的自由，而限制那些少数为个人利益破坏集体的人的自由，也就是说“恶的自由是应该束缚的”。

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绝对自由 反对集中 是极其有害的，它是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所需要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强调指出：“劳动团体的权力不集中，想和资产阶级对抗尚且不能，不要说是推翻资产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产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因此“权力集中是革命手段中的必要条件”。^⑥这就击中了无政

《评 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第2号。

② 《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

③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4页。

⑤ 《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页。

⑥ 《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

府主义的要害。

(三)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生产与分配问题上的错误经济理论。无政府主义者从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和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出发,反对生产集中,主张分散,“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攻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不平等”主张立即实行“各取所需”,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中央管理”。^①绝对自由“非闹得到停顿而破产不可”。“无政府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的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只是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互相冲突?怎么能转变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这些问题,是无政府主义所不能回答的。

在分配问题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原理指出:“实行按劳分配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必须在‘社会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质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秩序就会弄糟了”。^②

这次论战,持续一年多的时间,论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在一些社团和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有所反映,是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展开的一场规模最大的论战。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在这次论战中,也暴露出一些缺点和

李达:《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2号

② 李达:《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2号。

弱点，如藐视群众、轻视民主的偏向。但它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大量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时，也使不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通过这次斗争，还清除了混入共产主义小组内部的少数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纯洁了革命团体，从而扫除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障碍。

第四节 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及其活动

一、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酝酿和讨论。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进行活动，从而使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1919年—1921年，全国发生161起罢工事件，罢工总人数达24万多人。上海、香港、长辛店都发生过万人以上规模的大罢工，而且政治罢工显著增加，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马列主义在中国也迫切需从工人运动中找到物质力量，二者结合的条件已经具备，这就把筹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且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0年，李大钊即开始和邓中夏等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月，陈独秀被捕出狱后，李大钊不避艰险，护送他去天津转往上海。在去天津的途中，李和陈商讨了有关建党事宜，相约在南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当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国内酝酿建党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也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1920年8月13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张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方法：

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即：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但他特别强调：“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①因此，他明确提出：“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政党”^②。蔡和森在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是我党的哲学基础。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思潮进行斗争，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他深刻地揭示了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指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是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他强调，不论研究什么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坠入迷阵”。^③他还介绍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组织情况及严格的入党条件：（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个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们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个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据此，他还提出了建党的组织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卷。

②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卷。

③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卷。

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3) 严格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①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推动下，毛泽东也开始考虑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7月，他从北京回到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广泛宣传马列主义。8月，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革命经验。10月，他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俄国革命成功关键在于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十分之八九劳农阶级，如斯响应，俄国革命之成功全在这些处所”。②是年底，毛泽东收到蔡和森关于建党问题的来信后，对蔡的建党主张，在复信中表示完全赞成，并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③他还向蔡和森介绍了国内筹建政党的情况，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④。

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的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立起“共产党”的旗帜。创刊号的《短言》中，明确地阐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在第5期上公开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该刊系统报道了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的状况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状况，比较集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卷

②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5日。

③④ 《毛泽东复和森 蔡林彬》，1921年11月21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卷。

知识，包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任务、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等内容，它为帮助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了解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达在《共产党》月刊号上发表的《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一文，扼要地介绍了第三国际在同第二国际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历史，阐明了国际共产党的宗旨，号召共产主义者按照第三国际的榜样建党。1920年10月，他在《马克思主义还原》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第二国际堕落的历史，说明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弄堕落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的发扬光大，恢复马克思的真面目了”。在1921年6月写的《马克思主义派》一文，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各派修正主义的界限，着重阐述了多数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亦即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明确指出第三国际赞成劳动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各国社会运动最新趋势”。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讨论和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得到了列宁及其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列宁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就对中国革命表示了“深切的兴奋与充分的同情”。1912年7月15日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预言：“由于在中国将会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①1919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伟大爱国运动，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当时俄共（布）远东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②就立即作出派人访问中国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李达：《七一回忆》 《七一》创刊号，1958年7月1日。

五四领导人的决策。1920年初，共产国际同意远东局海参崴领导人维经斯基的建议，派维经斯基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和萨赫雅诺娃及翻译杨明斋赴华，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进行联系，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同中国社会团体联络，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指导中国工人运动，帮助成立各种工会；选择一些进步青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维经斯基等人于同年4月来华后，在北京通过俄籍教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介绍，首先和李大钊取得了联系，受到了李大钊同志的热情接待，并邀集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交流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及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此间，维经斯基还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座谈了建党的问题。他根据苏俄革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初步考察，认为，组织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已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李大钊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为了加速党的创建进程，维经斯基又经李大钊介绍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马迈耶夫继续留在北京，帮助李大钊从事建党的准备工作。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也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随后，由陈介绍，维经斯基又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时事新报》负责人张东荪等人。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座谈了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并积极介绍建党经验，促进建党工作的加紧进行。

二、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及其活动

共产主义者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20年8月，首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先后建立了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在法国和日本，也由在国内入党的同志建立了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当时，这些组织并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

“共产党小组”，后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由陈独秀创建的，并且成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中心。1920年初，陈由北京返沪后，《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回上海。陈独秀和沈雁冰、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共同传播新文化，介绍新思潮，宣传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4月1日，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4月2日，他同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明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必要性与必然性。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以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材料，转载苏俄劳动法典，宣传劳动运动。沈玄庐同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也编辑“劳动专号”，进行社会主义宣传。5月1日，上海工人阶级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破坏，举行了较大规模的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同时，陈独秀还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当时挂着研究社会主义招牌的戴季陶和《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也一度加入活动。但因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成立中国共产党，旋即退出。陈独秀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团结了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批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骨干。这就为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日益开展的情况下，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提出了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7月19日，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集会，决定开始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由李汉俊拟定一个简单党纲草案，提出劳工专政，生

产合作主张。在党的“一大”前，先后参加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启汉、李中、沈泽民等15人。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先后由李汉俊、李达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第一，创办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李汉俊、陈独秀发起，创办了《劳动界》，作为直接反映工人呼声的喉舌，许多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均为该刊撰稿。陈独秀发表《两个工人的疑问》、李汉俊发表《金钱和劳动》、李达发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等文》，以通俗的语言阐述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使命的教育。该刊还重视刊登工人来稿，从第1—24册，刊登约30篇的工人稿件。其中，《一个工人的报告》、《一个工人的宣言》

《做工的苦楚和选举的黑幕》、《一个工人的觉悟》、《现时中国劳动运动与劳动者》等篇，均用切身经历控诉了中外资本家及工头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恶，诉说了工人的要求和对工人运动的认识。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撰写的《一个工人的宣言》，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他说“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强调“我们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首先就要工人联络”。它说明通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已收到了实际的效果。《劳动界》在工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被赞为“工人的喉舌。”和“工人的明星”。

《新青年》从8卷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起，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设“俄罗斯研究”栏，开展社会主义讨论。该刊还展开了对研究系张东荪、

梁启超的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创刊《共产党》月刊，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第二国际及其领袖们的罪恶活动，揭露了修正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介绍各国共产党及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宣传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统一各共产主义小组的认识，推动共产党的建立，都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根据英、日版译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并用“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列为“社会主义小丛书”的第一种；9月，李汉俊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小册子《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也用“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列为“社会主义小丛书”的第二种。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新青年社，是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除编辑出版《新青年》月刊、《劳动界》、《上海伙友》外，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还翻译出了“新青年”丛书，包括《社会主义史》、《哲学问题》、《工团主义》、《阶级斗争》等。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制定了供成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必须“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同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而实行这个革命的关键在于“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它从思想上武装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推动了建党工作的进行。

第二，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

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是上海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一项重要活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利用工人刊物，为工人说话，向工人灌输革命道理，结合工人生活与斗争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

义。如陈独秀在《劳动界》第4册写了《穷人与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一文，用闲谈的形式，以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劳动者与剥削者生活的天壤差别，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沈玄庐在第5册写了《兄弟们想想看》，说：“我们流了一百滴，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这六、七十滴到哪里去了？不都是老板们，老爷们，太太奶奶们，小姐少爷们，一般有钱有势的吃了去吗？”以此教育工人懂得受剥削的道理。李达在第16册发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一文，强调“劳动者要怎样才能不饿死不冻死呢？……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

开办工人学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教育与组织工人的另一条途径。1920年由李汉俊主持在纱厂集中区的小纱渡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为建立工会打下了基础。1920年11月21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并决定由工人李中负责具体领导工作。这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第一个工会，陈独秀为名誉会员。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印刷工会会员有1346人，并出版了《友世画报》。

1921年1月，上海小组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和支持工人开展斗争。小组的一些成员还深入到工厂中去，向工人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起来斗争。1921年3月，法租界电车工人、上海烟厂女工、丝线业工人和日本纱厂工人先后举行罢工，都在上海小组的声援下取得了胜利。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为了团结和教育进步青年，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小组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书记。团员有：李启汉，李中、叶天底、罗觉（罗亦农）、王一飞、金家凤、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彭述、蒋光慈、曹靖华、柯怪君（柯庆施）等30余人。为输送革命青年去俄国学习，9月，创办了培养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学员多达五、六十人。1921年4月，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又从这批学生中挑选二、三十名团员分批赴俄，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汪寿华、任弼时、肖劲光、李启汉等。他们先后进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造就了一批党的干部。

第四，积极推动各地建党工作。

上海小组建立以后，积极推进各地的建党工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均与上海小组及陈独秀有关。1920年1月，李大钊陪同陈独秀去天津时，在路上共同讨论了建党问题。陈到达上海以后，与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时有书信往来；张国焘、张申府到上海时，也和陈独秀讨论过建党问题。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建党主张，认为“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① 据此，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0月正式成立。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也得到了上海小组的支持。陈独秀首先将他在留日时结识的刘伯垂介绍入党，然后派他去武汉筹建党的组织，李汉俊还亲自去武汉找董必武，要他“负责组织党的湖北支部”。^②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同“五四”时期在山东有影响的人物王乐平联系，要他在山东筹建党的组织，王乐平转告和他有联系的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日本东京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均为原上海小组成员，陈独秀指派施存统为旅日小组的负责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在陈独秀推动下由原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组成的。实际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在筹建党的活动中，对推动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是一个起作用较大的组织，是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李大钊于1920年1月在天津旧俄租界（特别一区）

①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

② 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

会见苏联友人，相互交换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返京后，又和邓中夏进行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为建立共产党作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是年 3 月正式成立，但在一年后才公开宣布。8 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从北京去上海，同陈独秀研究了建党问题。张申府返京后，将和陈研究建党的情况，告知李大钊，一致认为必须尽快建立组织，发展党员，于是发展了张国焘。10 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张申府去法国后，李大钊做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吸收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王竟林等 6 人加入小组。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人。由李大钊主持小组工作，并兼任组内外的联络任务，张国焘担任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创办《劳动者》周刊，并负责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由于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加入，因而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很快发生了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严重分歧。一是无政府主义者持自由联合观点，不赞成有严密组织，反对党的纪律和严密的分工；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否认这一点就失去了共同斗争的基础。经过争论，在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最后，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了小组，他们负责的《劳动音》由罗章龙接办。

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以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人转为正式党员。1921 年 1 月末，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此后，继续发展党员，到 1921 年党的“一大”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 12 人。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也积极开展活动，主要有：

（一）进一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2月初，李大钊发起在北京大学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以“互助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还投入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李大钊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自由与秩序》一文，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个人绝对自由的谬论，正确地阐明了个人和社会、纪律和自由的关系。何孟雄在《曙光》2卷2号上，发表《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一文，尖锐地批判了研究系分子张东荪之流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指出：“若是不幸真采取了资本主义，我国的实业愈发展，则人民愈论于不幸的境遇中”。因而，中国要发展实业，就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只能实行社会主义。

（二）积极在工人中开展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1920年11月出版《劳动音》周刊，用具体事实和典型事件对工人群众进行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如在第1期上用很大篇幅报道了“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还以“几十分钟死工人五、六百”、“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然而工人一命只值60元”为标题，揭露官僚买办对工人残酷压榨的事实。它还进行对工人历史使命的教育，强调工人要求解放，必须“组织工人会”，以推翻反动政府实现社会主义。由罗章龙主编的《工人周刊》，报道了各地工人遭受残酷压迫剥削的事实，号召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维护工人阶级自身利益的斗争。1921年1月1日，北京小组委托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在工人比较集中的京汉路北段长辛店地区，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先教工人识字，再讲革命道理，把提高文化水平和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曾去该校视察或讲课。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从而认识了组织起来的必要性。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组织领导下，举行群众大会，宣布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即工会）的成立，它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工会之一，《共产党》月刊赞扬它“不愧于北京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便教育青年和壮大革命队伍。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邓仲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颉、吴汝明等40人左右。会议推举高君宇为青年团书记。青年团成立后，大力组织青年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团员。

（四）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1920年11月，李大钊派张太雷回天津，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并出版《劳报》，报道有关天津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1921年1月，张太雷去苏俄后，于方舟在北京小组和李大钊的帮助下，将原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后来天津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李大钊还派张国焘和天津青年团组织的团员一同去唐山了解工人状况，并找邓培研究组织基层工会问题。北京小组派青年团员去唐山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6日正式成立，首批团员7人。1921年4月，李大钊委托高君宇返回家乡山西太原，在其帮助下，5月1日正式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夏秋之交，李大钊派人去济南和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联系，从而促成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活动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五四运动后，武汉进步社团和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继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创办的互助社、新生社之后，又出现了健学会、辅仁社、黄社、人社、日新社和利群书社等社团以及《向上》、《教育旬刊》、《教育改造》、《共进》、《新学生》、

《互助》、《我们的》等传播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1920年春，董必武、张国恩等在武昌创办了武汉中学，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阵地。恽代英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它既是武汉湖北地区进步社团的联合组织，又是一个经销各种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的书店。武汉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经常到这里阅读，探求革命真理。因而，该社实际成了湖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的主要阵地。

通过五四运动的革命实践，湖北的革命知识分子清楚地认识到新兴的工人阶级是一支伟大的力量，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依靠这一社会力量。因此，他们决心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宣传“劳工神圣”、“劳工解放”和社会主义思想，启发工人觉悟。创办平民教育是武汉进步分子接近工人群众的一个途径。1920年2月，武汉学生会“以开愚昧，而救国危”为宗旨，开办了通俗夜校，招收各种工人入学。汉口青年会成立了通俗学校，招收“15岁至22岁的贫民”。^①3月，武昌学商联合会决定创办平民教育社，并推恽代英、刘功辅起草了宣言书。

湖北、武汉地区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觉悟的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革命社团的普遍建立，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其成员李汉俊就写信给董必武等人，建议筹建湖北党的组织。不久，李汉俊又亲自来武汉和董必武商谈建党事宜。随后，董必武又先后找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赵子健 酝酿建党。与此同时，曾在广东参加《惟民周刊》的刘伯垂由广州回汉途径上海时，由陈独秀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旋即委派他回汉口与武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同筹建湖北党的组织。经过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的积极

1920年秋，在武昌抚院街（现民主路）董必武、张国

^① 《汉口新闻报》 1920年3月22日，1920年6月8日。

恩的住宅召开秘密会议，与会者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 7 人。会议由刘伯垂主持，会上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随后由刘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议决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还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 5 号作为党的机关，并在门外挂上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以便掩护党的秘密活动。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过小组成员的培养介绍，又发表了一批党员，有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师刘子通、黄负生等人。

1920年11月7日，由董必武、张国恩、郑凯卿等人发起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布以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同时，在汉口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开始有组织地去纱厂、铁路、码头找工人谈话，讲解工人解放的道理，采取办夜校、识字班的方法，传授知识，通俗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工人们觉悟。包惠僧撰写了一篇《我们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发表在 1921 年 4 月 8 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上，号召工人们“快快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福利”。

武汉小组还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 1921 年春创办《武汉星期评论》，作为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活动阵地。小组成员李汉俊、林育南、董必武、陈潭秋等人都为该刊写了不少的短译和文章，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起了一定的作用。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五四运动后，由毛泽东任主编的《湘江评论》比较集中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20 年 8 月，毛泽东发起创办文化书社，经销马克思书籍和报

刊。据1921年3月底统计：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科学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解说》、《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动政府与中国》、《新青年》、《劳动界》等164种书，50种杂志。它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学习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8月22日，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人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搜集俄国十月革命和劳农政府的书籍供会员学习阅读；派人赴北京与俄国代表接触，联系留俄考察事宜。他们还接办湖南《通俗报》，由谢觉哉担任主编，刊载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问题、殖民地问题、苏俄情况的介绍、留法勤工俭学的通信，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10月，毛泽东、彭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了以工人为主体的1万多人“双十节”游行，提出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书。11月7日，又举行庆祝苏俄十月革命3周年的大示威，“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起来”^①。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并与湖南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毛泽东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他在筹建小组的过程中，同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着广泛的联系。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向北京、武汉、长沙等发信，相约建党。毛泽东收到来信以后，开始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时，特别注意党员质量，严守秘密。从回忆材料看，初建小组时，成员有6人，至党的“一大”召开时，发展到10人，其中可以完全肯定的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3人。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1页。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因湖南处于军阀惨残暴统治的高压下，无法公开活动，不得不采取隐蔽的活动方式，以个人或群众团体的名义开展各项活动。

毛泽东经常向湖南《大公报》、《劳工月刊》推荐《共产党》月刊、《中俄通讯社》的重要文稿，在湖南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冬，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师，创办了民间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招收附近工厂工人学习文化，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发展史，提高工人的觉悟。是年秋、参加过天津学生运动和北京工读互助团的黄爱和庞人铨回长沙筹备湖南劳工会，得到了何叔衡、彭璜的支持，何被邀为名誉会员。湖南劳工会于11月21日建立后，设立了两所工人夜校，一所平民阅览室，成立了女子新剧组，出版《劳工月刊》。大力开展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提倡工人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使命而斗争。长沙小组积极支持湖南劳工会的活动，还帮助湖南劳工会开展“五一”纪念活动。1921年“五一”，有1000多名工人在湖南第一师范礼堂举办了游艺会，湖南工人首次纪念了自己的节日。1921年9月，毛泽东、彭璜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使之成为一个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特别注意组织和发展青年团的工作，1920年10月，开始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刘少奇、彭平之，张文亮首批加入，截止到1921年7月，共发展团员39人。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为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广东共产主义小组

五四爱国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广东得到了传播。广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杨匏安。从1917年7—12月期间，他在《广东中华新报》的《世界说》专栏中，连续发表40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21年春，陈独秀到广东后，先后去一些学校和女界联合会讲演，并在报刊发表40多篇文章。

章，旗帜鲜明地宣传劳动创造世界，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林修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公开宣布：“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情形最后合适”。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通过组织各种团体，出版刊物，举办平民夜校和职工学校，向职工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自觉性，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推动广州的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0年1—12月，省港两地工人举行罢工达17次以上，参加罢工的包括各个行业，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罢工突破了行业界限。1920年4月，香港机器工人要求工资，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行业的5500工人参加，从而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因而在罢工斗争中，使众多的工人越来越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广州香港等地纷纷成立工会组织。1920年3月间，香港海员正式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特别是工人中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就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920年7月，在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并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回到广州，分别在广州高等院校任教，他们不时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10月20日创办了由陈公博任总编的《广东群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启发和提高广东工人阶级的觉悟。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陈独秀即函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建立广东党的组织，他们表示赞同，并决定首先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下半年正式成立。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崧等数十人参加，以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逐步发展党员。

同年8月，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米诺尔·别斯林来广州建立俄国通讯社，到达后即与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于年末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在这组织的9名成员中，除上述2人外，其余7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

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参加。

1921年1月，陈独秀到达广州后，即先后与米诺尔·别斯林、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等人联系，然后把他起草的党纲交给他们讨论，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尖锐的争论，也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于是无政府主义者便全都退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均赞成陈独秀的主张，经过酝酿，于1921年春，建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陈植棠负责宣传工作，小组成员有9人。

广州小组成立后，以《广东群报》作为小组的机关报，开辟“评论”、“研究”、“杂著”、“马克思研究”、“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专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报道工人运动情况，生动活泼，深受革命知识青年欢迎。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向广大劳动群众和妇女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了推动和帮助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培养基层宣传骨干，学员毕业后分派到基层工作，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

广州小组还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使各工会组织有较大的发展。至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建立各种行业的工会33个，并发动了多次政治、经济的罢工斗争。在此基础上，广东小组于1921年通过各种工会组织广州工人集会，隆重纪念“五一”劳动节，散发传单，号召工人阶级革命，掌握政权。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为共产党组织在广东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创建的。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时，他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起草了一个十余条的党纲草案。20日施存统抄了一份去日本东京。上海共产

主义小组建立后，施存统和陈独秀、李达经常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达还介绍施存统同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了日本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小组负责人，小组也只有他们 2 人。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组织读书小组，参加者多为留学生。施存统和周佛海时常给国内写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施存统先后在《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等文，周佛海在 1921 年 1 月和 5 月，在《共产党》月刊上先后发表了《我们为什么主张社会主义》和《夺取政权》等文章。1922 年以后，他们二人先后回国。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是在旅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建立起来的，它的产生有相当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20 世纪初 中国旅法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逐渐增多。到 1920 年时 旅法华工总数达 16 万人之众。他们分散在各厂及前线工作 处境十分悲惨 因而在欧洲工人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影响下，逐渐觉悟到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为此，于 1919 年 10 月 马志远、袁子贞将华工工会、中华工团、华工公会三个团体合并，成立了旅法华工会，并设立了 63 处分会，以“巩固中国工人团结力，扩张中国工人知识范围，增进中国工人物质及精神生活程度”为宗旨。有会员 4000 多人。巴黎和会期间，旅法华侨，主要是华工，1 万多人举行集会，并包围北洋军阀政府出席和会的专使馆，反对代表在“和约”上签字，表现了它的阶级力量和高度的爱国热情。

五四运动前后，在我国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高潮，1919 年春至 1920 年末，先后有 1600 多名青年纷纷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到达法国的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陈延年、陈乔年、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傅钟、肖三等。他们同法国工人和华工一起劳动生

活，利用欧洲的有利条件，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并帮助华工学习文化知识，在华工中传播新思想。许多人在同旅法华工的结合中，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这就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有一个过程的。以蒙尼达为活动中心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曾计划在法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与李立三等人就此事多次交换意见。但没有实现，1920年6月，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赵世炎到达巴黎。不久，参加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筹备会议的陈公培携带一份抄写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党纲去了法国。1920年12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应吴稚晖的聘请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当逻辑学教授。他到达法国后，先发展和他同船赴法的刘清扬入党，然后由他们二人发展周恩来入党。1921年4月中旬，由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组成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为张申府。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参加和领导了1921年勤工俭学学生发动的三次群众斗争。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中国驻法使馆以对赴法勤工俭学“脱卸一切经济责任”、“维持费发至2月底”相威胁，企图将没有工作的勤工俭学学生“分别遣送回国”，激起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大愤慨。为此，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于2月28日上午齐集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生存权和求学权”。驻法公使馆被迫允诺延长发放了3个月救济金，华法教育会答应为没有工作的学生寻找工作。周恩来曾把这一斗争情况写成通讯，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揭露中法当局欺骗和镇压勤工俭学学生的真相。赵世炎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组织了勤工俭学同盟，并进而联合各种勤工俭学团，成立了勤工俭学会，“一边力

求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①1921年夏，北洋军阀以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的修筑权为条件而向法国借款。周恩来和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联合巴黎各华人团体展开声势浩大的拒款斗争。1921年6月30日，在巴黎召开了有300余人参加的第一次拒款大会，由赵世炎主持，通过了要求取消借款的决议。8月13日，由旅法各团体成立的拒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群情激愤，痛打驻法公使陈篆的代表王曾思秘书，迫使他在大会通过的反对中法大借款的决议上签了字，从而使拒款斗争取得胜利。拒款斗争结束后，法国政府停发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并取消送勤工俭学学生入里昂中法大学的许诺。1921年9月，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125名学生，分批向里昂进发，展开了进驻中法大学的斗争。中国驻法使馆竟与法国当局合谋，罗织罪名，将留学生拘禁起来，并将其中的104人押送回国。这次斗争遭到了失败，但却使许多留学生放弃了工读主义救国的幻想，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及其一系列的努力和斗争，又在干部上组织上给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样，把各地分散的党组织统一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任务，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为此，1921年3月，召开了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的会议。“当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规定了我们组织的机构与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待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同业工会和行会、对军队中的工作以及利用文化教育团体的态度，同时，也表

^①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

明了对于工会当前任务的态度”。^①同年6月3日，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克·斯内夫利特，荷兰人）到达上海，受国际工会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斯基派遣的弗兰姆堡和接替维经斯基的远东局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先后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相互多次磋商，马林正式提出了尽快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得到了上海小组的赞同，并决定由李达、李汉俊发信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德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开幕。参加大会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共13人。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刘仁静、张国焘；山东，王尽美、邓恩铭；广东，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在大会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先后讲了话。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第三国际的使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贡献。根据他在瓜哇建立共产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柯尔斯基介绍了赤色职工会工作及其任务。会议听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工作情况报告后，集中地讨论了党的基本任务和党章中的组织原则问题。

会议在建党的主要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在当前的斗争任务和斗争方法问题上，李汉俊提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尚属幼稚，因此，党员首先

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青年中国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612—613页。

用马克思理论武装知识分子，然后再大力进行组织教育工人。目前，共产党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刘仁静反对李的意见，认为党应立即开展工人的组织教育工作，在工人中发展党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任何形式的公开工作。大多数代表也不赞成李汉俊的意见。在对南北政府和孙中山的态度问题上，代表们一致认为北洋军阀政府是反动的，必须反对，但对如何认识对待孙中山的领导的南方政权及基本态度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包惠僧等人认为，孙中山好说大话，南、北方政府都搞军事独裁，代表资本家利益，是一丘之貉。因而不能与南方政府和孙中山共事。董必武、李汉俊等多数代表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应肯定孙中山从同盟会成立以来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南方政府要比北方政府好，但未取得一致意见。

在共产党人要不要参加资产阶级国会的问题上，发生了较大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进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希望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的社会是无益的。即使试作一下也是无益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救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会对国会抱有幻想，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采取彻底的手段”。^①

大多数代表反对上述意见，“认为：采取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采取共同行为，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而进攻，我们不当参加国会，而应在国会外进行斗争。而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使我们情况有任何好转，加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也只有利用国会才能使我们情况好转，才能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②

^① 《“一大”前后》（一）第21—22页。

^② 同 第22页。

这一争论同样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在大会通过纲领和决议上，规定“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进取的政策，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和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①从而否定了共产党员担任政府官员的参加议会的意见。

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30日，举行“一大”的第六次会议。讨论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刚开始就遭到了租界秘探的侵扰，被迫于8月初移到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最后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次决议，选举产生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纲领》确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四项纲领：即以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革命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有根本的区别。《纲领》还确定了组织制度和机构，提出党的组织要采用苏维埃管理制度，亦即民主集中制。组织形式，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 and 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党员的政治行为和工作必须取得党组织的批准和指导，各地方的工作必须受中央监督。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纲领》规定了党员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本党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被介绍人必须接受所在地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

《“一大”前后》（一），第8页。

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这一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确定，党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建立工会，在工人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开展工人运动。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

大会选出中央局作为党中央领导机关，下设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中央局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张国焘为组织部主任。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起来的，它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没有欧洲那样的贵族阶层，因而在中国不存在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上述条件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成为一个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并勇敢地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牺牲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工人阶级就有了坚强的战斗的司令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有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曾经有不少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其代表人物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统治，提出了许多所谓“救国救民”主张和建国方案，并为之奋斗，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科学思想的指导和阶级的局限，因而，都没有取得成功，包括同盟会领导的全国规模

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既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的阶级品质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因而才有可能认识掌握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争取中国革命获得彻底胜利的伟大起点。

后 记

《中国近代政党史》一书，是我们在学习、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上撰写的。参加编写的人员有：赵英兰、朱建华、李有清、苏贵民、李书源、朱兴义。初稿由雷家桓、李有清分章修改，最后由朱建华总纂定稿，李书源参加了部分章节的修改工作。

我们撰写《中国近代政党史》一书，力图阐明中国近代政党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中国近代政党的特征、阶级实质及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比较注意研究了中国近代各政党相互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面地评价了每个政党的历史地仁，认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

本书的撰写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出版的各种文献、书籍、报刊资料，并注意吸收了许多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但是，疏误之处仍在所难免、谨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0年4月

前 言

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下，逐步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已经丧失了独立地统治中国的能力，而侵略者却成了中国的“主人”，中华民族处于严重的民族危亡关头。因此，拯救祖国，挽救民族危亡，成了时代的要求。它促使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学习。

19 世纪 60 年代初兴起的洋务派，热衷于“西艺”，“师夷之长技”，追求“自强”和“自富”，结果是舍本求末，无济于事。甲午战争后 维新派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企图以君主立宪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因而对西方的政党与政党政治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他们认为立宪政治与政党的关系“犹如鸟有双翼”，政党“可以使暴政绝迹而不行，民情无微而弗达。”但是，慑于封建专制森严的党禁，维新派没能直接打出政党的旗帜，而是大力宣传和组织学会，从而出现了一个学会林立的壮观局面。这些学会或以救亡图存相号召，或以保国保种为宗旨，个别学会已经具有了政党的某些特征。但是，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也只有 103 天的寿命便夭折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矢志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制度，因而，政党便成了他们的斗争武器。他们先是建立了具有政党雏形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运用了党的组织方式和领导方式，以党纲的形式提出了一条较为完备的政治纲领，粉碎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保皇派的各种活动，把各种反清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终于

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胜利。资产阶级立宪政党虽然反对暴力革命，但他们大力进行的启蒙宣传和在国内发动的具有一定群众性的立宪运动，在客观上对革命起了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国的建立，掀起政党热潮，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虽然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是，多数仍是资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实行政党政治，是维护共和，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道路，成为独立富强之国的必然途径。

各政党以国会为舞台，抒发政见，批评时政，进行了一次颇有声势的民主宪政、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试验，促进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解体，使共和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但在国民党 1912 年全国进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企图组织内阁，使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受到威胁时，袁竟派刺客枪杀了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从而敲响了中国实现议会道路、政党政治的丧钟，最后袁世凯竟公然解散国会。这样，资产阶级向往的政党政治、议会道路也随之破了产。

辛亥革命以后，当共和制度遭受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破坏和摧残时，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奋起抗争，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反袁护国、护法运动，但大都失败。此间，立宪政党很多时候与革命政党相对立，同北洋军阀站在一起，图谋借军阀之力来削弱自己的竞争对手，发展党势，最后使封建军阀也“听命于我”，“左右天下”。但它也只能作为一种幻想而最后破灭。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是不可磨灭的。但它又无力完成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任务。这是因为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所致。它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妥协。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的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力量弱小，而且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内因使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缺乏坚定的斗志和彻底革

命的勇气。他们不仅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帝纲领，而且对帝国主义扼杀革命的行动也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在反封建主义方面也缺乏坚决性，民生主义在民国肇建之时，即被束之高阁。同盟会面对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的篡权窃国活动，一再妥协退让，直至以政权作交易，使共和制名存实亡。资产阶级立宪党较之革命政党具有更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反对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革命后又企图借封建军阀来发展党势，将中国纳入宪政轨道，实际上成了封建军阀的同盟者，有的甚至沦为封建军阀的附庸。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另一历史局限性是严重脱离群众。广大的农民是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但立宪党却以革命会引起下层群众暴动产生“内乱”为由，而反对以武力推翻清王朝；革命政党也只是把下层群众作为一种借用力量，因而使革命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失败是必然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组织涣散，内部派系纷杂，思想上严重分歧，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弱点。产生在经济成份多样，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思想统一、组织坚强、纪律严明的战斗的司令部，它建立伊始就存在着种种弊端。资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分为两大政党，革命党与立宪党，两党合作短而少，对峙多而长，直至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互相攻讦，纷争不已。各党内部成分庞杂、思想分歧，行动不一。资产阶级政党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改组，在思想上、组织上从未真正统一过，立宪党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它充分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力也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组织严密、力量强大的政党。

中国近代政党史表明，资产阶级政党曾经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的光辉胜利。但是它没

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国，取得彻底民主革命胜利的任务，只有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和完成，这是历史的结论。